遭 遇 警 察

“和谐社会”里的故事

徐友渔　华泽 编

目录

慕容雪村 东师古行记

前　言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谐社会”的口号与警察国家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最近几年，作为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与发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北非一系列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回应，中国的当政者越来越依靠警察力量来维持他们所谓的“稳定”。在对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丧失信心后，当政者对形势的判断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他们觉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即将燎原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对策是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他们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并在指导方针上提出“社会管理”即全面控制社会的概念。当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势已去，面临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这种恢复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企图既不得人心，又明显不能成功。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扼杀了社会的生机，毒化了社会的空气，当政者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但他们只是以“反华阴谋”的说辞来自欺欺人。

警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镇压行动，是极权-后极权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柏林墙倒塌之后，人们可以在反映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记录——展览、博物馆、电影、小说、回忆录，等等——中了解到警察形形色色的活动，体会到人们在警察制度下的遭遇、痛苦、不幸和种种感受。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值得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

必须指出，本书记录的中国公民与警察的遭遇，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远远不是全部。

我们只是把近两三年在网上流传的，我们手上现成的文章挑选了一部分收入本书，而没有做约稿、组稿的工作，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使得约稿、组稿无法进行。本书各篇文章的篇幅、体例、风格的不统一是这种困难条件的反映。

我们知道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们无法把他们的遭遇包括进来，也没有条件约请他们的亲友提供描述他们遭遇的记录。

我们还知道一些遭到警察刑讯和虐待的事件，对于了解历史真相，披露这些事件是必需的，但我们没有做这种努力，因为，虽然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得知，他们在出狱前受到严厉警告，甚至被迫作出保证，不得讲出他们的遭遇。为了免使这些受害者因为加盟本书而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舍弃了本来可以展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坚信，全面反映历史真相的时候终究会到来。

编辑本书的初衷和侧重点不是要反映当代侵犯人权的严重和残忍。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情况早已记录在案，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方向重复和增添新篇章，我们想反映的，是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活动的公开化、日常化。

与苏联东欧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严，中国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个别、例外的，而是大量、经常的，不是在暗处，而是在明处。他们可以打个电话就上你家，或者不打电话就来，长久以往变成常客；他们可以定期请你喝茶、喝咖啡、进饭馆，俨然成了酒肉朋友；他们可以在被监视对象的家门口、楼下、小区入口处安营扎寨，人手不够时大量雇佣保安、城管、农民工，每人每月只给一千多元，为了监视一个人雇八个人，三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这时警察像包工头，拉起一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队伍——可以

想见，这支队伍是不敬业、没有效率、没有士气的。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需要监控的公民太多，即使按照国家的恶法和警察的惯例也没有长期关押的理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做的空间，对人们的监控和短期扣押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出于“千万别在我这里出事”的心理，出于“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段敏感期”的命令。对个别人士，他们采取柔性方式：明明是扣捕和拘押，却要安排成旅游，入住宾馆，呆在度假村，他们要人们相信这是“人性化”措施，其实是想规避法律程序方面的难题；而对于绝大多数监控对象则凶相毕露，打、骂、侮辱、虐待，甚至对于身体残疾或身有伤病的人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大多具有法律意识和知识，还有人本身就是维权律师，因此，在遭遇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地利用现行宪法和法律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在此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自称的执法者根本不懂法，他们需要受害者向他们普法，当然，即使在了解相关法律之后，他们仍然做践踏法律的事。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多篇记录中看到，遭遇警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谓“执法者”面前宣传和捍卫法律的过程。许多公民在遭遇警察时表现出区别于以前的“臣民”、“顺民”的勇气，他们以现行宪法、法律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抗争，而警察的无法无天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法治不断倒退的明显标志。

本书指称的警察只是中国庞大警察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是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存在这种性质的警察。尽管中国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和黑暗触目惊心，尽管警匪一家的现象不是个别，尽管警察与黑社会合为一体在一些地方不是秘密，但总的来说，中国老百姓还是把警察视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力量，而不是威胁、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人们对那些在公路上辛劳执勤的交通警察，在边境、丛山和密林中执行危险任务的缉毒警察，对为缉拿凶犯而呕心沥血工作的刑侦警察，对一切为社会正常运行而坚守岗位的警察，充满敬意和爱戴，但这绝不包括政治警察，他们令人生厌和生畏，他们是警察中的异类，是通向公民社会的障碍。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当“建立法治国家”作为真正的政纲而不仅是口号提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缔政治警察。

放眼中国的未来，政治警察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滕彪，《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七 0 年代生于吉林省桦甸，一九九一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二 00 二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二 00 三年四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使滕彪成为了公众人物。当时已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的滕彪，与在北大读博士时的同学许志永、俞江，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即著名的“三博士上书”事件。此后，公民维权运动波澜迭起，“维权”一词开始成为时事关键词。也正是从这一事件开始，滕彪成为了中国维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不久，他与许志永等人一起成立了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1]（简称“公盟”）。在“公盟”的旗帜下，聚集了许多律师志愿者和公民志愿者，他们代理了大量的典型案件，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计划生育、强制拆迁、教育平等、刑讯逼供、酷刑、死刑，等等。

由于这类案件的敏感性， 被监控、被殴打、被跟踪、被绑架、被失踪，成为滕彪的生活常态。

二 0 一一年二月十九日，滕彪再次被抄家并秘密关押七十天，期间遭受了难以想像的身体及精神折磨。本书出版时，他虽被释放，但仍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无法放弃——记一次绑架

滕_彪

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

（一）

二 00 八年三月六日晚八点二十五分，我在万圣书园买完书，给妻子打电话，说再过十二分钟左右到家。

八点四十分左右，刚把车停下，准备关车门的时候，围过来三、四个中年男子，一个突然猛拍我的肩膀问：“是滕彪吗？”没等我回答，他们就强行把我往一辆黑色轿车里塞；几秒钟以后我才明白发生了绑架！我开始拼命挣扎，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钟。我想这声音完全可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以及小区保安全都听见，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寡不敌众，被他们狠狠地反剪着手腕，动弹不得。被塞到车上之后，我已经喊不出来，喊了也没人听见，就立即冷静下来。

扭斗中，我的眼镜被弄走，车里一片黑暗。他们有四个人，我的左右各一人，牢牢控制我的四肢。他们给我罩上黑头套，一路上左边的人死死反剪着我的手，右边的人用后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后座上，我每一反抗，他们就用污秽不堪的话辱骂，尤其以左边的人最为恶

[1] 是一个通过法律援助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具体制度变革，推动公民社会成长，最终以实现国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目标的非盈利性公益组织。鉴于维权公益组织无法获准在民政部登记，只能在工商局注册为公司。

劣。

我开始想，这拨人究竟是谁呢？很有可能是“国保”[2]，与去年十月李和平律师被绑架那次非常相似，这一次，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荒郊野外，脱光衣服，拳脚，电棍，扔到路边，打车回家……不到两年，亲眼见到的政府绑架行为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山东临沂，陈光诚案开庭前一天，重要的证人陈光余被绑架；另一次是在我家楼下，陈光诚的妈妈和孩子被山东警方绑架。其它的就更多：二 00 五年九月六日，陈光诚被绑架；二 00 六年八月十七日，高智晟被绑架；二 00 六年二月十六日，胡佳被绑架；二 00 六年四月十六日，刘正有被绑架；二 00 七年九月三十日，李和平被绑架；二 00 八年一月十四日，齐志勇被绑架；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权案件中，以绑架的形式来对付当事人、证人、律师，常有发生。

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我的身子骨还承受得住。但这伙人凶神恶煞，如果不是东厂而是土匪，那麻烦就大了。在办案中得罪过一些官员警察，他们要跟我玩黑的，那就比较惨。卸掉一个胳膊一个腿，或者像傅先才那样被打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人到这个时候，就得认命。

四十多分钟以后，车停了，从附近的狗叫声感觉，是在郊区农村。几个人从车里出来，押着我到一间屋子里，自始至终我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姑且将他们四个称为 A、B、C、D，匿名的暴力、匿名的罪恶。

摘下黑头套，他们命令我在屋子中间站着，一张张凶横的脸围着我。一个人说，“把衣服脱了！”心想糟了，要开练。我没动。不料他说：“把外套脱了，屋里热。”

一个人开始训话，叫他 E 吧。E 也有可能是 A、B、C、D 中的一个，但无法证实。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你们是谁？干什么的？”我大声反问。

“我们‘市局’[3]的，不是黑社会，你放心吧。”

“你们有证件吗？”

“现在不是时候，需要的时候会给你看的。”

我的左手腕被他们掰得很痛，就不断地来回活动，像拳击选手上场前的准备动作。

“怎么，要打架啊？”E 说。“再这样动，我们的枪走火了怎么办？”“哥几个等你一天了，你要是再拱一拱火，能有你好受的吗？”

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我突然想起，早晨岳母来的时候，说楼下有个可疑车辆，发动机开着。我想无非是昌平“国保”想在“两会”[4]期间看一看我，例行公事，没什么好怕的。往下一看，不是那辆熟悉的桑塔纳，应该跟我没关系，原来就是这个作案工具！

我只是盯着他们看，不说话。站着，往上看顶棚，尽量不低头。房间里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窗帘严严地把窗户堵住。此外两盏灯，一个暖气片，别无他物。正前方的那盏灯，正对着我的眼睛，没点亮。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访民说的“特提室”，我猜那东西很可能是强力灯光兼录像设备。不管怎样，这里不是宾馆也不是民宅，肯定是审讯室了；第二天趁他们

---

[2] 指各级公安部门所属的国内安全保卫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的简称，即秘密警察，主要监控包括政治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访民以及所有被其认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人士。

[3] 指北京市公安局。

[4] 指每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开门的时候，我还看到走廊对面也有个几乎同样的审讯室。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如实回答，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最担心的是家人。而且下午一直在书店看书，现在又累又饿。我提出条件：“让我回答问题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给爱人打电话，第二要吃饭。”

他们说：“按照规矩电话不能打，但仍然可以考虑。”然后开始训话，这伙人是洗脑专家，有极强的演说欲，可讲出来的都是些陈词滥调，思想贫乏、逻辑混乱。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人回来说：“电话不能打，但可以发个短信。你准备说什么啊？”

“我只想告诉她让她别担心。”

“你就写：在和朋友谈事儿。”

接过来手机，我写道：“老婆，别担心，照顾好孩子。在和朋友谈事儿。爱你的老公。”他们审查了一会儿，觉得不是在传达其它的信息，就让我发送了。时间是二月六日晚十点四十五分。

她用不着判断是否我本人发的，就可以知道，我已经“出事”了。因为我平时出门不会用“照顾好孩子”，“爱你的老公”这类词，这也正是我的用意。

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拿来盒饭让我吃。油麦菜已经凉了，不新鲜，也不够吃。F 说：“吃吧，里边更素。”“里边”指的是看守所。他们多次暗示，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那里面日子更难过。

（二）

E 说：“判你个十年，等你出来成老头儿了，还能干什么呢？”

“别跟政府作对。我们把你饭辄弄没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饭辄就是工作、谋生方式。他们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对入狱前和出狱后的一些思想犯，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E 说：“你在这儿的时间长着呢。一会让我这位同事给你宣布一下纪律。”F 体格粗壮，三十多岁，后来知道他是看守人员的头儿。

“第一，早晨六点起床，进行操练；第二，警官进出要起立，喊警官好；第三，如实回答问题，声音要大。”

第二项，明摆着是要侵犯人的尊严。给这帮专门以思想自由为敌的秘密警察起立，真是没有天理了。

两个打手虎视眈眈的坐在我的两侧，随时准备动手。我得想办法消极抵抗。

我也知道，那个像探照灯似的东西， 一定同时在对我进行全程录像。我尽量要在每一秒钟都保持平静和自信。

之后进来另外两个人：按照出场顺序，应该叫 G、H。他们专门负责问话和做笔录，大概是预审处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起立，E 说：“你是不是把规则忘了？”我懒洋洋地站起来。但不说“警官好”（后来我一直坚持不说，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起立；在进门的时候，慢慢地做出要起立的样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有时候我在吃饭或写东西，就装做没看见他们进来，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E、F 都出去了，屋子里剩下 G、H、我以及两个看守 I、J。看守共有 I、J、K、L、M、N 六个，三班倒，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吃饭、睡觉，上厕所，思考问题，总有两双眼睛在近距离逼视。一下子想起《一九八四》里的电幕。按我的理解，二十四小时严密看守大概有三个目的：防止逃跑；防止自杀；另外就是汇报被看守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情绪变化，据说他们有专门的洗脑专家，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一个人的弱点，然后展开心理攻势，随时调整洗脑策略。不过大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着真的很滑稽，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小的侮辱。

G、H 开始正式问话。G 主要问，H 主要记。问话中也掺杂着大段大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六日晚的核心问题是： 你从农村考上北大，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也有不错的家庭，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专挑政府的毛病，还写文章拿到海外去发表，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政府做好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表扬，你眼中还有没有国家利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G 说到在海外发表文章和爱国主义的时候，H 好像有点激动，插话道：“崇洋媚外，臭卖国贼。”我用蔑视的眼神盯着他，不说话。不过这些洗脑工作者也一样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应该同情才对。

G 还不错，不是毫无人性的那种。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和我有相似之处：出身贫穷，一九九二年上大学，也经历了一九九三年申奥失败的场面，等等。他说:“你首先想到给老婆打电话，说明你还是有责任感的，这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多为国家负些责任？西方人本来就不了解中国，你又专挑黑暗面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什么了？”（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什么民主，什么维权，你还是多为自己家庭想想，你进了监狱，老婆孩子怎么办？”）

等他们全说完，我开始讲：“我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很了解。上大学学了法律之后，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更有责任作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我觉得必须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说真话也有风险，而我觉得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最悲惨的人去承担。”

“我在一些场合和一些文章里也肯定了中国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我认为这种进步主要是由民间付出了不少代价争取来的，但我也不否认体制内的人做出的努力。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我绝不会做歌德派，一味歌颂赞美，拍马屁。我觉得政府只要做一点儿好事，有一点儿成就，就会有大批大批的文人、记者、学者去歌功颂德，绝不缺我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要找毛病，即使在一个制度不错的社会里，也永远有各种弊病。”

“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同样对家庭成员负有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一个都不能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做着艰难的平衡。我当然不愿意进监狱，但决不害怕进监狱。”

他们拚命想把我的文章往刑法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靠，我说：“我爱国家，爱人民，从来如此，也不会改变。我觉得指出国家、政府的缺点错误，积极地帮她改正，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热爱。忠言逆耳，隐瞒和欺骗只能害了她。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知识分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知而不言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对祖国如此热

爱，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我专门研究法律，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

（三）

凌晨两点多，才允许我睡觉（二00八年一月十八日的另一次绑架，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对我审讯，持续到半夜十二点，由于当天早晨不到五点就起床，晚上十一点时我已经受不了了，不断地说：“我困、我困”，笔录是在那种情况下做的）。他们从外边搬来一张床垫，我倒头便睡。

不许熄灯，两个看守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比我更不自由。

还好，他们没有在早晨六点叫醒我。不知道几点时我睡醒了，看到看守困倦的样子，我说：“你们辛苦了。”完全没有挖苦，只是觉得心疼。他们既是看守，又是打手，他们在剥夺别人自由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他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自己的人性何尝没有受到摧残？

叠好被子，洗脸，吃早饭，等着他们继续讯问。

七日上午问话的还是 G、H。他们拿着打印好的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包括《奥运前的中国真相》、《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抓捕胡佳意味着什么？》、《关于<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的说明》、《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等等，共有十五篇左右，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显然这些是他们认为“出格”的地方。一页一页地让我签字，逐字逐句地讯问。

G 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刑拘、逮捕、审判、坐牢；另一条路是态度好一点，争取宽大处理，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他对我印象不错，说我人品很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有意思的是，他离开之前，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调对我说，“滕彪，你就违心地说两句认错的话吧，算我求你了。”他既是为了我好：有个好的态度，可以从轻发落；同时，在笔录上如果反映不出来我的“思想转化”，恐怕他也过不了关。

在里边呆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个制度就越憎恨，同时对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的自由。哈维尔讲过这样的话：极权制度下，没有人仅仅是受害者，而不同时是(或多或少的)同谋。换言之，也没有一个施害者不同时是受害者。比如，面前这些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没有能力分辨善恶的人，他们一定有各自的难处、尴尬和痛苦。

只剩 H 一个人做笔录，两个看守、我，参与这样一幅画面我觉得有些尴尬，这是二十一世纪，一些中国人在真真假假地帮另一个中国人洗脑。想起《窃听风暴》里的那位作家，他的生活，感动甚至改变了那个在暗中的监视者。我从这些人的问话中了解到，他们仔细看了我写的所有文字，我觉得他们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果对他们有所触动，我就没有白费心血，为了这一批认真的特殊读者，我也不应该停止写作，还要努力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大约下午两点，H 问完了出去，我可以歇一会儿了。

在没有讯问人员在场的时候，也很可能在对我全程录像，我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是非

常宁静而坦荡的，没有恐惧和慌乱，没有沮丧和懊悔，没有投降作交易的可能性。监狱可以囚禁人的身躯，却无法锁住灵魂的高贵。我闭目养神，轻轻地吟诵我会背的唐诗宋词，从五言到七言，从《将进酒》到《春江花月夜》；静静地回忆着我最心醉的音乐旋律，从贝多芬的《命运》到莫扎特的《G 大调第 13 小夜曲》。

昨天梦见我从北大四十一号楼偷偷溜出来给爱人打电话，电话里说自己被看管着，必须设法出去。昼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太想打这个电话了。——四十一号楼是我读本科时住的地方，也许今天的囚禁象征着我上北大以后的必然宿命？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召唤以后的必然宿命……

想家、想孩子。巧儿到姥姥家已经两天了，正好我这两天工作忙，没去看她。昨晚给妻子打电话就是要和她一起去接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一个月，一年，三年？虽然这些家伙威胁可能十年，但我觉得不可能。五年是个杠，凭我这几篇东西，过不了五年那个杠儿，不能以李元龙四篇文章判两年那个标准，那是近年来以“煽颠罪”入狱的作家中“单价”最高的。何况外界的声援也许会让刑期打个八折……

很多话想和爱人说，用心做了首诗，用脑子把它记住，下午要了一支笔，把它写出来，就叫《狱中致爱人》吧。诗被看守搜走了，但愿他们把它当成文学作品，而不是藏头诗或政治檄文。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融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

（四）

有了纸和笔，舒服多了。练字，默写唐诗。从小就喜欢书法，心仪于书法创作时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看守中如果有懂书法的，将来也许会允许我把家里的笔墨纸砚带进来……

下午，F 来了一趟："你还有闲心写诗！赶紧写写你的思想认识。我是负责看你的，跟他们怎么处理你没有关系。我这是为你好。以前从这儿出去的，都写。依我的经验，写得好的，出去的也快。"

去他娘的思想认识！

——好，我写。把昨天说的那些东西整理整理，写成《我的感想》：拒绝谎言，说真话，关注人权、推进法治、自由思考、独立批判，知识分子责任，等等，落款是"中国公民滕彪"。

F 看了说："你这么写还不如不写！这些东西上面看了能高兴嘛？你看看能不能再写一个？这个我给你保管吧。"他拿走了，连同那首诗。

"上面"肯定看了这份"思想汇报"，连同那首诗。F 想套我写更多的东西，我却不再写了——再写没准儿"上面"更生气，后果更严重。

晚饭后，E 又训话，之后说："我们领导一会儿来，说明对你的这个案子还是很重视的。""领导"很快进来了，个子不矮，身体壮实，短发，看样子不到四十岁。按字母顺序应该叫他 O。

O 是个演讲狂。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不停地讲他的大道理。有人插话都被 O 打断："我还没讲完"，讲完就走，没给我反驳的机会。我知道一些思想僵化的教授总是讲完就溜，不给学生质疑的机会。

"国保"做思想工作，我见过不下三、四十次，绕来绕去，跑不出四、五种路数。O 也不例外，要点简记如下：

1、民族主义论：哪个国家没有缺点？美国就好啊？美国干我们这一行的比中国多多了。在境外反动网站发表诋毁我国政府的文章，这是什么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这样的成就容易吗？你去过故宫吗？看看故宫那里面盛水的大缸，看看那上面的刀印儿，帝国主义侵略者把上面的镏金都给刮掉了。我们今天落后，难道跟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关系吗？

2、以卵击石论：我这次来主要是要告诉你，政府不怕你。政府怕过谁？不要企图和强大的政权作对。魏京生、徐文立，名声比你大多了，说判就判了，我们犹豫过吗？你算个啥？被我们（部门）盯上，还有你好果子吃吗？以后你甭想出国了！我告诉你，无论你这次什么时候出去，你甭想再做维权了！赖斯这次来也提到了胡佳的案子，你知道我们外交部怎么回答的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律，用不着你们管！”高智晟怎么样？现在老老实实的，我能把他叫来给你做思想工作你信不信？

3、恶法亦法论：有人说应该废除刑法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别跟我谈这个，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这一条。只要它不废除，它就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就要执行它。如果不执行，那就是我们失职。办了高智晟，来了胡佳，抓了胡佳，又出来个滕彪，你还要“继承胡佳的事业”，那好，我们就要用一百零五条来对付你！

4、家庭责任论：你现在多好，有车有房，你开的是福克斯，我开的是奇瑞，你房子一百四十多平米，我九十平米。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和睦，多想想对家庭的责任。孩子那么小，将来孩子问爸爸去哪了，让妈妈怎么回答？

但 O 对我本人也表示尊重，他说：“除了你的妻子和直系亲属，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你人品很好，人性很好，写的文章也不错……”——一个好友在我出来之前安慰我的妻子说，我人品好，在里边可能不会被打。我觉得未必，不是所有“里边”的人都了解你的人品，而且“不打好人”如果是他们的原则，“不抓好人”应该也是。

O 最后说：“正式的司法程序我们也能走，但是太麻烦，要这个证那个证的。我们还是本着教育和挽救的态度，再给你一次机会。不但要看你这次怎么表态，还要看你以后怎么做。”

晚上十点多睡觉，一夜无话。

（五）

早上六点被叫醒，洗脸后，在房间里活动身体。

G 来了，问我有什么考虑。

我说了几点：

1、我的文章个别句子和用词的确有不恰当的地方，以及引用后没有调查核实的地方，以后会注意。

2、我以后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

3、奥运结束之前，不写关于奥运会和胡佳案的文章。（这一点是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市“国保”对我的要求，有我自己写的书面声明。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不答应就马上让学校开除我，答应了损失也不大，这次绑架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无非是让我少写东西。）

妥协是必须的，为了早点儿回到家人身边。但要守住底线：不能伤害他人；不能和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比如接受他们提供的工作，为他们提供消息之类；不能认罪；不能放弃以后写作的权利。前两条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违背的原则。（但如果有人在酷刑之下或者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之下写了保证书或悔过书，我完全理解。在绑匪的胁迫之下写下“我热爱绑匪”难道有什么可耻吗？威胁恐吓之下的保证能算数吗？哪一种事业比一个人承受肉体上

的痛苦更重要？哪一种信仰或理想会因为一个人被迫表示放弃而受到损害？）

之后我说，“我希望你们四十八小时之内放我，也就是今晚八点四十分之前。因为：第一、我岳母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她在一九九八、二000、 二00二、二00五、二00六年都犯过病。如果我出事，她很可能再犯病；第二、我每天要接送孩子去幼儿园；第三、我周一要讲课，至少得花一天时间准备；第四、我的朋友肯定要联名呼吁，人权组织也要呼吁和抗议，媒体也少不了报道，这对政府形象不利；还有一些机构会在失踪者四十八小时没有消息后做出反应。我没有威胁的意思，都是为了政府和奥运形象考虑。”

“最后一点，如果你们今晚不准备放我，我需要些日常用品：内衣、牙刷、牙膏、毛巾、袜子、剃须刀，还要一些书。只要有书，我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多久都行，不给你们找任何麻烦。”

G去汇报了。几分钟后，给我拿来牙刷、牙膏和毛巾：“刷刷牙吧，但内衣我们解决不了。”看来是不准备放我。

中午G又来了，我问向“上面”反映了没有？他又说了一大套，核心思想是，放人。

午饭很好，在里面共吃了六顿饭，一顿比一顿好。

午饭后换了两个看守，P和Q。Q看了我写的钢笔字，问，你练过柳体？我说是啊，但练颜体更多些，对《颜勤礼碑》下过些功夫。他说他也写书法，有一段时间很郁闷，就写书法来调节。我说，是啊，书法能净化人的心灵……

G进来，把从我身上搜走的东西还给我，钱包、钥匙、手机。说“现在不能开机，到家再打电话。”

P、Q给我带上浅绿色的头套，G说委屈你了。我说，我理解。架我出去，客气地提示我：“抬腿”，“低头”，“上车”。

一路上G和我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他有个六岁的女儿，孩子她妈让她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兴趣班。我说这样不对，应该让孩子多和同龄人在一块儿玩儿，多接触大自然，带她到农村野地里去数星星，给孩子自由的空间最重要……。我们教育孩子不应该以竞争中取胜为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金钱、地位、名誉都不是最重要的，丰富的内心生活，体验幸福的能力，感受爱和美的心灵，才是一生享用不完的财富。

他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来我那些话里的双关语。

大约四十分钟，到了我家附近，摘下头套，和他们告别。一辆黑色捷达，没有车牌。

（六）

巧儿看到我，高兴地趴在地上，我抱起她，很想哭。

妻子没想到我能这么早回来，她说准备下午游个泳，把身体和情绪都调整到最好状态，投入漫长而艰巨的营救工作中去。

我抬头看表，下午一点四十分。

朋友们都说她的表现很精彩，和朋友商量对策、报案、接受采访，从容镇静，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她把我出事后发生的事情都详细记录下来：每个电话，每个采访，还有她内心的感受。

三月八日七点二十分，早上醒来，很安静，不敢多想，一想就要流泪。

三月八日七点四十四分，徐老师打电话问情况，让我别着急,我不能控制地哭了。

我不想让她再为我的失踪而哭泣。可我却不知道能否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在楼下挣扎狂喊了三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一看。派出所来调查，也没有人愿意作证。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他们争取自由和人权吗？”

值得。

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

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

注：感谢萧瀚、许志永、王天成、浦志强、王建勋、刘晓波、王德邦、李方平、韩一村、李和平、江天勇、昝爱宗、李苏滨、张鉴康、程海、王光泽、凌沧州、李劲松、童话大姐、曾金燕、范亚峰、沈浪、温克坚、张伦、杨春平、齐志勇、黎雄兵、张立辉、李剑虹、陈光福、李柏光、李晓蓉、张佳玲、张敏、张裕、陈昕、Albert·Ho、Jerome·Cohen、Eva·Pils、Mark·Allison、Keith·Hand、Jim·Yardley、蒲杰夫、舒海云、杜丽缇、夏明、赫林娜、玛莱雅、胡平、吕京花、杨建利、盛雪、王丹、王军涛，等等；感谢人权观察、维权网、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华援助协会、中国人权、世界反死刑联合会等。还有很多朋友、记者和机构给了我及时的帮助和温暖的问候，但我不方便说出你们的名字。

刘沙沙，本名刘琳娜，《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七 0 年代生于河南桐柏。

二 00 八年开始参与公民维权运动。探望郭泉，上街宣传《零八宪章》，声援“公盟”，率众怒砸黑监狱，围观声援赵连海案。二 0 一一年五赴临沂，发起了“围观东师古、探访陈光诚”活动。

后会有期！

刘沙沙

（一）

二 00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左右，我去南京师大，给郭泉媳妇李晶送去一份慰问礼物。东西放在门口传达室。然后回夫子庙，上网、吃饭，九点左右回旅馆。刚到总台，身后就跟过来一个小眼睛中年男子：“你是刘某某（我本名）吧？”

我说“是。”

他说“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的，请你和我们走一趟。”

我说“行，但我得先打个电话。”

他说“不行，不能打，手机得关机”。

我看他们好几个人，还有的坐在旅馆大堂那边的沙发上，就也走到沙发上坐下，笑着说：“我正好也想找你们交流一下呢。”

他们也笑，问：“什么时候到南京的？”

我说：“今天早晨。”

又问：“到南京干什么来了？”

我接着笑，说：“看郭泉来了。”直奔主题，不弯绕，我就是看郭泉来了。然后警察和我一起上楼去房间，我把零碎东西都收进背包里——我放在桌上的零钱硬币太多，我不想要了，结果一个警察替我收进包里，态度还不错。

上了车，我坐在后排中间，一左一右两个警察。车开动，他们就在车里问：“你为什么要来看郭泉？”

我“吭哧”了一下，在谈一些太高尚的话题之前，我总会这么“吭哧”的不好意思一下：“如果我说是为了——理想，你们会怎么看？但我确实是为了理想——民主理想。我认为中国民主改革，下一步肯定要走多党制的道路，而郭泉建党，是先走了一步。总之我来，就是为了——理想。”

车内静默几秒，估计他们直抽冷气：这年头，理想……

几秒钟后，警察问：“你认识郭泉？”

我说：“不认识，就是在 QQ 群里见到郭泉发的文章，新民党党纲什么的。”

警察：“那么你是仰慕他，崇拜他了？”

我一听就乐了："我不仰慕任何人，不崇拜任何人，我对政治人物一律平等看待。我只是看了他的党纲，赞同他的党纲里的一些内容，比如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什么的。当然我也不赞同郭泉的一些说法、做法。比如他砸汪直墓碑，我就觉得很傻，二愣子。再比如那个一千万党员的说法很不严谨。"

又是几秒钟静默。

我打破静默："其实我今天上午就想找你们去，和你们交流一下看法，关于郭泉，以及关于你们的工作方法改进什么的。"

警察："那为什么又没来呢？"

我"嗑巴"一下："嗯，还是有点害怕吧。"

开车的警察轻轻冷笑了一声。

到了某派出所（后来知道是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派出所），走到一楼楼道尽头，过一道铁门，上楼，再在二楼楼道里走过七八个办公室，他们打开一间办公室："请进。"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头一昂，眉毛一抬，欣喜地笑了一下，特振奋！特期待！啊，终于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站到革命的舞台上了！

但我没想到，坐下之后，光是那个温和的小老头警察一边问一边在电脑上输入我的基本情况，身份住址工作什么的，就琐琐碎碎弄了好久，把我的豪情都给磨碎了，思路也给打断了——这是一个教训，不要一进派出所就提起十二万分的斗志，还有一大堆琐碎事在等着你呢。哦，那个温和的小老头警察，我给他起外号叫"尖下巴"。

等到基本情况填完，他和颜悦色地问我："什么时候到的南京？"

我说："今天早上。"

然后突然旁边一个站着的白净方脸警察居高临下，很凶狠地："谁让你来的？"

我马上反击回去："我自己来的。"

他又逼问一句："到底谁让你来的！"

我一口咬定："我自己来的，没谁让我来，没人能'让'得动我！"

啊，对了，这个白净方脸警察，我给他起的外号是"郭粉"，以后大家能看到，他对郭泉的钦佩仰慕之情。

然后那个温和的中年警察"尖下巴"，看场面要僵，就在旁边和颜悦色地岔开了："你怎么知道郭泉的？"

"QQ 群里。"——这时，警察表现出了烦人的地方：同样的问题，问 N[5]遍。一个人问了一遍，换个人又问一遍，今天问了一遍，明天再问一遍，目的就是让你疲倦，也核对一下前后有没有出入。当然，也因为他们没啥词儿。

然后我就又讲了一遍：在 QQ 群里见到郭泉写的文章、党纲，我赞同的地方，不赞同的地方，赞同他的多党制，民主竞选，不赞同他的一千万党员的说法，不严谨，等等。他们个个点头称是，我说一句，他们"嗯"一句，气氛显得很温和，很交流。

在很温和的气氛中有人问："宁文忠你认识吧？"

我说："认识。"

"他的网名是什么？"

---

[5] 即很多很多之意。

“砍樵人。”

“你怎么有他电话的？”

“他在 QQ 群里留的。”

“什么时候留的？”

我突然警惕起来，这已经不是温和的交流了，这是在套口供，马上绷上嘴，不说话了。刘沙沙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说出朋友，仅此一次，仅此几句，再往后，他们再问，我也不说了。

这次“喝茶”，最困难的是第一天，即二十号晚上。因为没有经验，也因为心态太放松，结果上了他们不少当———你想人家是朋友，人家想你是犯人。你想的是交流，人家想的是审问。我本将心做明月，谁知明月照污水沟！

（二）

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坐在我右侧后方发问，我扭脸一看，此人尖长脸，单眼皮，黄青肤色，满脸疙瘩，看着很丑、很凶。我给他起的外号是“中统特务”，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外号，往下看大家就明白了。

下边这一段，是刘沙最出糗的一段。首先他坐在我侧后方发问，你要想尊重他，就必须不停的扭脸看他，这样就很累，很分散注意力。其次，他语速极快，又急又快的问题一句接一句，你前一句没答完，他后一句就来了。一句没完，“啪”又一句，一句没完，“啪”又一句，句句都是隐含了前提的“阴险问句”，刘沙沙没经验，技不如人，又被前边几个警察搞累了，顾不上分辨他问句中的“阴险前提”，发现被套已经晚了。输了，确确实实技不如人。输得心服口服。

下边这段对话语速极快，大家可以想像这种语速极快的对话节奏。“网警”[6]同志也可以找南京方面核对一下谈话录音，学学经验……~_~

我怀疑这家伙是特别训练过的，只听你一半句子就知道后面的意思，就开始问下一句：

“你到南京来干什么来了？”

“看郭泉来了。”

“你怎么知道郭泉被抓了？”

“在 QQ 群里。”

“你为什么来看郭泉？”

“我怕他在里边吃亏。”

“哎,你对郭泉比他媳妇对他都关心啊？”

我一下就把脸沉下来了：“你什么意思？”

问话停顿。几秒钟后他又开始了，从头问：“你到南京干什么来了？”

“来看郭泉来了。”

“为什么来看郭泉？”

“怕他吃亏。”

[6] 指网络警察，负责对网络上的言论进行监控、审查和删除。

“吃什么亏？”

“在里边挨打。”

“你以为我们会打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会打人？”（威胁的口气）

我因为还想给对方留面子，当面说不出“你们法西斯”这种话，所以犹豫了一下：“……听说过。”

“你以为你见得着郭泉？”

“见不着，只好见他媳妇。”

“见他媳妇干什么？”

“问他吃亏没有。”

“如果他吃亏了，你会怎么办？”

“在网上呼吁，打抱不平。”

“你见着他媳妇没有？”

“没见着。”

“为什么没见着？”

“他媳妇吓得不敢见人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回去。”

“还发不发呼吁了？”

“不发了。”

“为什么不发了？”

“因为我现在没证据证明你们打人了。”

“那你原来不也是没证据，现在不也是没证据吗？你不前后矛盾了吗，你不扯蛋吗？”我一听扯蛋，一下子就恼了，把手里的纸杯往桌上一墩，脸一绷，不说话了。

——大家看清楚，我输在哪儿了吗？

他很得意地站起来，站到我侧面，而我，几秒种之后我长长地“哦”了一声：“哦——我明白了，你的每一个问句，都是一个隐含了前提的复杂问句，我回答是或不是，都上当了。在正常的审讯中，是不准使用复杂问句的，用了就是诱供！”这时，我对面的方脸警察和“中统特务”交换了一个钦佩的眼神，那真是惊喜、钦佩的眼神，喜悦的眼神，棋逢对手的眼神！

然后“中统特务”站着，嘟嘟嘟嘟又说了一遍：“你矛盾。”

我一下打断了：“你说我扯蛋，你对我人身攻击，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了！”

他马上又开始连珠炮似的嘟嘟嘟嘟：“你原来没证据，现在不还是没证据吗？你这不扯、扯谎吗？”然后开始发狠，说了 N 多话，我因为在回味刚才的失败，没听清他说什么，只听见最后几句：“你一个女人家，管这种事情，你多管闲事！你咸（闲）吃萝卜淡操心！”很威胁的，江湖狠辣的口气，倒把我听笑了。

我仰起脸来：“你说的几句话我很熟哎。”

他俩都意外了，都傻傻的听我往下说：“你说的几句话我很熟哎，都是老电影里边，革命电影里边，中统特务说的哎！”一下把他俩卡住了，半天，互相看看，都给怄笑了！

“中统特务”一边笑一边不服，嘟囔着“什么中统，还军统呢……”

……

这时那个尖下巴的温和警察从外边进来了，递给我一张纸，要我签字，是一张讯问通知书："刘某某（我真名），你因为涉嫌煽动，策划非法游行、示威而被讯问。"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好久，对"煽动"、"非法"两个词很是反感。但看了半天……好吧，毕竟只是"涉嫌"，就提笔签了。

下边这一段话，是警察另一个无赖的地方，逻辑混乱的地方。那是我以一对四，和四个警察混战之际发生的对话，这段对话在二十一号早晨又重复了一遍。可见他们犯错误都犯得没有新意。

"中统特务"："你为什么来看郭泉？"

我："因为我赞同多党制，赞同他建党的行为。你们说他颠覆国家政权，他一个书生，没枪没炮没武装，他怎么颠覆国家政权？"

"中统特务"："你认为我们会无缘无故抓他吗？"（已经开始用公安机关那破碎不堪的信誉来做保，来威胁我了。）

我："那么好，你们给我证据，证明郭泉颠覆国家了，我马上可以声明再不参与郭泉这事了。你们有证据吗？"

"中统特务"："有证据能给你看吗？这是机密！"

我："那对不起，在证明一个公民有罪之前，他就是无罪的。"

"尖下巴"："所以我们说郭泉，也只是涉嫌，涉嫌，调查！"

我："那么好，你们认为他颠覆国家，我认为他没颠覆国家，我们有权组织游行示威，有权做出我们的表达！"

"尖下巴"："你们的表达是错的！

我："你怎么能说我们的表达是错的？"

"尖下巴"："郭泉是颠覆国家罪，你们为他游行示威，你们就是支持颠覆国家！"

我："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游行示威，属于表达自由！"

……

大家看清楚了吗？当你直接质问郭泉有什么罪，有什么证据时，他们一是偷换话题，用"你认为我们没证据会抓他吗？"这种无赖反问来抵挡；二是退让一步，说涉嫌，只是涉嫌！可当他想吓唬你"营救郭泉也有罪"时，就把郭泉颠覆国家当做一个已经成立的罪名来说了！

然后又一个警察，站在我另外一个侧后方，问："你跟法轮功有联系吧？"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不赞同法轮功的世界观。我是唯物主义者，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

"百分之八十？"

"对，我接受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那你不接受的是？"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于民主方面——"

还没说完就被"中统特务"打断了："你什么时候到南京的？"口气很凶。

我一愣："不是要我讲民主吗？"

“这会儿是讲事实！你什么时候到南京的？”

“今天早上。”

“坐的什么车？”

“火车。”

“几点到的？”

“六点半。”

“哪个车站？”

“玄武湖那个站。”

“到站之后干了什么？”

“吃麦当劳。”

“然后呢？”

“和李晶联系。”

“还和谁联系了？”

这时我已经疲倦了，就抗议说：“你们找到我时是十点左右，这会肯定过了十二点了，（登记身份住址什么的太啰嗦了），你们不让我睡觉，搞疲劳战术，不人道，我抗议你们的不人道行为，我不会再回答了。”然后就把眼闭上，嘴绷上了。

这时，那个尖脸的温和警察又说话了：“你想搞民主，很好。但是中国国情不同，肯定不能照搬西方……”什么什么什么的一大堆。

这就是他们又一个可恨的地方，问你最擅长，最愿意讲的民主理论问题，当你想跟他们讲理论时，没说两句他们就打断你让你讲事实，让你的注意力碎片化。当你讲事实被他们问烦了、抵触了、绷上嘴了，他又跟你讲理论，侮辱民主，逗你说话的欲望......

（三）

……

在我睡眼朦胧之间，“中统特务”要从我面前走过，要我翘着的二郎腿让一下，我弯弯腿，让他过去后，小声骂：“你个特务，你个中统特务……”他已经走到另一张桌边坐下了，听我这么骂他，又给气笑了。

他又走回来，坐到我这张桌边，一张嘴，就被我堵了回去：“我讨厌你，我不和你说话，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就是困倦得低着头闭着眼，他又问了好几个问题，都被我的疲倦挡在了脑海之外。结果他生气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头都没抬：“江姐[7]的态度。”

他被怄得哭笑不得：“那你是江姐，我们是什么？”

我心说：共产党反动派。

但是，“反动派”三个字一出口，就又得是一通长篇大论：什么是“反动”，共产党怎样从“革命”到“反革命”；烈士们为什么要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打倒国民党”

[7] 小说《红岩》中宁死不屈的女主人公。

等等。我困倦得不行，没精力和他长篇大论的争，以“共产党反动派”也没说出口，只闭着眼养神。

他又叨叨叨叨说了 N 多，看我没反应，发狠了：“你别以为我们就拿你没办法！就你网上的那些反动言论，早就够判好几年了！”

我被激怒，昂起头，高高地昂起了头！不看特务，而是盯着墙壁，嘴角紧绷，眼神倔强，那架势——眼望五洲、心怀四海、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杀剐由你“判了我恰恰证明我是对的，证明你们不折不扣是法西斯！”我当时真是被激怒了！真是横下心豁出去了！骄傲极了！轻蔑极了！

眼角余光知道他在盯我，但我绝不看他！两个人就这么僵持着。僵持了 N 久，看他真说不出什么话了，没新意了，我就闭上眼，又睡觉了。

一旦刘沙沙闭上嘴不说话，场面就很干巴很无趣了。就他们六个人轮换着叨叨叨叨，那长篇大论的陈腐叨叨只记住了几点：

跟我说话的是那个白净方脸警察“郭粉”：

1、“郭粉“：“你别以为这次只抓了你一个，这次我们抓了好几个！各地都在动手抓人！宁文忠已经抓起来了，邬伟民也已经抓起来了！”

我眼睛都没睁：不意外。

2、“郭粉“：“你给李晶送的东西，放在传达室，人家也没去拿，人家也瞧不上这点礼物。”

我心说：挑拨。

3、“郭粉”：“你就那么困？那么没精神？那么没精神你还搞什么民主？你孬种！听明白没有？你孬种！”

我心说：六对一，你们才孬种！

4、郭粉：“郭泉就不孬种，人家比你精神多了！趴到电脑上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跟我们辩起来可以一夜不睡！”

睡眼朦胧间，看到他提起郭泉时，那感叹钦佩的眼神。那眼神亮亮的，我心里也一亮，啊，郭泉有警察粉丝啦！

5、“郭粉”：“民主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郭泉有一句精彩的话：‘象我这样的，在五十年代，早枪毙了；六七十年代，肯定无期徒刑；现在，我能在这里跟你们辩，就是中国民主的进步！’”

我心想：不够，远远不够。

又一想：啊啊，“郭粉”被自己的偶像承认了“进步”，瞧你高兴得！

6、“郭粉”：“你们搞民主的人，应该坦诚！郭泉就很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整天就是‘你们为什么还不来抓我啊，为什么还不判我啊？’”

我心想：一、坦诚？我跟谁坦诚也不能跟你们坦诚，我可以拿自己的事儿坦诚，但绝不能拿朋友的事儿坦诚！二、囧死，郭泉郭泉郭泉，你没发觉你提到郭泉的次数太多了吗？而且，郭泉这话，也真是，你们是互为斯德哥尔摩囚徒了吧？

7、“郭粉”：“我和郭泉吃过不下十次饭。其实郭泉人不坏，就是他不知哪根筋拧上了……”

我心想：着急啦？心疼啦？

8、“郭粉”：“来看郭泉的人多了，我们抓了好几个了，丽水的邬伟民，合肥的某某某，都抓起来了，也都放回去了——人家早就把你说出来了，早就把你出卖了！”

我心想：一、挑拨。二、切，你前边跟我说坦诚，后边又说别人“出卖”，那我要跟你们“坦诚”了，一转身你们肯定也跟别人说“刘沙早就把你给出卖了！”让我的朋友们寒心。

9、“郭粉”：“嘻！别睡了！去水房洗把脸，清醒一下，别睡了！（踢我椅子）你是不是睡得太舒服了？来换把椅子！”在我的皮面扶手椅子旁边，扔下一张只有靠背的硬椅子。

我睁眼看看：“然后就该站着了，然后就该蹲着了？”

他们几个哈哈大笑：“你把我们看得也太可怕了吧？你都从哪儿听说的？”

我闭上眼睛低着头接着打盹，他们把我架到那张硬椅子上，我还是打盹。

10、“郭粉”：“你有什么病没有？如果有，可以提出来，我们好安排照顾。”

我很想告诉他们，我头痛了两、三年，心脏也不太好，以前莫明其妙晕倒过，这会儿也觉得心跳胸闷———但，咬咬牙没说。一则不想让他们发现我有弱点；二则，不想向他们示弱求援，不想承他们的情。

11、“郭粉”：“你什么看李晶，你们不就是想把李晶也拉进来，拉进你们的行动里来吗？”

此时，一个穿黑色警服的进来了（别人都穿便衣），此人是个流氓土匪，纯的。我给他起的外号是“土匪”，土匪言论大致如下：

“土匪”：“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油田。”

“土匪”：“你怎么去的油田？”

我：“考去的。”

“土匪”：“为什么你就能考去？”

我：“企业需要劳动力。”

“土匪”：“企业是谁办的？还不是共产党办的？你的饭碗，还不是共产党给的？”我一听他如此奴性的感恩逻辑，知道双方水平相差太远，再也不理他了。此后就是他在说，我在轻蔑，他每说一句，我就冷笑一声，冷笑他那奴才逻辑，那种把正当的劳动报酬当中共恩德的奴才逻辑。

“你为什么能去油田，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去？还不是共产党给了你饭碗，还不是共产党给了你爹妈饭碗？你的饭碗是国家给的，你父母的饭碗也是国家给的，你从小到大吃着国家的，喝着国家的，现在要颠覆国家？想推翻共产党，想跟着郭泉干，推翻了共产党捞个一官半职？”

他说一句，我冷笑一声，最后一句话，我一下笑趴了！他看看如此被轻蔑，也觉得无趣，几秒钟后，悻悻而去。

然后，我继续打盹，“郭粉”、“中统特务”、“尖下巴”三个人的激将、威胁、劝慰，红脸、白脸、花脸……一锅乱七八糟的语言粥，翻滚的语言粥，离我很近，离我很远，与我无关。我只管闭着眼，紧绷着唇，打盹，那表情，就是个抵触！

最后他们终于说累了（可能对望了一下），放弃了：“来，笔录签个字，签个字去睡觉。”

睁眼看了一下，笔录上结束时间是一点半，内容大致不差，我一盹一盹的，在朦胧睡眼中签了字，字写得东倒西歪有鸡蛋大。

然后一个年老保安带我走出办公室，我在走廊里半睁着眼睛往前走，没走两步就走到墙上了，再走两步又走到墙上了。就这么黑一下，明一下，在墙上扶一下、 扶一下走到走廊尽头。身后的郭粉挖苦我："瞧你这精神头儿，你比郭泉可差远啦！"我心里顶嘴：本沙的战斗力可不在这会儿，不在熬夜掐架上边！

老保安下了楼梯，我站在楼梯口，停住，晃了一下，"郭粉"马上在后边叫："接住她，小心摔下去！"老保安马上站住，仰脸看着我。我苦笑，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了下去。

"郭粉"在后边嘲笑："就你这困劲儿还搞什么民主！这才是第一天！"我心想，把我搞成这个样子，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耻辱。

睡眼朦胧中拐了几个弯儿，越拐楼道越灰暗、越压抑。最后在楼道尽头一个空间停住："你今晚就睡这儿。"

我一看，沮丧了：靠墙三个小圆凳，就是银行柜台或酒吧吧台里那种坚硬光滑的小圆凳儿，直径三十厘米左右，还有一小半圈儿是斜斜的靠背。就是说，只有二十厘米左右是平的……

尽管很受打击，但我也绝不想向他们求助求援，不想说好话，也没精神再争。就爬到那些圆凳儿上，和衣睡下了。

事后想想，这是他们卑鄙的地方，他们绝不让你睡足了有精神，头脑清晰、思路敏捷的和他们辩论。这也是一个教训，该要的人道待遇一定得要，吃饭睡觉治病什么的，一定得要！不要想着脸皮薄不愿意求人，否则你没法保持体力第二天和他们斗争或者说交流——民主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首先要争取自己的人权，连自己的人权你都不能去斗争保卫你谈何保卫别人？

……朦朦胧胧睡了几秒，又朦朦胧胧被吵醒——被旁边走来走去、说笑打闹的保安们吵醒。我把脸埋进胳膊弯里，把自己埋进黑暗的夜色大海深处。开始思量，开始害怕。

（四）

……

刚开始我想着没多大事，想着宽松交流，所以根本不害怕。"中统特务"拿"判刑几年"恫吓时我一下被激怒了，也根本不害怕。和几个警察对吵时情绪亢奋激烈，忘了害怕。然而，现在一个人被丢在这里，旁边是几个流里流气的保安在说笑打闹，我一个人默默地睡着，半夜三点，真的害怕了。

我是一个人来的，亲戚朋友一个人都不知道。警察问我时，我如实回答了——网友们知道我来，可下午送完东西我已经在网上发布了"平安无事"的消息，现在警察把我抓来没人知道，说句难听话，麻袋一装，扔进长江，警方一点风险都没有。她在南京走丢了，谁管得着？谁有证据？守望之鹰[8]的话："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李寒秋的话："直接毁尸

[8] 网名。

灭迹。”皮诺切特时代失踪的上千人尸骨何存？我这样的小蚂蚁，只是历史沟壑里微不足道的一具尸骨，千万分之一，默默无闻，沧海一沙，民主的分母而已，被杀如草不闻声。

不过，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真到了扔长江那一步我也就横下心痛快了，杀了我恰恰证明我是对的，证明你们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我是民主的分母，而已。我不担心一下被杀那几秒钟，我担心的是长长远远时时刻刻的折磨。就像“中统特务”说的“判刑几年”。我一个外乡人，没根没秧没亲没戚的丢在南京监狱里，被犯人打是肯定的，被警方授意犯人殴打是肯定的。这几年，再让老父老母为我操心，我爸我妈身体都不好，行动不便举止蹒跚，关上几年，不知出来还能不能见着他们——想到这些，揪心的痛，只能狠狠心不想。

然而，所有这些痛苦和恐惧，都不能让我让步，或者说，都不能让我让步到我的底线之下。

我不是新民党党员，以后也不想加入。这次来，是出于同情，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支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也是出于信用，我说了要来，就要守信用，来送完东西就回家了。游行的条件不成熟，游行计划放弃，这都是我本来的想法，明天跟他们解释清楚就是。

刘沙沙的让步，仅止于此。

至于其它：中国的多党制建设，民主追求，以及——朋友，这些，一步也不能让！一寸也不能让！让一寸，则刘沙沙今生今世休谈民主，今生今世，再无资格谈民主！那样的羞辱，那样没有意义的人生，更痛苦。

民主，朋友。如果连这点底线都不能坚守，则刘沙沙的骨气，是不是也太可怜了些？中国民主，是不是也太可怜了些？——我不敢保证，我能拿出第一秒的，民主的勇敢；但我敢保证，我能守住，最后一秒的，民主的羞耻。

……

主意拿定后，心态也放松了。老保安开了暖风空调，我稍微好受一些。几个年轻保安一直说话，最后实在累得没人说话了，就在我旁边打电子宠物，不停的出怪声，吵我。睡几秒，又被闹醒，睡几秒，又被闹醒。一夜，这睡着的几秒几秒，积攒不到一个小时——困倦钝痛的脑袋，岌岌可危的圆凳，噪声，辗转反侧，天色微明。

（五）

二十一号主审的，是头一天的“尖下巴”，和另一个中年警察。这个中年警察四十多岁，长方脸儿，白，平顺的眉毛，双眼皮、大眼睛，斯文英俊，很像年轻时代的汪精卫。穿一件黑色外套，举止大方、谈吐得体、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我给他起的外号是“教授”。当然，他现场发挥的辩证法认识论之程度，在我掐过[9]的网友中只能算中上，当教授，肯定欠精深。但是，现在的教授，混事儿的也多。

晨光中，“尖下巴”和“教授”两人把我叫醒：“小刘，起来吃饭。洗漱没？带牙刷牙膏没？”

我：“没带，就指着用宾馆的……”

“尖下巴”马上对“教授”说：“去给她买一份。”

[9] 即论战之意。

“教授”转身往外走，被我叫住了：“给你钱。”

“不用。”

“你花的还不是纳税人的钱？”（我不愿意占纳税人便宜）。

他一怔：“我回来肯定找你报。”出去了。

回到楼上昨天那个办公室，不大会儿“教授”买回来牙刷牙膏毛巾一套，我给了他钱。去洗漱，回来吃饭，三个人一样的早点：塑料袋里加油条加咸菜三个饭团和豆浆。“尖下巴”给我倒了杯豆浆，我说“谢谢，不喝，我喝咖啡。”自己包里的咖啡冲上一袋，准备提神。饭团很干很油我吃不下，几口就放下了。等着他们吃完，三个人在桌前坐定，我和“尖下巴”隔着办公桌对坐，他后边另一张办公桌坐着“教授”。

个人基本情况我让“尖下巴”在电脑上直接复制、粘贴，几分种弄完，我开讲：“今天，先说三件事儿。1、昨天你们有人说，我想把李晶也拉进来，拉进这个行动中来，这个，冤枉。我没这个意思。我一直认为，夫妻不能两口子都搞政治，那样的话，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郭泉已经进去了，如果李晶再搞政治，那么孩子太可怜了。我只是对她致以同情，没有把她拉进来的意思。”

“2、昨天你们有人说，我想跟着新民党捞个一官半职，这——这是个很可笑的说法！我天生不适合当官，原来当过两年团支书，太累，组织工作太琐碎，不文学不浪漫。我没有当官的想法。这次来，一是为了同情郭泉，‘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支持你说话的权利。’我不赞成新民党，但是我赞成他建党的权利。二是为了守信用，已经说了要来慰问，必须遵守我的承诺。来了，慰问了，就回去。没有把李晶拉进来的想法，更没有什么什么跟着郭泉捞个一官半职的想法。郭泉的新民党，就他一个人，离成功，那还远得很呢，渺茫得很呢，‘捞个一官半职’这个说法（我被怄得哭笑不得），是个很——很不沾边，很庸俗的说法！”我笑趴了，心里说，这是个很土匪、很共匪的说法。但看看面前这俩不像共匪，不想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没说出“匪”字。

“3、你们问我本人的情况、想法、行动，今后的打算什么的，都行。但是，问别人，一字不提！”

“问别人，一字不提！”这七个字，我一字一字咬得特清晰、特坚决，斩钉截铁。

他俩都怔了一下，没想到我前边说得那么软，硬头钉子钉在这儿了！

“教授”：“你不说我们也掌握了。”

“对，QQ 记录你们有，电话你们窃听。所以我的‘一字不提’不是证据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气！节！问！题！如果我连这一点气节都没有，你们会瞧不起我的。”

“还有，你们不要跟我说‘别人把你出卖了’，我特讨厌这话。同一件事，你们一会儿跟我说‘坦诚’，一会儿又说别人把我‘出卖’了，那我要跟你们坦诚了，一回头你们不是要跟别人说我刘沙沙把人家出卖了？我决不接受‘出卖’这种耻辱落到我身上。所以就是，问我的事儿，可以，咱们这是坦诚交流。问别人， 一字不提！”

响亮干脆的说完，他俩的表情都停滞了。

……

停滞了一小会儿，“尖下巴”：“好，咱们开始。你为什么来南京？”

我：“来看郭泉。”

……

接下去，就是整整一个上午的厮杀混战，三个人，三个头脑，如大风中的柳絮球，飞快地从一个话题滚到另一个话题，从“郭泉的有罪无罪”到“游行示威对不对 ”；从“真理的可知不可知”到“今天的早饭不好吃”；从我的“普世原则民主前景”到他们的“中国国情戒急用忍”，高手过招行云流水，每次停顿，都是卡在了“别人”。

争论得热火朝天时“教授”突然问：“游行示威谁提的？”

我说：“不知道，当时群里气氛太热烈了，大家七嘴八舌都在说，不知道谁提的。”

他说：“我提醒你一个词，是不是有人先说了‘散步’”？

我一看他又想去翻 QQ 记录，一下急了：“我提的！我先提的，我计划的！”脑袋高高地昂了起来，坚决地盯住他，特务威胁的几年徒刑从天而降压在我肩上，却压不垮我的豪情和担当：“我提的！我计划的！如果你们因为策划游行判我几年，那是我的骄傲和自豪！”

他眼神停滞几秒，刚想说话我又给打断了：“别跟我说什么‘别人出卖你’，我也不接受囚徒困境。你就是把别人出卖我的笔录给我看了，别人出卖我的录音、录像当面给我放一遍，我也不会出卖别人！所有人都出卖我，我也不会出卖别人！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这是气节！”

空气和阳光一下静止，静如黄金的页子，敲之有声。

金声玉应。

……

停了几秒后我怔怔地问“教授”：“我是不是很傻？”

一个自豪的气球儿悬在空中，等着对方的承认和夸奖。

“教授”阴郁地剜我一眼，阴狠的挖苦：“我觉得你很聪明！——你一直在避免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

“哦。”

“啪”一声气球被戳破，我没拿到夸奖，“吧叽”一下掉了下来，沮丧了两秒种，不过——“你很聪明”，也算夸奖，于是又得意起来。

“尖下巴”又问话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南京？”

“昨天早上。”

“到南京后和谁联系了？”

“我不回答你。我说过了，事关别人，一字不提！”

……

平心而论，二十一号上午这场辩论，从十点以后，就是刘沙沙赢得少，输得多。几乎对方每一轮理论攻击，都是在我这里告终。要么就是我的“保留，咱们保留意见，谁也说不服谁了，瞧两边都开始循环论证了......”要么就是我怔怔地听对方说着，却接不上话。然而这样的输，刘沙沙不服，毕竟我头天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对方的理论，都是论坛上常见的挺政府言论，早就是被我掐得死去活来的手下败将。可，在警察局一夜失眠的情况下，在这种二对一，三对一的不平等辩论条件下，常常是一个人被我逼到死角里了，另一个马上打岔，

逼迫我那破碎的脑子跟着转换思路。再不然就是，对方说的我不服，我心里有话辩驳，可头脑黑暗疼痛，眼前黑暗混沌——这样的赢，他们胜之不武，这样的输，刘沙沙虽败犹荣。

我体力不支，打着盹儿不服："你们不让我睡觉，搞疲劳战，你们胜之不武！"

不料"尖下巴"和"教授"齐齐叫苦："我们哪睡了？你睡了我们还要整理文件，我们都没睡！"

"尖下巴"说："你看看我们的黑眼圈！"

果然俩人都是黑青眼圈。怪不得"教授"的表情那么阴险呢，都是黑眼圈给闹的！我是又打盹，又想笑，正盹着呢，"郭粉"青着眼圈进来了："怎么样今天？"

"问着呢。"

"郭粉"坐在我旁边，又跟我叨叨叨叨，我强睁着睡眼听着，叨叨中只听清了他一句："你傻！——人家十个人给你挖的坑，就等着你跳下来呢。"

我说："我知道。"

"郭粉"："你知道你还护着他们？"

"教授"懊恼地挖苦着："人家那是气节——！"凶狠地嗔我一眼，嘴角却笑。真像一个班主任，带了一群又淘又倔的闯祸学生，审"逃学打架"审不出口供，恼火得又好气又好笑："人家那是气节——！"

"郭粉"就怔着看他："哦，气节？"

满屋子人都笑了。我一边笑，一边接着打盹。

……

"你傻啊，多少人给你挖好了坑，就等着你跳下来呢！"

我知道。我想让他看看我的散文《艺人的琴弦上永远传唱着你们的故事》，让他看看那深刻和沉痛：

我对革命的纯洁度早已不抱任何幻想，每一场革命里都有它的心机与龌龊。你的领导人时刻准备着出卖、出逃，你流血牺牲只保留了如此自私的"火种"！

明知道，在我所参加的任何一场运动中，我都会是首先被出卖的那一个。然而，即使知道后边有人在出卖我，我也仍然会——往前冲。

不悔。

总得有人傻，总得有人牺牲，总得有人出逃，总得有人活下来，踩着同志们的累累尸骨登上城楼："人民万岁—— ！"

代代革命，代代如此。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没有谁清白，个个都是罪人。

政治之肮脏，从来如此，而当今中国，不能只让共产党一家龌龊！不能只让共产党一家没边没沿地龌龊下去！必须要有另外的政党，另外的心机手段和共产党抗衡。龌龊对龌龊！如此，才能形成有力的竞争。才能逼迫各家党派都知道点儿要脸，知道点收买民心。革命是——收买、煽动、挑拨、激将、青春热血、老谋深算、纯真理想、狼心狗肺、权术、炮灰，驱使同志们卖命而自己身登高位——如此卑鄙、如此肮脏，历史，就这样肮脏着前进。

不悔！

（六）

中午吃的盒饭。吃完后回办公室，我趴到桌上接着打盹。“教授”和“尖下巴”悉悉索索在整理文件。

打着打着盹我的激情又上来了，一抬头，眼前金光灿烂：“你们知道我这会儿什么感觉吗？”

他们都不解地看我。

“我这会儿的感觉是——幸福！一则因为你们水平都高，跟你们掐架，智力上很爽；二则终于轮到我站在时代的前沿了，轮到我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了！这感觉，特充实、特幸福！”

“教授”又恼火、又想笑：“你呀，太幼稚！”

看我一脸的不服，他斟酌着词句，看着我的脸色，斟酌着词句：“你是——你别怪我说话难听啊——你啊，你是没孩子，等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你的想法有多幼稚了！”

“哦。”我实在想不出来育儿经和推动社会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不服！但问题是我确实没孩子，这点上没法跟他争嘴，只好怔着。

他又坐回桌后边：“我们是尽力帮助你、挽救你。你呢，对我们是敌对的态度。”

我：“这就像个童话情景：大狗和小狗咬架，大狗根本没把小狗当回事儿，可小狗儿看来，哇欧！@_@　好！可！怕！”

他又笑了：“我们可没想让你觉得可怕！怎么样，这次亲身体验了吧？我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那么可怕吧？”

我一边点头，一边却想起昨天的“中统特务”，那真是一条凶恶的大狗！

……在我接着打盹的功夫，他们交接，换人了。这次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警，和一个小帅哥。这个小帅哥，昨天抓我的人里就有他，帮我把零钱硬币收起来的就是他。他一张稍稍发胖的鹅蛋脸，白皮肤，平眉，单眼皮大眼睛，眼睛下边一道精美的卧蚕，漂亮的鼻子和嘴巴——总之，你可以想象一下单眼皮的钟汉良，或胖了一点的苗侨伟——此人看上去最帅，水平却最菜，我给他起的外号是“脑残”。

他在和女警聊天儿，我趴了一会儿，起来走动时，看见他那模样，不禁想笑：眼圈黑青，尤其下眼皮，好像用毛笔生生画上去一道黑。我乐了：“你也熬夜了，眼圈黑成这样？”心想昨天我进来后他就消失了，没审我，那他审谁去了，他们到底抓了几个人？

他也乐了：“哟，这么关心我？”

我笑着答：“不是关心，是好奇——！”

不是关心你，是关心我的同志。

这个办公室，房间到阳台的墙给打掉了，原来窗台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现在太阳已经到了西边阳台上，房间明亮通透，我就坐在阳台上的办公桌后边，晒暖儿，打盹。

盹了一会儿，“脑残”——算了！尽管这孩子蠢了点，可我毕竟嗑了人家一包瓜子，不好意思老是脑残脑残地叫，改个称呼：钟汉良——小哇。

“小哇”问我：“你一个女的，怎么会对政治这么感兴趣，受谁影响？”

我说：“我是受林达的影响。”

“林达？……”他的眼睛和胖脸一下僵滞了。你跟一个人谈论一个他根本不知道的问题，看他脑子转不过弯来时，那愚蠢迟钝的表情，就是这样的表情。不过，说句公道话，这种表情，这两天在我脸上肯定也没少出现，想必他们也看在眼里了。惭愧，惭愧。

他迟疑了一下，眼珠笨拙地转了一下：“林达……是个什么人？”自以为是的警觉眼神，发现了新罪犯的眼神。

“是个旅美华人，写了不少文章，国内到处都有他的文章。”我心里惊讶叹息，你连林达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办政治案啊弟弟？！

他固执地追问：“你跟他有联系？”

我哭笑不得：“他的书都是公开出版的，国内到处都是，我没跟他联系过！”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总统是靠不住的，国会是靠不住的，独立检察官是靠不住的，最高法院是靠不住的，只有这种互相制衡互相约束的制度才是靠得住的——”只听他嗯嗯连声，也不知听懂了没有，我又太累，说完这几句，桌上一趴，接着睡。

他出去了，一会儿进来，让那个女警：“吃瓜子儿。”他又叫我：“哎，吃瓜子儿！”

我：“谢谢，不吃。”继续睡。

他就自己嗑了起来，不大会嗑得满屋那个香啊！我禁不住诱惑，睁眼起身，把他那包瓜子倒出来一把，也嗑。

正嗑着呢，女警进来了：“哎，吃完这把别吃了，马上上班了，人多了，看见了——”然后就是女警和“小哇”他俩聊天唠家常，我在阳台上晒太阳，闲得无聊，就把他们办公桌下边的杂志拉出来看，《凤凰月刊》什么的。

看了两本杂志，又睡。女警过来了，又问工作、地址、工资什么的，又像问讯，又像拉家常，我不好意思不礼貌，只好抬起头回答。然后就是住房啦，父母啦，天气啦，喜欢看什么书啦……

喜欢看政史类的书籍，次贷危机，货币战争什么的，不喜欢柴米油盐，安玻璃啦、油烟机啦什么的话题。

女警感叹道：“哎呀，那我感兴趣的话题你肯定不感兴趣。”然后又是天气：“这边的法国梧桐还没掉叶子呢。”

然后我：“院里菊花真好看，刚才我站在窗户边看菊花的时候就想着得多看两眼，这可能是我这几年最后一次看见这么好看的花儿了。”

女警一怔：“怎么？”

我：“昨天那个人不是说要判好几年吗？”心想，何况今天上午我还拼命死顶，一口咬定是我干的。顺口说到这儿，说完了我又有点后悔，不想让他们看出我在寻思“几年”这事，显得我害怕了似的。

“小哇”：“你油田生活不错为什么还干这些？”

我：“生活是不错，可是，人生不能就这么过去了呀，总得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吧？
所以我就想到搞民主。得，这下得到监狱里去体验人生了。”我把重音放在“体验人生”四个字上。

女警很意外：“到监狱里体验人生？”

“是啊。”我摊出一只手，一五一十地跟她解释：“监狱里可以观察人性，特复杂、特深刻的人性。这也是人生体验啊。”出来我就可以写书了，中国版《库拉格》——想跟他们这么解释，但考虑到他们未必听过《库拉格》，也就作罢。

反正我不怕你们。

然后“小哇”接了个电话，又把我叫到他面前，隔桌坐下，问我：“为什么有两个手机号，来的时候在哪儿坐的火车，谁给你买的票？”

“自己买的。”

女警突然问：“票价多少？”

我：“忘了，不贵，所以忘了。”

女警不忿：“自己买的还忘了？”我心说，你是俗气女人你记得住，我是浪漫女人，我记不住，何况这两天这么困。

“小哇”：“你给李晶送完东西还打算干什么？”

我：“玩儿，在南京玩儿，雨花台啦中山陵啦纪念馆啦什么的。”

他突然袭击：“你不是第一次来南京吧？”黑灰灰的“熊猫眼”眯了起来，敌意的眼神，扮凶的眼神。

我很意外：“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南京啊。”

“你对南京挺熟的嘛。”

我笑趴了：“我有地图哎！何况南京的风土人情，几个景点儿，稍微看点书的人都知道哎！”心里感叹，这小 P 孩儿，真是蠢得没边儿。果然，他接着犯蠢，自以为是地想和我讲政治：“你认为共产党好吗？”

我再次笑趴了：“你这个问题很幼稚——！”

然后，正色、诚恳地：“共产党在历史上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从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开始，到苏联革命、中国革命，共产党在追求社会主义，追求平等方面，有过不错的历史成绩。但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不少优点，这个时候，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性欠缺，就落在历史的后边了。”

他笑了：“你的意思是共产党有好的时期，也有不好的时期？”

我也笑：“对，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有好的可能，也有不好的可能。”

他笑喷了：“总之你就是不肯正面回答问题。”

我笑着反驳：“那是因为你问题本身太幼稚！”

他换了一个自认为不幼稚的问题：“那你认为共产党坏在哪里？”

我心里想着最近那几件大案，口中却换了个不那么刺激对方的说法：“这不是个案问题，这是通则问题。人有缺点，党肯定也有缺点，所以需要多几个党互相监督。”

“小哇”：“我们有多党，好几个党呢。”

我笑：“那几个花瓶！”

“你怎么能说他们是花瓶？”

“当然啦，我听说这些党发展党员都限制，不能超过多少人，必须死一个，才能补一个。”（其实我想说的“花瓶”不是这个原因。但是，另一个思路并不成熟，也不严谨，容我另文讨论。）

“我怎么没听说这种限制？南京也有国民党你知道吗？”

这下轮到我的眼神停滞了：“……不知道。”几秒钟后又兴奋起来：“真的？……”开始浮想联翩。

……

下午的对话基本上就这样了。

他打完笔录，要我签字时“没有受到其它干扰”——为了这句“干扰”我们吵了起来：

“刑讯逼供是没有，但是你们有诱供！”

“小哇”：“这是（文件）系统自动生成的——”

吵了几句，最后“尖下巴”和稀泥：“算了算了，划掉。”这才签了字。

到楼下吃完盒饭，我又在那三个圆凳上盹了会儿。

“小哇”叫我：“包背上，去旅馆。你们公安局来把你接回去处理。”

夜色中一边往旅馆走，一边听他解释：“条件不好，也没办法洗（澡）了，你就合衣睡一会儿吧。”

到地方一看，果然是一家又旧又脏的小旅馆。最里边的房间，门口已经有两个警察，进去一看，两张床，里边床上睡了一个不知犯了什么事儿的小伙子。他们让他起来，把外边床上没盖过的被子扔到里边床上，然后对我说：“可以了，你睡吧。”

我把羽绒服一脱，穿着毛衣裹进被子里。真困了，在他们的聊天儿和电视声中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深夜一点，斜靠在床头，看着电视，听他们说话。两点左右，听见楼道里几个人寒暄的声音传来，有人进来跟我说：“你们公安局的人来了，起来吧。”

进来两个人，一个黑衣胖男子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是厂保卫科的——当时我眼里看见的，只有一个熟人：我们书记。他进来看看我，一副大哥哥来接淘气小妹，“看见你没吃亏我就放了心”的表情，跟我说：“……小叶来了（小叶是我玩得要好的小姐妹），在车里等你。”

……

我起身的时候，“中统特务”站在门口等我，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没任务，总之，他不再咄咄逼人，而是低着眼帘，默默的，侧身站在门口，有点不敢和我对视的样子。就像一个来接首长的卫兵，或者，刚被老师训了一顿的孩子。我突然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在道德上伤人太重了。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却被我骂成那样，蔑视成那样……

“教授”正面迎来，我一边和他热情话别，一边往前走：“你的水平在我掐过的对手中间算中上。可是，考虑到你们是警察，已经很不容易了，总之，我对警察队伍素质的提高还是满惊喜的。”

他在我身后寒碜我：“你见的警察都是哪儿的啊？”我想说我见到的警察都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可是，我不想在外人面前说家乡的坏话，只好不答而行。同时心里还惦记着要跟“中统特务”握手致意：“高手，服了——”可是，他昨天被我骂得太厉害，羞怯了，这一会儿远远地落在后边，夜色里在和我们书记交接道别。而我在接人待物上也是羞怯磕巴，心里想，总不好再强巴巴赶过去、找话缝说话。这时已走到单位的车子旁边，夜色里灯光下，我的小姐妹叶小丽从车里出来，叫“沙沙！”我扑过去一把抱住，两个人搂

抱着亲热着说得热闹无比，我心里却还惦记着没能和“中统特务”道别， 没能有高手揖别那豪爽的一抱拳：“保重，龙虎风云，后会有期！

唐小昭，《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七 0 年代生于重庆，现居上海，从事营销策划工作。

二 00 九年初，许多签署《零八宪章》的人都有被警方传唤的经历，但唐小昭是较早将此经历用文字记述下来的作者之一。

发表这篇文章后，她也曾被数度骚扰：警察上门查居住证，带着相机在她的房间里拍照；谎称她住的房子要拆迁，让她早点搬家。上门警察的态度都很友好，但那种无声的警告--类似于说：我们知道你住在这里，你的情况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却给她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一段时间，她曾暂离上海避居新疆。

经历了这些之后，她开始渐渐摆脱恐惧。她说，写下这篇文章，就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喝茶”没什么了不起，希望更多的人看了她的文章而不再恐惧。

喝茶记

唐小昭

二 00 九年二月五日下午，上海。

我出了地铁八号线大世界站，沿金陵东路向东走。心里非常平静，就跟平时朋友约我喝茶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朋友约我喝茶，我可以不去，警察要我“喝茶”[10]，我就不能不去了。

自从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我就一直等待这一天，许多人都“喝”过了，没理由我不“喝”。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黄浦区公安分局已在眼前，穿皮夹克的警察正站在门卫室旁边等候，看到我，他远远地问：“是不是小唐？”

“是。”我走过去。

小唐，这称呼真亲切。怎么，你们没把我当成“阶级敌人”？当然，我本来就不是敌人。

他把我带到门口左边的房间，里面已经坐了一个人，脸色严肃，面前摊开了几张纸，是准备作笔录的。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一九六九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房间约二十多平方米，一个巨大的警徽挂在墙上，这警徽让我有些伤感。它本该是我的保护神，护卫在我身畔，但如今，它成了对我的威压，从头顶沉沉压下来。

我在“记录者”对面坐下，“皮夹克”打横而坐。他比较活跃，经常站起来走动几步，不像“记录者”那么沉静。

他俩面前都有茶杯，却没人给我倒水。我想，“喝茶”怎么没茶呢？不过我来此不是作客的，就低调一点吧。说了几句话之后，我口渴，想到这谈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结束的，于是主动问：“有没有杯子？我想喝水。”“记录者”这才站起来拿杯子给我倒水，客气地问我要不要茶，我说：“不用，我喝白开水。”

[10] 指政治警察未经法律程序的非正式传唤。

“你不用紧张，我们只是找你谈谈，了解一下情况。”“皮夹克”说。上午的电话中我已经主动提到宪章，所以他们没必要绕圈子了。

“我不紧张。”我笑道：“自从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我就等着你们来找我，都等了一个半月了。”

“皮夹克”也笑了：“你的名字在第六批名单上一出现我们就知道了。起初没有来找你，因为你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在重庆，重庆市 XX 区，对不对？”

哈，他们连我身份证上的地址都清楚。春节之前与朋友吃饭，我还困惑地说：“怎么到现在还没人找我‘喝茶’呀？”

朋友说：“可能他们找不到你。好像他们是根据户口来查的，你的户口不在上海，所以找不到。”

我不信：“你别天真了！他们要找我，哪有找不到的，我这种人最好找了。肯定不会根据户口来查，而是根据网上的线索来查。”警察神通广大，谁能躲得过去？何况我并没有躲。

他们起初没来找我，我想并非因为我户口在重庆，而是因为我不重要。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名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迁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记录者”提起笔，铺开笔录纸，先问我姓名、出生年月等，我如实回答。又问：“工作单位？”

我说：“我签宪章跟工作单位没关系，这是我私人的事情。不过反正你们能查到我单位的，我就告诉你们吧。”他们对我的单位不熟悉，还要我写给他们看。

“皮夹克”听说我在一家公益机构，慢悠悠地说：“做公益挺好的，我就认识很多做公益的人，他们很热心的……”

分明诱供来了。我咧嘴一笑：“别以为我不知道，有些公益组织也是很‘敏感’的，比如艾滋病、环保什么的。不过我们这个机构一点都不敏感。”好歹我也在上海公益圈里混过几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我知道有些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也是经常被“喝茶”的。但我从没参加过任何“敏感”的活动。

“没有没有，我就很支持公益，做慈善嘛，对社会是有益的。上次有个什么什么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他们很热心地发了很多传单……”（我忘了他的原话。）

我瞠目以对。“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啊！”

我猜想他提到的公益活动是被官方密切注意的，如果我有参与，我的“敏感度”会被加一颗星。但我实实在在不知道。上海的公益组织多如牛毛，我哪有那么好精力都去关心。

“皮夹克”继续说人民广场的公益活动：“后来我跟他们谈了谈，了解了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也很支持的。”

我茫然地听着，不再开口。我想这是他设下的一个陷阱，只要我对他说的公益活动有一点点知情，他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挖出我更多的“敏感材料”。但我是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不知道。

“你们开展公益活动，资金从哪里来？要向社会筹款的吧？”

“对呀，公益组织都这样，有私人捐款，也有向企业或者慈善基金会申请项目资助。”

“有些公益组织也接受境外资金的。”他说。

哈，来了来了，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嘛。我又咧嘴一笑：“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接受境外资助也是很‘敏感’的！”

他笑了笑，直接问道：“你们也向境外申请资助吗？”

“我们这个机构没有什么‘敏感’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查。市领导都知道我们机构的。”上个月我还跟老板一起到市政府去开会呢。

工作单位的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又问我文化程度，大学名称。“我们学校不出名的，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我把大学名称告诉他们，他们果然没听过，要我写下来。我写了校名，又要我写“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写了。

“你在哪里上的高中？”我写了。“哪一年到哪一年？”我把上初中高中的时间都写了，并解释：“我初中和高中是在同一个学校读的。”

我写下的年份中有一个让他们立刻注目，并念了出来：“一九八九年？”

我满不在乎：“你们别紧张，当年的事情我没有参与过，连见都没见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呢？”“皮夹克”不相信。

是啊，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就算没参与，至少也会看看热闹，可我真是连热闹都没看过。为了解释清楚这一点，我总得告诉别人我们中学的地理位置：“我们中学不是在城里的，是在郊区。这里是我们学校，”我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周围都是农村”我用手在圈子外边比划了一下，“离最近的城镇也有几公里，信息很闭塞的。我们住校，在学校里可以看看报纸，周末回家才能看看电视，报纸和电视上说的都是官方想让我们看的。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最近两年才从网上了解了当年发生的事情。”

还好，他没问我“当年发生了什么？”就算他问，我也不回答。这种问题，不应该由我一个被蒙蔽整整十八年的局外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当年的亲历者来现身说法。

学校问过了，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工作单位？”

我一听便来火：“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家里人没有关系！总不能因为我签了《零八宪章》，你们就要查我祖宗十八代吧？”

“记录者”解释：“我们不是要去重庆找你父母，这只是一个程序。每个人都要回答的。”

“那我不回答可以吗？如果你们查到了，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签名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家里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说着，泪水忍不住流下来了。桌子上有一盒面巾纸，赶快扯一张来擦脸。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查到，但不要指望我告诉你们。我最恨搞株连！这是二十一世纪，不是封建社会。一人做事一人当，怎能牵涉我的父母家人？我不配合！

见我哭了，“记录者”赶快说：“好好好，不问不问。”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骂自己：怎么这点小事也要哭？真丢脸。

我“喝茶”之前唯一的担心是：我会不会哭？当初是“大哭一场，签上我名”。后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也哭了，所以照片里的我眼睛肿肿、鼻子红红。我一直担心“喝茶”时也会哭，那就太破坏形象了，在警察面前，咱得英勇一点不是？可我完全没有把握能够控制住情绪。女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若到伤心处，我就会忍不住珠泪滚滚。

警察的讯问继续进行。后来我也几次落泪，真是一路哭到底，丢脸丢到家。八千多个签名者中，“最爱哭鼻子奖”非我莫属。

个人情况问完了，轮到正题：“你什么时候在《零八宪章》上签的名？”

“十五号。”

“一月十五号？”

“哦，不是。是去十二月十五号。”

“在哪儿看到《零八宪章》的？是别人发到你邮箱里的吧？”

“不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华盛顿邮报》说你是从邮箱看到的。”

“他们写错了。通过翻译的采访，有时不是那么准确的。”

“那你是在哪个网站上看到的？”

“我不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呢？”

“当然不记得。我在网上看文章，从来不会注意哪个网站的呀。”

“那你是怎么知道《零八宪章》的？”

“也是在网上。先是看到有人说晓波被抓了，后来又有人说晓波被抓是因为《零八宪章》，我就好奇：《零八宪章》是什么东东？就去搜索。那时候很多网页都被删了，但还是有漏网之鱼，我一搜就搜到了。”

“那你看到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看了之后，同意它的主张。但起初并没打算在上面签名，因为……”我有点不满，“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签这种名是要冒风险的。”今天我被警察传唤，便是“风险”之一。

“那后来为什么又签了呢？”

“我在博客上转贴了《零八宪章》。过了两天，我的转贴就被删了。我很生气，连转贴一下都不可以！又想到晓波被抓的事情，感到很悲哀，我不幸生在这样的国家，有很多权利我们享受不到，也就罢了，可是，连说都不可以说！我不喜欢这种局面，我希望改变，所以我就签了名。”

“你对《零八宪章》是怎么评价的？”

“哈，没什么好说的，它对我而言太简单了，很多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网上很多人说过的，而且有些内容我们宪法里面本来就有的。总之我觉得，《零八宪章》的内容是陈旧的，都是大家讨论过无数遍的，但它把这些内容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倡导性的文件公开发布，无论是谁，只要你同意它的主张，都可以签名，这种形式是新的。”

“其实，”我补充，“宪章的那些条款，我也并不是每一条都赞成，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的话，有一些我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问我，那我完全同意。”

“哪些是你同意的，哪些是你不同意的呢？”“皮夹克”问。

“这个，我可说不出来，宪章上面那么多条，我记不住。你们有没有打印稿？要是有的话我可以看着说。”

我相信他们肯定有打印稿，但他们说“没有”。大概是不想让我拿着稿子口若悬河。

在网上看过很多签名者的“喝茶”故事，有的人抓住机会向警察宣传《零八宪章》，把这作为“战术”之一，我没打算那么做。第一，我不相信警察没看过；第二，宪章内容一看就懂，无需讲解；第三，我没本事说服警察，懒得费口舌。

桌子上有个大信封，旁边散着的七八张打印纸便是警方掌握的我的“材料”。“皮夹克”一边问，一边不时拿起材料来看看。我很好奇：纸上写着什么内容？当然他们是不肯给我看的。

嗯，从此我也有“黑档案”了，光荣光荣。

想起一个网友的话：“小昭，你 blog 上写那些东西还是让我有些担心，要是被当局盯上就麻烦了。到时你会背上一辈子都卸不下的烙印，想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限制。某校一位老师，当年曾经参加过‘六·四’事件，当时如果不是一位老先生力保，就会锒铛入狱，虽然被保了下来，但是此后他的人生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这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老师，校长助理干了多年，早就该提为副校长的，可是数次都是在政审的关键时刻被拿下，档案上那一笔永远存在，年龄越来越大，估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不郁闷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

是。”

网友不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外”，从小就决定，永远不进入这个体制。我不需要它给我评职称，不需要它给我分房子，不需要它给我升官，不需要它给我发财。我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我，两相隔绝。所以我对于档案上给我记一笔，才不在乎呢。

你以为“永远”是这种局面，中国人“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恐惧中吗？靠，休想！——我们等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了。

我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在博客上写文章，都是合法合理又合情，没什么好惭愧的，相反，这是我小昭有勇气、有正义感的表现，我该骄傲才是。希望警方把我的“材料”好好保存，切勿丢失。将来我白发苍苍，坐在葡萄架下对小孙女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中国人还处于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奶奶克服了恐惧之心，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那时我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向小孙女展示，免得她以为奶奶吹牛呢。

我正神游物外，“皮夹克”把我拉了回来：“你是怎么签名的？”

“发邮件去签的。宪章上有签名邮箱，那两个邮箱都很好记，我看一遍就记住了。”

“你签名之前好好看过宪章吗？”

“看过啊。最初知道宪章的时候就看过一遍，后来决定签名了，又仔细看了两遍。我在任何文件上签名都会起码先看两遍的。”

“你肯定没有好好看过！”“皮夹克”一口断定，“如果你看了就不会签名了。这个宪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看出来了吗？”

我摇摇头。“我没看出来。”

“你呢，是个很感性的人，有时候会冲动，也没看清楚宪章是什么，就签名了……”

真要命，只因我爱流泪，总被别人说成感性。“我觉得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当然也有感性的一面，但总体说来是很理性的。签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作出的决定。”

“你最初决定不签名，这是很理性的，是正确的决定。但后来又签了名，像你说的，因为转贴的文章被删了才签的，这就是冲动，不理性的行为。”

“我签名，首先是因为我赞同它的主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因为转贴宪章被删了，还有晓波被抓的事情，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我被激怒了，所以签了名。这是一种反弹，对你们打压的强烈反弹。”

常言道“请将不如激将”，如果我没有被激怒，就不会有第六批名单上的唐小昭了。相信还有其他人跟我一样，签名的直接原因是“反弹”。官方对言论的强力打压，固然吓住了一些人，却也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反弹。

“你这样做是很幼稚的，签个名就能改变什么吗？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看来你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皮夹克”说。

“政治上不成熟”这个句子我从小在小说里看惯了，没想过有一天会放到我自己身上。嗯，按照党国的标准，我确实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永远不会成熟。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谁“政治上成熟”了，基本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台冷血机器。

“政治”我说，“中国人把政治看得很肮脏，以为政治就是阴谋诡计，充满了欺骗和权谋，什么事情一和政治联系上就觉得很可怕，其实不是这样的。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既然是大家的事情，政治就应该是阳光的、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谈论，都可以参与。”

我还没打算“参与”呢，我只是喜欢“谈论”一下，就这也要冒风险,所以我才签名的。

“我希望我能够行使宪法保障的那些权利。你想想，我都××岁了，还没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呢。”

“怎么会没见过选票呢？”“皮夹克”不解，“选票都有的呀。”

“我到哪里去选啊？回重庆去选吗，我又不住在重庆，重庆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在上海选吗？我又没有上海户口。”我撇了撇嘴，“再说，你们那些人大代表，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真的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不都是走过场嘛，做个样子罢了。”

“皮夹克”笑了笑，没有反驳。

我想起我有个朋友，上海人，已经移民海外，他说他从来不投票，“居委会把选票送上门来，我每次都把它撕掉”。他为什么要撕掉选票？因为他不认为手里这张纸片是真正的选票，没有公正的选举程序作保证，就不可能有公正的选举结果，民意既然被强奸，他宁可弃权。最后他的移民，就是更为彻底的弃权。

“我就想要选票，真正的选票。”我接着说，“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我们有权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意或反驳别人的观点。政府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公权应该来自民授。”

“这些话都没有错，我也赞同民主的呀。但是我们不能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现在中国的现实不是那样，你既然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就要遵守现实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对你没有好处。”

我漠然，“我知道，我是握在你们手掌心里的。”我用手划了一个圈，“中国就是一个大笼子，它囚禁着我们。”

我对你们的“现实”毫无兴趣。我不喜欢这种公权力毫无制约，民众被关在笼子里，公民生活在恐惧中的“现实”，我不为这种“现实”背书。我只为自由背书，为人权背书，为民主背书，为子孙后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背书。

“我没违反你们的游戏规则。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两大原则：第一不违反国家法律；第二不违反社会公德。我以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形式来表达对某种观点的认同，这是我的权利。”

“皮夹克”耐心劝导：“你是有这个权利，但是《零八宪章》的事情很严重，不是你想象的只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政府已经定性了，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的政治事件。”

起码一个月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关于“定性”的传言。这“定性”貌似十分严厉，但我看了漠然置之，半点没感到害怕，只感到滑稽。都什么时代了，解决问题还要靠几个人关起门来“定性”？呵，莫非我不是身在二00九年，而是公元前二二一年嬴政那会儿？但，时光如水永向前，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事儿照我看很简单，如果《零八宪章》是个法律问题，那就交给法律去审判（当然是公正、公开,程序合法的审判，不是杨佳案式的暗箱操作）；如果是个道德问题，那就交给大众舆论去评判。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心里继续想着：你们“定性”以后，打算怎么办？把这几千人抓起来，关几年？随便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怜这些自封为“公民”，却无法享有公民权利的中国人，既然无力保护自己，也就只好逆来顺受、泰然处之了。

“皮夹克”继续说：“你知道四项基本原则吧？坚持……”

我漠然点头：“我知道。”这些东东放在宪法里，真是莫名其妙。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承认现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流观点……”

我纠正他：“是官方观点。”

如果说“主流”的话，须得全国多数人赞同的观点才是主流观点。依我看，民主才是主流。

他继续说：“好吧，是官方主流观点。现在这个《零八宪章》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我没看出它要推翻谁。”

“你没看出来？”他很惊讶，“《零八宪章》说要实行多党制，这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它要实行三权分立，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我叹了一口气：“我对这样‘主义’那样‘主义’不感兴趣，不想跟你争论。可能是从小被灌输了太多的‘主义’，有了点儿逆反心理，听到‘主义’这个词我就头疼。”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只有两种“主义”的国家：民主和专制。显而易见我喜欢民主，其它的免谈。

由于我经常打断他的话，“皮夹克”有点不满意：“你听我说完!”

“好，你请说。”

他说了一通属于官方主流观点的话，我一句也没记住。在他停顿的时候，因为无法判断他是讲完了该轮到我说了，还是他仅仅是要换口气再接着说，我还鼓励道：“你继续说，没关系，我听着。”

他讲完了他的道理，见我明显缺乏兴趣，连反驳都懒得开口，他又说：“中国的宪法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零八宪章》要代替宪法，要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违宪的!”

“个体的公民不可能违宪，只有国家机关才能违宪。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小昭后注：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违宪主体”的文章，忘记是不是徐友渔写的了。）“而且，”我补充道，“《零八宪章》并不是一个法律文件，它仅仅是一种倡导，提出一些主张，它不是宪法。宪法的修改是有一定程序的，要经过全国人大超过 2/3 的代表同意才可以修改。”谁要是把《零八宪章》当成宪法，那肯定是脑子进水了，我深表同情。

“皮夹克”问我：“你知道《零八宪章》是谁起草的吗？”

“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们不是把晓波抓起来了吗，你们不是说他起草的吗？”

“谁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是刘晓波起草的!”

这个就不关我的事啦。反正不是我起草的。

“你知道刘晓波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以前不知道这个人，最近两年在网上看了他很多文章，了解个大概。”

“刘晓波在‘六•四’的时候……”他对晓波作了一番“官方介绍”，我不记得原话，大意是说晓波当年是幕后主使之一，这些年一直和海外势力有联系，背景很复杂，像你（指我）这种单纯冲动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你是被他们利用了……

我嘟哝了几句：“没有人利用我。是我自己要在宪章上签名的，又没人逼我。”然后我好奇地问，“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刘晓波是中国第一号敏感人物。是不是啊？”

“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很敏感的嘛，至于是第几号就不一定了。”

嗯，官方不喜欢晓波,但在民间评价系统中，晓波是条好汉！我就欣赏这种有胆有识有担当的男人。

他们接着问：“你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吗？”

我心里想，你们都知道了，用得着问嘛。不过还是回答：“接受过。”

“什么媒体？”

“《华盛顿邮报》。”

“什么时候采访的？”

“一月十九号晚上。”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我没找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把邮箱放在博客上，他们看到了，就给我发邮件。”
“那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约的采访时间？”
“这个倒不是，是通过电话约的。”
“是怎么采访的？电话采访吗？”
“不是，是当面采访。”
“你为什么要接受采访呢？”
“为什么？”我睁大了眼睛，“我有接受采访的权利啊！”
公权是“法无明文规定皆不可为”，私权是“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我可太清楚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了。再说，我从没接受过外媒的采访，人家好奇嘛。
“在哪里采访的？”
“一家饭店里，一边吃饭一边采访。”
“哪个饭店？”
“在黄河路上，具体哪家饭店我就不知道了。黄河路上很多饭店的嘛，一条街都是，我跟着她们进去、跟着她们出来，没注意饭店的名字。”
“几个人采访你的？”
“两个。”
“男的还是女的？”
“两个都是女的。”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个是美国人，不过是韩国裔的。”
“记录者”边听边记录，问道：“那就写‘韩裔美人’了？”我觉得“韩裔美人”这个词太滑稽了，两个人讨论了一下记录用词。最后他好像记录为“韩裔美国人”。
“那个中国人是做翻译的吧？”
“对。”
“那个美国人长得跟中国人一样吗？你怎么知道她是美国人？”
“我本来以为她是中国人，可她一开口说的是英文，我就问她的助理她是哪里人，助理说是美国人，父母都是韩国裔的。”
“是怎么采访的？录音采访吗？”
“就是当面采访呀。”
“她们问了你哪些问题？”
“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呀，就是那篇报道上写的。”
“你看过她们写的报道吗？”
“看过。”
“你看得懂英语？”
“哈，这还不简单？用 google 自动翻译系统，就可以勉强看了。”我解释，“主要是看看关于我的部分有没有失实的地方。基本属实吧，有些小小的误解，但不重要，所以我也无所谓了。”
比如报道上说我最初是从信箱里看到《零八宪章》的，这就是误解。
“不过，”我补充，“我不满意她们那个大标题，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过于严重了……”
“就是……”“皮夹克”拿起打印纸念道：“《一个中国草根的反抗》？”
我猜，警察看到的是万维网那个中文版，是以第三者的语气介绍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主要是关于我的部分，警察不知道我的博客上有全文翻译的中文版。
“对。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激烈，这个题目用在我身上有些……有些……严重……”我一

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

还是“记录者”帮我想到了：“有些‘过激’了？”

“对。”我赶快点头。

华盛顿邮报的原文，大标题为 *In China, a Grass-Roots Rebellion*，这 Rebellion 的意思有“叛乱、暴动、暴乱、谋反、异议、变、意见不合”，无论中文用哪个词，对我都极为不利，所以我当初翻译此文时干脆回避了大标题。但万维网和其它网站转贴时，题目译为“一个中国草根的反抗”、“在中国，基层反抗”、“中国草根造反”，等等，吓出我一身冷汗。

其实，无论人家用什么标题，我都无所谓的。可我是“In China”，这个 China 对我来说不是温暖如母亲怀抱，而是冷酷无情的铁笼子，随时可以伸出铁爪子把我抓住撕成碎片。你们要是用太严厉的词语，“伟光正”[11]先生会把帐算到我的头上，我一条小命儿又要死翘翘。——所以我拒不认可那个大标题。

“你看，外媒是在利用你！你被人家利用了都不知道！”“皮夹克”抓住机会教育我。

我没觉得《华盛顿邮报》是在利用我。再说，他们利用我，我不也利用他们吗？他们利用我来观察中国的普通签名者，我利用他们把我的观点撒向世界。中国媒体对《零八宪章》全体噤声，能发出声音的只有外媒……

“皮夹克”对采访内容特别感兴趣，问了好几次。我都回答：“就是报道上的那些呀。”过了这么久，我哪里记得？我又不是记者，没做笔记。

“你了解《华盛顿邮报》吗？”

“不了解。以前从来没看过他们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是一家很大的媒体，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皮夹克”特别强调这一点，仔细观察我的反应。

我无动于衷:“不知道。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媒体的名字而已。”心里想，你们修建了“柏林墙”把我们囚禁，不准我们看外面的世界，我哪晓得那么多啊？

几天后，有个朋友告诉我，《华盛顿邮报》是著名的反华媒体，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喝茶”时警察那么注意看我的反应呢。偏偏我就是被愚民愚成了白痴，压根儿就不知道哪些媒体“反华”哪些媒体“亲华”。不过，就算事先知道，对我也无影响。我不认为美国的媒体敢“反华”，因为这涉嫌种族歧视，而种族歧视在美国绝对是个敏感雷区。“反共”还差不多，这属于政治观点不同，在美国是正常的。基本上，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都不会亲近“伟光正”的。

“你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采访？”“皮夹克”又一次问这个问题。

我睁大眼睛：“我不能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吗？”

他只好说：“你有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权利。”

OK，你承认就好。

“皮夹克”恳切地说：“你以后不要再接受外媒采访了。”

我说：“我不做任何承诺。”

“什么？你还要接受外媒的采访啊？”“皮夹克”相当惊讶。

“我没说还要接受外媒的采访，我只是说我不做任何承诺，这个决定应该由我来做。”

本人的逆反心理比较强，最烦人家威胁我，如果威胁，肯定反弹。其实他们根本不用担忧，不会再有多少外媒来采访我了。我啥也没做呀，跟别人一样，就签了个名而已，这点小破事儿，没多大新闻价值，不值得再采访。

“其实，我也不希望因为《零八宪章》而出名。”我说。

他赶快赞同：“这个出名对你没有好处的！”

好处与否，见仁见智，我想的不是这个，“我觉得，要出名的话，应该是靠我自己的能

---

[11] 指中国共产党，它常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因此被人们简称为“伟光正”。

力和水平。可是《零八宪章》吧，这个事情也不是我做的，那个文件也不是我写的，它不是我自身能力的体现，所以我不想因为它而出名。”

警察还要我答应：“以后不要继续参与《零八宪章》了。”

我回答：“谈不上参与不参与了，我所能做的就是签个名，表示我同意它的主张。我的名早就签过了，对我来说这事儿已经结束了。”

“喝茶”喝了两小时左右，虽谈不上“亲切”，但气氛还算和平友善。

后来他们把谈话笔录给我看，我仔细地看了两遍，改了两个词，最后签字认可。很高兴“记录者”把我那句“公权应该出自民授”也写上去了。

这个笔录很简单。但我想，等我走了之后，他们还会写一份对我的“鉴定报告”，就跟班主任对学生的期末鉴定一样。他们一直在观察我、忖度我，不知他们最后会怎样给我“定性”。

大家站起身来，准备离开这间屋子。“皮夹克”告诫我：“今天的事情，你不要说出去，也不要放到你的博客上。”

“我不做任何承诺。”

“什么？你要把今天的事情也放到博客上啊？”“皮夹克”瞪大了眼睛。

“我没说要放到博客上，我只是说我不做任何承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做决定。我不喜欢被人家强迫着做决定。”

“你要是把今天的事情公开出去，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转头问他：“请问一下，我需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当然要负法律责任的喽！”

啐，答非所问。如果要负法律责任，首先得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拿出来衡量，我是否违了法。其次呢，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我真的不明白，才向你请教的嘛。我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喝茶”内容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别给我扣个“泄露国家机密罪”，我不认的。

二00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后记：

为了让关注小昭命运的朋友们放心，也为了践行我的“站在阳光下”原则，我当然会公开我的“喝茶”经历。这可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呀，如此有趣的经历，岂能不与朋友们分享。

我说过，我不做躲在阴沟里的小老鼠。哪怕死，我也要死在阳光下，死在众目睽睽之中！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小昭还没死，至少目前一切平安。但未来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只要晓波一天没有恢复自由，其他几千个签名者的命运就处于“未卜”状态。既然不幸生在中国，只好以一副肉身坦然去承受。

上帝保佑我们，阿门！

十七只猫和鱼（网名），男，一九八 0 年代生于北京， 自由撰稿人。

小市民奇遇记

十七只猫和鱼

昨天是几号啊，昨天是二 00 九年的几号啊？已经忘记了，最近记忆力真差，但无论昨天是几号，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发生在我身上这三个小时的奇遇，大概是忘不掉的了。

北京六月的天气就像一个唐氏综合症儿童的脸[12]，说变就变。四点过半，黯然间，不详的黑云化作狂风和尘土笼罩了城市，接着下起了雨。这雨下得一点不清爽，反而闷热、压抑，好像一个悲愤的醉鬼，而且有点血腥的臭味。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走在非机动车道上，脑子里正在琢磨：是去宣武门外吃碗卤煮，还是去新街口吃碗延吉冷面？面馆的对过儿有卖打折的袜子，不过吃卤煮可以顺便参观参观被拆迁的南城啊，等等，反正都是一些俗人想的俗事。

但，一辆靠站的四十六路公交车改变了我庸俗的思想，因为上面传出了世界上最优美华丽的旋律——“什么什么红旗（忘了），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这歌声赶走了卤煮和打折的袜子，也击溃了我庸俗的心。啊，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名字比吃喝玩乐更重要，甚至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一块普普通通的天意[13]批发十块钱一米的红布，画了几个几何符号，居然有此等神奇的魔力！竟然能让一个人开开心心去送死，不，错了，是牺牲。这种魔力不得不令人扼腕，哦不，是幸福！是感动！

那我也去吧！我也去吧！我也要拜倒在这血一般的图腾下，为它欢呼，为它祝福！告诉它，您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去哪儿找它呢？哦，对了，似乎在大一路公共汽车中间儿有那么一站，叫什么站来着？反正里面住着这么一帮子人，整天干的就是这码子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跑到马路对面升旗降旗。旗杆下面还有个专门供人们膜拜这种仪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广场[14]来着？忘了，最近记性太差了。好，那我就去那儿看吧！让卤煮和延吉冷面见鬼去吧！我要做一个和彭丽媛[15]姐姐一样自豪的人！

于是，我趁四十六路公交车关门的一瞬间跳了上去，可是发现这车不到什么什么广场，就到西单。算了，先坐着，再换，反正是空调车。到了西单那堵墙的旁边，我换了地铁。一个卖花的姑娘清秀但脏兮兮的脸蛋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同情和无耻，我买了一只白色的菊花，没想到，这支菊花十分钟后给我带来了一连串滑稽的麻烦。

“这位先生，请等一下，您衣服上写的是什么字？”一位和蔼的警察拦住了我。

“啊？我不知道啊，你看看。”我答道。

---

[12] 先天智障儿童

[13] 北京一个著名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

[14] 指天安门广场。

[15]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妻子，中国大陆著名歌星，前面那首歌曲的演唱者。

“哦，没事，走吧”警察转身。

那只不过是一件学校发的衬衫，上面的字写得扭曲了一点罢了。不知道他在执行公务时怎么会有闲工夫对 T 恤的设计感兴趣？开小差真不应该啊！

算了，不管他。啊！那就是什么什么广场了吗？真是壮观美丽啊，那块越来越大的黑云可真煞风景，我所爱的旗帜就不远了罢，我带着崇敬走进了广场。

在搜查恐怖分子的小棚子里，我把手上拿的东西——一本书和一朵白菊花放进了 X 光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出口的履带上只有一本书，菊花竟然消失了！我的乖乖，这竟然是一台魔术机！要么就是里面藏着一个爱吃白菊花的怪兽！

哦，原来只不过是卡在了里面而已，我冒着被辐射的危险伸手进去把白菊花掏了出来，转身就走，却惊然发现，我对面站着四个完全被吓傻了的警察和两个什么什么军。一朵花也能杀人吗？还是我长得像本・拉登？

“你们有几个人？”一个警察走上来问。

“啊？您什么意思？”这回换我纳闷儿了，他如何判断出我不是自己来的？这不会就是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当作笑料的大陆特异功能者吧。

“你们有几个人？你们有几个人？”“特异功能者”好像死机了。

“我们？没有我们，我就一个人啊！”

“拿花做什么？”

“为什么不能拿花？”我更加困惑了。

“身份证！”

“没带。”

“请等一下，我们要核实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证号是 11……”

我话还没说完，“特异功能者”竟转身走了，他根本不需要我的身份证号就去核实我的身份了！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陆特异功能人士！在他离去的当儿，一个穿着和我一样普通但在和什么军聊天的人凑了过来。

“您拿的什么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

“哪国的，能给我看看吗？”“普通人”很有礼貌的问。

“当然，请。”

“哦，（粗粗翻了几页）没事，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带白菊花做什么？”

“法律禁止人带白菊花进入广场吗？”

“普通人”陷入了沉默，旁边的什么军在努力咬着嘴唇，似乎想笑。

“您做什么工作的？”

“无业，您呢，您来旅游的？”

“不是，我在北京工作。”

“哦，您在哪儿工作？”

“普通人”指了指 X 光扫描机，“那儿。”

“您在 X 光机里工作？”

什么什么军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普通人”瞪了他一眼。

“您哪儿人？”

“我北京人，您呢？”

“我辽宁人。”

“葫芦岛？”

“马鞍山。”

“哦，我去过，那个地方……”

正在我和一个新结识的“朋友”对话的关键时刻，“特异功能者”回来打断了我并对我说（他的特异功能暂时失效了），希望我能去一下一个叫“局里”[16]的地方，在电脑上核实一下我的身份。于是我匆匆拿起我的书和菊花，和他走进广场，上了一辆停在那儿的依维柯警车。

警车里冷气很足，很舒服，但有股子劣质烟草味。一个面色阴郁的带着一只卷线耳机的阿姨坐在车里，我冲她点了点头，心想，她不会也没带身份证吧，这下是两个倒霉蛋了。谁曾想，我一坐下，她竟然凑了过来。笑着问：

“你多大了？”

“二十五岁。”

“在上学吗？”

“毕业了。”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您也对花感兴趣？”

“我能看看吗？”

“当然。”

“这白菊花在哪儿买的？”

“西单，五块钱。”

阿姨拿起了对讲机“注意注意，西单有人卖白菊花”，这个举动把我从对“特异功能者”的思考中彻底拉了出来，陷入了更大的困惑……

为什么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要坐在警车里消磨时间？为什么她对白菊花如此感兴趣？为什么她要通过对讲机告诉别人她很感兴趣？卖花的小姑娘城管都懒得管，又关她什么事？还有，一个普通人要对讲机和耳机做什么？……

“这菊花有什么含义吗？”她回头问。

“含义……没想过。”

“一定有一些含义的，每一种花都有含义，比如，玫瑰象征着爱情，菊花……”

“哦，那就是美好、纯洁、幸福？”

“可这是白菊花啊！”

“菊花本来就有白色、黄色、紫色……”

[16] 指警察局。

“白菊花是祭奠用的。”她突然抛出了一个理论。

“哦？是吗……祭奠？祭奠什么？”

阿姨无语了，正好“特异功能者”和他的几个“练健身的兄弟”上车了。阿姨对他们说她吃饭去了，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如同祥林嫂般喃喃的说道：“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大。”

“特异功能者”走了，留下了“健身爱好者”，和晒得很黑的“南戴河爱好者”[17]，还有一个叔叔。

“南戴河爱好者”要走了我的基本信息后下了车，似乎在这群人里地位最高的一个叔叔凑了上来。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你有两种选择：要么把花留下，去看降旗；要么带着花离开。”

“也就是说法律禁止人民带着花去看降旗咯？”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执行命令。”

“您的意思是您的领导命令您拦住带着花来看降旗的人？”

“不是，根据你的情况，领导是这么批示的。”

“理由是什么，一朵白菊花能伤害谁？似乎不在你们的违禁品名单上啊？”

“没有理由，戒严需要理由吗！”叔叔的耐心和礼貌突然消失了。

“广场戒严了吗？没看到通知啊！”

叔叔刚想说话，突然沉默了……

“你尊不尊重我，你到底尊不尊重我？”叔叔突然问了一个关于感情的问题。

“我很尊重您啊，您有没有发现，我一只在对您使用敬语‘您’，而您一直在说‘你’……”

“你要是尊重我，就赶快照我说的做。”

“我尊重法律，当然，也尊重您，但我不能按您说的做，除非您给我一个法律条文的规定，哪一条禁止带菊花上街。”

我们还是略去中间与这位警号 051911 名叫王坤的警察叔叔关于纳税人纳税多少才有发言权的谈话，和各种上车来的好事者问的消磨时间的各种车轱辘话，和一个人究竟要不要带身份证出门的重复问题不表，反正我带着对于他们为人民服务效率低下（一个小时竟然查不出一个身份证号码），和无法按时看降旗的不满，拿着白菊花和书随着依维柯（一路逆行）来到了“局里”。

这个叫“局里”的地方并没有门牌号，而且进进出出的有：面带菜色的乡下人，挺着肚子尾随他们的警察，带着耳机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不明身份者，和第四种人——他们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类，但都靠在墙上斜眼看人，而且都晒得很黑。——我心想还是离他们远点吧，万一是攻击型神经病怎么办。正想着，后面有两个人叫我的名字。

“进去核实身份。”“南戴河爱好者”指着一个昏暗的楼道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17] 南戴河是中国最著名的海滨浴场之一，作者因为此人肤色黑，故称他为“南戴河爱好者”。

“我知道什么了我？”

“你的 POS 机几秒钟就能查出我的身份。”

“POS 机坏了，网络不通。”“南戴河爱好者”眨了眨眼睛。

“不要撒谎，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要撒谎。”

“真坏了，不信你……”“南戴河爱好者”快哭了。

“好好好，行吧。”

我怕他一个大男人真哭了我反而下不来台，就走进了那个卫生搞得十分糟糕的楼道，由“健身爱好者”尾随着，绕过几个带着哭腔的乡下人，进入了一个有趣的房间，这个房间没有任何看上去能核查身份的设备，只有几把椅子，几个摄像头，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摞白纸和红色的印泥盒，一扇有铁栅栏的窗户，还有防盗门。

“坐吧。”“健身爱好者”指了指一个凳子。

“怎么了？”出现了一个新人物，他年纪三十岁上下，穿着警服，问“健身爱好者”。（就叫他警服小子吧）

“带白花的。”“健身爱好者”抬头看了我一眼。

“为什么来广场？”“警服小子”微笑着拉了把椅子坐着我旁边。

“我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去核实我的身份，我只是来看降旗，没带身份证。”

“带白菊花做什么？”“警服小子”还是笑。

“喜欢菊花。”

“喜欢菊花?”

“喜欢，家里也养了不少。”

“家哪儿的？”“警服小子”渐入佳境，此时走进来一个穿军装的干部模样的人，没有说话，只是坐在了“健身爱好者”的旁边。

“海淀。”我答道。

“为什么今天来看降旗？”

“因为昨天没时间，明天也不想来。”

“带着花今天来看降旗是不是要纪念什么？”“警服小子”有点急躁了。

“啊？您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明白，请您说明白点。”我大惊。

“今天是六月四日。”“警服小子”目光如炬。

“六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啊？”我直视着他反问。

“警服小子”一下子不说话了。

“诸位，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我站起来大声问，但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健身爱好者”还装作看手机。这时，门开了。

“你现在是否住在海淀区 xxxxxxx？”闯进来一个秃头的人，没打招呼就问。

“不是，我住在 xx。”

“详细地址？”“秃头“掏兜找笔。

“我需要先看您的警官证。”

“没带在身上，你就说吧。”“秃头”不耐烦地说。

“我需要先看您的警官证。”我重复。

“秃头”自知违反了操作流程，气喘吁吁的跑回去拿来了警官证：05114？王 xx，因为后面俩字儿我不认识，是生僻字。我就告诉了他我的住址。

“单位？”

“没单位，自由职业”

“父母单位？”

“我早成年了，又不需要监护人，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

“秃头”嘟嘟囔囔的走了。

漫长的等待中，看完了半本书。这期间来过两个人，一个是轻微精神病的妇女，自称梦到了某领导人，让她来什么门前找他。另一个是一个拎着写有“二十二届教师节留念”的中年男人，很紧张，警察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最后这两个人都被自称是什么什么办[18]的人带走了。

“人真是奇怪啊！”我放下手中的书大声说。

“人有什么奇怪的？”“健身爱好者”和“军装干部”都看着我。

“随随便便，心甘情愿的就跟一个陌生人走了。”

俩人没说话

出于无聊，我想起了很多劫机电影里面的经典对话，反正看降旗的时间还早，我就说：“查我身份的人怎么还没回来？”

“该回来就会回来的。”

“早就查完了吧，在做什么？”

“那倒不是，赶上了，系统就是这么慢。”

“你有孩子吗？”我问 “军装干部”。

“没有。”“军装干部”笑了。

“你会有的，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将怎样对他们描述自己呢？”

“军装干部”沉默了。

“骗子，你的父亲是一个骗子。”我慢慢地说。

不知为何，所有人都不出声地笑了。

“你还能看书，我只能干呆着陪着你”“健身爱好者”说。

“你想看吗？我给你看。”我把书递给他，他摆摆手拒绝了。

“你能把花留下吗？留下你就能走。”“警服小子”插话。

“不能，但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给你。”

“你能送给我吗？”“警服小子”一脸纯真。

“不能，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嘲讽地看着他。

这时已经八点多钟，我在这个叫“局里”的鬼地方呆了两个钟头了，陪我逗闷子的有“警服小子”、“健身爱好者”、“军装干部”三人，查我身份信息的“秃头”一去不复返。我对看降旗，实现为它自豪、为它欢呼祝福的念头已经不抱希望了。多么神奇，只因为我没带身份证只带了一朵花！

[18] 指某地驻京办事处。

“秃头”说来就来，不是一个人来，又带了俩人 A 和 B，活脱就像从《茶馆》[19]第三幕里蹦出来的一样。A、B 哥俩一进门儿就横着肩膀。

“走吧！”A 说。

“去哪？”我问。

“去 xxx 啊，你不是住那吗？我们就是 xxx 派出所的。”B 说。

“我自己可以回去。”

“别啊，我们都开车来了，怎么能白跑一趟。”A 又说。

“谁让你们来的？你们自己愿意来！再说，你们是谁，给我看你们的证件。”我说。

“没证件，没证件！”B 突然失控了，口水都出来了。

“喊什么喊？没证件你们跑这儿干嘛来了。”我看了眼“秃头”，“秃头”没说话。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让你走就走。”A 说。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敢假冒警察，我马上打 110。”我反驳。

“穿着一样的制服，区别真大啊。”我对“秃头”说。

“秃头”转身把 A、B 拉出了房间。

“你可以走了，你打车走是吧？”过了半晌，“秃头”回来对我说。

“这就是本大爷的证件！”A 冲了回来，揪着衬衫上自己的警号对我说。

“不要激动，041128。”我平静地说。

“秃头”又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没事了你们，走吧。”

“你可以走了，记住，以后如果想献花先去管理处备案。”

“谁说我来献花了？我来看降旗。”

“我说如果！”“秃头”大声说。

“我一辈子都不会来献花。”

“那最好。”“秃头”随口说。

“你说什么？为什么不献花最好？好在哪？”我没有准备放过他的反动言论。

“当我没说吧，你可以走了。”

我向“健身爱好者”打了个招呼，感谢他陪我发了一下午呆，他坐在那儿都快哭了，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看我，而我一直在看书，也没有要逃跑。他练那么多肌肉也没派上用场。几个人起身送我走出了“局里”这个神秘又滑稽的地方。“秃头”还好心的为我指了能打到出租车的方向。

“再见。”

“再见。”

太奇怪了……派出所的人开车穿越半个北京来送我回家，是一种什么程序呢？我的身份到底被核实了没有？为什么我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们就让我走了？到底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有什么秘密为何不肯告诉我？难道他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既然知道还问什么呢？今天对于他们这么特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看来得回去找回中学历史书看看，到底什么日子会令一群大老爷们对一朵鲜花如此恐惧？这些问题是永恒的迷！

[19] 一部描写清末民初北京生活的著名话剧。

唉，该诅咒的四十六路公交汽车，你何必经过一个普通人身旁；唉，彭丽媛，您何必唱那首歌；你们毁了一个小市民的下午。他本来应该去吃碗卤煮或面条，买点便宜货再逛逛胡同！他可是带着崇敬走向广场去向那面旗帜致敬，在他的人生终于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却被一群业余喜剧爱好者围着，强迫排练了一下午达里奥佛[20]，等他们过完戏瘾天都黑了，黑得令人害怕，他现在出来了，站在长安街上，他该走哪条路回家呢？

[20] 一九九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喜剧家。

吴华英，《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七0年代生于福建省福清。二00一年，弟弟吴昌龙在“福清纪委爆炸案”中蒙冤入狱后，吴华英开始为弟弟申诉上访，期间从上访者成为维权人士。二00九年，因与游精佑一起拍摄了“闽清严晓玲案”严母林秀英自述冤情的视频并上传到网络，成为全国著名的“福建三网友案”中三被告之一。

蒙冤记

吴华英

一、深夜抓捕

二00九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二点左右，我们一家人都在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父亲、女儿惊恐地走出卧室。

我打开里面的木门，隔着铁栅栏问：“谁呀，半夜三更的，有什么事？”

漆黑的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查户口的。”

“又是查户口的？为什么只查我家？”

门外的人不接我的话碴，继续大喊开门。

我说：“请你们出示证件。”

来人说是音西派出所所长，证件忘带了。

我很鄙视他们这种连基本执法程序都不遵守的借口。没有证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你喊开门，我就开门？

其实，我心里清楚，来人就是警察。这些年来，我为蒙冤入狱八年多的弟弟四处伸冤上访，已让他们恨之入骨。这样的半夜骚扰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我说：“请你回去把证件拿来。等看到证件，我才能配合你们‘查户口’”。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去。

我立即打电话，向律师、亲友通报：今晚又遭遇警察“查户口”。

然后，我找出数码录音笔调试好，准备一会儿将“查户口”的过程录下来。

趁他们还没有返回，我又给一个约好明天陪我去看守所，为弟弟吴昌龙送东西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明天的约定可能要取消。电话还没打完，外面又响起了敲门声：“证件拿来了，快开门。”

我只好把电话放在一旁，用方巾盖上，过去开门。

门刚打开，一男一女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就闯了进来，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六七个便衣，其中一人扛着摄像机。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没接，但按开了接听键，然后问四周站满的警察：“传唤证带了吗？”

领头的瘦个子便衣迟疑了一下说：“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你叫什么名字？”

我坦然回答：“吴华英。”

看到我拿着手机，几个便衣异口同声让我放下。随后他们开始抄家，一个便衣掀起座机电话上的方巾，把话筒扣上。不一会儿，放在冰箱上的数码录音笔也被发现了。

看到这群人在家里翻箱倒柜，我再次追问：“你们为何来抄家？警官证、搜查证、传唤证都带了吗？”

瘦个子便衣示意身边的那位拿出警官证，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我问瘦个子："你是哪里的？也请你出示证件。"

瘦个子回答："市局的。"

"哪个市局的？"

"福州市公安局。"

我说："既然是福州市局的，就应该亮出你的证件。"

我的父亲在一旁忍不住质问："我儿子冤狱八年没人理。半夜三更你们又想干什么？你们这样滥施淫威，于心何忍，于心何忍！"

看到父亲焦燥愤怒的情绪，我害怕出意外，连忙宽慰他："我没犯法，没事的。他们要折腾就折腾去吧。"

搜完客厅，他们开始搜查卧室。柜子里的衣服、物品被一样一样翻得七零八落。看到他们又要搬走电脑，我的心一沉。八年前，弟弟被他们带走后，警方多次来抄家，从未留下扣押清单。我说："今天你们抄走的东西，能不能留下清单？"

便衣说："这个你放心，我们是按照法律程序办的。所有扣押的东西，都会给你清单。"

听到他们口口声声按照法律程序，我就来气："别跟我说这些道貌岸然的话。这么多年了，我弟弟被扣去的手机、家用电器，收藏的邮票等物品，为何至今不见踪影？"

便衣说："如果没有写在扣押清单里面，你可以不给我们。"

我心里暗自冷笑，知道多说也没有意义。

他们搜查了两个多小时，总共抄走物品十三件，主要是电脑和文稿。

一个闽南口音的便衣，拿出一张搜查证，对我的家人说："你们谁来办一下手续？ "

我女儿走过去，想拿搜查证，便衣说："这个不能给你。"

女儿问："不给我，那我拍张照片作凭证总可以吧？"

另一便衣极不耐烦地说："不行不行！"

看到女儿和他们争执，我不禁想起五年前的往事。二00五年九月十四日夜晚，也是十二点多钟，七八个便衣同样以"查户口"的名义要把我带走。十二岁的女儿拿出照相机，拍下他们抓我的情景，哭着说："我要拍下来，到时候找不到妈妈，就拿这张照片向你们要。"

时过境未迁，往事历历在目。想到这些，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瘦个子掏出了传唤证，在我眼前晃了晃，让我带几件换洗衣服，跟他们走。凭着多年被抓的经验，我感觉这次非比平常，我说："今晚，你们是以何罪名传唤我，总该有个理由吧？传唤证上没写清楚。"

便衣说："你跟我们走，我们调查一下就知道了。"

"你们什么都没调查清楚就来抓人？"

便衣说："我们是依法办事。"

父亲气愤地说："依法办事？你们的法为何不用来解决我家的冤案，总是用来欺负我们？"

我担心父亲情绪激动，于是不再追究那一纸法律文书，准备跟他们走。

我草草收拾了一包衣物，瘦个子说："少带一点，不要弄得像搬家。"

我说："既然你们又是抄家，又是传唤，我还是多带一些吧。我家老的老，小的小，别让他们跑来跑去，增加麻烦。"

临出门，他们给我带上了手铐。看着家人，我的心在滴血。我再三咛嘱他们："要互相照应，过好每一天。"

二、三十六小时审讯

凌晨两点左右，我被带到福州市马尾区快安派出所。派出所里灯火通明，不少人进进出

出，先是两个年轻人看着我，不一会儿，几名便衣把我带进了一间特审室。

我感觉乌云压顶，暴雨将临。

我被按坐在一张“老虎凳”上。“老虎凳”用铁条和钢管焊成，扣上前面的横板，我被固定在里面不能动弹。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特审室四面无窗，空气异常闷热混浊，门口摆着一台大型落地扇，对着审讯我的人呼呼旋转，我感觉不到一丝凉意。

几名年轻便衣一边吃着宵夜，一边谈笑风生：“楼上专案组来了好多人，吴大亲自出马，还抱着被子来了呢……”他们好像故意说给我听，以加剧我内心的恐惧。

便衣们吃饱喝足后，开始对我进行审讯。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遭到拒绝。

审讯者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你去问省公安厅厅长牛纪刚去。又不是第一次抓我，他最清楚我的底细，我的手机和住宅电话，时刻都被你们监听……”

审讯者恶狠狠地说：“我问你话，干嘛扯到牛纪刚身上去？‘闽清严晓玲案’[21]你清楚吗？你认识林爱德、陈仰东、陈焕辉、杨雪云、郭宝峰、游精佑、范燕琼[22]吗？”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被抓，原来是因为“闽清严晓玲案”。

我请他们拿出今晚抓我的法律依据来，否则我拒绝回答。审讯者没辙，只好上楼汇报。

余下的人七嘴八舌：“你电脑里的材料，你发表在网上的帖子，我们都看了，也很同情你，为了你弟弟的事情，你这个做姐姐的上访了八年，挺不容易的。但是，你只要管好自己的事，不要管别人的事……”

上楼去汇报的审讯者回来了，随他而来的几个人架起了一台摄像机，镜头对准我，然后拿出一个没有装水的纸杯，放在摄像镜头前做道具。又从身上掏出证件，在镜头前晃了晃，迅速收回。距离太远，我根本看不到证件上的内容。

审讯重新开始，仍然重复着之前的问题，我也不断用之前的话应对。

审讯者说：“对你弟弟的冤案，我深表同情。但一码归一码。今天抓你，是因为“闽清严晓玲”案，不是‘福清纪委爆炸案’[23]，你不要老扯你弟弟的事”

……

审讯轮班进行，走了一位“红 T 恤”，又来了一位“白衬衫”。期间，有一人拿来一张十二小时传唤证让我签字。

长时间被强光照射，我已分不清白天、黑夜。身体里的水分也在闷热中蒸发流失。被固定在“老虎凳”上的身体麻木酸痛，滴水粒米未进的肠胃开始一阵阵痉挛。我一边用手捂着胃，一边弯着身子，以减轻肠胃痉挛造成的疼痛。

审讯者时而戳我脑袋，时而猛踢“老虎凳”，时而拽着我的肩膀晃动，不让我因极度疲惫而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拿来了一张十二小时传唤证让我签字。

在被他们多年的折腾中，我也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我对来人说：“二十四小时之内，你们如果拿不出我有罪的法律依据，就必须放我回家。”

对方大吼起来：“吴华英，你一字不吐，原来就是想耗过二十四小时走人？嘿嘿，老实

---

[21] 即二 00 八年二月十一日，发生在福建省闽清县的严晓玲意外死亡案。

[22] “福建三网友案”中最初抓捕的涉案人。一个月后，除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三人被正式逮捕、起诉外，其余几人均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获释。

[23] 二 00 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福建省福清市纪委司机吴章雄触动了被事先安放在纪委传达室的一个邮包，当场被炸身亡。案发三个月后，福清警方宣布案件告破，称福清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因对纪委审查其账目不满，与该公司司机吴昌龙一起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爆炸案。二 00 四年十二月一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陈科云、吴昌龙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事发十年来，被告一直申诉喊冤，称自己是在警方刑讯逼供下被迫认罪。二 00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此后，该案几经反复，直到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才在福建省高院开庭审理，但至今审而未决。

告诉你，今天你就别想了。我们已经申请对你审讯升级，变更措施为‘监视居住’”

我打断他：“即使是‘监视居住’，依法也应当在我的住所……”

对方高声凶我：“你还想像以前那样，关几天就回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不是快安派出所吗？突然想到曾经听一位同是《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朋友提到过“国保”，难道这就是他们办案的地方？

过了一会，押送我到快安派出所的便衣 “大眼睛”进来了。

“大眼睛”说：“看了你记录的账目，开销不小啊。八年都没有工作，一直在申诉和上访，你的生活来源靠什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电脑里的材料是谁整理的，有没有人帮忙？”

旁边另一位便衣说：“你知道范燕琼为‘福清纪委爆炸案’写了半部书稿吗？”

我不知道他们的用意，以沉默表达抗议。

长时间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心力交瘁，不知不觉神志开始模糊起来。

突然，我又被摇醒，审讯者拿着一张照片问：“这是不是你女儿？”

“老虎凳”距离审讯桌有两米远，我无法看清照片上的人。这时，听到女儿熟悉的声音从大门外传来，我振作起精神转头搜寻她的身影。

从门外嘈杂的声音中，隐隐约约听到范燕琼的女儿林静怡在喊妈妈，难道范燕琼也被抓来了？又听到有人提到游精佑的名字，游精佑工程师也关在这里？

没过多久，特审室又来了几个便衣，他们打开“老虎凳”前面的横板，让我在一张“刑事拘留证”上签名。

看到拘留证上的时间我才知道，自己在这间特审室里已经被连续审讯了三十六个小时。 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我水、米未进。

我的手被他们拽着摁指模，拍照片。我已没有力气抗议，任由他们摆布，只希望早点结束这一切，倒头睡上一觉。

走出特审室，遇到那个闽南口音的便衣头目，问他：“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以何罪名拘留我？”

他迟疑了一会儿，说：“是‘诽谤罪’。”

“我诽谤谁了？”

他沉默不语。

我被几个警察押着，走出快安派出所，此时，天正下着滂沱大雨，真是老天有眼，它也在为我一家的苦难遭遇而流泪啊。我蒙冤八年的弟弟，姐姐再也不能为你奔波诉冤了。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泪水和着雨水，在脸上流淌……

三、投入“二看”

七月二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拎着自己的一袋衣物，被押上了警车。

我不知道他们要将我押往何处。但有一点我清楚，我去的地方不是拘留所，就是看守所。

警车冒雨前行，雨刮不停的左右扫动。警车开行了一段时间，绕了好几道弯，将我押到了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简称“二看”）

进入“二看”大厅，看守所的一名林姓女管教打开一道小门，让我跟她进去。

我一步一挪地随她到了“二看”医护室。医生看我形容憔悴，有气无力的样子，问我：“有没有被警察刑讯逼供，手臂上的淤青是怎么回事？”

我如实回答：“马尾警察没有直接打我，但让我连续坐了三十六小时‘老虎凳’，不让我吃饭、睡觉，是变相的刑讯逼供。”

医生检查完后，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名、摁手印。

林管教随后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屋，门也不关，就让我褪掉身上的所有衣服，手抱着头，反复下蹲。

经过三十六小时的连续折磨，估计她看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误以为我是吸毒人员，担心我身上带有毒品。

由于审讯期间水、米未进，几次蹲、起，让我几乎站立不住，踉跄跌倒。但林管教视若无睹，只顾催促我继续蹲下、站起，直到她认为满意为止。

然后又让我站在小屋里摆放的一架电子秤上量身高、测体重。我的体重六十二公斤，身高一百六十八公分。

测完身高、体重，林管教让我把衣裤穿上，把胸衣和鞋子扔到一个蓝色塑料桶里。这时，旁侧的小门打开了，两名从派出所押送我到“二看”的女警察走进来，拎着我带来的那包衣物说：“二看不让带进去，让你家人另外寄些衣服和钱来吧。”

我向她们要求：“请让我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

其中一位女警察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拔通了我女儿的电话。我告诉女儿：“妈妈被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帮我请律师，寄几套衣服，再寄一些钱来。你们要坚强，妈妈没事的……”。在女警察不断催促下，我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赤足走过四道大门，被林管教带到标有“文明号”的三０一监室，大铁门打开，我一步跨了进去，眼睛还没有适应昏暗的环境，就听到“哐当”一声，大铁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迎面走来一位四十开外的女人，她中等个儿，两腮无肉。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不好相处的人——一定是牢头。

她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了一番，然後让我跟她走。走过布满铁栅栏的天井，跨进了第二道铁门，进到里面的监室。这间监室大过外面的一倍，有三个大铁窗，窗台上放着衣服之类的物品。约十米长的过道，一边坐着一排女囚，另一边是一排大通铺，通铺靠墙的里面，也坐着一排女囚，每人前面放着一只塑料桶，塑料桶上面铺着一块硬纸板，硬纸板上面叠满塑料袋和一束束红色牛筋线，女囚们用牛筋线把塑料袋穿结起来，制作成鞋子的包装袋。

牢头指着洗手间的两塑料桶水命令道：“把衣服脱了，先洗个澡。”

我打量洗手间，它是用塑料扣板搭建的，上面也用塑料板封死了，但与塑料板相对应的那扇铁窗，会让在里面如厕、洗澡的人春光外泄。后来在里面呆长了，我发现，送饭的师傅，巡逻的管教，常常会在女囚们洗澡的时间路过，偷偷瞄上几眼，以满足他们的变态心理。

牢头指挥两个女囚，把一大堆东西放在洗手间旁的窗台上，说：“塑料桶、毛巾、拖鞋、牙膏、牙刷、肥皂，都是公家先借给你用，等你家人来上卡了，你要买了还给公家。还有这套衣服也是公家先借给你穿的，等你家人寄衣服来了，把它洗干净还给公家。”

牢头和两个管生活的女囚监督我洗澡，看到我身上多处淤青，牢头问：“挨打了？”

我摇摇头：“是坐老虎凳弄成这样的。”

牢头又问：“你是哪里人，因为什么事情被抓进来？”

我说：“是福清人，因状告无良官员遭到打击报复被抓进来的。”

两个管生活的女囚，要我把脱下的衣服扔到洗手间外面，她们用塑料袋当手套，拎起衣裤，仔细检查每个衣襟和褶皱，生怕里面藏着危险品或违禁品似的。

平时，我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一日三餐很准时。突然两天两夜水、米未进，身体处于极度虚弱困乏状态，冰冷的水淋在身上，顿时打起了寒颤。洗完澡，牢头叫我把换下的衣服装进红色旧塑料桶中，等吃完饭再洗。

然后她指着“学习园地”贴着的几张Ａ４纸说：“你刚进来，叫‘新号’。按监规，七天之内边生产边学习，背熟监规、作息时间、权益和义务，等等；七天后，和老号一样待遇，轮流值班搞卫生；一天生产一千五百个鞋袋，生产任务完不成不能休息；如果监规、作息时

间、权益和义务背不下来，晚上要加班背，直到背熟为止；第二个星期要背熟七章四十二条行为规范，如果背不下来处罚跟背监规一样；如果有人揭发你有违规行为，视情节轻重罚班……”

听牢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规矩，我倒抽一口冷气。

当天下午四点多，晚饭送来了。二十多个女囚分成三个小组挤在通道口，等待三个牢头，两个生活组的女囚分发饭菜。其中一个叫娟的女子，拿一把用香烟烫了记号的塑料小勺递过来，要我看清楚记号，说：“以后这是你专用的，不要搞错了。”

领到晚饭后，女囚们依次按进监的时间顺序蹲在号子里吃饭。我是新号，所以蹲在垃圾桶边。

晚饭后，牢头拿来一件桔红色囚衣叫我穿上。还让人教我练习背诵 “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的口号。举手报数时声音要响亮，否则就要一直喊，直到牢头满意为止。

六点钟，女囚们盘腿坐成两排，等候铁窗外巡逻管教前来点名。

穿便衣的管教姗姗来迟，左手一本名册，右手一支笔。先按开关，“呼”的一声，把隔间的铁门关上。监室里鸦雀无声，牢头大喝一声：“报数！”声音像平地炸雷。“一、二、三……”清脆响亮，短促有力。管教点完名，记录在册，转到下一个监室。

之后牢头开号务会，对号内秩序点批，宣布奖罚。

晚饭之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新号要站在通道口背监规。大家时而闭目默念，时而睁眼验对，那副认真劲，是因为害怕受到加班的处罚。

我突遭逮捕，心乱如麻。加上连续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折磨，身体极度困乏，脑袋昏昏沉沉，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背监规。

晚上七点钟，打铺睡觉。女囚们争先恐后到墙角认领自己的席被，只有我无所适从，抱着被单，站在卫生间一侧看着她们来回折腾。

牢头安排我睡在两位老年女囚的边上，我们三人挤在一米宽的水泥地上睡下。白天繁重的生产任务，使女囚们倒下就发出阵阵鼾声。我躺在狭小的过道里，看着灯火通明的监室，虽身心疲惫，却睡意全无。我默默地向上帝祷告：“主啊！请保佑我狱外的父母和女儿，让他们平安。请保佑我蒙冤八年的弟弟，让他健康地等到伸冤雪耻的那一天……”

早上六点，随着一声 “起床！”的吆喝，下铺的号友一跃而起，叠好被单，井然有序地堆放到过道的墙角，然后轮到上铺的人收拾整理。牢头则翘着二郎腿，注视着号里的一举一动，不时发令催促。我揉了揉粘糊的双眼，拖着僵硬胀痛，疲软无力的身体开始了紧张的一天。

四、二十四小时讯问笔录[24]

七月三日九时许，昨天带我进来的女管教来到我被关押的三 0 一室查号。我现在知道她叫林梅希，四十岁左右，负责管理三 0 一和三 0 二监室。

林管教进来点名，问了问号里的情况，例行公事后，就叫我跟她出去，也是例行公事，二十四小时讯问笔录。

她一路走，一路劝我：“不管是因为什么事进来的，既来之则安之。想多了也没用。安于现状，管好自己……”

林管教是军转干部，养成了“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思维习惯，只知道惟命是从，不问是非对错。

我跟着她来到管教办公室，林管教看到我一点都不拘谨，皱着眉头说：“本来在押人员到我这里谈话都要上手铐。今天没给你上铐，把手放到背后。”她指着两步之外的墙角，让

[24] 指在押人员进看守所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的讯问笔录。

我把凳子往后挪。

她居高临下的训斥态度，让我很反感，但出于礼貌，我还是照她说的做了。

林管教问："你叫什么名字，出生年月，住址，因何罪被逮捕，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在海外，你八年都在告状，生活来源靠什么？"

我告诉她："你问的这些问题，早在几年前，福建省公安厅牛纪刚厅长，就屡次派福州市公安传唤我，要我交待清楚。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家里的私事，与你们无关。牛纪刚自己办的冤案不纠正，还对冤属打击报复，以权压法。我为弟弟伸冤，何罪之有？我弟弟至今已在冤狱中八年。你不想想，纪委机关炸死一个人，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为何只判死缓？案件审了八年，上诉三次，为何悬而不决？"

林管教听着听着，不耐烦了："你冤不冤我不管，也不由你说了算，要等司法机关认定。"

最后，她将自行写好的二十四小时询问笔录递给我，要我在上面签名画押。

我看到笔录上写着"涉嫌范燕琼诽谤罪"，非常气愤："警察抓我时，不告知我犯了什么罪，人被抓到派出所后，才问罪由。如今把我扔到看守所里，却给我安上这样的罪名。今天既然是讯问，就应该我回答什么，你记录什么。所谓的罪名，我很清楚，就是因为我多次进京告状，就是我指着牛纪刚的名字，到网上发贴揭露，让他们恼羞成怒。"

她辩解说："这是电脑里面记录的，我是照抄过来的。"

五、第一次开庭

二 00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福州气温骤降，阴云弥漫。这天是我们的案子第一次开庭的日子。

早上起床，我的心情也十分寒冷。七时许，三 0 一室的大铁门打开了，有人喊："吴华英。"

我走出监室，前来提人的管教马上给我戴上了手铐。

"二看"大门口停着几辆法院的中巴，我被押上最后那一辆。

上车前，我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范燕琼被抬上了中间那辆中巴。最前面那部车，应该就是押送游精佑的吧，但视线被挡住，我没有看到他。

几部中巴开出"二看"，七拐八弯，经过几个村庄，驶上了平坦开阔的高速公路。

约二十多分钟之后，囚车驶近马尾区法院，透过茶色玻璃车窗，我看到马尾法院的大门左右，站着一大群翘首张望的人们。只见女儿拔开人群，向车子跑来，大声呼喊着"妈妈，妈妈"。

为了参加今天的旁听，我的亲朋好友，一大早从百里之外的福清市赶到马尾法院，想必他们一夜无眠。

法警分别将我和范燕琼、游精佑关进了三个房间。在范燕琼的抗议下，法警给了我们每人一份早餐。

用餐期间，一名男法警指着我对身边的同事说："这个漂亮女人，怎么也在这里？几年前，福州中院开庭时，当庭叫起来的就是她。"

他的话让我想起福州中院审理"福清纪委爆炸案"的情景。我曾当庭揭露冤案制造者、省公安厅长牛纪刚的恶劣行径，揭露他在该案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没想到，几年之后，还有人记得这件事。

女法警附和道："她在日本的亲属，在温家宝访日期间，还向温家宝一行拉横幅请愿呢。"

八点整，我们三名被告人被依次押进法庭。范燕琼要求亲亲旁听席上的女儿，被法警冷漠地拒绝。我努力在旁听席上寻找亲友的身影，终于看到被挤在左角边上的母亲和女儿。

今天的法庭戒备森严，不仅有专人拍照，旁听席中间的通道上还架起了摄像机。

法官宣读了庭审纪律，然后问："是否申请法官回避？"

我回答："法官有独立审判权吗？如果申请回避，审判结果会不同吗？"

法官不回应我的质问，继续询问我的名字。

我说："我是"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者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因关注'闽清严晓玲案'被控'涉嫌诬陷'（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先是以"涉嫌诽谤罪"对我和范燕琼、游精佑三人宣布逮捕，起诉时改成了"诬告陷害罪"),这完全是'福清纪委爆炸案'的继续，是冤案制造者对我的打击报复。"

当法官宣读到"吴华英在二00二年六月十三日，因扰乱社会秩序，曾被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处以治安拘留"时，我纠正他："在我漫长辛酸的告状历程中，我被治安拘留过三次，不是你说的一次。二00二年六月十三日，我拦下福建省委政法委书记的轿车，面呈诉状，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后来因为一位老同志致电福建日报，向记者反映情况，我关了一天就被放出来了；第二次是在省政府门口向省领导请愿，被拘留十天；第三次我拦下省委书记的轿车面呈状纸，被拘留了十五天。"

接着，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坐在轮椅上的范燕琼，怒斥公诉人胡说八道。要求林秀英[25]出庭，当面对质，查清真相。

公诉人不理范燕琼的请求，依旧继续宣读起诉书。

这时，六位律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逐个质证，遭到法官的驳回。

面对马尾公、检、法串通一气，上下联手，装模作样的庭审表演，我和范燕琼都坐不住了。

范燕琼以退庭抗议，我也当庭表示："今天庭审，既然话都不让我们说，那对不起，我不配合你们演戏，你们自已唱独角戏去吧。"我的话，引来旁听席一阵哄笑。法官猛拍"惊堂木"："安静！安静!"

我对旁边的游精佑说："看来今天的庭审，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和排练，开不开庭，结果都一样，我们没必要配合他们录音录像。"

在我们的抗议声中，法警将我们押出了法庭。

没有被告人配合的表演，难以演好"剧本"。加上众律师的据理力争，法官只好不再坚持原先笼统打包的质证方法，改为对我们三人的逐个审问。

当我们被法警重新押进法庭时，我在门口站住了，对旁听席上大声说："今天来旁听的人里有多少是我们的亲友，请站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黑压压的旁听席上我们三位被告的六位亲属站了起来。

这时，范燕琼的前夫林辉对我说："许多前来参加旁听的亲友，还有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都被挡在法院大门外，不让他们进来。"

我不顾身后的法警用力推我，对法官说："今天的庭审，倾向性太明显。法官大人，你的法槌是为长官意志而敲，还是为法律正义而敲？牛纪刚厅长今天是否也在小阁楼上坐镇指挥？"这与当年福州中院审理"福清纪委爆炸案"如出一辙。

法官马上频敲法槌，喝令我："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话。"

我接着质问公诉人："我到底诬告了谁，陷害了谁？起诉、审讯阶段，我一再追问这个问题，但马尾公、检、法不是回避，就是推拖，说到了法院就会清楚。今天到了法院，总该给我个答复吧？"

公诉人说："现在是我在问你，不是你来问我。"

我坚持质问："请你先回答我，我到底诬告了谁，陷害了谁？"

公诉人无言以对。

两名医护人员一直站在范燕琼的轮椅边，为她量血压，插氧气瓶。范燕琼的模样让我异

[25] 即"闽清严晓玲案"中严晓玲的母亲。

常心酸。她头发稀疏，两腮深陷，脸色苍白。原先两只闪着智慧光芒的大眼睛，现在已黯淡失色，似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她的身体也严重萎缩，双腿如枯木，声音时而歇斯底里，时而气若游丝。

就在被抓捕前几天，我们还一起吃过牛排。那时，她步态轻盈，来去如风。没想到啊，短短四个多月时间，竟然坐在了轮椅上。

中午休庭时母亲和女儿靠近前来，女儿隔着铁栏杆，欲扑入我的怀中，被身后的法警粗暴制止。看到女儿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连忙宽慰她："乖，不要哭，我们要坚强。妈妈不在的日子，你要照顾好外公、外婆。"

母亲明显憔悴了，脸上写满忧愁和悲伤。

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弟弟蒙冤八年，现在我又身陷囹圄。妹妹吴华玉去年在温家宝访日时，曾拉横幅请愿。半个月后，竟遭"意外车祸"。医生曾断言妹妹将在轮椅中度过余生。好在天佑神助，她最后终于奇迹般的康复了。

此时此刻，我只能默默地祈祷：愿上帝正义的光辉照耀我们的内心，保佑我一家不被苦难压垮，让他们心怀希望过好每一天，让弟弟沉冤得雪……

整个庭审中，我和范燕琼一再请求法官，准许林秀英到庭对质，澄清真相。

法官的回应总是："等一下，等一下。"

我实在无法容忍，遂愤慨指责道："法官大人，你说等一下，现在是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了。我们等得天都黑了，还是不见林秀英到庭。"

旁听席上又是哄堂大笑，法警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法官与两位公诉人对视了一眼，然后说："我和公诉人认为，林秀英没有必要到庭。"

对我们的非法关押，是因为林秀英申诉其女儿严晓玲惨死真相而起，林秀英却"没有必要到庭？"真是天大的笑话。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旁听席上的人们开始纷纷离去。

想到被挡在法庭外的亲友还伫立在寒冬之中，我按捺不住对法官说：我们的亲人一直在外面苦苦等待。现在法庭已空出这么多旁听座位，是不是可以放他们进来旁听？

法官以法律程序为由，一口拒绝。

庭审结束，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在签署庭审记录时，我看到首页上赫然写着"公开庭审"。

当我们被押出法庭时，外面正下着雨，寒风冷雨中远远站着我的亲友们。

当我被押上中巴车时，听到女儿正对着法庭怒骂："你们是一群衣冠禽兽!"我心中隐隐作痛，是谁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愤怒和仇恨？

六、两分钟庭审

二 0 一 0 年三月十八日，林洪楠律师来"二看"会见，告诉我明天马尾法院将第二次开庭审理"福建三网友案"[26]。

第一次开庭到现在已过去了四个多月，早已过了法律规定的审限，这样的法院能审判出什么结果？

三月十九日早上七点钟，我被押出看守所，大门口已有十几名法警列队待命。

仍然是三名被告分别被押上三部中巴车。前面有警车开道，后面有辆黑色轿车跟随，这

[26] 二 00 八年二月十一日，福建闽清县女青年严晓玲突然死亡，警方做出"系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的结论，严晓玲的家人却坚持认为她是被多人奸杀致死。此后，严母林秀英开始上访。二 00 九年，福建三网友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分别用文章、视频的方式纪录下林秀英的口述并在网络上传播，被以"诬告陷害罪"提起公诉。

辆挂着“闽 0－Ａ0592”牌照的黑色小轿车里，估计是某位政法委的大官亲自坐镇指挥。轿车后面还有警车，车队最后面，是一辆救护车，车上坐着十几名医护人员。

七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警灯闪耀，浩浩荡荡，颇为壮观。出了“二看”大门，看到村道两边站着穿不同制服的人员，有保安，有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我粗粗数了一下人数，不包括便衣，大约有八十多人拦在道路两旁，不让行人靠近。他们肯定把靠近公路的人，都当成可能“劫法场”的危险分子了。

车队到了高速路口，有警察专门拦下过往车辆，为车队辟出“绿色通道”。

途中听到一法警对同事抱怨：“有一个朋友去机场，路过这段高速公路，被迫停车等待，差点赶不上飞机。”

看到这个阵势，我心里明白，“福建三网友案”由于受到全国网民的关注与谴责，让福建当局惊慌失措，如临大敌。我们因此受到这样的“礼遇”。

临近马尾法院，马路沿线围起了警戒线，不让其他车辆行驶。法院门口，亲友团早已等在那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团、公民记者、媒体记者。我坐在囚车内行驶而过，真想大声向他们道声谢谢！

警车驶入马尾法院大门，我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屠夫、天理、王荔蕻大姐[27]……

我被押下囚车时，看到王荔蕻大姐正手持摄像机，隔着铁栅栏对着我们拍摄。我喊了一句：“荔蕻大姐，辛苦了。”

我隐约听到王荔蕻大姐惊诧道：“哎呀！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

两名女法警赶快冲上来，抓住我的手臂就往法院大厅里拽，我被拽倒在了石阶上，没等我从地上站起来，就被半拖着拉了进去，弄得我囚服上满是尘土。

快九点时，我们被带到法庭门外等待。隔着一道门，听到法官正在宣读法庭纪律。

我们被带进法庭时，范燕琼的女儿林静怡在旁听席上喊了声：“妈妈。”法官立即下令，让法警将林静怡带离法庭。之后我们三人又被押到外面，在那里候着。

大概前面的过场表演完了，我们才被重新带入法庭。辩护席上，不见我的委托律师林洪楠。正诧异时，听到法官急促宣读：“经研究决定，退回补充侦查。”然后，法官脸朝公诉人嘀咕几句，再转向我们说：“案件退回补充审查。这是第二次退补，也是最后一次退补。”

刘晓原律师提出抗议，遭到法官制止，随后我们被带离法庭。

面对这两分钟的庭审，我错愕着还没反应过来，法警就将我推了出去。身后传来女儿的呼喊：“妈妈要坚强！”

候审室里，范燕琼正歇斯底里地怒骂不公的法庭，无耻的政府，腐败的官员。她握着双拳，情绪异常激动。

门口站着一个人，手持摄影机，镜头对着愤怒的范燕琼。

这时，书记员拿来了两张“公开审理开庭笔录”，要我们签字。

游精佑担心即将高考的女儿，为他四处奔波，无法静心学习。他要求见一见家人，被拒绝后，一向冷静克制的他也愤怒了。他怒斥法庭反复折腾，怒斥法官毫无人性。他把书记员递过去的开庭笔录揉捏成一团，掷到地下，好像要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张纸上。

此时的我，反而将心中的悲愤化为无言的沉默。

八年了，我为弟弟申冤，屡次遭到警方的非法拘禁，这样的经历已太多太多。尽管心里仍然愤怒，但已激不起涟漪。我默默地蹲下，捡起游精佑扔在地上的“庭审笔录”，慢慢打开皱巴巴的纸，见最后写着：“另定时间、地点，开庭另行通知……”

这次开庭，只用了两分钟：宣布退回补充侦查。以前的“退补”，都是书面通知。今天为何要浪费巨大的资源，动用众多的警力，隆重开场，草草结束？我想是为了反复折腾千里之外赶来的北京律师，也是为了折腾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团网友，让他们遭遇反复折腾之后，

---

[27] 均为“福建三网友案”关注团的网友。

心灰意冷，自动放弃吧。

我们三人很快被押上各自的囚车，车队开出法院大门时，透过茶色玻璃车窗，我看见外面围观的网友情绪激动，他们有的举着标语，有的舞动着黄丝带。

囚车很快飞驶而去，那些我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从我的视线中逐渐消失。

七、裸奔的判决

四月九日下午，马尾法院的法官林晨、陈丽来“二看”通知我，林洪楠律师受到“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北京金光鸿律师因遭遇车祸在家养伤。问我：“接下来的开庭，是否需要法院为你指派律师？”我说让林洪楠律师转告我家人，由家人为我委托律师。

我问二法官：“会判我三年以下，还是三年以上？”

法官推诿：“这不好说，要视情节轻重而定。”

我想到起诉书中反复提到的“情节严重”，看来福建司法机关对我们的打击报复是不会手软的，我心里已经做好了长期坐牢的准备。

四月十六日早上七时，三０一监室的铁门又打开了，“二看”副所长和科长亲自前来。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今天又是马尾法院开庭的日子。

前几次提人，来的都是管教干部，今天却是所长与科长一同前来；以往开庭前，律师会来会见、通知。这次家人为我委托的律师怎么没有来？

我带着满腹疑问被押进了囚车。车队开出“二看”，一路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比“三•一九”开庭那天有过之无不及。

车队还没靠近马尾法院，就看到四处拉着警戒线，黑压压一片穿制服的人。

在法院大门的右侧，有一群人被一圈警戒线围着，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挥舞着拳头……

车上的法警说：“西南交通大学的也来围观了。”

由于距离远，人又多，我还没有找到熟悉的面孔，囚车就拐进了法院大门。我和游精佑被相继押下车，范燕琼是被抬下来的。

法官照本宣科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庭审开始，我问法官：“为何开庭前律师没到看守所会见，没有告诉我开庭时间？”

家人为我请的李颖善律师解释说：“由于时间仓促，昨天还在出差的路上，没来得及去会见。”

平时在看守所，纸和笔都被牢头控制着，开庭前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所以我的陈述只有腹稿。我当庭向法官要了纸和笔，趁范燕琼和游精佑陈述期间，急急忙忙把腹稿列成提纲，以免思维短路，衔接不上。

我的“最后陈述”就是按这个提纲口述的：

“我是八年不决‘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者吴昌龙的姐姐，也是‘闽清严晓玲案’三网友之一的吴华英。我今天遭到不公正的判处，是因为我八年来不懈地揭露‘福清纪委爆炸案’黑幕，触动了福建某些当权者的神经，便借‘闽清严晓玲案’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这是‘福清纪委爆炸案’之后，冤案制造者迫害冤属之继续。

马尾法院三次开庭，‘诬陷案’至关重要的叙述者，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不能出庭作证，证人缺席，正义缺席，这是对宣称依法治省的福建法治状况的莫大讽刺。

我的行为是响应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倡导的，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果这次判我们有罪，就证明胡锦涛总书记的话错了。或者说明，福建有人上抗中央，下压百姓，制造不稳定因素。

我是现代版的杨乃武的姐姐，却没杨乃武姐姐那般幸运。她在滚过钉板之后，弟弟的冤

情终于得到洗雪。她不屈不挠的诉冤历程，也因此载入史册，为后人传颂。

而我八年的上访经历，饱受屈辱折磨。我向福建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呈状讨说法，至今未能澄清弟弟的冤情，反而因此几次成为阶下囚。

我现在只想说，人民法院是用来寻求公正，惩罚罪恶的，而不应该是用来制造不公，偏袒罪恶的。希望马尾法院本着事实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林洪楠律师因为替我辩护，被停业一年，在此，我向林律师表示歉意！透过这件事情，也足见福建的司法腐败，已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打击报复的黑手，又伸向敢于说真话的律师。那些躲在幕后操纵这起冤案的策划者，他们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请法官主持公道，秉持良心，还我们三人自由和清白。”

我做完最后的陈述，法官马上宣布暂时休庭。

当我们从候审室再次被带进法庭时，法官宣布：“全体起立，听候宣判。”

那一刻，我那颗坦然的心，立即被紧张占据了。他们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为我辩护的林律师做出“停业一年”的处罚。还能有什么公正的判决？他们明目张胆践踏法律，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按关注团网友的说法，他们已没有羞耻，当众裸奔……

法官前面宣读了什么，我没有听到，只听到最后一句：“范燕琼获刑两年，游精佑和吴华英各一年。”

宣判完毕，法官问我们是否上诉？

我立即回答：“绝对要上诉。”话音一落，我们三人立即被带离法庭，押上囚车。这时，我听到法院外，传来雄壮的《国际歌》声。

当囚车驶出马尾法院大门口时，关注团的数百名网友齐声喊着我们的名字：“范燕琼！无罪！吴华英！无罪！游精佑！无罪！”

泪水模湖了我的视线……

静下心来想想，我获刑一年，比原先预计“三年以上”确实好得多。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一定与全国网民对“福建三网友案”的关注有关。

还差两个月，我就可以与日夜思念的亲人团聚了。想到病魔缠身的范燕琼，还要在狱中呆一年多时，心中的隐忧又阵阵袭来。

那些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子里想的最多的，还是出狱后怎样继续为已入狱八年的弟弟申冤……

感谢荆楚先生为本文斟酌把关，梳理浓缩。

许志永，一九七 0 年代生于河南省民权县，二 00 二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讲师。中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博士上书”事件，即孙志刚事件中建议全国人大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提议者之一，也是著名公益性法律援助组织“公盟”创始人之一，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 00 九年七月，政府以“公盟”接受耶鲁大学法学院三笔捐款没有纳税为由，对其处以五倍罚款，总计一百四十二万多元，“公盟”下属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民政局宣布取缔，随后法定代表人许志永和财务主管庄璐被以“偷税罪”的名义逮捕，“公盟”被撤销登记。“公盟”的遭遇引发国民广泛同情和支持，纷纷捐款为其缴纳罚款。舆论压力下许志永和庄璐获释，一年以后税案撤销，“公盟”账户解冻。

经历与反思

许志永

也许这时总结还有点早，但时光会让一切变得模糊，也为了避免一些误解，有必要告诉大家这些天的经历和思考。在看守所二十多天，除了提审，大部分时间在监室思考哲学和宗教问题，写下了大约三、四十页的日记，可惜不能带出来。关于“公盟”税案[28]，二十多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刑事拘留到正式逮捕之前，我的思路发生过转变，从如实回答记不清了到主动承担责任；批捕之后几天，做好无罪辩护和几年徒刑的准备；八月十七日形势转变之后，妥协。

（一）

二 00 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早晨六点，不断的按门铃和敲门声把我吵醒。开门，进来一群陌生人，说是派出所和市公安局经侦队的，录像、搜查大约一个小时，关掉一切电源，把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带我到北京市公安局。

几乎一整天圈在铁椅子上，没有实质性审讯，中间有人送来两个包子。一个警官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政治，任何个人在政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傍晚，第一看守所，签字，刑事拘留。脱衣服检查，换号服，拍照、录像。怀着感恩的心，趿拉着特大号布鞋，双手抱着被褥，穿过长长的走廊和一道道铁门走向监室。感谢您，这是一个民族通往自由的必经道路。

七月三十日第一次提审，问我知道为什么进来吗，我看着预审的眼睛说：“为受苦而来。”“我不管你什么公益，也不管别的什么原因，我只管偷税的问题。”这是他们以后整个审讯过程的简要概述。

监室里另有五个人，他们都是涉嫌普通的刑事犯罪，大家友好相处。有新闻联播和北京

[28] 二 00 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向“公盟”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偷税二十四万余元，加上五倍罚款，共需缴纳一百四十二万余元；七月十七日，北京市民政局作出取缔“公盟”下属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决定，并查抄了“公盟”大量办公用品和文件资料；七月二十九日，“公盟”创始人之一许志永博士被捕。此案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

日报，我从新闻中看出，这个社会的法治在我被捕后并没有出现全面倒退，这样就好。另外，感谢很多朋友到看守所给我存钱，不是因为钱多少，而是能从中看到希望。其中很多是上访者，他们每个人存十块钱，看到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还都有人身自由，也说明社会整体氛围并没有全面恶化。出来以后知道很多朋友寄来了明信片，很遗憾，我没有收到，但这件事对我非常有意义。

也许因为感动，也许因为在这里终于可以放下世间烦扰，常常有美好的灵感冒出来。我向管教要纸和笔，七月三十一日给了，我开始思考和记录。

八月一日，孤独。其实过去很多年中，偶尔会有无力感，但从没有此刻这么强烈，想要一个家，想要一个完整的人生。直到第二天，躺在黑色的铺板上，心中豁然光明，终于懂了为什么恐惧，因为面对不公正，心中有时怀有敌意和怨恨，因为爱不够博大和纯粹。记住，要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值得爱。

我应该诚实，即使面对警察的预审。我对于财务、税务没有概念，七月份准备听证会时才知道记账和没记账在偷税意义上的区别，当时我一直以为“公盟”记账了，只不过没有记成收入，后来五月份补充记成了收入。地税局听证会的时候我和黎雄兵、彭剑[29]都不知道没记账。因此，在《苍天在上》一文中我才敢公开说：“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罚款”。后来看，此文中有些话说过头了，当时我认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把柄。

我确实没有印象，但预审显然不相信，为此发生过激烈争吵，他说你怎么可能不记得？！我说我确实不记得了你让我怎么办？！回到监室，自我反省，不能生气，要爱每一个人。

八月六日大概第五次提审，平时都在小的审讯室，这次是宽大的特讯室，至少三个摄像头。预审慷慨激昂地说我撒谎隐瞒真相。此刻我没有生气，仿佛从遥远的高处看这人世间几个不同的角色，于是有了一个奇怪的对话。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说，你什么想法？” 预审问。

“原谅他们吧。”

“你说什么？原谅谁？你说原谅就能原谅的吗？”

“我说的他们是指你们。”

预审有点困惑，然后继续谈坦白从宽等大道理，然后再问“什么想法？”。

“在这世间，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说。

“你回答了我的话了吗？那你说，你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良心。”

是的，我们从事的是良心的事业，预审交流中我常常提到这一点。我们不对任何人怀有敌意，我们只想为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做点什么。我们确实有远大的理想，为着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理想如此遥远，以至于令我们几代先辈们感到绝望。但是我们的理想和我们此生世俗的利益确实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我们只是为了理想。

这次审讯草草结束了。从这天开始我反思应对思路，大概第五天之后我确认庄璐也在里面。据预审说，每次提审完她都哭着不愿意回到监室，专门负责庄璐的那位警察不断提醒我该怎么办。我知道责任在我，其实谁都知道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税，而在于我们得罪了某些人，遭此劫难，导致庄璐也和我一起受罪，无论我个人多么英雄主义，如果因此有一个无辜的小姑娘被送进监狱，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耻辱。在诚实、勇气和责任伦理之间，我该选择什么？

预审反复告诉我，耶鲁法学院的几笔钱，外聘的会计那里没有记账，是二 00 九年五月份补记的，而且会计根本不知道那几笔钱的存在。他们当然不相信我居然不知道这事，他们

[29] 维权律师，“公盟”日常决策委员会成员。

认为同样难以置信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会计叫什么名字，也从来没有和会计联系过，但事实确实如此，对不起，作为法定代表人我确实失职。

我根据他们的态度推定，可能我们确实没有记账，如果对方非要给“公盟”定罪，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是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庄璐无论被他们当成财务主管还是直接责任人都很难逃脱责任。而对于我而言，哪怕庄璐只是被判缓刑也是不可接受的，她去年刚刚通过司法考试，缓刑都意味着毁了前途。大概八月七日我开始调整思路，预审肯定地告诉我，庄璐说没记账是我的指示。我确实不记得这事，但如果我拒绝认可这一点，庄璐的责任就会比较重，如果我承认是我指示庄璐不记账，庄璐只是传达我的意思，记账责任在会计，那么，法律意义而言，我是财务主管，会计是直接责任人，庄璐就可以没有责任。想到这里，我开始认可是我指示庄璐不记账，庄璐没有任何责任，预审也答应向上面汇报，争取庄璐在批捕前尽快出去。

这时我面临一个诚实的问题。不撒谎是我做人的原则，可是现在我却说是我指示不记账，做完笔录我告诉预审真实情况是我确实不记得了，为此发生激烈争吵。预审甚至扬言要撕掉笔录，理由是既然笔录是假的那还有什么用，我只好保持沉默。

晚上回到监室反思，我错了吗？他们的目标显然是针对我的，而他们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笔录。可是，如果确实没有记账，我如果不知道此事，那必然是把责任推给了别人，这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承担。

（二）

围绕案件事实第二个争议是他们所说的 “篡改账目”。对方的逻辑是，五月份地税稽查时我们补记账目并缴纳税款是“篡改账目掩盖真相”，我坚持认为我们找会计补记账目是为了弥补过失，不是为了偷税而是为了缴税。

他们花很长时间追究所谓篡改账目的细节，说我们专门开会研究过，但我确实没印象。我最大的过错是一点也不懂财税，庄璐也不怎么懂，二月份我专门问庄璐我们的税务有没有问题，她给会计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转告我说，没问题。五月份地税局开始查税，我根本不懂财务插不上手，只能告诉庄璐去找会计想办法弥补。我另外一个错误是始终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税务，而在于我们做的某些事情需要反思，比如是不是得罪了某些人，所以我集中力量考虑我们的“三·一四”报告、北坞村调查等是不是有问题，该怎么解释，等等。有两天我去了郊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心思考这些问题。

“公盟”致力于个案法律援助和具体法律制度研究，基本上关注民生问题，我们做过的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是《藏区“三·一四”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报告的基本内容是，“三·一四”[30]事件固然有外部因素，但内部因素也不能忽视，现代化进程中藏人经济方面的相对被剥夺感，文化教育的缺失，地方腐败等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由于事件本身敏感，我们很谨慎，该调查报告的资金全部来自国内个人捐助，报告非常温和理性，报告出来以后先发给国家有关领导人，过了一个多月后没有回应才公布在我们的网页上。公布之后可能确实被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利用了，我们不断就此解释和道歉，连给税务机关的报告中也有就此事的解释和道歉。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弥补税款，尽了最大努力和有关部门沟通解释，希望能化解这场危机，但是没想到七月十四日税务机关还是给我们毁灭性重罚。除了公开呐喊，我们已别无选择。

[30] 指二00八年三月十四日，发生在西藏拉萨的暴力冲突事件。

有时，我和预审一整天争吵各自的基本逻辑。对方的逻辑是，“公盟”是公司，所有行为都是经营行为，都应当依法纳税，不记账少缴税就是偷税。我的逻辑是，“公盟”形式上是公司，实质上是非盈利组织，“公盟”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和资金的性质决定了不应当适用有关税法，我们不是少交了税，而是多交了税。

期间，海淀区工商局来人了，询问当初注册时的想法，做笔录，打算撤销“公盟”公司营业执照。我详细询问撤销营业执照的法律后果，他们解释说撤销意味着失去经营行为的资格，并不意味着“公盟”公司法律主体资格消失，我们本来就没有经营，只要“公盟”公司还在就好。另外考虑到税务问题已经牵涉很多精力，工商听证会就像税务听证会一样不会有实际意义，在公司即将被定罪的背景下这成了一个很小的细节问题，没有必要给律师们添麻烦转移方向，三天之后，我决定放弃听证申请。

（三）

八月十三日下午提审。在预审室外走廊里突然见到了庄璐，和我一样穿着红色马甲，银色的手铐在她瘦小的胳膊上尤为扎眼，我叫她名字，她看着我，木然没有反应，然后我被推进旁边的预审室。这一场景给我留下了极为痛心的印象。

那天下午主要是宣告批准逮捕，隔着铁栏杆，预审递来逮捕通知书，签字。问我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如果说之前内心某个角落还有一丝幻想，现在彻底放下心了，等着审判——内心英雄主义情结开始膨胀。我问庄璐呢？也逮捕了。不是说答应争取庄璐不批捕的吗，怎么还是批捕了？对方没有回应。

八月十四日上午见到周泽律师，主要谈三件事：

一是一定要尽快给庄璐存钱、请律师。看守所里伙食太差，需要钱买额外的食品。知道“公盟”已经为庄璐存了钱，我宽慰了很多，这至少能让她感到还有人在帮她。

二是我的辩护思路，一旦进入审判就意味着一定会定罪，就没有妥协余地，我们只能坚持无罪辩护。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公盟”没有营业收入，不存在营业税问题，“公盟”没有利润，不存在所得税问题，“公盟”不是少交了税，而是多交了税，这不仅是为“公盟”辩护，也是为很多在工商注册的公益组织辩护。

三是委托雄兵、功权等处理我的私事。房屋租期到了，帮我把东西搬到郭玉闪家；还房贷；送一些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来，等等。

接下来是一个平静的周末，想好了未来几年的狱中生活，要写的书的名字《灵性的成长》。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是灵性成长之路，灵性成长靠科学进步、经济发展、教育启蒙、法制完善和宗教道路。至于个人，灵性成长主要靠三个方面：服务——这一生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帮助了多少人；承担——为社会进步和他人幸福承担了多少代价，苦难、残疾等都是为正常人承担；放下——在多大程度上放下了自我。

（四）

八月十七日，形势似乎发生了变化。预审变得焦急，急于要我认罪，甚至说出“这也是为你好”之类的话。又过一天，预审明确说，交了罚款有个好的主观态度就可以出去了。

我说出不出去无所谓。某种意义上这时确实已经无所谓，如果命运为我准备了一条圣徒的道路，在里面待几年也好，可以认真思考哲学和宗教问题。当然出来也好，可以继续做事，

听天由命吧。但我得承认，本来批捕之后心情平静，看到对方急于找台阶下，对自由的向往又开始萌动了。

他们又谈到庄璐，说庄璐主动要求提审，如何每天以泪洗面，等等。说，你无所谓，人家小姑娘凭什么要受这个罪？我知道他们急于找台阶下，但也不敢冒险，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关于认罪的问题，我要求看刑法第七修正案，他们给我拿来的是修订前的刑法二百零一条，当时我不知道，很抱歉之前还没来得及看刑法第七修正案。我认真研究了很长时间，觉得控方的逻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公盟”是公司，没有记账（行为方式），少交了税，构成偷税罪。如果对方可以让步，那我们也可以让步，从绝对无罪辩护的思路退回来。我们从来不寻求对抗，如果有必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也未尝不可。

我认了“‘公盟’客观上构成偷税行为”，“如果耶鲁大学资助‘公盟’的款项没有记账，是我指示不记账”。最后两、三天对方一再要求我承认没记账“主观上为了偷税”，我肯定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另外，我考虑万一被起诉，没有主观故意是作无罪辩护的必要条件。最长的一天在预审室僵持了九个小时，盒饭摆在那里，他们不吃，我也不吃。

八月二十一下午，为了主观故意问题，我们发生了最后一次激烈争论。他们说，你这样的认罪实际上还是没有认罪，庄璐还是不能出去啊。我说，对不起，我能为庄璐做的就这些了。僵持不下，后来公安局的一个领导过来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说出去还有活动空间，继续推动法治等等，我们达成妥协，我写一个几百字的《关于“公盟”涉嫌偷税问题的思考》，基本内容是：“公盟”是一个理性、建设性推动民主法治进程的公益组织；作为一个非盈利的公益组织，我们确实有少缴税的想法。但是，具体到耶鲁大学这三笔钱，不记账的主观原因是一系列因素构成的，本来这些捐赠应不应纳税就有争议，主要是暂时搁下后来忘记了；“公盟”客观上构成了偷税罪，保证以后不再犯同类错误；“公盟”税案值得反思，一方面工商注册的公益组织应当依法纳税，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放开公益组织在民政局注册。他们要求把最后一段删除了。关于主观故意我始终没认可指控，也为可能的庭审留下无罪辩护的空间。他们不满意，但也只能这样，我必须坚守底线，一旦开庭审判只能是无罪辩护。

晚上，学校副书记来看望我。感谢北邮[31]老师、同学的关心和支持。其实即使没有安慰，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怀有敌意，我们从来都不对任何人怀有敌意，即使遭遇了不公正之后。

（五）

八月二十三日早上，正在思索时空问题，扩音器里传来“许志永收拾东西”。十分钟后，我和室友们拥抱告别。办理手续时问预审，庄璐怎么样，回答说取保候审，昨天已经回家了。我还有疑问，对方肯定地说她走了。我默默走出大门，心中感伤。

二十多天里，我有过懦弱，最初的两天渴望有一个家，但还好，那只是一闪念，整个过程中，我基本的心态是感恩。关于有限度的所谓“认罪”，我也不断反思，这样做对不对。关于“公盟”的辩护思路，一是完全无罪，“公盟”作为实质的非营利组织，不存在税的问题；另一个是对方的思路，“公盟”作为公司，根据现有法律确实有不记账少缴税的事实，根据旧的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构成“偷税罪”，控方虽然弄错了罪名，但这个逻辑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一些法律人士也这么认为。如果非要把我们审判定罪，我们只能选择无罪辩护，一个非盈利组织因为税务问题遭难本来就是荒诞的。但是，如果可以妥协，在对方基本承诺

[31] 指北京邮电大学。作者为该大学的教师。

我们有继续推动法治的活动空间，作为法律人，承认“公盟”作为一个公司在纳税方面的过错似乎也有点道理。

在通往民主法治的道路上，我们常常面临妥协。很多时候妥协是被迫的，比如为了保护人质不被伤害，或者为了保全继续推动社会进步的空间，一些体制内改革人士可能要做更多的妥协，体制外人士可能更少妥协，但绝对不妥协几乎不可能。有时妥协是基于认识问题的不同角度，很多时候控辩双方并不是一方绝对正确而另一方完全错误，这个世界常常不是非黑即白，有时理解一些保守势力的思维对于社会进步是有帮助的。我尊敬那些为信念毫不妥协而牺牲的前辈，我自己的角色是一个建设者，社会进步还有很多事需要做，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如果还有推动正义事业的空间就可能有些妥协，如果没有了做事空间，担当和牺牲也无怨无悔。

我有过关于诚实的困惑。过去两、三年以来，诚实开始作为我人生的一个准则，而我的诚实遇到过两个挑战，一个是善意的谎言，比如某个约会忘记了，情不自禁会撒个谎，现在不说谎了，忘了就是忘了。另外一个就是面对预审，如果说实话，那我确实不知道没记账的事情，进看守所之前我和黎雄兵、彭剑等都不知道此事。但是那应该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记清楚，这是我的责任，只好撒谎说是我让暂时不记账，但承担之后我还想回头捍卫自己不说谎的原则，因为这个“确实记不清了”，我在里面和外面都遭到了强烈的道德谴责。人们可以说我懦弱，但指责我撒谎是对我最大的伤害。我们这个社会充斥太多谎言，太多违背内在良知的行为，我们要改变这些，必须首先从自身做起，成为一个诚实的公民。

我有过骄傲，当预审滔滔不绝反复质问我“篡改账目”的细节，我甚至打起了瞌睡。当他和我大谈人生观的时候，我得不断提醒自己，要爱每一个人。整个涉税事件过程中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发布《苍天在上》一文，我应该事先征求“公盟”同仁们的意见，应该更平和地表达。我的基督徒朋友们不断告诫我，不能骄傲。谢谢你们！我们应当谦卑，因为我们自身不完美，还因为爱。

或许在公民社会成长道路上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感恩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关爱我们的人——那些捐款、签名、呼吁、文章、T 恤衫、徽章、明信片、行为艺术……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也包括那些给我们成长机会的人——相信这世上每个人的角色都有其价值。我能回报大家关爱和支持的方式就是继续良心和正义的事业。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们都会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理性和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进程。因为我相信，只有这条道路才能通往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

小乔，本名李剑虹，《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六 0 年代生于安徽蚌埠，曾任高校教师、外企行政管理、财经记者、证券分析师等职。因发表文章并参与公民维权运动，自二 00 五年起遭上海警方监视、骚扰、传唤，多次被软禁和关押，以至剥夺工作权利，被迫成为自由撰稿人。二 00 八年应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府文化部邀请出访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驻市作家”。二 00 九年十月回国时，在深圳海关被拒绝入境并遣返香港，现居瑞典。

君问归期未有期

小 乔

（一）

离开中国，转眼已经三年。现在我生活的瑞典，是一个自由、祥和的国度，这里有蔚蓝的海、清澈的湖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草地。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生活得自由而有尊严，不必担心生病时因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不敢寻医问药；不必担心子女因家境贫困而失学；也不必担心年老没有退休金而无人照料。对于失业者、年老病弱伤残者等弱势群体，这个福利国家有着细致、体贴的保护；街上执勤的警察，是保护民众、服务民众的，如果你是守法的公民，警察不会三更半夜闯进你家，恐吓、威胁你的亲人，将你的电脑、私人财物，甚至身份证件席卷一空；不会命令你的老板解雇你，命令你的房东驱逐你；不会监控你的电话、电脑、网络，逐个调查你的亲人、朋友，更不会躲在阴暗的角落拍下你私人生活的录像；不会随时抓捕你，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将你秘密关押、酷刑折磨……在这里，中国国内的朋友们正在承受的种种磨难都已经离我遥远。

互联网时代资讯发达，虽远隔万里，仍可随时通过电话和网络与故乡的亲友联系沟通，但我的心头仍时时笼罩一层淡淡的乡愁，那难以割舍的亲情牵挂，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常當令我午夜梦回，黯然神伤。三年前去国时，原以为只是一次短暂的离别，岂料如今竟是归期渺茫。

（二）

二 00 九年秋天，我在瑞典的访问项目即将到期，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前就有国内外的朋友纷纷劝我：现在国内局势越来越恶劣，你回去也多半被看牢，做不了任何事，还有可能被投进监狱，不如就留在外面自由的天地，或许还可帮国内朋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至少能拥有一份不受干扰的自由生活。

我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一件最自然的事情——回家，回到我的父母之邦，那里有我牵挂的亲人、朋友，有我割舍不下的梦想……何况我也没觉得自己“重要”到会令一个据说“正在崛起中的”，已经强大到可以拯救西方经济危机的“负责任的大国”惧怕的地步，他们有什么理由将一个合法公民拒于国门之外而贻笑国际社会。

但之前也有两件事给我的归国之行蒙上阴影：一是二 00 九年三月，我曾向中国驻瑞典使馆申请换发当年十月即将到期的护照，在正常提交材料等待数周后被拒绝，使馆的口头解释是：“你国内户籍所在地不同意给你换护照。”另一件事，是从上海出国去日本的我的朋友冯正虎，此前已数次回国，均被拒绝入境。

我向住在瑞典的朋友张裕辞行时，他提醒我做好“回来”的心理准备，他预计我进去的概率最多“两成”。此前张裕本人曾持中国护照从香港经北京转机返回瑞典，居然在首都国际机场被强行遣返香港——简直莫名其妙！难道他从北京转机飞往瑞典（他并无打算出机场在京停留），会对这个国家造成危害吗？同样是张裕，二 00 八年四月我初来瑞典时，他正好要去香港参加一个会议，那次是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遣返瑞典。

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地球村”的二十一世纪，中国这个“围城之国”还要对多少自己的国民封锁国门，以至于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

当时只是想，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既不是 “恐怖分子”，又不会“祸国殃民”，只是回自己的国家去，有什么值得他们担心的？我只是做好了另一个思想准备，这次回国后，短期内他们可能不会再放我出来——一年前，为争取出国权，我曾与他们进行过长达两个多月艰难而屈辱的“谈判”。

我订好了斯德哥尔摩飞香港的机票，打算从香港入境深圳，一则顺道探望香港的朋友，估计三、五年内难有再出来见面的机会；二则担心神经过敏的上海“国保”会在机场“守株待兔”，像对待冯正虎兄那样把我扔出来——我心存侥幸，只要上海的“国保”没有把我上报到国家级 “禁止入境黑名单”，绕道深圳比直接从上海入境把握更大一些。

我揣着有效期仅剩两周的中国护照踏上归程。

十月十一日清晨抵达香港。入境香港时一切顺利，只是办理入境手续的海关官员提醒我：下次从香港过境，护照的有效期最好保留一个月以上。我不便说出曾在中国驻瑞典使馆申请换发护照被拒绝的情况，只答应下回注意。那位态度和善的海关官员说，按规定大陆护照可在港过境停留七天，但因你的护照即将到期，给五天停留时间够不够？我说够了，并向他致谢。他爽快地签注了离境日期，便放行。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会友武宜三兄收留我在他家暂住几天。因不想大陆方面事先得到“风声”而临时采取“措施”——毕竟我在国内曾长期享受“有关部门”的“特殊关照”，谁知道“老大哥”会不会正在黑暗中窥视我的一举一动呢？——-我不敢大肆张扬地在港呼朋唤友，只小范围与几位相熟的笔会会友聚了聚。

见面的几位会友普遍感觉与我类似，认为当局没必要阻止我回国而制造又一起“国际事件”，他们比较担心的是我回国后的安全问题。

（三）

十月十五日，我打算从深圳皇岗口岸入关。从地图上看，皇岗比罗湖口岸距离我落脚的武宜三家近一些，后来他告诉我还有另一处新开的深圳湾口岸更近，但我已在 skype 上联系了深圳的朋友在皇岗碰面，就没再更改地点。朋友预备中午十一点开车来深圳口岸接我，然后一起午餐。

因顾忌过关时行李被检，安全起见，我将手提电脑请武宜三代为保管，收拾好两只行李箱出发了。

宜三送我到公交车站，说这趟车直接开进香港边检站，他就不过去了，然后问我：“可不可以来个西式告别礼？“我笑着给这位热心肠的大哥一个朋友的拥抱，他并不太担心我进不了深圳，只是估计我进去后会有好几年出不来，短期难再见面。分别时他叮嘱我，若“万一”的情况发生，一定马上通知他，先回他家再做商量。

到达边检站，从香港顺利出境到达深圳检查站，边防警察将我的护照在电脑上划过，脸上顿时闪过一丝诧异的神情，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示意我：“请这边来。”

我问：“有什么问题吗？”

对方答：“你的护照有点问题，我们需要核查一下。”他让我拿上行李跟他到另一个小隔

间，招呼一位同事在门口看着我，然后拿着我的护照“请示领导”去了。

“意外”终于还是发生了。我掏出手机，由于担心电话被随时掐断，匆忙间翻出第一个香港号码就拨了过去，原以为是武宜三，接通之后发觉是笔会另一位会友潘嘉伟，电话里告诉他我在入关处遇到了麻烦，请他转告宜三和瑞典的张裕等朋友。刚说两句，门口看着我的人果然进来警告：“手机不能打，否则我们会收掉。”

我向小潘简短说明情况后挂机，问那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请问现在对我采取什么法律措施？有书面手续吗？”

他答：“等会儿会有人来通知你。你先把手机关了，否则我们会暂时保管。”

我知道多说也无益，便关机，一边在心里遗憾没来得及通知深圳检查站外还在等我的朋友，希望他能料到情况发生了变化。

过了十几分钟，有人把我带到一间稍大的隔间，门口牌子上写着“询问室”。边检的人向我宣布，奉上级命令，对我进行人身和行李搜查，请配合一下。

我问：“什么原因？我现在算是犯罪嫌疑人吗？”对方只说是“上级命令”。

一位女警过来要对我搜身，我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问清楚情况。女警说：“你先配合一下，待会会有人跟你谈话的。”

因天气较热，我只穿着 T 恤和薄长裤，她将我周身上下摸了一遍，又命令我脱掉鞋子检查。

我问：“你看我像贩毒的吗？莫非身上藏了白粉？”

她不说话，查看完我的两只鞋子，然后告诉我可以穿上了。

又有几个人过来，将我两个行李箱中所有行李都翻出来，其中一位穿制服的警官问：“你还有别的身份证件吗？”

我答：“护照被你们工作人员拿去了，身份证国外用不上，所以出国时没有带。”

他似乎不信，又问了一遍，我确定地答复他没有其他证件。看他怀疑的神情，我若有所悟：“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国外身份？我才出国一年，没那么大能耐。我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公民，连‘绿卡’都没有。我回自己家，你们不说声‘欢迎’就罢了，居然这样兴师动众，拿我当犯罪嫌疑人对待，又是搜身又是搜行李，我到底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你们搜到什么了吗？”

他笑而不答，继续搜我的行李。这期间进进出出的制服警察和便衣有十多人。不止一台摄像机对着我和箱子里的个人物品拍摄。

他们把搜出来的书一本一本翻检。有人指着一本“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零八宪章》里面，我为狱中的刘晓波写的一篇文章问：“这是你写的？”我说：“是。”他说要拿去复印一下。旁边有人议论着：“原来是位作家。”看来多数参与搜查的人并不清楚我被扣留的原因。

有人拿来一台手提电脑，要把搜出来的 U 盘和碟片放进去检查，问我：“这些可以看吗？有没有什么个人隐私？”

我反问：“我说有你们会不看吗？想看尽管看好啦。”

对方说：“我们当你面检查，是对你表示尊重。你看，我们也没有删改你的任何东西呀。”

在这里滞留了两个多小时，早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我说我没有吃午饭，问他们还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商量了一下，说派人帮我买饭。

过了一会，工作人员送来一客排骨盒饭。我吃完饭，搜查才告一段落。他们告诉我，除了桌上那几本书，其余东西可以先装回去。我一边开始收拾被他们翻得到处都是的行李，一边问：“我可以进关了吗？有没有领导能跟我沟通交流一下？”

刚才一大群人连同摄像器材这时都消失了，只留下两名穿制服的女警在屋里看着我，她们让我别着急，说待会儿有人跟我谈。

我坐在那里闲得无聊，便拿起桌上的一本书翻看，心里预演着怎样对付接下来可能面临

的讯问。

其间，我提出要上洗手间，看我的一名女警一直贴身跟随，并要求我不能关闭洗手间的小门，让我感觉浑身不自在。

接近下午五点钟时，先前问我要身份证件的警官进来通知我："上级决定你今天不能入境，现在我们送你回香港。"并告诉我桌上的八本书因"违禁"必须没收，让我拿上其它行李跟他们走。

我问："什么原因不让我进去？有法律文书吗？"

他告诉我没有书面决定，是上级命令，依据是《出入境管理条例》。

我问："中国《出入境管理条例》哪一条规定，什么理由规定中国公民不准进入自己的国家？"

他答不上来。我又要扣押物品清单，他说："算了吧，几本书又不值几个钱，你可以回香港再买。"

我说："几本书是不值几个钱，但你们不能随便扣留公民的私人物品不给手续。这些书在香港都是公开出版物，我不认为违法。而且你也看到了，有的书上有朋友的签名题字，是朋友送我的礼物，它们对于我的价值不在于多少钱。"

他们继续解释是上级决定，又说那些书在香港可能不违法，但在大陆不允许，希望我配合。我明白今天要入境是不可能了，本想跟他们继续争取归还书藉，并给我查扣清单，转念又想，已在此停留了六七个小时，外面的朋友会担心。书留在这里，或许有人看了能从中受益，于是不再坚持。

他们让我上了一辆车，车前座连同司机两人，后座一左一右也是两人将我夹在中间。车在香港和深圳边检站的通道中间停下等了几分钟，香港边检站几个人开着一辆车过来接我。回到香港，让我在"访客区"等候，拿走我的护照说要研究一下。

我打开手机，分别给宜三和小潘打了电话报平安，并简单描述了我在深圳边检站的经历，我告诉他们，除了搜查、扣押之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盘问，事先准备好应付讯问的答案也没了"用武之地"，现在我正在香港边检站等候港方答复。

小潘告诉我，独立中文笔会已经就我被扣留一事发表了声明，大家最担心的是我被当局关押起来。我说估计我还没有那么"重要"，不准我入境已经让我非常意外了。宜三则说，香港方面一旦放行，让我赶快先回他家，他请我吃宵夜压惊。

接下来接了几个媒体的采访电话。或许香港边检站很少碰到此类情况，我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晚上十点，先前接我过来的一位穿制服的女士才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他们的主管先生向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与我做了简短的交流。他说现在大陆方面不接受我回去，我的护照也只剩下几天的有效期，他只能给我在港停留两天，即到十七日，希望我在停留期届满前离开香港，如果暂不能回大陆，就先返回瑞典。我答应考虑，心想还有两天缓冲时间，或许可以去中联办交涉，请中国当局纠正错误的决定。

终于又回到香港，宜三在他家附近的车站接我，见面后直接到一家茶餐厅吃宵夜。我告诉他明天想去中联办交涉一下，请他们解释为什么中国公民不能入境自己的国家，如果得不到合理答复，后天我会去边检站再试一次，宜三说他明天陪我一起去。

正交谈中，有记者打来电话，告诉我明天中午曾荫权特首会在香港立法会参加一个会议，建议我去立法会向曾特首陈情求助，并说会联系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先生提供帮助。于是我和宜三商定次日先去立法会，再到中联办。

（四）

十月十六日中午十一点左右，我和宜三在立法会办公大楼前见到长毛梁国雄先生，他对

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过了一会，曾荫权特首在一大群人簇拥下进入立法会办公大楼，人很多，我根本无法靠近。曾特首进去后，梁国雄先生向立法会外现场采访的记者介绍了我的情况，我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并讲述了昨天在边检站入境被拒的经过。

随后，梁国雄先生陪同我一起去中联办，我向门卫说明情况，希望与中联办负责人就我回国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一名门卫进去通报，不多时出来告之，里面的人不接待我。我请门卫转交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他们摇头拒绝，我只好把信投进中联办院内，门卫说你这样做没用，他们不会看。虽然交涉没有任何结果，但我很感谢梁国雄先生的仗义相助。在港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也在中联办门前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

离开中联办后，我和长毛道别，他把自己的名片和助理的电话都留给了我，让我在港期间遇到困难可以随时联系，他会尽力提供帮助。

我和宜三在外面吃饭时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在瑞典工作的西方记者也被中国当局拒绝入境，原已申请到的中国签证被临时吊销，他认为原因是他报道了中国"血汗工厂"劳工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劳工维权一事。来电者说他是这位西方记者的中文翻译和助手，看到香港媒体对我的报导，他们想同我见面聊一聊。

与这位 "同病相怜"的外国朋友约在附近一个地铁站见面，然后四人一起去茶室聊天。这位英国籍记者文森特·科洛先生，为瑞典的一个关注中国的左派媒体"中国劳工论坛"工作，上午刚在罗湖口岸被吊销中国签证并禁止入境。

科洛先生的助理小陈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说会继续争取回国权，计划明天去另一边检站深圳湾口岸试试，但显然我的名字已进入"禁止入境黑名单"，不可能成功，我只是想再争取一次与他们正面交锋的机会以表达我的诉求。如果再次被遣返回港，下周一我会继续尝试去中联办交涉。

科洛先生和小陈也估计我再次入境不会成功，我们约好下周一一起去中联办。

不知不觉又奔波了一天，回国意外受阻令我身心疲惫，但听宜三说当晚在浸会大学有个放映会，放映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拍摄的川震纪录片《我们的娃娃》，主办方邀请了艾晓明教授到现场与观众见面交流。艾教授是我在国内曾有一面之缘的朋友，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虽然当天已十分疲乏，我还是决定去放映会见艾老师一面。宜三也不顾疲劳陪我同行。我将放映会的信息告诉了两位刚结识的朋友，他们也颇感兴趣，于是一同前往浸会大学。

我们到达浸会大学时，纪录片已经开始放映，影片很精彩，观影中我数度落泪，为那些倒在"豆腐渣"校舍下的孩子和他们不幸的家长。我环顾全场未能找到艾晓明教授，直到影片放映结束后的讨论阶段，才听说艾教授当天被"有关部门"关照不准出境。

我在观众自由交流时发言，谈了我对纪录片的观感，也对艾老师等朋友不辞辛劳，冒着风险拍摄影片，为历史留下见证表达了敬意，接着我告诉大家，艾老师是我的朋友，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见她一面，因为我昨天在深圳边检站被自己的国家拒之门外，短期恐怕很难有机会去广州拜访她，没想到她却被阻止出境了，我发现我的祖国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难道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特色"？

（五）

十月十七日。我将一半行李留在宜三家，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去深圳湾口岸。一位记者朋友特意赶来送行，为我在香港边检大厅里拍了两张照片。我们握手道别，他祝我好运。此时大约中午十一点半。

在深圳湾口岸，香港检查站和深圳检查站共用一个办公大厅。我仍然顺利出境，到了深圳那边，此后的经历与前天大同小异，我再次被带进单独的隔间，行李被一一仔细搜查。在被扣留的五六个小时里，我多次要求与负责人见面，并一再声明我的回国意愿，抗议他们拒

绝本国公民入境毫无道理，我说哪怕我真是“罪犯”，你们也应该让我回国接受依法审判，但始终没有任何人跟我做实质交流。

下午五点左右，我被告知不能入境并送回香港。清理行李时，我发现少了两个 U 盘和几张碟片，我说这些东西前天在皇岗口岸已经被搜查过了，说明他们认为没有问题，今天如果不还给我，我不会离开。事实上因预料到会被搜查，第一次入境前我就对随身携带的 U 盘和碟片资料做过处理，U 盘上除了一些并不重要的 word 文件外，大部分是我的私人照片，几张碟片也丝毫没有“敏感”内容。前天在皇岗口岸他们已经检查过了，只扣缴了几本所谓的“违禁”书籍，这次因为一无所获，大概他们觉得无法向上司交差吧。

他们显然不愿我的高声抗议招来大厅过境人员的注意，劝我不要吵，说再去请示领导。

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着我的 U 盘和碟片：“东西还给你，希望你配合我们回香港，不要在这里胡闹。”

我说不是我在胡闹，你们无理拒绝本国公民回国才是胡闹。他告诉我这是上级决定，并强调今天你是不可能进去的。

我觉得无法跟他们讲理，争执下去亦毫无意义。于是，再一次被押送离境。

在办公大厅中线，一位香港边检的女士过来接我，我拿出护照给她，提醒说：“我是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我在香港停留的期限已经到期，且护照也即将到期，我要求回大陆，你们现在完全有权利拒绝我进香港，如果你们配合中国边警带我回去，会给自己造成麻烦很难处理。”

她一再说：“你先跟我们走吧”。我无奈，与她回到香港口岸。

她让我在办公室的“访客区”等候，过了一会出来建议说，因为我现在不能回中国，希望我当天离境“回”瑞典，他们可以代订当天返回瑞典的机票，他们认为这对我是最好的选择。

我说，我在瑞典的访问项目已经到期，虽然瑞典签证还有几天与护照有效期同时到期，但我拿着只有几天的签证和即将过期的护照，不可能也没理由再去瑞典。我就是要回中国，我是中国公民，我的家人都在上海，我回自己的家，中国当局不能拒绝我，请你们将我 “遣返”中国大陆。

她笑着摇头说：“是大陆拒绝你进入，我们也没有办法。”她让我再等等，她去请示领导。

我打电话咨询何俊仁律师，何律师听我说明了情况，告诉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强制我回瑞典，并说他过半小时会来深圳湾香港口岸接我，让我告诉香港边检官员。

那位女士再出现时，我告诉她何俊仁律师会来接我，有关法律问题我会委托何律师与他们商谈。

那位女士一听，又进去了好一会儿，再出来时他们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说：“你也很累了，我们今天就让你进香港找你的朋友，我们为你预订明天回斯德哥尔摩的机票（需到机场后自行付款），希望你明天‘返回’斯德哥尔摩。”

我考虑后暂时同意这个安排。于是我的护照上又被敲上一个新的入境章，这回只给我一天停留期，即到十八日。

晚上七点左右，我离开深圳湾口岸重新进入香港。我打电话告诉何律师不必来接我了。他建议我暂时不要离开香港，并约我十九日上午在立法会他的办公室见面，商谈下一步计划。然后我又回到武宜三家。

（六）

十月十九日一大早，武宜三和小潘陪我去立法会见何俊仁律师，何律师从法律角度给了我一些建议，并带我们参观了香港立法会办公楼。看到立法会的会议大厅，想到香港议员们

在这里开会讨论问题时的激辩争论，想到市民可以自由申请旁听，想到香港市民有权随时联系立法会议员表达诉求，议员也必须代表市民利益，为市民服务，否则下一次竞选就可能失去选票，被淘汰出局，对比起我们各级人大[32]的“举手会、拍手会”[33]，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告别何律师，宜三和小潘陪我又去了中联办，我告诉门卫要求与中联办负责人沟通解决我的回国问题，否则会在门口举牌抗议。门卫说里面的人不会见我，于是我拿出准备好的“我要回家”、“释放刘晓波和一切良心犯”的标牌。这时文森特·科洛先生也来了，他举着用中、英文双语写着“捍卫工人权益不等于威胁国家安全”的标牌。

有几家媒体现场采访，我对记者说：“今天我来这里是希望再给中国政府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中联办的人拒绝沟通。”

武宜三对记者说：“中国政府真是疯了！他们有几百万军队，几十万警察，为何要怕一个小女子？凭什么不准她回自己家？”

我和科洛先生举牌抗议时，巡警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说明了原因，警察说抗议没问题，但要求看我们的证件。我和科洛等人出示了证件。当发现我护照上签注的在港停留期前一天已经到期，警察要我跟他们去警署。

我告诉宜三和小潘等朋友不用担心，香港是法治社会，相信警方会公正处理，我到警署后会继续要求警方“遣返”我回中国大陆。

警车开进一个大门，门外写着 “西区警署”。警察让我在一间与办公室分隔开的隔离室等候。隔离室的门不到一人高，与外面的办公区视线可及，墙上贴着一些被讯问者应有权利的说明，估计这是置留被讯问人的地方。

警察看到我的标牌上写着刘晓波的名字，问我是否与刘晓波相识，我说刘晓波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现在被中国政府关在监狱里。看那警察的表情，估计他知道刘晓波一案。

我要求打电话，警察说没问题。于是我拨打手机告诉小潘我在西区警署的情况，小潘说会联系一些媒体关注我。

警察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把护照拿去研究。我再三表明自己回国的意愿，要求他们将我 “遣返”大陆，他们说会考虑我的要求。

估计我的情况让香港警察感觉非常棘手，我在警署待了差不多四个钟头，终于有一位警察前来说明他们无法处理我的问题，要送我去香港入境处，那里的官员会给我一个处理决定。

我打电话告诉小潘新的情况，然后跟警察来到湾仔香港入境处。在这里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入境处一位官员告诉我，他们将延长我在香港的停留期，但希望我在十月二十四日护照有效期到期前离开，我说可以考虑，打算先争取几天在香港斡旋的时间。

尾声

随后几天，各地朋友们给了我两个建议，一是建议我留在香港继续抗争；二是认为我暂时回国无望，还是先返回瑞典寻求民主国家的帮助。我咨询了何俊仁律师和香港支联会朱耀明牧师的意见，他们表示，如果我选择继续留在香港，他们会尽量帮助我争取在港的合法居留权，但这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后没有先例，时间上难以预估；如果争取让联合国机构接受我为难民，然后分配到西方国家，会比留港更快、更容易。考虑到在港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工作，经济上难以自保，在港十多天已经给宜三兄添了不少麻烦，不能再长期住在他家里，反复权衡后，我决定在护照有效期内先返回瑞典，再设法继续争取回国的权利。

做出决定后，我打电话给住在上海的父母亲——此前因为怕他们担心我的安全而没有说

[32] 指从中央到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
[33] 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会议进行决议时，只会举手通过和拍手赞成，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

我回国的计划，想到家见面后给他们一个惊喜——电话接通后，听来父亲惊慌的声音："你现在在哪里？"我说在香港。

父亲的声音充满担忧和恐惧："你赶紧回瑞典去！千万别回来！警察这两天又上门了，说不准你回来是为你好，否则你回来他们就会抓你进监狱。"

我告诉父亲，我现在在香港很安全，父亲仍然担心中国当局会恼羞成怒越境抓人，叫我赶紧离开。

我通过 skype 与数度回国被拒，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冯正虎兄联系，他说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我的情况，希望香港的朋友帮助我坚持下去，并说自己在美国短期访问后就返回日本，会继续争取回国权，并有新计划——他没有告诉我"新计划"的详情——在我返回瑞典不久，当冯正虎兄又一次从东京飞返上海，并被当局粗暴遣返后，他以决绝的意志在东京成田机场入境过道坚持抗争了三个月，上演了一出真人版 *The Terminal*[34]大戏，最终为自己争得了回国的权利。在此我祝福仍坚守在中国大陆的冯正虎兄和所有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抗争的朋友们。

在我离港前，长毛梁国雄先生为我和科洛先生安排了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谈我被拒绝回国和科洛被拒绝入境中国的情况。在我离开香港时，梁先生又特意赶到机场送行，浸会大学的几位同学也赶来机场与我告别。

瑞典政府二 00 九年十二月接受我为"政治难民"，给予我永久居留权。我多次尝试去中国驻瑞典使馆交涉，要求换发我已到期的中国护照，至今未果——我无端被自己的国家剥夺国籍和回国权，不得不求助临时客居的国家提供保护，这对中国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国"无疑是巨大的讽刺。但世界文明的脚步是任何专制势力无法阻挡的，中国最终不能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阻隔中国公民与外部世界自由交流的中国"柏林墙"也终有一天会轰然倒塌，那一天应不会太遥远了。

借此，感谢我在香港、瑞典被迫滞留期间曾施予援手的所有朋友：独立中文笔会会友张裕、武宜三、潘嘉伟、蔡咏梅大姐、陈兴邦大姐等，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先生、何俊仁律师，支联会冯爱玲小姐、朱耀明牧师，文森特·科洛先生和翻译小陈，瑞典陈世忠先生，斯德哥尔摩市文化部官员安妮卡·哈罗町女士等，以及一些不便在此提及姓名的朋友。

[34] 美国好莱坞电影《航站楼》，讲述一位伊朗流亡人士在法国戴高乐机场长期滞留的故事。

古川，本名丁访关，《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八０年代生于四川，曾担任网络编辑、杂志记者等职，《改革之死》作者之一。

因参与公民维权运动，长期被警察监控。本文讲述了他因参与公民维权运动，长期被警察骚扰的经历。二０一一年二月十九日，因在推特上转发"茉莉花散步"信息后，再次被抄家、绑架并失踪六十三天，期间遭受酷刑虐待。

我的公民经历——从"喝茶"到抄家

古 川

一、"喝茶"

平生第一次被"喝茶"是在二00五年四月十九日。那时，我刚到博客中国上班没多久。一天早上，同事突然告诉我，楼下值班室有警察找你。我下去后，看到值班室有两个穿便衣的人，他们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姓韩，另一个叫王峰。他们首先问我，是不是叫古川，还说古川很有名气，然后解释说，上了他们名单的都是名人。然后，他们接着问我，是不是给王怡出过一份证明，我说是的。

之前，王怡自己出钱印了四本书（王怡评论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康正果自传《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小说《有没有》），用于朋友间的学术交流，这些书均标有"内部交流、严禁翻印"的字样。王怡也给我寄了几套。但二00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四川省新闻出版署却以"涉嫌非法出版"，将王怡委托快递公司寄送的九百零六册书籍全部抄收。抄收事件后，王怡请我写一份证明材料，证明这些书是用于朋友学术交流的。于是，我就写了并寄给了王怡。我没想到的是，仅仅因为这份证明材料，北京"国保"就来找我"喝茶"了。

"国保"问我是怎么与王怡认识的，为什么要给他写证明材料。他们一再强调，让我不要被王怡利用。我回答，不存在被利用的问题，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些书本来就是用于朋友学术交流的。

谈完王怡，他们转而了解悼念赵紫阳一事，问赵紫阳去世的时候我都做了什么。我这才明白，其实他们找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关于王怡，而是关于悼念赵紫阳，王怡的事只是他们找我的借口而已。就像二０一０年四月九日这次我被传唤、抄家，他们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因为研讨会，而是因为维权网，研讨会的事也只是他们传唤并抄家的借口而已。

二00五年一月十七日，赵紫阳去世。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我们的悲哀》悼念他。后来，又签名参加了李健等人发起的《关于署名哀悼赵紫阳先生的倡议》。为了将这份悼念签名名单送到赵家，李健来到北京。一月二十四日上午，李健到位于国家图书馆行政楼四层的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找我（当时我在这里工作），中午，我和李健、周鸿凌、张星水等人一起去附近餐馆吃饭。吃完饭后，我们往办公室走，李健在前面，我和周鸿凌、张星水在后面，快到国家图书馆北门的时候，四个突然出现的"国保"迅速将李健抓到天桥下的车里，我们只好回办公室等李健的消息。一、两个小时以后，李健回来了，他说"国保"不准

他下午去赵家递交悼念签名名单，要把他送回大连，他回来拿一下东西。然后，他将悼念签名名单给了我，要我帮忙送到赵家。赵紫阳去世后，中共官方要求参加悼念的民众必须先打电话申请，然后二十五日到金台饭店领取“出席证”。我当时也申请了，但二十五日到金台饭店却没有领到“出席证”。不过，我将悼念签名名单交给了赵紫阳的孙女，她向我表示感谢。

因此，当“国保”问赵紫阳去世我都做了什么的时候，我说帮李健送交了悼念签名名单，他们就说我被李健利用了。我说不存在利用，这是我作为公民对赵紫阳的悼念而已。赵紫阳不是曾经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吗，为什么不能悼念他？他们说，赵紫阳已经被官方定了性，不能进行悼念，悼念就是与官方作对。后来，他们问我是否认识到错误，并要我写一份认错书。我说我没有错，拒绝写认错书。

他们要求我以后每天用电子邮件向他们汇报行踪，我答应了。二00五年四月十九日十七时五十一分，我向他们留下的hansir@263.net邮箱发出了第一封汇报信，内容如下：

王先生、韩先生：您们好！我今天工作，参加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在友谊宾馆。其余的没有什么。丁访关 二00五年四月十九日

他们于当天二十一时五十七分回复如下：

小丁：你好！邮件已收到。希望你能按照我们达成的承诺，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改善我们的“距离”，希望看到你明天的邮件有更丰富的情形。即日

此后，我每天都向他们发送内容相同的信。如二00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十八时零九分：

今天一天工作，没有别的事。丁访关

发了几天后，我烦了，就设置成定时发送。然后我于二00五年五月四日十七时零五分收到他们的回复：

小丁：你好！“五·一”期间，能看到你的来信，比较欣慰，不知你们有没有放假，如果放假的话，你上网一定不是很方便，但你能每天坚持住，这个态度值得肯定，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你的这个态度。但是，细观你的来信，不足的是，无论内容还是措辞都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苛求你将每天活动情况如实记录，（当然你这些天也不可能是什么都没做，这个我知道得很清楚，毋庸多言），我只是要求你讲一讲心里的想法，因为，经过我们前两次的见面和谈话，我觉得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这些日子以来你也不可能没有想这些事情，你也不可能没有一些想法，所以呢，我就提出这么一种渠道，用来沟通我们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能够被你所接受的，并不至于太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换一种方式，隔三差五去找你或每天给你打电话，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我还是从你的角度考虑对你的工作、生活可能不太好，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一种约定，但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对你的表现还是不尽满意！单就发信这件事情，我无话可说，你确实按时完成，一天不差，但从内容上来讲，恐怕从头到尾都不能令“你”满意！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说你蒙混过关我觉得不为过。你第一天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回了信，我的态度自认为很有诚意且很明确，期间你的来信我不满意，之所以过了这么久今天才给你回信，是想充分给你一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有所明白，能够拿出你的“诚意”来，可是，今天我仍然没有看到。因此，今天我再回信给你说明这一点，下一次我就不会再讲了，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我还不能看到你的诚意，我想我们得换一种方式了。

此后，我依然每天发送内容相同的信，如二00五年五月十二日：

王先生，韩先生：你们好！今天工作，没有别的事情。丁访关 二00五年五月十二日

这是我向他们发出的最后一封汇报信。

第一次“喝茶”时，他们问我的住址，我告诉了他们。几天后，十几个警察到我家试图进入我的房间。当时我不在家，但房东被吓坏了，后来，房东就让我搬家。

此后，他们又找我“喝”过两次“茶”，一次在“五·一”前，我被带到海淀区东升园派出所，他们要我认错，我拒绝。又让我写保证书，我仍然拒绝。我被迫搬家后，他们又问我地址，我说，上次告诉了你们，你们去威胁房东，我不会再告诉你们。第三次“喝茶”是在“五·一”后，我告诉他们，汇报我不写了。

这三次“喝茶”中，他们两“国保”总是姓韩的唱白脸，威胁恐吓我，姓王的唱红脸，温和软化我，但他们还是拿我没办法，最后说，要去找我老板方兴东聊聊我的事情。方兴东后来对我说，你的事情，好好与警察聊聊就算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找了我一次，说要去茶馆喝茶（前几次都没有真正喝过茶，他们只给我喝水）。当他们开着车把我带到圆明园公园门口，又不愿意请我去茶馆了，于是就在车上聊了一段时间。此后，他们没有再找过我。还需要提及的是，他们对我说，不要再与“敏感人士”交往，当我请他们提供具体的“敏感人士”名单，他们又说这是国家机密。

二、失业

二0一0年四月十七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四月十一日编发历史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做出批示，将其停职。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这个博客中国主编的失业。

二00六年十月十七日，我值早班，值班的时候，我在自己的专栏刊发了《要想爱国必先成为公民》，并加了按语：“本文是为二00六年四月《中国青年》杂志的约稿，但据说太激烈，《中国青年》杂志未刊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但是思想未变，当时讨论的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是不是耻辱？’，而现在讨论的是‘九·一八事件’，都与日本有关，都涉及到爱国，因此我把此文找出刊发。”

当时在博客中国担任副总编的郭明虎（网名叫“小国寡民”）看到这篇文章后，在MSN上要我删除。我商量性的问了一下：“真的要删除吗？”

郭明虎以为我挑战他的权威，火了：“不删就滚蛋！”

我也火了：“滚蛋就滚蛋！”

郭明虎接着说，上班之后你去把离职手续办了。正式上班后，我先去找了总编王俊秀，王老师说，你不要去办离职手续，他不能把你怎么样。

其实，郭明虎来博客中国还是因为我。我在博客中国任主编后，邀请作家来开专栏时也邀请了他。这样他就与方兴东、王俊秀认识了，后来经陈永苗介绍，他来博客中国担任副总编。他来之前，王老师问我，郭明虎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实际上他权力欲极强，容不得人。郭明虎曾在天涯社区、百灵社区、中国搜索等很多著名网站工作过，不是与员工斗就是与领导斗，最后都被扫地出门。

在《要想爱国必先成为公民》这篇文章刊发前，他对我很好，但这件事却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为了达到将我从博客中国“失业”的目的，他找到北京市新闻办网络管理处副处长陈华，说我是在“国安[35]”挂号的人（之前我与郭明虎交流时，曾提到我被“国保”“喝茶”一事）。于是，陈华于十一月一日向博客中国下了三道命令：一、博客中国停止更新三天；二、关闭何家栋、李新德、李一磊、李玉海等四位专栏作家；三、对责任人博客中国主编进行处理。此事发生后，郭明虎还给王俊秀打电话说，博客中国停止更新三天与他无关。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方兴东让我暂时回家休息一个月，躲避一下风头。

此后，郭明虎写信给董事会，要求撤掉方兴东董事长一职，方兴东一怒之下将郭明虎扫地出门，我回到博客中国继续工作。一天，郭明虎去博客中国办公室，看见我在那里，于是，他向陈华告状，陈华再次要求博客中国处理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离开博客中国。虽然这次“失业”不是直接源于“国保”“喝茶”，但还是间接源于“国保”“喝茶”。

三、再“喝茶”

再次被“喝茶”是二00九年一月九日，因为《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发布之前的二00八年十二月九日一早，我听到消息，作为《零八宪章》发起人的刘晓波和张祖桦，前一晚被传唤、抄家，我放在张老师家的护照也被抄走了。当时，我实际上已经签署了《零八宪章》。但考虑到我的护照被抄，我想要回我的护照，于是决定先不签名。然而直到今天，这本被抄走的护照不但没有归还我，还将我新办的护照也抄走了，真是可恶。

因此《零八宪章》发布时的第一批名单里并没有我的名字。不过，“国保”告诉我，他们手上的《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名单里有我，此后，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一书里，第一批签名名单里也有我。主编这本书的张老师告诉我，他提供的名单本来是没有我的，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被列在了上面。既然如此，本人在此正式宣布：我（古川，真名丁访关，北京人权捍卫者）同意签署《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发布后一个月，也就是二00九年一月九日早上，我接到香山派出所（当时我住在香山附近）朱警官的电话，说有人在派出所等我聊天。在香山派出所二楼会议室，我见到前面提到的北京市公安局王峰，与另外两位海淀分局的“国保”。王峰与一个“国保”坐在一圈会议桌的南侧，我坐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国保”坐在我旁边。

王峰说，是不是很久没见面，以为我们把你忘了？接着他们问我知不知道《零八宪章》，我说知道，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从博讯知道的，问我签没签名，我说我认同，但没有签名。问我认不认识刘晓波、张祖桦。我说认识刘晓波，但不熟，与张老师是朋友，经常去他家借书。

“喝茶”过程中，手机响了，是我妻子李昕艾打来的电话，他们不准我接，让我关机，然后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我按他们的要求做了。王峰中途出去，再回来路过我旁边，把我的手机拿到了他的桌子上。“喝茶”快结束，王峰与他旁边的 “国保”又出去了，我想趁此

[35] 国家安全部门的简称，与「国保」不同，「国安」主要负责涉及海外的国家安全事务。一些被认为与外交、国际组织有关的国内异议人士，有时会被两个机构同时监控。

机会拿回手机。当我站起来想走过去的时候，被旁边的“国保”（姑且称之为“倒地国保”）拦住，我挣脱再往前走，他就假装被我推倒在地，然后紧紧抱住我的腿，试图把我放倒，并同时大声呼喊另一个“国保”的名字，让他来帮忙。那个“国保”听到后，与王峰一起回到屋里，把我们分开。 “倒地国保”站起来，又试图用腿将我扫倒，被我躲过。混乱平息以后，“倒地国保”还诬赖我打他，并威胁说，只要我还住在海淀，就会再找我麻烦。我说，我敢打你吗，这是派出所，你们的地盘。我只是要拿回我的手机，你挡着我，自己倒在地上的。王峰说，没想到几年没见，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喝茶”结束以后，王峰边上那个“国保”送我下楼，并安慰我说，他与“倒地国保”都是八零后，我们是同龄人，希望我谅解。

二00九年四月，我搬到朝阳区天通西苑。当然，我搬家并不是害怕“倒地国保”找我麻烦，而是因为孩子即将出生，在天通西苑租了一套大些的房子。不久，香山派出所的朱警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还住在香山，我说不是，他问我具体住在哪里，我没告诉他，只说反正不在香山。

“国保”再次出现，是刘晓波案第一次开庭之前，昌平分局两个“国保”与东小口两个警察来我家“喝茶”。据说，他们把我的地址弄错了，敲了我邻居家的门，后来，他们通过房东才找到了我。刘晓波案第二次开庭前，昌平分局的这两个“国保”又来我家“喝茶”。他们两次来的目的主要是让我在刘晓波案开庭时不要去现场。这两次“国保”找我把房东吓坏了，不敢再继续续租，让我们租约一到期马上搬家。

还需要提及的是，二０一０年一月八日，我去泰国旅游，在首都机场过关时，被边检警察告知：“接有关部门通知，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禁止出境。”一月十日我再去首都机场，仍然被告知：“接有关部门通知，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禁止出境。”

四、抄家

二０一０年四月九日，我们搬到新家刚好一个星期，清早，我妻子李昕艾从窗户上看到我们车的旁边停着另一辆车，里面坐着三个人在看报纸，其中一个人是以前来过我们家的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李昕艾说：“是不是来找我们的？”我还说：“别神经紧张了。”十点半，我们下楼去买菜，顺便把扫车的刷子带到车上去，其实主要是想看看那辆车里究竟是不是“国保”。

当我们走到车旁边的时候，里边三个警察坐直了身子，并启动了发动机，那个来过我们家的警察说：“等你半天了，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有事情要了解一下。”

李昕艾追问：“去多长时间？”

他们回答：“很快。”

他们把我带到东小口派出所以后，让我把手机掏出来关机并放在桌子上，我没理睬。这时，过来一位自称是副所长的人，问我为什么不把手机拿出来，我说：“这是侵犯我的通信自由权，你们要了解什么可以，但我不会掏出手机放在桌子上。”

然后，这个副所长就提高声音开始威胁我。

我说：“我会记下你的警号。”

他回答：“警号牌我撕下来给你，你敢怎么样。”

我说："我不跟你说了。"

我站起来准备走，他也站起来按住了我的肩膀，我顺手抓住他前胸的衣服。这时，另外两个警察也过来按住我，让我坐下。我说我与你们"国保"打交道又不是第一次，我与市局、分局的都打过交道。他听我这么说，声音低了下来，动作也变得缓和了一些。他说看我站起来，以为我要攻击他。我说："我敢攻击你吗，这可是在派出所。"

接着他开始说："要是没有毛泽东打下江山，今天会有这么好吗？"

我说："正是因为毛泽东打下江山，导致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会更好。"

他又说什么党是母亲之类的，我说你这些都是废话，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他却不说具体的事，而是坚持要求我配合，将手机掏出来关机并放在桌子上，我说这是不可能。这时李昕艾给我打电话，他们说你不要接，你如果接的话，我们就把你的电话抢过来，所以我没有接。我一再问到底找我有什么事情，他们一会儿说领导正赶过来，一会儿又说市局的人正赶过来。十二点钟左右的时候，他们给我端来饭让我吃。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吃饭的时候，市局的王娜正带着八九名警察在我家抄家，将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两本护照、一个移动硬盘、一个U盘、两大本名片册、三十二册手抄笔记本、六十二份打印材料、十二份《中国改革的末路》及《改革之死》作者的协议书和资料领取单、一册古川著《梁启超时代》打印稿、一册吴祚来著《时评是一种力量》打印稿；抄走的书籍有：《零八宪章》（珍藏本）一本、《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本、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各一本、崔卫平著《正义之前》一本、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一本、陈子明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一本、王力雄著《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一本、张祖桦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本、《人权年鉴（2007-2008）》一本、繁体台湾版复印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本、《大风》杂志一册、《方舟》杂志一册。留下了两页纸共计二十六项扣押物品的"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办案人只留下"焦帅帅、李硕"二人的签名。他们还在衣橱内翻出一件印有"还我人权"的T恤拍了照；翻出我家的数张银行卡和存折拍了照。

下午一点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市局的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带我的人和一个调摄像机的人分别坐在我的两侧，只有一个穿着警服的人坐在我的对面。他们首先向我出示传唤证，上面没有提及任何罪名。我要看他们的警察证件，带我进去的人说："根据法律，有穿警服人员在场时，不用出示警察证件。"实际上，他们是害怕自己的名字被公布出去。据说，"国保"基本上都用假名，所以无论王峰、王娜、焦帅帅、李硕，可能都不是他们的真名。

他们首先问我与维权网的关系，认为我是维权网的工作人员。他们说，维权网的背后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它们的背后又是美国国会，所以维权网的问题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他们还说，为维权网工作，用历史上的话说叫"汉奸"，用现在的话说叫"走狗"。我说我与维权网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汉奸"、"走狗"的说法都与我无关。事实上，如果说"汉奸"、"走狗"的话，共产党才是，它曾经用苏联的卢布，还组织大学生游行，高喊"保卫苏联"。

他们又问我认不认识张祖桦，我说认识，我们是朋友，张老师的来头很大。我的意思是说，张老师曾经与李克强、刘延东等人都是团中央的常委，而且他还是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

记，罗干曾是他的领导，两人同为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委员。“六·四”屠杀后，中共当局一度要他去担任营口市市长，避避“六·四”审查的风头，他断然拒绝，不再与中共当局同流合污。

他们对我说，张祖桦被抄家时搜走的一百六十多万元钱，是维权网给了我们之后剩下的。我当即表示，我不是维权网的工作人员，那些钱也不是维权网的，而是张老师父母和岳父岳母的。他们问我听谁说的，我说张老师告诉我的。他们就说，你已经成为张老师的一条狗，被他利用。我说，我不是任何人的狗，也没被任何人利用，这是我的独立判断。

他们随后问到第二天会议的事情，说那是维权网主办的，不让我去参加。我说是不是维权网主办的我不知道，我去不去参加需要与主办人员沟通。这是一个环保方面的会议，题目叫“守望生态中国——生态灾难与政府公民责任研讨会”。本来这个会议不应该这么敏感，但因为他们认定是维权网主办的，所以调动北京全市“国保”阻止这次会议召开。后来我听说，张祖桦、李智英、王德邦、王京龙、王俊秀、陈永苗、姚遥、梁晓燕等人都被“喝茶”。张祖桦、王德邦、王俊秀、李智英甚至被“国保”上岗[36]，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撤离。而王俊秀在会议原本举行的当天早上九点，被辖区警察拉到大兴，直到下午六点才回到家里。据维权网报道，有二三十人因为这次会而被“喝茶”。当然，遭遇最惨重的是我，不仅被传唤还被抄家。

王娜带着八九个“国保”抄完我家之后，来到东小口派出所。她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为父母、为孩子着想。我说：“你不要和我说这些，我不想听。”

她说：“你不想听，我也要说，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从悬崖边拉回来。”她又说：“你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不能说出来，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难道就不为自己着想？”

她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撒旦的逻辑，而马克思正是撒旦教的信徒，所以，她的说法正好符合共产党的逻辑。当时我想，既然你们说要为自己，那么你给我说这些，不就是为你们自己吗？为你们自己吃人血馒头而升官发财，何必打着为我好的旗帜呢。

传唤于下午四点半正式结束。从十点半开始，我在派出所整整滞留了六个小时，从正式传唤开始，也已经滞留了三个半小时，这些时间都被他们的废话浪费掉了。传唤结束时，要我签字，我说：“在刘晓波一案中，你们随意把传唤别人的材料掐头去尾作为起诉刘晓波的证据，因此我拒绝签字。”

他们说：“那你写上本人拒绝签字，签上你的名字。”

在传唤的时候，他们问我对刘晓波案的看法，我说：“这是因言获罪，你们公检法是一伙的，本来没什么事，被你们无限放大，现在刘晓波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了。”

他们就说：“你的意思是刘晓波被判刑入狱，你觉得是好事。”他们又说：“从魏京生、徐文立开始，凡是与国家作对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我说：“要看什么叫好下场，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国民党也说共产党没有好下场，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你看南非的曼德拉、韩国的金大中，他们是不是有好下场呢？”

他们就说：“你的意思是将来有一天你要来审判我们。”

[36] 维权人士被警察软禁在家中，门外有警察站岗，故称为“上岗”。

我说："这可是你说的，我并没有这么说。"当然，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在期待着审判他们那一天的到来。

丁子霖，《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三０年代生于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蒋培坤，《零八宪章》签署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因儿子蒋捷连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中丧生，丁子霖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联合其他死难者母亲，搜集“六•四”死难者名单，要求中共为“六•四”平反，释放所有因“八九民运”被捕在押的政治犯，公开“六•四”真相，追究事件责任。为此，丁子霖、蒋培坤夫妇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软禁，甚至拘捕。

二００二年、二００三年“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两次提名。

“大国崛起”阴影下的幽禁纪略

丁子霖 蒋培坤

引言

自二０一０年十月八日公布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日，至十二月二十日的七十四天时间里，我们夫妇在江苏无锡农村居所以及北京寓所的座机电话、网络，京锡两地的手机，先后被切断，我们与亲人、难友、海内外友人中断了一切联系。

从我们的切身体验而言，这个“大国崛起”所构建的“和谐社会”真是“与时俱进”。尽管我们俩身上深烙着“天安门母亲”、[37]“六•四”难属、“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等诸多印记，在以往的二十多年里也曾先后两次遭到异地幽禁，连续五十天中断通讯联系并被限制行动自由……，但还从来没有这样长时期的幽禁。大概顾忌到我们年老病弱，这次没有把我们置身异地，而是囿居于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连园”。虽然是在自己家，但通讯被中止，行动受限制，在漫长的七十四天里，只有几位亲戚被允许不定期地前来探望。我们多么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但却音讯隔绝，这是我们一生经历中最寂寞、最难耐的时日。

可以想象，在京的亲友、难友们如此长久得不到我们音讯时的忧急心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霞女士[38]，这段时间她的日子是怎样过的，能不能去挪威参加颁奖仪式？十月十一日，她从北京发来过一条短信，告诉我们她的新手机号码，但是，我们的手机很快就被无锡“国安”切断了，至今已过去两个半月，始终没有再同她取得联系。我们还特别想念难友徐珏女士，自二００九年她罹患重症以来，不管她在医院治疗，还是在家中休养；也不管我们是在北京城里，还是在无锡乡下，丁子霖与她每周都会通上一次电话，彼此听到对方的声音，就是一种慰藉、一份力量。然而，她现在到底怎样了？每每念及，内心充满了忧伤与悲愤。

因此，我们夫妇俩在无锡“连园”被幽禁期间就商定，一旦返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我们这两个多月的经历告诉所有亲朋好友，以释挂念。

一、我们的宽带和座机被切断

二０一０年十月八日下午四点多钟，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时间快到了。蒋培坤打开了电

[37] 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中死难者母亲组成的群体，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六•四”死难者母亲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

[38] 二０一０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独立作家、《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的妻子。自二０一０年十月二十一日起，她即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渺无音讯。

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五点刚出头，诺奖揭晓了，是刘晓波……。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马上来电话采访，丁子霖只说了两句感言，座机就出了问题，开始时断断续续，随即便没有了声音。接着座机铃声又响起来，拿起电话，是中国人权双周刊记者打来的，丁子霖赶紧说："这是二十一年来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也是二十一年来最好的消息……。"话音未落，座机又没有了声音。之后，座机铃声再次响起，但拿起话筒仍然没有声音，如此者三。

五点十三分，我们用手机往北京打电话找刘霞，话务员说对方正在通话中。以后又多次拨号，话务员说对方已经停机，我们知道刘霞的电话也被切断了。至五点半，我们在无锡寓所的座机被彻底切断，蒋培坤去看电脑，发现连接网络的宽带也被切断了。

当晚七点三十九分至第二天上午，我们用手机给北京的多位难属去电话，告诉他们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大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个声明，表明在京难属的心情和态度。

十月九日中午，考虑到蒋培坤的病体，我们用手机给北京"国安"打电话，告诉他们无锡"国安"切断了我们的网络和座机电话，北京"国安"答应立即派人来无锡 "协调"。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北京"国安"来到无锡锡北镇张泾我们的家中，他们说无锡"国安"担心我们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担心我们对外发表声明，甚至担心我们去上海世博会见外国记者，等等。经与北京"国安"再三商谈，我们勉强答应了他"不要发声明，不要接受采访"的要求，条件是必须立即恢复我们家中的座机和网络通讯。

十月十一日上午，处于封闭状态、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的我们，带着"自由门"[39]去邻村一位亲戚的厂里浏览海外网页，当看到刘晓波在刘霞探监时得知获奖消息后表示"心中很不安"，并说"这个奖是给天安门亡灵的"，言罢落泪……。我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丁子霖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顾不得个人安危，唯有听从良心的抉择，决定发一个声明，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递出去。

当天傍晚，我们拿着起草好的《天安门母亲：我们的声明》，到附近的另一位亲戚家，想借用他们的手机发短信，将我们的声明一段一段传送出去，恰巧这家主人的女儿可以上网发 E-mail。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

我们立即把这份声明发给了北京的一位难属，由他向北京的其他难属征求意见后传送给海外网站。不一会儿，接到对方短信，说声明已发出，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二、与无锡"国安"发生激烈冲突

当我们在亲戚家全神贯注地发 E-mail 时，突然有四个陌生人冲进大门、二门，闯进屋里，其中一人用手摁住茶几上的电脑，另外一人迅速把电脑和 U 盘抢到手里。六七个在场的亲戚全都惊呆了，大家反应过来后本能地去保护电脑。

丁子霖问："你们是什么人？拿证件出来！"

其中一人拿出工作证一晃："无锡市国家安全局"。

丁子霖还没看清上面的名字，工作照便被收了起来。他们再次来抢电脑和 U 盘，几位亲戚死死护住电脑，差点被他们推倒在地。

"你们是强盗！滚出去！滚出去！" "你们不讲理由，私闯民宅，我们犯了什么天大的罪？你们要抄家就拿搜查证出来！"丁子霖一边怒斥他们，一边将那四个人推出门外。

由于事发突然，无锡"国安"动粗，丁子霖情绪激动，当再要和他们理论时，突然昏厥倒地，在场的亲戚纷纷围上来救援，这家的女儿急得只顾哭喊，蒋培坤拿出自备的硝酸甘油塞进丁子霖嘴里。正好有一辆小车在旁边停着，车主把丁子霖扶进小车，立即送往张泾医院。

[39] 指一种能够突破中国政府建立的网络信息封锁系统，即"长城防火墙"的软件。

经医院抢救约一个小时后，丁子霖才慢慢苏醒。她拨掉手上插的输液管，借用亲戚的手机给来无锡的两位北京“国安”打电话，叫他们立即来张泾。随后，在亲戚们的搀扶下，她慢慢往家走，途中，她担心电脑放在亲戚家会连累他们，又返回亲戚家把电脑抱回了自己家里。

这时，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名官员也赶到了。他们要我们交出电脑，让无锡“国安”赶快撤走，尽早平息事态。

三、丁子霖目光呆滞，丧失记忆

丁子霖回到家里，目光呆滞，嘴里不断自言自语：“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

从去亲戚家发 E-mail。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到去医院输液，拨掉输液管给北京“国安”打电话……，十月十一日晚发生的那场激烈冲突，丁子霖完全记不起来了，她丧失了记忆。

在丁子霖被送去医院抢救时，张泾派出所的几名警察，锡北镇的政法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等来到我们亲戚家，甚至亲戚的房东也被通知来了。警察借查户口的名义问这问那。

蒋培坤火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里有你们什么事？赶快出去！出去！”他接着质问无锡“国安”：“警察怎么来了？”

“国安”回答：“是我们要求他们来协助工作的。”

就在这一天，我们发现手机也被切断了——手机屏幕上只有六个字：“仅限紧急呼叫”

蒋培坤问北京“国安”：“家里两人都有病，现在与外界的通讯联络统统断绝，一旦身体出现意外，怎么办？”北京“国安”表示会与无锡“国安”交涉，一定妥善处理。

一直到深夜十一点钟，无锡“国安”仍然不肯离开我们亲戚家，他们逼着亲戚家的女儿到我们家拿回电脑，交给他们，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蒋培坤考虑到电脑里保存着物主的个人隐私，只同意把声明复印给他们。但是他们说，那份“声明”他们已经从网络上“截获”了，他们还要检查电脑里的其它东西。

最后，由北京“国安”从蒋培坤手里拿走了电脑，他们保证等无锡“国安”检查完后就归还物主。次日凌晨一点多钟，无锡“国安”才从亲戚家撤走。

十月十三日上午，应我们的要求，无锡与北京两地“国安”来到我们家，商议归还电脑一事。无锡“国安”说：“电脑会尽快归还。”却绝口不提具体归还日期。

丁子霖坚持说：“今天必须谈定归还电脑的事，必须立即归还！”

于是，北京和无锡两地“国安”先后去室外打电话向上级请求，无锡“国安”最后终于答复：“电脑明天归回。”

四、逼迫亲戚签署《承诺书》

十月十四日，北京“国安”返回北京。

无锡“国安”则在锡山区、锡北镇两级政法委书记协同下，逼迫我们的五位亲戚在一份《承诺书》上签字，要求他们：“不给丁子霖、蒋子霖提供电话、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不为丁子霖、蒋培坤购买手机卡；不向外透露丁子霖、蒋培坤的任何信息。此项承诺直到丁子霖、蒋培坤离开无锡为止，如有违反，将承担法律责任。”亲戚们迫于无奈只好签了字，要求“国安”给一份复印件却遭到拒绝。

十月十六日，无锡“国安”来到张泾我们家，丁子霖向他们正式提出了抗议：“你们切断我们的宽带和电话，因发 E-mail 挑起冲突，以及逼迫我们的亲戚签署《承诺书》等做法，完全不把宪法和法律放在眼里，公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无锡“国安”对丁子霖的抗议不予理睬。

从此，我们在无锡市锡北镇张泾的居所，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通信联络，一些亲戚也不敢再与我们往来。在此期间，我们提出，自己年老多病，必须确保应急呼叫措施。他们答应除 110、120、119 呼叫电话，以及无锡、北京“国安”手机外，再向我们提供三部专用电话，这三部电话只能在他们的监听下分别打给三位亲戚。

五、到无锡医院检查病情

丁子霖自十月十一日晚昏厥失忆以后的半个月里，虽然未再发病，但整日头脑晕晕沉沉，走路摇摇晃晃，时常站立不稳，腰部更是疼痛难耐。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向上门来的李、于两位无锡“国安”提出，要回北京为丁子霖检查治疗身体。

两人一听我们要回北京，忙笑脸相劝：“丁老师现在身体虚弱不宜远行，还是就地检查治疗吧！反正在这里看病与回到北京看病一样都是公费医疗。”

又说：“我们会去找无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要不，你们就去住太湖疗养院，那里既可检查治疗，还可以休养……。”他们似乎早有准备，立即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我们选择，潜台词是我们不能回北京。

当时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丁子霖的脑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多严重？万一贻误了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蒋培坤也患有冠心病和脑梗塞，两年前，他曾因受到当地警察突袭而引发大面积脑梗。想到这些，我们非常担心，既然不能回北京，又不愿意去太湖疗养院，就只有同意由他们找医院检查治疗。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无锡李、于两位“国安”前来告知，已与锡城南郊人民医院的脑科专家王副院长约定，下周二上午为丁子霖检查治疗。并嘱咐丁子霖：清晨空腹；准备好以往病历资料；写一份就诊费用的说明供财务报销。

十一月二日清晨，丁子霖如约来到人民医院，在候诊、问诊，做各项检查的过程中，两位“国安”寸步不离地看守着丁子霖。

丁子霖向王大夫说明，十月十一日的发病并非张泾医院急诊抢救病历上所写的“患者因与家人发生争执而昏厥倒地”，而是因与“国安”发生冲突造成的。张泾医院的病历是在患者昏迷不醒，家属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写成的。之后丁子霖又交给王副院长以往的病历说明：第一次，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得知儿子中弹，生死不明，昏厥倒地。此后，共发生过五次昏厥，时间、地点、引发原因，经过情况，等等。最后一次，即二 0 一 0 年十月十一日，这次昏厥时间最长，情况也最为严重。从病历纪录上看，最近这两年昏厥的间隙已越来越短了。

大夫当即开具了各项检查，包括心脏、血压、腰腿关节、血液、脑部、腰部，核磁共振，等等。当天检查出丁子霖血压偏高。

六、失忆是因为“脑震荡”

丁子霖向大夫提出了一个最让我们担心的问题：“为什么此次昏厥近一个小时，醒来后对前后十二小时内发生的事都失去了记忆？“

大夫明确回答：“是因为“脑震荡。”

丁子霖问：“我今后还能慢慢回忆起来吗？”

大夫答：“不会了。”

离开医院时，丁子霖交给无锡“国安”一个信封，里面是应他们要求而写的就诊费用说明：“十月十一日晚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发病倒地的经过，因被阻止回京，需在无锡治疗，诊治费用需由无锡“国安”负担，尽管非本人所愿……”

十一月五日中午，丁子霖按照预约时间来到人民医院做脑部及腰部核磁共振。一进医院

便看见李、于两位无锡“国安”已守候在那里了。丁子霖不禁有些纳闷，原来说定今天只由于“国安”陪同，怎么这位李“国安”也来了。

做完核磁共振，在医院门口，丁子霖与两位“国安”分手时，李“国安”说：“丁老师，你写的那份东西能否重写一下？”

“为什么？我写的难道不符合事实？”

“那倒不是，只是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详细。前面那一段（指与“国安”发生冲突）就别写了。这份东西是给财务报账用的，他们不用知道那么多。”

“你们的财务也是‘国安’的工作人员呀，有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的呢？”

“丁老师，你就重写一份吧！别为难我和小于了。”

见李“国安”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丁子霖勉强答应了，但同时提出：“不管检查结果如何，天气越来越冷，蒋培坤又患有心脑血管病，离京时北医三院的大夫反复叮嘱过，不能在南方过冬，我们最晚本月底要回北京。”

十一月九日下午三时，无锡“国安”再次陪同丁子霖到人民医院看各项检查结果。经过一周休息，丁子霖的血压已基本稳定，查出脑部有腔隙性脑梗死。

丁子霖表示要回北京治疗，所以大夫只开了一些治脑梗的非处方药。临别时再三叮嘱：“日后要控制情绪，不要大喜大悲，以免再次发病。”当着“国安”的面，他又补充了一句：“过去的事已经这么久了，就让它过去吧！”这些话丁子霖懂了，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七、无锡“国安”的责任“解脱”了吗？

出了诊室，“国安”李“国安”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丁子霖说：“丁老师，你身体没有大问题，可以放心了，我们也感到挺欣慰！”可见，检查的结果对他们来说相当满意，本应承担的责任现在可以“解脱”了。但这次引发的病症今后会不会留下隐患却无从得知。

丁子霖拿出他们要求重新写的就诊费用说明交给李“国安”，已将“因与‘国安’发生冲突”改成了“‘因故’昏厥倒地”，李“国安”用手弹了弹这句 “尽管此非本人所愿”说：“这句话是多余的。”

丁子霖回应道：“这就是我的本意。”他这才勉强收了下来。

在医院大门口，李“国安”对丁子霖说：“你上次提出月底返京一事，我请示了领导，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领导不同意。”

他又接着说：“现在你们在无锡，由我负责，有事可直接找我，没有必要找北京，我们听省里的领导。”

丁子霖再次提出，南方冬天没有取暖设备，蒋培坤的身体很难坚持。对方答：“可以去太湖疗养院住一阵子，那里既暖和又不用自己做饭……”

八、冒名邮件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蒋培坤的高中同学一家突然造访，我们惊喜之余不免有些诧异，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客人来了，今天老同学上门，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果然，落座后这位根本不会用电脑的老同学掏出一张纸，说是别人帮他下载的一份远在加拿大的高中同学发来的 E-mail：

2010.11.12　4：37

××：好久未联系了，近况如何？

因为晓波获奖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是一步都不能出门，不过刚好这个时间可以用来专心的处理先前没有空闲处理的事情。电话至今没有接通，幸好家里还备有一个无线上网的 SIM

卡。我们这里还好。就是天气有点冷，原来买的取暖电油汀又用上了。我把刘毅的 1989、天安门、大地、圣地拉萨（组画）发给你共赏。

冬安！

丁子霖 蒋培坤

这是十一月十二日“我们”给那位老同学的信，后面是这位老同学的回复：

你们在无锡的情况已悉，这实在是无奈的事，你们一定要心情愉快起来，共同携手度过难关……

我们阅后大吃一惊！自从十月十一日晚借用亲戚家的电脑发出《天安门母亲：我们的声明》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与任何人通过 E-mail，此邮件纯属伪造。经了解，很多以前用 jielian.jiang@gmail.com 与我们联系的朋友和亲属都收到类似邮件，而这个邮箱早就由于密码被盗无法登录而废弃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早已被无锡“国安”切断，既知道我们目前情况，又掌握我们 E-mail 地址，而且还知道我家卫生间门口放着一个取暖电油汀的，除了无锡“国安”，不会再有其他人。并且十月十一日无锡“国安”曾声称他们“截获”了我们发给北京的声明，还提到声明后面附着的一位旅美人士的 E-mail 地址，这说明他们可以轻意掌握我们的通讯隐私。

九、什么叫“违反承诺”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无锡李、于两位“国安”再次来到我家。丁子霖当即向他们提出了伪造邮件一事，对他们自十月八日以来对我们的一系列行为再次提出抗议，指出他们违反了宪法三十五条，侵犯了我们的公民权利：“你们是执法人员，你们目前对我们采取的监控措施，是监视居住，还是宪法或法律规定的哪一个条款？”

李“国安”对丁子霖突如其来的质问有些不知所措：“我个人理解，是中断了你们的通讯联系，行动自由还是有的，你们不是可以去看望老同学吗？”

丁子霖问：“为什么我去镇上超市、小店购物，后面有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寸步不离地跟着？”

对方说不是他们的人。

丁子霖又问：“那我们有去上海、苏州探望亲友的自由吗？”

“你们去上海、苏州的话，要向我们打个招呼。”

“要打招呼，还算什么行动自由？”

对方大概被这些问题激怒了，忽然间板起面孔说：“是你们一再违反诺言。你们答应不发声明，结果还是发了；你们答应不打电话，结果还是打了，而且据我们得到的确切信息，你们不仅打了电话，而且还是给北京方面打的……。”这句“据我们得到的确切信息”充分表明，他们动用了一切非法手段来监控我们的言论。

这一番话也惹怒了丁子霖，她打断对方：“我们做事向来光明正大，今天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你们对我们所做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都是违法的。你们十月八日切断我们的宽带、电话，我们找来北京‘国安’从中斡旋，是为了尽快恢复通信联系，避免扩大事态。我们在北京‘国安’再三要求下，曾同意暂时不发声明，这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的妥协。我们一开始就明白，发声明也好，打电话也好，都是公民应享有的合法权利……不存在什么‘违反诺言’，你不能用某项自撰的‘承诺’来代替宪法和法律的条文。作出某种‘承诺’，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让步，能退则退，不能退则不退，所谓‘承诺’，不过如此而已。”

接着，丁子霖谈到十一月十二日那封冒名邮件：“你们指责我们给北京打电话，这件事情今天也得说说清楚。十一月十四日，我们看到无锡老同学送来的冒名邮件，随即借用他的

手机给北京的难属打了电话，我们担心北京的难属收到类似邮件而受蒙骗。结果不出所料，我们当即得知有两位难属同时收到了这类邮件（其他人的情况我们还不了解），他们并没有怀疑是假的，收到后还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们给北京打电话的缘由。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借用与你们签订了《承诺书》的亲戚的电话，而是用别人的手机打的，这难道也是违反“承诺”的一条罪状？

李“国安”的态度随之缓和下来：“谁给你们发来的邮件，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

蒋培坤立即上楼取来交给他。

李“国安”看后，说：“这口气倒挺像你们的……。”

蒋培坤斩钉截铁地说：“这分明是你们‘国安’干的，只有你们才掌握了我们和加拿大老同学通讯的邮箱，也只有你们用我家洗手间时见到放在门边的油汀。”

丁子霖补充说：“这件事必须查清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否则你们又要制造构陷我们的借口。”

李“国安”将冒名邮件装进包里，答应回去查一查。

临别时，丁子霖又问：“什么时候可以买票回京？请给个准话。蒋培坤每天所必需服用的药到月底就用完了。”

李“国安”忙说：“我们沟通一下，到时候天气冷了，找个暖和的地方去。”就是不肯说明我们回京的日期。离开时他们带走了蒋培坤平时每日服药留下的几个空药盒，并答应尽快解决。

此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由于谈话内容激烈，气氛紧张。“国安”走后，我们深感身心疲惫，体力不支。

十、“万一颁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叩门怎么办？”

十二月一日下午，邻村的亲戚给我们送来了蒋培坤需要的药，是无锡“国安”转告北京“国安”在京购齐后汇寄到我们亲戚处，让他转交的。

亲戚刚向我们交代了药的的事，无锡“国安”就来了。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万一颁奖（指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你们家叩门，怎么办？”

丁子霖答：“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乡下来呢？这里既无路标，门牌号码也是乱的。”

对方仍执拗地问：“万一来呢？”

蒋培坤说：“万一叩门，我们就开门，清茶一杯，接待他们。我们不会将来客拒之门外，这是做人的起码礼貌。你们怎样对待境外记者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的是办法。”

无锡“国安”无趣地走了。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们开始掰着手指头号倒计时地掐算着，还有几天能回北京，十天、八天、一周……。我们密切关注着北京、江苏、无锡几家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好几次，无锡电视台预报未来几天将有寒流。我们找出所有的厚棉衣、厚棉被，严阵以待。幸好，一次又一次寒流与锡城擦肩而过，这里的气温始终在二十度左右徘徊。我们暗自庆幸，也许是老天相助吧！

然而，十二月六日这天，狂风、寒流真的降临了锡城，蒋培坤随即病倒，感冒、寒颤、嗓子疼痛，连服一周北京带来的“阿奇霉素”，谢天谢地总算度过了难关。

十一、终于等到了回京的日子

“国安”同意我们十二月十四日晚十点回北京。买到回京车票的这天，我们享受着两个多月来难得的轻松。我们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唯恐因自己罹病而滞留在此，二十多年来，

我们第一次如此归心似箭！

面对“连园”内寒风凛冽中那两丛刚开放的腊梅，尤其是闻到初绽的花瓣上散发的沁人心脾的幽香，给我们凄苦的心灵带来了些许抚慰。

屈指数来，“连园”自开始筹建，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了。这里的许多回忆既让我们神往，又令我们哀伤。

一九九四年，因不胜北京“国安”的骚扰，又应亲友之邀，我们用所能承受的财力、物力，亲手设计、建造了这座二百一十多平米庭院的居所，希望作为春秋两季休闲、写作以及会友的避居地，事实上它也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六•四”和人权方面的三本书藉，许多文章和信件，包括《天安门母亲之路》纪录片文字脚本，都写就于此。“连园”里留下了不少难友、同学、学生，以及新、老朋友的足迹。闻名于世的《零八宪章》最初的创意也是在这里萌发的。

然而，这个精致、典雅的园林也是我们晚年的多次蒙难地：一九九五年八月，我们被无锡检察院（实际是“国安”局）从这里带走，秘密关押四十三天；二00四年四月，丁子霖只身回锡、苏两地扫墓，被无锡“国安”抄家，并从这里带走，秘密关押七天；二00八年十月底，蒋培坤因受无锡当地警方突袭，导致冠心病发作造成大面积脑梗，抢救三天三夜才从死神手中夺回性命；二0一0年十月八日，丁子霖因与无锡“国安”发生激烈冲突，导致昏厥，引发脑震荡。……我们已届暮年，在未来的余生，还会有多少次劫难在等着我们呢？

二十多年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我们的切身感受是，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最为宝贵的。如果失去了自由，即使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也像瞎子和聋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如同一个人在漫长的黑暗中独自摸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刘晓波是我们真诚的朋友，此次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本应是中国人的荣耀，但是，一个自称已经“大国崛起”的执政当局，却不能以平常心来坦然面对，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竟然在公众的视野里无影无踪；而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也同样在公众的视野里销声匿迹。

十二、可以回北京，但不能回家

终于等到了十二月十四日。清晨，蒋培坤到镇上菜市场买回来两斤鲜活的河虾，准备做熟了带回北京，这已经是前几年形成的惯例。每次从无锡回北京，我们都要带一些河虾给晓波和刘霞品尝。晓波入狱后，剩下了刘霞，依旧如此。估计颁奖仪式已过，我们回北京可以见到她了。

这一天天气很冷，丁子霖一个人正缩着脖子、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把河虾的脚剪下来。忽然听到有人叩门，我们以为是当地亲戚前来告别。开门一看，原来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工作人员。

丁子霖不禁心生疑惑：“怎么啦？是不是又变卦，不让我们回北京了？”

“不！不！”来人忙做解释：“今晚就回北京。但是情况有些变化，我们临时接到上级（不知是哪一个无道的“上级”）指令，你们月底才能回家。我们考虑到二老的健康状况，才争取到目前的方案——回北京，先上别的地方呆上一阵子，呆的时间不会太长，最迟到十二月底，也许到圣诞节吧。怕你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领导专程派我们来，接你们一起回去，希望你们谅解。”

原来如此，除了接受这样的“安排”已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离开这个冰冷的地方吧。

来人建议晚上由他们来接我们去车站，我们谢绝了，我们有亲戚送站。

当晚九点，我们乘亲戚的车出发。车刚驶出小巷口，就见一辆出租车已经守候在那里，

两位北京“国安”走过来要我们换车。

就这样，我们与两位“国安”同乘一个包厢，于十二月十五日清晨抵达北京南站，北京“国安”的车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我们赶上了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在我们要求下，先回家匆匆拿了一些御寒的棉衣、棉裤，和准备去医院看病、取药的钱，就又被他们带着乘车往远郊区驰去。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天一天翘首等待回家的日子。十二月十八日，丁子霖终于按捺不住，发作起来：“十二月二十日是我的生日，二十一日是蒋培坤老师的生日。自从小连遇难后，大孩子只要在北京，总会约好在这两天来为我们过生日。我们俩已经失去了小连，现在就剩下这一点亲情，还要被你们剥夺，你们的上级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什么‘以人为本’、什么‘和谐社会’，难道这不虚伪吗？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的人了，干脆把我们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又何必这么费事呢。”

身边“陪同”的人默不做声，无一人相劝，也无人敢劝。

次日清晨，一位“陪同”笑脸相告：“丁老师，有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回家？”

“对啦，二十日送你们回家，让孩子们给你们过生日。”

十二月十九日，丁子霖几乎一夜未眠，她想起了当年孩子们为她过五十岁生日时的情景：两个儿子把她平时坐的大椅子搬到屋子中间，摁着她朝南在椅子上坐下，一本正经地给她连叩三个响头，那份幸福太短暂了，现在剩下一个孩子……。回想起以往的二十多年，就如同堕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真难以想象那梦魇般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十二月二十日，终于回家了。但家里的座机、手机、网络仍处于停机状态，经再三交涉，终于在二十一日恢复了通讯。

从两个半月的紧张状态中突然松弛下来，丁子霖病倒了，寒颤、呕吐，咳嗽不止，不能进食、不能走路，在床上躺了三天。

当读到网上海外友人为丁子霖过生日祝福的报道后，病中的丁子霖心中充满了感动，这份温馨激励着她，她要以此文衷心感谢这七十四天里所有海内外关心她的朋友们。

王荔蕻，《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五0年代生于山东青岛，在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一九七五年赴陕北延安插队，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市某机关工作，一九九一年离职，后下海经商。

二00八年开始活跃于公民维权运动第一线。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结石宝宝事件、唐福珍事件、李淑莲事件中都有其慷慨奔忙的身影。尤其在“福建三网友案”中，她以卓越的智慧成功地组织了上千网友以街头“围观”的方式争取公平正义，第一次将中国公民维权抗争提上“讲人权”、“讲政治”的高度，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提供了难得的范例。二0一0年十月八日，她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庆祝活动中被拘留八天。此后，有关部门要求她写保证书以换取自由，她写下了《不作保证书》表达自己的心声：“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

二0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当局以“福建三网友案”围观事件为由，将王荔蕻拘留，并以“寻衅滋事罪”入狱九个月。

八 天

王荔蕻

二0一0年十月七日，和几位朋友约定，第二天到位于旧鼓楼大街的凤凰竹餐厅吃饭，看看到底打赌双方（赌刘晓波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谁掏钱。

到了凤凰竹餐厅，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因电路故障，暂停营业”[40]，于是决定转移到地坛公园。

派了一个小伙子去联系饭馆，大家等在地坛公园门口。联系好了，准备去饭馆时，有人说，还差两分钟就到五点了（八号下午五点宣布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结果），等等吧。于是又等了一会儿，传来消息：刘晓波真的获奖了。

大家高兴得拥抱、欢呼起来。有一位记者在现场采访，我说主要是高兴国际社会有人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时不知怎么脑海里想到的都是谭作人[41]……

然后大家说唱歌吧，就唱起了《国际歌》，大家举着“庆祝刘晓波获得诺奖”“言论无罪、自由万岁”的大字拍照。

有警察来了，我们就离开地坛公园到刚联系好的饭馆“新味火锅”。

刚刚坐下，跟着进来了两、三个警察，大家鼓掌欢迎。

为首的警察说：“起什么哄？”

我说：“什么叫起哄啊，欢迎你们不好吗？有高兴事，大家一起高兴。”

这时呼啦啦进来好几十个警察，态度非常粗暴，说把你的电脑收起来。然后就开始动粗，强行把人们揪起来推搡出去。

我的动作很慢，天天一直照顾我，帮我收拾电脑，所以我和天天最后出去。坐到警车上，看到阿尔已经在里面了。车子开到和平里派出所，大家下车，我和屠夫、阿尔、小路、天天被带到一间屋子里。过了几分钟，我和天天又被带出去，开始以为是去另一间屋子，后来出了派出所，被带上一辆警车，说去别的地方。

我和天天问：“为什么带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

回答：“去景山派出所。”

[40]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聚会，常常受到警察的干扰，方法之一就是要求餐馆以停水、停电等理由拒绝接待。
[41] 因调查二00八年四川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名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的异议人士。

这时，院子里一个穿黄T恤的警察突然毫无来由恶狠狠地破口大骂："傻逼!"

我迎上去："你说什么？"

他也冲过来："你说什么？"那架势好像要大打出手，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这时听到天天气愤地质问："干嘛打人？！"我回头看到，天天穿的裙子被掀起来，露出穿黑丝袜的腿。

天天喊着："干嘛看我的腿，干嘛耍流氓？！"我背着双肩包，也被凶猛地推搡着。

天天有心脏病，这个想要做人的权利的女性却完全不顾自己的小命。

我曾问她："何苦来哉？"

她笑曰："没有了人的权利和尊严，活着何苦来哉？"看到她被粗暴地推打、踢踹，我既气愤又心疼，护着天天上了警车。

在警车上，接到片警[42]小刘打来的电话，问我："到了哪里？"

我说："被从和平里派出所押往景山派出所的路上。"

片警说："我过去接你。"

到了景山派出所，开始时我和天天关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大个子警察很凶地说："瞧你那德行，那么大岁数了。"

我说："这么大岁数怎么了，没做坏事。你呢？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了不起了？"

那警察说："对了，就是了不起怎么着。"

因为东城区警察的粗暴行为让我非常气愤，所以就跟那个为首的警察说："我强烈抗议！我跟你们没话说。"于是保持沉默一直到宣布对我拘留八天，让我签字。

我说："我抗议！我不认可，不签字。"

一个自称派出所副所长的警察让我上警车，先去检查身体。

我问："我的背包呢？"

他说："会给你儿子的。检查完了身体还回派出所呢。"结果上了警车，就一路往昌平的拘留所开去。

在车上，那个派出所副所长带着点得意地说："你们纯粹是瞎闹，以后你要多看点书。你看我平常就爱看书，我爱看古书，比如《古文观止》什么的。"

我的眼镜没掉，也没心情笑（我觉得他不会真的看《古文观止》，就是看，也基本看不懂），我只是说："你的知识结构太陈旧了，作为执法者应该读读《社会学》、《政治学》，你应该上网查查什么是"平庸的恶"。你们执法，为什么要那么粗暴呢？有必要吗？我也有当警察的朋友，也去过几个派出所，我觉得一个派出所的风气，和这个派出所的领导很有关系。如果这个派出所的领导有人性，那么派出所的警察就不会对公民很凶恶，反之亦然。我原以为皇城根的警察——东城的警察会比较文明一点，结果这次领教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文明执法吗？"

副所长（后来知道叫王冰）说："我认为社会上只有三种人：警察、老百姓、坏人。"

我说："太简单了吧。你是不是认为所有不像羔羊一样顺从的人就都是'坏人'？而一旦被认定为'坏人'，你们就可以随便处置、为所欲为？所以你把我们都当做'坏人'，所以你们就可以不择手段。"

王副所长说："是老百姓说的坏人。"

"不是你刚才说的吗？社会上只有三种人：警察、老百姓、坏人？"——不知道他们把中南海里面那些人划到哪一类里，是"警察"还是"坏人"？肯定不会是"老百姓"吧。

王副所长又说："比如吧，老百姓过日子呢，街上有几个流氓，身上刺着青，老百姓不

[42] 户籍所在地或常住人口所在地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分管户籍和治安，也时常被要求协助"国保"（秘密警察）监管异议人士。

怕吗？对这些犯罪分子我们能不处理他们吗？”

“是不是犯罪分子不能你们说了算吧？”

“难道还要你说了算？”

“要法院说了算。要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判了才能算呢。不能你看着谁像‘犯罪分子’谁就是犯罪分子吧？”

“不跟你说了，你这个人太偏激，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我把话放在这儿。你们这些人……”

“希望这次就我一个人（被拘留）。”

“嗬，你还挺仗义（嗤笑的语气）。”

警车在八达岭高速上飞速行驶，路过我家，又开了很远，到了拘留所。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也许这是命中注定，心里异乎寻常地踏实，我想这大概是那个副所长绝对想不到的。

拘留所“前台”接待人员态度很好，没有那种丑恶嘴脸。

在等待登记的时候，听到屠夫在门外叫：“大姐。”

晕！怎么屠夫也进来了！他那天本来不准备来参加聚会，后来来了也一直很低调。如果屠夫也进了拘留所，或许还有别人也未能幸免。只有我一个人进来的想法破灭了，顿时感觉很内疚。对屠夫喊了一句：“抱歉啊！”

登记完了，先检查身体，别的方面都还好，就是颈椎病比较严重，那几天正在吃药。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腰里一直戴着钢板护腰。

之后换囚服。那天很冷，里面的衬衣和秋裤允许穿着，棉服因为有拉链，所以必须脱掉。代之以囚服，护腰不允许带进去，没有想到眼镜也必须摘下来。我的左眼六百度、右眼六百七十五度，摘了眼镜就跟瞎子一样，可是这事不容商量。只好摘了眼镜，摸索着上到二楼，左转，在一个门口站下，领我上来的值班管教拿钥匙转了一下锁孔，喊道：“开十四所。”咔嗒，门开了。模模糊糊看到里面两排通铺，中间是过道，有几个人迎过来。

管教（后来知道姓孙）对里面说：“这个新来的王荔蕻高度近视，眼神儿不好，你们照顾着点啊。”

里面几个声音答道：“好的，没问题。”

过来两个人搀着我进去，让我把东西放到一个格子里，在通铺板上坐下，管教关上了门。

心想，终于进来了，去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准备好了》，所以没什么可说的，这是早晚的事。

我的监狱生活就此开始了。

在同监舍号友的帮助下，铺好被子，钻进被窝，几位纷纷问道：“为什么进来？”

我说：“在公园门口唱歌、喊口号来着。”

七嘴八舌：“哦，你这是政治犯啊。”

“够牛的啊。”

“怎么在公园门口唱歌也拘留啊？”

正说着门开了，孙管教叫：“王荔蕻出来，提审。”

起来，穿上囚服，走出来，摸着楼梯扶手下楼，在接待处遇到屠夫正在登记，屠夫又喊了一声：“大姐！”

我眯着眼模模糊糊对着屠夫的方向抱拳：“抱歉抱歉啊。”

屠夫问：“大姐，你几天？”

“八天，你呢？”

“也是八天。”

“抱歉抱歉！”

狱警催促：“别说了，快走。”

提审室很冷，我坐在开着窗户的窗口，禁不住有点瑟缩。

预审说：“冷吗？我只穿两件都不冷。”

我说：“你多大年纪我多大年纪啊？你们小伙子当然不冷了。我在派出所一天一夜没吃没睡，刚到这里你们就提审，我能不冷吗？你们什么意思？”

预审说：“你赶快说完就能早回去。”

其实从在门口看到屠夫开始，我已经决定“好好配合”，把经过统统说出来。

以下为根据记忆整理。

提审记一

预审：“姓名。”

王荔蕻：“王荔蕻。”

……

预审：“你们七号在凤凰竹吃饭有几个人？”

王荔蕻：“大概四五个吧。”

预审：“说实话。”

王荔蕻：“是实话啊。”

预审：“都有谁？”

王荔蕻：“涉及别人的我不想说。”

预审：“我们都知道了。”

王荔蕻：“知道就行了呗，还问什么？”

预审：“要让你说。”

王荔蕻：“我先跟你说吧，我有一个原则：我自己的事情我说，涉及到别人的我不想说。所以你们也别问了。”

预审：“谁先提议去地坛的？”

王荔蕻：“我。”

预审：“你就大包大揽吧，对你没好处。”

王荔蕻：“本来就是。我前几天去地坛书市，看到那里地方挺空旷的，所以先去那里。”

预审：“几点去的？”

王荔蕻：“四点多。”

预审：“到那儿就开始了？”

王荔蕻：“没有，本来想去地坛里面。”

预审：“后来为什么没去？”

王荔蕻：“刚想去，有人说还差两分钟就到五点了，等一等吧。就在那等了。到五点就宣布了，大家很高兴，就在原地庆祝了一下。”

预审：“怎么庆祝的？”

王荔蕻：“把标语拿出来，大家唱歌。”

预审：“唱什么歌？”

王荔蕻：“《国际歌》。”

预审：“喊什么口号？”

王荔蕻：“和标语上一样，庆祝刘晓波获诺奖，言论无罪、自由万岁、释放晓波！”

预审：“你们喊这些什么意思？”

王荔蕻：“高兴呗。”

预审：“言论无罪什么意思？”
王荔蕻：“刘晓波那么温和的人被判十一年，这是不对的。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还因言获罪，太不应该了。”
预审：“标语是谁做的？”
王荔蕻：“我。”
预审：“在哪做的？”
王荔蕻：“我不想说。”
预审：“为什么？这不是你的事吗？”
王荔蕻：“涉及到别人了。人家做生意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必要连累人家。”
预审：“标语和照片是在一个地方做的吗？”
王荔蕻：“不是。”
预审：“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王荔蕻：“网上下载的。”
预审：“网上有吗？”
王荔蕻：“到处都是，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预审：“做标语花了多少钱？”
王荔蕻：“几百吧。”
预审：“几百？”
王荔蕻：“三四百。”
预审：“哪里来的钱？”
王荔蕻：“几百块钱我还出得起。”
预审：“你自己的钱？”
王荔蕻：“对。”
预审：“黄丝带呢？”
王荔蕻：“也是我准备的，买一盘黄丝带，铰成一截一截的就行了。”
预审：“胸牌是谁做的？”
王荔蕻：“我。”
预审：“上面有什么？”
王荔蕻：“刘晓波照片。”
预审：“还有什么？”
王荔蕻：“还有字，“和你在一起”。“
预审：“是‘我们和你在一起吧’？“
王荔蕻：“对。”
预审：“还有什么？”
王荔蕻：“还有‘共享正义阳光’。”
预审：“好像还有日期吧？”
王荔蕻：“对，二０一０年十月八日。”
预审：“你做这些干什么？”
王荔蕻：“本来准备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带着，如果获奖了就拿出来挂在墙上，大家照相，高兴一下；如果没有获奖就不拿出来，只是吃一顿饭算了。”
预审：“你们怎么知道刘晓波获奖消息的？”
王荔蕻：“在推特上知道的。”
预审：“推特是什么？”
王荔蕻：“是一种微博。”

预审：“推特上说这个消息了？”

王荔蕻：“已经在推上吵了一个月了。有两种意见，一种觉得会获奖，一种觉得不会。还有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给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写信，反对刘晓波获奖。”

预审：“十月八号这个日子是怎么知道的？”

王荔蕻：“也是推特上说的啊。他们有人在打赌，有人说赢了请客，也有人说输了请客。我没有参与打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赢了的请客还是输了的请客。”

提审记二

东城国保（以下简称东厂[43]）：“王荔蕻，你挺忙啊，全国到处跑啊，福建、四川……”

王荔蕻：“四川？没去过（说完以后想起，说四川是因为刘贤斌[44]）。”

东厂：“皇城根也去（指今年六月十六日端午节声援倪玉兰[45]的那次活动[46]）。”

王荔蕻：“皇城根？没去过。你们不是有录像吗？看看呐。”

东厂：“你们那个‘福建三网友案’是怎么回事啊？”

王荔蕻：“我想问问，你们是刑事警察，还是‘国保’？”

东厂：“呦，你对我们公安局内部的组织分工还挺知道的啊。是不是认识警察啊？”

王荔蕻：“怎么了？”

东厂：“认识谁啊？”

王荔蕻：“能跟你们说吗？”

东厂：“你就跟我们说说福建的事呗，我们就想知道知道。”

王荔蕻：“网上都有，你们上网一搜就知道了。”

东厂：“你就跟我们说说呗。”

王荔蕻：“从前，在福建闽清，有一个二十六岁的姑娘……（给他们讲了一遍严晓玲和三网友的故事）”

东厂：“那你们去那干吗？”

王荔蕻：“去围观[47]啊，去表达我们的关注。不知道你们当过刑警没有？以你们做警察的经验，这个案子没有疑点吗？那么多学者、教授，还有退休的检察官、法官都说这样判是不对的，他们还硬要判，我们不该去表达关注吗？”

东厂：“你说说都有哪些教授、学者写文章了？”

王荔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涌……你去网上查，多着呢。”

东厂：“你们怎么组织那么多人去的？”

王荔蕻：“没组织，网上说要去就有人去了。”

东厂：“那么多人去要花不少钱的吧，你们哪来的钱？”

王荔蕻：“很多人都是自己掏钱去的，也有募捐给想去没钱的人。”

东厂：“都谁捐钱了？捐多少？”

---

[43] 中国明朝著名的特务机构。

[44] 因写文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的四川民主人士、独立作家。

[45] 因帮助北京奥运会工程而被强制拆迁的访民维权，被警察打残双腿并入狱的维权人士。二 0 一 0 年她出狱后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46] 二 0 一 0 年端午节，网友发起“端午节之夜”消夏活动，呼吁人们去看望流落街头的倪玉兰。当晚，数十名警察将坐在轮椅上的倪玉兰带走，网友们聚集在关押倪玉兰的北京东城区东华门派出所门外，搭起帐篷等候，直到深夜。

[47]“福建三网友案”提起公诉后，“福建三网民因言获罪案网络关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在网络上征集签名，签名者达五千余人。二 0 一 0 年四月十六日，福建省福州市马尾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团成员数百人在法院外声援。此次声援活动被称为中国公民运动的里程碑。

王荔蕻：（沉默）
东厂：“你们那么多钱肯定有管账的吧？都谁管账啊？谁是会计？”
王荔蕻：“那么点钱有必要找会计吗？”
东厂：“那也得有人管账啊。”
王荔蕻：“我自己管。”
东厂：“你们得有个机构吧？要不别人怎么相信你啊？”
王荔蕻：“没机构。”
东厂：“哦，也没机构，就说王荔蕻需要捐款，就有人捐了？你王大姐面子够大的啊。”
王荔蕻：“我们‘福建网友关注团’有五千多人，有人想出力，有人想出钱，网上发个帖子说没钱了，就有人捐钱了呗。”
东厂：“那怎么证明你没把这钱拿去买粮食买吃的？要是别人不相信你怎么办呢？”
王荔蕻：“不相信就请他拿汇款票据来，把钱退给他。”
东厂：“你们不可能没有管钱的，你们网上不是都公布了吗，还有什么可隐瞒的?”
王荔蕻：“没什么可隐瞒的。你们老问福建的事干嘛？福建和你们有关系吗？连市局‘国保’都说，别说福建，连天津的事我们都不管。你们东城区‘国保’问福建的事干吗？”
东厂：“华泽是东城的啊，这有关系了吧？我看你们录像，华泽也去了，在拍录像。”
王荔蕻：“华泽是我叫去的，她原来是中央电视台的，会摄像，我请她专门去摄像的。”
东厂：“你们怎么认识的？”
王荔蕻：“网上。”
东厂：“姐妹俩关系还挺好？”
王荔蕻：“一般。”
东厂：“你叫她去她就去了？”
王荔蕻：“我说有个活动，请她帮忙去摄像，就去了。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东厂：“那我就写上你叫华泽去福建的了。”
王荔蕻：“你写这个干吗？你别写，你问的是东城地坛公园的案子，华泽又没去地坛，和这事儿没有一点关系，你写这个干吗？”
东厂：“那就写你认识华泽。”
王荔蕻：“这个也别写。跟你问的事没关系你写什么？写了我不签字。你们那个笔录纸上写的有：‘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哼，你们是不是觉得八天还不过瘾，还要挖坑设套再整出点事儿来啊？”
东厂：“我们当然要问了。比如我们抓到个小偷，只偷了一支钢笔，我们肯定不能只停止在一支钢笔上，还要问问他以前什么事，说不定他还杀过人呢。”
王荔蕻：“哼哼，还说你们不是挖坑设套。”
东厂：“我们就是问问。”
王荔蕻：“前几天我跟预审的也说了，我的原则是自己的事情可以说，涉及别人的事情，我不想说。”
东厂：（瞪眼）
王荔蕻：“我跟预审的还说了，涉及别人，你就记‘不想说’就行了。“
东厂：“呵，你还想当江姐[48]啊？”
王荔蕻：“这跟江姐没关系，只要你们不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我就不说。”
东厂：“给你上老虎凳你就当甫志高？[49]”

---

[48] 小说《红岩》中的共产党员，被塑造为宁死不屈的女主人公。
[49] 小说《红岩》中的共产党员，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而叛变。

王荔蕻：“我尽量扛。”
东厂：“还老虎凳呢，不至于的。”
王荔蕻：“那你就记我‘不想说’。”（后来在笔录上签字时看到“涉及别人的我不想说。”）
东厂：“你们那天在地坛干吗？”
王荔蕻：“照相。”
东厂：“照相干吗？是不是想发到网上去？”
王荔蕻：“有可能。”
东厂：“什么叫‘有可能’？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王荔蕻：“我说、你记，你就记‘有可能’就行了呗。我觉得说‘有可能’就行了。”
东厂：“不行。要不就说是，要不就说不是。”
王荔蕻：“那——不是。”
东厂：“那你们那么多人在那儿喊口号、照相就是为了自己回家弄个相册看着玩？”
王荔蕻：“我们一般都用电子相册。”
东厂：“你别激动，咱们好好聊。”
王荔蕻：“没激动啊，有什么可激动的。”（后来看笔录上写着“我们就是想拍了照片自己看着玩。”）
东厂：“你对这事怎么认识的？你觉得做得对吗？”
王荔蕻：“我觉得没有违法。没有扰乱社会治安、没有影响交通秩序，你们是小题大做，你们过度执法。我要请律师，我要申请复议。”
东厂：“请律师跟拘留所说。”
王荔蕻：“拘留所说要跟你们说。”
东厂：“今天就到这吧，以后再聊。”
王荔蕻：“还聊？等出去再聊吧。”
东厂：“出去你不跟我们聊了。”
王荔蕻：“现在更没什么聊的。”

提审记三

预审：“你认识刘晓波吗？”
王荔蕻：“不认识。”
预审：“见过刘晓波吗？”
王荔蕻：“没有。”
预审：“那你搞出这么大动静来？”
王荔蕻：“高兴呗。”
预审：“有什么可高兴的？”
王荔蕻：“中国大陆第一个获诺奖的，当然高兴了。”
预审：“你知道还有一个获得诺奖的华人吗？”
王荔蕻：“好像没有了吧？”
预审：“我说的是华人。你知道那个华人是达赖吗？”
王荔蕻：“达赖喇嘛好像是印度护照吧？”
预审：“你知道达赖想分裂祖国，想西藏独立吗？这样的人也给了一个和平奖。”
王荔蕻：“我听说好像是 CCTV 说达赖喇嘛要独立，但是有人找出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没有说一句西藏要独立的话。”
预审：“你说他们（挪威诺奖评选委员会）让一个被政府判十一年的罪犯获诺奖，是不

是别有用心啊？”

王荔蕻：“我觉得你们思维定势就是这样，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说是别有用心。我觉得像刘晓波这样非常温和的，希望国家好的人，希望国家在转型时期不要流血的人，你们也判十一年，太过分了。”

预审：“你说转型，什么转型，转到哪里去？”

王荔蕻：“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啊，最近温总理在一个月内提了六次政治体制改革呢。你们可以上网看看啊。”

预审：“那能是一回事吗？”

王荔蕻：“怎么不是一回事啊，不都是希望祖国好吗？”

预审：“那邓小平还提政治体制改革呢，那谁谁还提政治体制改革呢……能是一回事吗？”

王荔蕻：“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刑事警察吗？不是在问治安案子吗？老问刘晓波干嘛？”

预审：“签字吧。”

提审记四

预审：“说说你这几天对问题的认识吧。”

王荔蕻：“什么认识？”

预审：“政府判你八天的认识啊。”

王荔蕻：“我没认识。”

预审：“你还不服？”

王荔蕻：“我当然不服。我很生气，我越呆火越大，我火大了去了。”

预审：“和着你这八天白呆了啊。”

王荔蕻：“没有白呆啊，我出去一定会申请复议的。”

预审：“你还觉得冤枉啊？”

王荔蕻：“当然了。”

预审：“你都觉得冤枉，那吴淦[50]呢？”

王荔蕻：“是啊，是啊！这么说你们也知道屠夫是冤枉的！我实在不明白，你们抓屠夫干什么！屠夫本来就没准备来，来了也没有干什么。照相也没有他，唱歌、喊口号都没有他，他就在旁边站着，你们可以看录像啊。我实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他？简直是匪夷所思。”

预审：“那你们在地坛又是喊口号，又是唱歌的，没错吗？”

王荔蕻：“我觉得没什么。我们不过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唱唱歌、喊喊口号，没有影响社会治安、没有影响交通。”

预审：“还没影响？你知道有多少人往那儿赶吗？”

王荔蕻：“有多少人往那赶，只是你们的预想。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能拿来做‘违法事实’吗？能凭着预设‘会怎么样’来判人有罪吗？”

预审：“那天是国庆假日上班第一天，下班的人很多……”

王荔蕻：“你一直在说可能会怎么样，但是没有怎么样啊。”

预审：“你还想怎么样啊！”

王荔蕻：“什么也没发生，屁大点的事儿，你们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你们总是以‘可能会怎么样’来决定怎么做，太过分了！你们就是过度执法。”

[50] 即前文所说的屠夫，维权人士，网名“超级低俗屠夫”。

监舍•号友

我所在的这个监房叫十四所，在东城拘留所的二层靠东边（如果我的方向感没错的话）。大约有四十平米，铁门进去，右手是由八张床（每张床大约九十公分宽，一米八或两米长）连体排列，组成一个大通铺，叫做“大板”；左边一进去先是一个玻璃隔断的卫生间，里面有一个蹲坑、一个水龙头，大小约七八平米。卫生间往里有一米的空地，再靠里面是四张床排列，叫做“小板”。中间的通道大约一米宽。每个铺位对应的墙上标着数字 1、2……，表示铺位的号数。一般来说，睡第一板，就是头板的犯人，是资格比较老的，可以帮着管教管理监室犯人的。不过十四所的头板是在走廊的窗户下面，风有点大，所以我们监舍的“头板”是睡在八号位置——最靠里面的铺位上。

十四所的头板叫春燕，老北京，在旗，好像是正黄旗。五十岁，肤白，轮廓透着年轻时的俏。因吸毒进来，但我未见传说中的毒瘾在她身上发作。晃着一米六五的身条儿，似乎是把监房一米宽的过道，一会当成 T 型台，一会当成王府井步行街。她自称十四岁就出来混，什么都见过。可能在更年期，老是燥得慌，囚服的尼龙搭扣粘不住，故经常敞怀，有时又会一边很认真地粘着扣子，一边说，没有帅哥值班，留着给自个儿。

春燕喜欢唱歌。不唱时声音就好听，开了歌喉好听得紧，沙哑、磁性、性感，像惠特尼 •休斯顿。她唱《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妈妈。我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不去看她谁去看她？我在这里受的苦啊，妈妈你可知道？吃的是凉馒头啊、喝的是白菜汤；含着眼泪啊，叫了一声爹和娘，点点滴滴辛酸的泪啊，洒在了我的心上……”第二段不一样的地方是“住的是大楼房啊，睡的是光板床。”通常她一个人哼哼，其他人都前前后后跟进来唱，管教听到也不管。歌悲了一些，人又背了一些，两个“一些”就管不住泪腺了……，沉默的泪水，沉默的囚室，很长时间，等谁打破。

春燕对我很尊重，还让其他人照顾我，每次盛饭先紧着我。吃完晚饭会有热水，有时热水够三个人洗澡，有时刚洗一个半人就没有了，春燕看我总是用凉水，便拿她自己的盆子接热水让我洗脚，如是者三，让我既感动又很不好意思。

这个春燕，是拿着“取保候审”的票在里面住着的。（怕对她的案子有影响，不说了，也许以后有机会再说她的故事）

十四所有一个年龄比我还大的人，叫王绍荣（抱歉，最后一个字有点没把握），一九五三年生人，家住西城区宫门口西岔五十一号，身份证号是 110102195302171138。她六九年曾到黑龙江兴凯湖兵团插过队。

王绍荣面庞精致，美丽痕迹仍在，五十七岁的人，没有发胖，岁月只是使她失去了曾经的挺拔。她说话温婉柔和，暖暖的似有春意，但说起“他们这样对待我是违法的”时，又钢钢的如金属之声。下午“坐板”时，夕阳有一瞬披在身上，她便很满足地笑着：“有太阳照着真幸福啊”。

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睡觉的时候有漫长的六个小时，她会把馒头撕碎，放在饭盆里，再撒一点方便面调料搅拌，说是“炒馒头”，然后把“炒馒头”，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吃掉，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把日子设法往精致里过的主。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管教才不理会犯人的坐姿，她才能难得的放松放松，把馒头当鲍鱼“伺候”，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

王绍荣信仰“法轮功”，平日在家经常被邻居和居委会窥探、骚扰。今年八月四日在她家附近被警察挡住，从包里搜出宣传法轮功的小册子，又到她家里搜出法轮功资料，警察说她“利用宗教破坏……”，于是，劳教两年。

抓她那天，她正病着，阑尾炎发作，去看守所之前，警察带她去医院（忘了是隆福医院还是福绥境医院了）检查身体，发现血项很高，医生让她住院，警察说不行，硬是把她送到了东城看守所。看守所检查身体后不收，又从看守所带回医院，医生说要打吊针，警察很执

着地把医生拉到一间屋子嘀咕，拿了几包药，然后又把她送回了看守所。她现在在拘留所等着被“下放”——送去劳教所。

我问，“你受得了吗？两年劳教!”

“受不了又能怎么样呢？扛吧。”

“我出去后要不要跟你家里说一声，送点钱？”

“不要连累家里了吧，我身上还有将近一千元钱呢。”

“可是！我听别的犯人说，到下面是很费钱的，没有钱，身体会很快垮掉。”

“是啊，到了劳教所要检查身体，而检查身体的钱（据说要将近两千元）是要自己付的。还要重新置办洗漱用品什么的，都得花钱。”

我告诉王绍荣，外面大家正在签名呼吁废除万恶的劳教制度。她礼貌地说：“那很好啊。”看得出，她对此并不抱希望。

琴儿，湖北人，嫁到北京，三十一岁，白领美女，披肩长发，眼睛大而妩媚，上嘴唇中间略略有点翘，很舒淇[51]。一次她被提审回来对我说，她碰到屠夫了，屠夫冲她笑呢（我跟她们描述过我“同案”的相貌，也给她们讲过邓玉娇的故事，以及屠夫在邓玉娇案子上的作用）。我哈哈大笑说：“屠夫最爱看美女”——谁不爱呢。

琴儿就职于一家著名房屋中介连锁机构，一聊工作就像刚充完电似的，看得出来她很敬业，收入也不错。因“溜冰”（吸食冰毒）被抓。据她说，那些天她压力很大、很郁闷，刚吸了一口就被抓住了，派出所也说是有人“点”了她。以前没有前科，第一次被处理就两年“强戒”[52]，她觉得太重了，提出复议，希望改为社区戒毒，哪怕天天验尿都可以。但她的预审对她说：“你申请复议就是想告我们啊？没用，不会改的，别捣乱了。”

吴妹，温州商人，圆脸，胖乎乎、红扑扑的，烫发，一头闪亮的黑色瀑布，让人误以为是二三十岁的人，其实都五十了。她走路轻轻慢慢的，像猫一样。她和丈夫在北京开一个印刷厂，某天其舅来京，让她去玩，到那里板凳还没坐热，警察进门，说他们赌博，她说我刚到没有参加。警察说如果你不承认可能要劳教，如果承认了，多大个事儿啊，一会儿就回家了。于是她说入了一百元，本想早点回家，结果被拘留十天，身上的五千多元当成赌资，都没收了。

菱，黑龙江人，清秀、水灵，鼻梁挺直，嘴唇薄，呈粉色，脸上透着掩不住的青春光彩。二十二岁，大专学历，专业是居室设计。本来准备过几个月结婚，却因动了好奇心去卖淫（是的，卖淫有很多原因，而这个姑娘既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性，而是因为抑制不住的好奇心!），被抓了现行。从宾馆房间到和平里派出所，一丝不挂，只披一被罩。做笔录时，给她照相，说留档，无奈忍了。但闪电般，门外冲进来十几个便服者，拿着照相机、DV 机，羞愤难当间问：“都是警察吗？”没有回答，只听一片拍照的咔嚓声。

菱从被抓现场到派出所，再到宣布劳教半年，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也不让穿衣服。那几天很冷，尤其夜里，她在派出所房间里吹着穿堂风，哆嗦得找不到魂儿。直到押至东城拘留所，换上囚服，才算结束了被罩下面的一丝不挂。问：“我已经承认了，笔录也做完了，为什么不让穿衣服？”没人理她。

十四所的所有人里，菱的思想压力最大，总是把头放在两个膝盖中间，悒悒。

王管儿，三十多岁，在洗脚屋谋生，个子不高，性格好，大家都爱跟她开玩笑。她说，那天四个姐妹在洗脚屋前台闲坐，突然警察冲进来把她们带到和什么里派出所，拳打脚踢，让她们承认卖淫，还给她们嘴上捂三层口罩，每层都涂上芥末油，连呛带憋，不是人受的罪。王管儿看到小姐妹们被打成那样非常害怕，于是招认有过“推油”。那几个咬牙坚持，死不承认的姐妹，最后都“滚”了，只有她被判一年劳教，罪名是“以手淫的方式卖淫”——多

[51] 香港女影星。
[52] 即强制戒毒。

有创意的罪名！

小甘，三十多岁，个头小，胸部丰满。放风时让她跟我一起跑步，她说没带胸罩，颠得太厉害，没法跑。贵州人，嫁江西，头胎女儿，没想到第二胎双胞胎——俩儿子。高兴归高兴，但养活孩子压力很大，要准备孩子将来上学的钱啊。于是小甘出来，因卖淫被抓。本来就没有钱，还劳教，劳教很费钱的（“俗话”说，家有万贯，养不起一个劳改犯）。她希望尽快被送下去（到劳教农场），到了那里就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了。

十二日那天，旋风般刮进来一位“孙二娘”，四十多岁，干瘦，脸上带着太阳的馈赠：黑。以为放下锄头刚从田里走出来，却是在北京站倒火车票的老江湖，干了十年了。问老江湖怎么被抓住了？大咧咧回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看模样听口音都以为是山东人，其实却是江苏的，和山东交界处的徐州。进来三次，和管教都老相识了，这次拘留五天。

大约十三日凌晨四点，同时进来四个女孩子，同案，因为发小广告（淫秽广告）被抓。好像都是九 0 后。她们刚到北京找不到工作，在类似“手递手”的网站（实在想不起那网站的名字了，好像带着一个“勤”字）看到招聘启事，就去应聘，工作就是到宾馆发小广告，刚进去还没来得及发就被抓了，拘留五天。号子里人都说那是个陷阱：招聘广告是陷阱；跟宾馆保安达成的协议是陷阱；内部人员出卖，警察迅速赶到也是陷阱。对于这些经历：挨饿、受骗、拘留……这些初涉都市的少女，会在心里留下怎样的创伤？将来，又会以何为生？

十四日，又进来两个“溜冰”的，其中一个是成功企业家，拥有数家连锁饮食公司。漂亮、时尚、前卫，目光飞扬，与周围环境形成巨大反差，令人有时空分裂之感。她们都是拘留五天。

据“溜冰”的号友说，所谓吸毒人员分这样几类，他们最看不起的是吸食海洛因的，因为这些人一旦瘾上来了，完全没有人格，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而“溜冰”就是吸食冰毒，这是一种化学合成物，据她们说是不上瘾的。白领、演艺界人士，因为压力大，还有打麻将连着几天不下台时偶尔为之的。但后来我在招待所被软禁时，“照顾”我的女警有一位原来是缉毒警察，她说冰毒一样戒不掉，对中枢神经的伤害可能更大。不过她也同意，吸食海洛因的人是最被看不起的。

十五日，蹭进来两个农妇打扮的人，茫然、瑟缩、无语，额上写着生活的艰辛。她们因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不恰当地炸麻花，被不恰当的人碰上，改变了生活的轨迹——拘留五天——自己被当成麻花拧巴了。

据同号的狱友说，在我来之前刚走了一个六十八岁老太，因在天安门广场卖地图被抓。号友们看“大票”（拘留通知书）上写着：“扰乱社会治安……物证一元”。就是说，这老太卖地图刚卖了一元钱，就被英勇神武的“淫民警察”依法捕获了。老太不懂得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敏感区，除了拥有者中南海，谁都不能碰的，哪怕你是一个老妪，哪怕你为了卖出一张只能赚几毛钱的地图。虽然我与她擦肩而过，却仿佛看到在那茫然、怆然的老脸上，镶嵌着这个国家沟沟壑壑皱纹里卡夫卡的文字。

看来东城警察很敬业，几乎每天都有送进来的，号友们说，警察抓人有指标。虽然以前也听说过，但在里面才真正看到，因指标被完成而不断把人送进来。由此想到，我们伟大的国家六十一年来有过多少指标被完成啊——反右、清查……而当自己也被指标网罗时（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感觉，很特别。

在十四所一面墙上涂写着各种留言：“出去后要大吃十天”“出去我要狂玩”“希望在哪里啊？”“十四所的姐妹们，加入 QQ 群啊……”——写字的“墨水”是卤鸡蛋的汁。

我也在墙上留了几行字：

“人，生而平等

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和墙上的其它文字比，我写的这几行有一点酸气，但我真的希望这些文字对看到的人有所裨益。

八天，在生命的长河中，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十月九日到十六日这八天对我来说，却刻骨铭心。

八天中结识的这些号友，我从未想到会在这里和她们的生命发生交汇。她们从不同的生活场景被命运、被欲望、被指标、被……带到"东拘""十四所"，这些卑微的人们，在艰难的日子里，小心翼翼呵护着自己残存的自尊的羽毛，不忘给他人以帮助，她们有的出去放风时牵着我的手，有的吃饭先给我盛，有的给我打洗脚水；因为我不参加值班，有的人就要值两个班，每班两小时，在半夜最困倦的时候爬起来，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没有怨言。还有号友跟我说，出去后或要以行动或以资助的方式参加"王荔蕻爱心志愿工作室"，做公益事业，让生命更有意义。

现在我出来了，回到大监狱，不知她们被洒落何处？愿这些卑微的，如蚁如蚊如尘埃的号友们好运！八天中，感受到她们各种爱和善良，我会珍藏。

无以为报，惟以此文记之。

黄雅玲，《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八0年代生于四川，现供职成都某房地产公司，NGO组织“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志愿者，自称“热衷于网络围观、签名、打酱油。”

秋日沪上花与茶

黄雅玲

补充一些话在前面：

这是我回忆二0一0年十月十二日去上海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挪威馆献花，以及之后“喝茶”经历的小文。前面部分不那么好玩，因为在“推特”[53]上直播了，我也没花太多精力写得很精彩。后面“喝茶”部分更加有趣。记录肯定有疏漏，写了很久才写完。你想啊，喝茶就喝了三个小时，写至少得大半天吧，又要接电源，又要开电脑，又要照着样儿一句句的写。

大概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我的名字叫黄雅玲，四川人，在成都工作。我在twitter上的ID是@leftry，另外还有一个喜欢使用的网名叫“温暖透明”。

去上海，是因为工作需要，公司派我出差，行程有两天时间，第一天的工作比较轻松，时间也可以自由安排，就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干脆去挪威馆献花吧。”

十月八日下午五点诺贝尔和平奖宣布颁奖的直播，我和推友[54]们一起看，一起欢呼，高兴得几乎流泪，对做出颁奖决定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充满敬佩，连带着也对挪威心怀感激。我想，去挪威馆献花的话，肯定能让挪威人知道我的谢意。

出差之前，我就已经发推[55]说我想去给挪威馆献花，得到了好几位推友的回复鼓励。十一日晚上到达上海，在宾馆住下之后，又在推上和推友讨论了第二天去献花的计划。

十二日一早起来，穿着带有twitter标志的Tee和卫衣（都是推友@digitalboy 店里的商品），还在包包上系了黄丝带，才出发去世博会场，一路的过程都发在了twitter上。从地铁下车后先去买了花（找了很久才在一个医院的附近找到花店，特别要求用黄色的丝带，因为店里没有，所以是用黄色纸带代替的），进入会场之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挪威馆的位置（我方向感很差，中间有一阵子好像还迷路了）。

到挪威馆之后，在花束里的卡片上正反两面分别写了“I love Norway！For Nobel peace prize For LiuXiaoBo！ via @leftry”和“言者无罪！释放刘晓波！”

然后找到挪威馆绿色通道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跟他说我想把花献给挪威，也许他有点听不太明白我的话，于是叫来一位女翻译跟我沟通，之后便有一位工作人员出来，示意我跟他到馆内去。我开心坏了，本来以为可能就是有人来收下我的花事情就算完了呢，没想到还让我进去了。

---

[53] 即Twitter，总部在美国的社交网站，近几年成为中国异议人士的交流平台。
[54] 指Twitter上的网友。
[55] 指在推特上发布消息。

进去之后就更开心了，他们跟我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馆长，然后就被好大的一只手握住了，其实好像好多人都跟我握手，现在也记不清楚了，反正一群像大树一样高大的人围着我，我结结巴巴的跟馆长说，我想把花送给挪威，为了感谢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先生。馆长先生又跟我握手，还说“Thank you.”并接过了花，然后翻看了花束里的卡片。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想和他，还有这花一起合影，于是就有了现在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之后似乎是馆长示意我可以参观挪威馆，我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又跟工作人员确认了一遍。

更开心的是合影完之后，那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生（就是照片上站我左边的那位，好多推友都说他非常帅啥的）又跟我握手道谢。

献花之后，工作人员把我从一个小通道带到了挪威馆的入口处，让我随便参观。旁边人来人往，几位音乐家在小小舞台上做演出准备，我则在兴奋中发呆，一时反应不过来该做啥好，然后在推上发推尖叫欢呼。我想，馆长先生和工作人员应该都明白我的来意了，然后又觉得有很多小遗憾。因为来之前，有推友在推上托我献花时帮他向挪威馆问好，但是我忘了，连自己来自推特也忘了说，此外还觉得自己各种不漂亮……脸色不好还好多痘痘。

挪威馆布置得很细致，我喜欢那些小小的人像木刻，正好还有音乐家在演出，演奏的应该是《神秘园》吧，非常美。之后还去丹麦馆看望了小美人鱼，其它的馆都只在外面张望了一下，大概快两点的时候离开了世博会场馆，回到宾馆可能三点多了。本来我打算把工作完成了才回宾馆，但是手机快没电了，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下雨从宾馆借了雨伞，结果很累赘，就想干脆回去充充电，把不需要的东西放回宾馆再去工作。

回到宾馆，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把照片发到推上。从早上出门，就一直在跟推友们交流，得到他们的很多鼓励，他们觉得照片上的两位先生非常帅，以至于我都后悔为什么没问清楚人家的名字。还有推友也说要去挪威馆献花，我当时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会不会人家觉得我们是为了不排队参观才去献花的呀，那样的话好丢脸哦。”（笑）

收拾好之后正准备出门，接到我上司打来的电话，问工作进度，我跟他老实说我去献花耽误了，不过今天的工作是可以完成的，他也觉得很有趣。

在外头完成工作之后，奖励自己去吃了很好吃的汤包才又回到宾馆，也许八点多吧，处理一些其它的工作，上推跟大家聊天，本来打算玩一会，然后准备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就休息了。在警察来之前，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去接又没有人说话，当时我还以为是酒店那种按摩服务什么的，如果男性去接，就会问要不要按摩，如果女性去接，就不说话的那种。我以前出差的时候接到过好几次这类电话啥的，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是警察确认我有没有回宾馆……我要是在外面玩晚一点回来，他们不是会等很久吗?

在说到被请“喝茶”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先说一些想法。在警察找上门来之前，我得到推友的很多赞扬，这些评价大部分是说我很有创意，献花这种行为很浪漫很美，也有一些是说我勇敢的。但对我来说这个“勇敢”是类似于“粉丝”[56]面对偶像时的那种勇敢，就好像去找豪斯医生或海盗船长要签名，合影留念那样。而我把献花经历发到推上，得到的反馈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大部分还是那些跟我比较熟的推友祝贺我成功献花。警察来找我之后，我的“勇敢”才升级的，而且我现在会得到这样多的关注，也是因为被警察找我这件事造成的，我后来跟朋友说，“其实是上海‘国保’在帮我打广告。”

---

[56] 即英文 fans 的谐音。

有人敲门的时候，我正在跟一个小游戏苦战，敲门的人说是酒店客房服务啥的，问他们到底要服务什么，说是来送矿泉水的，我说房间有矿泉水啊，他们说要再送两瓶，我说不要矿泉水请他们回去，才跟我说是派出所的（先鄙视一下），来找我了解情况请我配合。我要求看证件，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猫眼"上出示，我近视，而且走廊很黑，"猫眼"里啥都看不清楚，连人我都没看见（我太丢脸了），我说没看清楚。他们就在外头凶我，说的啥想不起来了，大概就是你不配合工作要传唤什么的。

我想该来的反正要来，还没喝过茶呢，于是在推上留言说派出所来敲门啦，然后关上电脑开门。当时还有点小兴奋，把以前推上看来的那些类似"'国保'来了怎么办"的指南迷迷糊糊在脑子里过了一下，然后还是有点担心，万一真把我带走了，或是抢走我的电脑了，明天工作怎么办。

堵在门口要看来人的证件，两个证件"唰"的一下晃过去，最过分的是两个人都用手指把名字那里挡住，这 TM 哪叫出示证件哦。我说还是没看清楚，可不可以再给我看一下，马上就又凶我，大概说的是我们来找你了解情况是客客气气的制服都没有穿传唤证马上就可以拿过来抓你去警察局赶紧让我们进去之类的话。

我说你说话慢一点，你有点口音我听不太明白，估计这句话有点伤他的心，凶得更厉害了，说，我说的普通话哪里有口音了还不老实点把你电脑带上赶紧出来。（我真是被他们搅晕了不是要进来吗怎么又要我出去啊，对这种混乱状态还是有点小害怕） 我说那好啊你们就进来吧，请进来坐我配合你们，我还有零食呢（我就进去坐下了，还顺手把矿泉水倒到电水壶里烧）。又觉得我伤害了他们一样，我们不吃零食我们不要进去坐这是你住的地方（原来他也知道哦）你跟我们出来到他们办公室去带上电脑和房卡。

我表示各种不愿意出去，他们则表示各种有办法收拾我，来来回回纠结了半天水都烧开了，我便把茶泡上端着茶杯，抱着电脑拿了房卡跟他们出去到那间办公室。

办公室真的好小，里面有个写字台，上头有台电脑，只有一张椅子，还堆了好多箱子。宾馆的工作人员（一直跟在两位"国保"身后，估计他也觉得很糊涂了吧）拿了椅子和坐凳过来，关上门。两个"国保"一开始指定我坐在靠墙一边我没同意，说那里太挤了，自己把椅子安到一个舒服的地方，旁边就是饮水机，坐下来。结果屋里的局面就是，带头的那个"国保"坐在最里面靠窗户，我坐在最开阔的地方，另外一个被我挤在门口，本来我想把他给挤到靠墙那里的，没有成功。我抱着杯子不停喝水，喝两口又倒新的喝两口又倒新的。

脸都没抹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你就回答我们的问题完了做个笔录就走。我说那你们是为什么来的呀。这俩又马上翻脸，你自己清楚得很还一点不老实你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再不配合……还没说完又被我打断，我真的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啊。两个人冷笑不相信，我则暗自在想莫非上海"国保"人力真的比成都充足，我这种小虾米在成都各种打酱油围观献花都干过，"认证茶"却是在上海喝的，莫非真是成都"国保"把我给惯出来的臭脾气还是成都"国保"不敬业还是各地"国保"喝茶标准不同，各种胡思乱想。

"国保"拿出一个单子我努力看是什么，貌似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我说想看看，不给我看，先跟我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但是要找你了解情况，对着单子问我叫啥名字推号是什么多大年龄在哪工作几时来的上海结婚了没有，我一一回答，然后便问我，你今天干嘛了？

我说我来上海出差啊。（以下 P 代表“熊猫”[57]，L 代表我，不完全是场景回放，顺序可能有点混乱，不过也差不太多）

P：“去世博会了吧？ ”

L：“去啦。”

P：“去哪个馆啦？”

L：“挪威，还有丹麦。别的馆人太多我就没去排队。”

P：“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L：“小美人鱼！”（我这还真不是胡搅，第一反应就是她，在全世界的光芒面前，她的美都不会逊色。）

P：“还有呢？”

L：“挪威馆的冰，还有《神秘园》。”

P：“神秘园？”（估计是无意识反问）

L：“哎呀《神秘园》你不知道啊巴拉巴拉巴拉……”被打断。

P：“我怎么不知道《神秘园》了没问你这个。”

P：“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特别值得你回味的？”

L：“啊！我看到挪威馆的馆长了！馆长好帅呀好像电影明星！”

P：“你都结婚了还看人家外国人长得帅”。（一股鄙视崇洋媚外女的酸气扑鼻而来。两个人自己还争起来，其中一个说这是我老公的问题他们不管）

L：（他们不管我要管）“看到长得帅的人欣赏一下不行啊，我老公也可以看外国美女漂亮啊，你看到漂亮美女不多看两眼啊。”（瞪着那个年轻的越说越急声音慢慢变高）

P：“我还没结婚呢当然可以看美女。”

P：“馆长怎么样了呢你知道我们问你什么配合点。”

L：“我给馆长献花了。”

P：“馆长呢？”

L：“收下了呀。”

P：“馆长叫什么名字？”

L：“不知道啊，哎呀就是啊我都没有问人家名字好后悔哦，你知不知道馆长的名字？”（被打断）

P：“我怎么知道馆长叫什么名字。”

P：“你献花馆长就收啊？”

L：“嗯，我长得漂亮呗。”

P：“你长得漂亮去找外国人过啊。”（估计又被我激怒了，或是想激怒我？忘了怎么回答的，反正是鄙视了他一下，反正话题差点又就此岔开）

P：“你献花说什么了？”

L：“我爱挪威，我把这花送给挪威。”

P：（各种不满意）“你为什么要送花给挪威？ ”

---

[57] “国保”与“国宝”谐音，而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故人们打趣地称呼“国保”警察为“熊猫”。

L：“我喜欢挪威啊。”

P：“喜欢挪威就要送花给挪威？”

L：“那还能怎么样呢？”

P：“为什么喜欢挪威？”

L：（深吸一口气，开始眼睛里冒星星）“你知不知道《挪威的森林》？”

P：“我又没去过挪威怎么知道他那里的森林什么样的。”

L：（又开始发急）“不是不是我是说那首歌嘛后来......”

P：（相当不耐烦了）“谁跟你扯《挪威的森林》我们要问你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我们也是工作你配合点我们也不想耽误你时间……”

L：（我真的打算配合他们了）“好的我不扯了配合你们，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到挪威馆去献花嘛，我现在坦诚的跟你们说一下，不过我有个要求，可以再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我真的不是胡搅蛮缠我打算跟你们好好说，但是在那之前我想知道你们的名字，刚才出示证件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清楚，要不然我跟你们握个手嘛握完手我就好好说。”

P：“这跟证件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不配合要不要我们去把传唤证拿来？”

L：“我没有不配合，就是需要一个仪式，话都在嘴边了但没有一个仪式说不出来，人家馆长都跟我握手了你们不跟我握手，人和人见面的时候不是要讲一个礼貌的吗握手又怎么了不就是打个招呼吗，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握手的嘛……”

P：“一开始你不配合。”

L：“谁让你们一开始那么凶的，好不好嘛握手嘛，握手完了我就慢慢讲。”

P：“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跟你握手的，谈完了做了记录自然会跟你握手。”

L：“哎呀我真的很想跟你们握手啊，我第一次有人找我来‘喝茶’，握个手纪念一下嘛。”

P：“什么‘喝茶’你不要看网上的那一套，我们是来找你了解情况。”

L：“那就是第一次有人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来找我说很多话，你看我每次出差都是我去求着人家跟我说话，握手嘛握手嘛。”

P：“你配合一点赶快回答问题。”

L：“那跟你们其中一位握手好不好？”

P：“不好你快说为什么到挪威馆献花。”

L：（喝水，嘟嘟囔囔说他们不懂礼貌）“因为诺贝尔和平奖。”

P：“和平奖怎么了？”

L：“高兴啊，你们不高兴吗？（又抬起头来盯着他们看）我想问的是和平奖发给中国人你们不高兴吗？”

P：“我们是工作说不上高兴不高兴，高兴就到挪威馆献花啊？”

L：“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

P：“你还知道刘晓波啊从哪里知道的？”

L：“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不是说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吗？”（其实我没有看过的……）

P：“哪里看到的人民日报不是现在的报纸吧多大你就看人民日报啦。”

L：“办公室桌上摊着的嘛。”

P：“小时候你就有办公室不是胡扯吗？”

L：“我又没说是我办公室，小孩不得上学吗老师办公室里摊着的我看见啦。”（我确实在跟他们胡扯）。

P：“看人民日报看二十多年？”

L：“啊呸啊谁看二十多年人民日报，不要吐死了。”

P：“看到刘晓波觉得是偶像是吧？”

L：“什么偶像啊那会觉得他够呛大麻烦了。”（其实那会我只对发生的事隐隐约约有点印象，真没看过人民日报也不知道刘晓波）

P：“光看人民日报知道刘晓波？”

L：“还有新闻联播啊，新闻联播不也说他了吗？”

P：“你怎么知道和平奖的？”

L：“发奖那天人家诺贝尔官网不是现场直播了吗，我看了直播知道的。”

P：“看了直播知道的那你为什么要到挪威馆去献花？”

L：“怎么又问回来了，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啊。”

P：“感谢发给刘晓波就去挪威馆献花啊你为什么要去献花？”

写到这里我记忆混乱了，反正我觉得是他们有一套想听到的答案，我只要没说出他们希望的答案来，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回答问题，但不是马上重新问，而是问几个问题绕开之后再绕回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明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不理解不认可不关我的事，而他们不问出来又不肯善罢甘休，所以就这样纠缠反复，其间我还斤斤计较的挑他们字眼，说他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

最终我的答案是：

我感激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是挪威的独立机构，但是正是因为有挪威这样的国家，所以有这样的机构产生（关于这一句话我跟两个警察纠缠了很久，他们记录为“只有”挪威这样的国家，“才有”和平奖委员会，但我坚持说这不是“只有”和“才有”的关系，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奖，只是不叫诺贝尔和平奖而已。他们两个表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挑字眼，不过还是在我的坚持下，把记录中的“只有”“才有”改成了“因为”“所以”）。

我觉得我的想法跟刘晓波先生的想法有共鸣的地方（这一句话也各种纠结，他们一开始写的是，我觉得刘晓波的想法跟我很接近，坚持了很久让他们把记录修改掉）。我去献花是遵从我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一开始我脱口而出的是“人总要有个是非判断的嘛”，他们也挑我字眼说“你除了是就是非啊？”我于是改成了“价值取向”）。我的价值取向就是，我们应该爱身边的人，关心周围的自然环境，关心下一代，让大家过得更好（一开始他们让我说“价值取向”，我说，我是认真跟你们说的，但我说了你们会说我乱扯，结果我这样说了之后他们果然说我乱扯，费好大劲他们才同意这是我的“价值取向”）。我去给挪威馆献花是为了让挪威人了解我的感激之情（他们又问我为什么要感谢挪威，貌似我还真的又把前面那一堆话重复了一遍）。

此外他们还精确的问了我献花的全过程，包括几点进的世博门几点到的挪威馆找了谁说了啥写了啥花是鲜花吧在世博里面买的还是外面买的看到谁之后等了几分钟照片怎么发到

网上的几点钟发的（关于发照片的时间我撒谎了，顺着他们的话说是晚上回去之后再发的）这样那样……

关于那天的献花大概就问了这些，然后又问我有没有在网上签过什么名字，我说有啊，那个新《红楼梦》我去签过禁播。警察又不高兴，谁问你《红楼梦》了。我说我签了《零八宪章》，他们相当满意的样子，含情脉脉的对视好像在说，看，果然是签过《零八宪章》的，又问什么时候签的，我说 0 九年初吧。他们说我签得够快的，我说哪里快了都几个月了我才签的。又问在哪里看到的《零八宪章》，我说是从梁文道的博客里（其实我是从饱醉豚@baozuitun 的博客看到的，虽然这人有时候有点讨厌，不过这个信息来源确实是从他那里），问在哪个网站签的我说想不起来了，那段时间那些网站一会有一会没有的谁知道哪个网站啊。警察问我在哪里看到《零八宪章》的时候，我反问说你看过没有，他说我当然看过，我就捧着杯子笑，笑得他很不爽，说，你文化高，你能看《零八宪章》我们不能看啊。我笑得更开心说，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多点人看好，你们看了就好。

又问我还签了什么，我说反对“躲猫猫”[58]啊“邓玉娇”啊我都签了，签了好多名呢我都想不起来了，哦还有就是呼吁释放因为庆祝和平奖被北京警方关起来的王荔蕻她们我也签了。他们听成了王力宏，又糊涂了，又费劲解释半天，记录的时候，他们也把王荔蕻的名字写错了，我说荔是荔枝的荔，蕻是那个很复杂的字我也不会写，比划半天他们还是没听明白，于是拿了张纸让我写，荔字我写对了，蕻字只写了草头和底下左边那一半就不会写了，我撺掇他们用宾馆的电脑来查字，最后其中一个掏出手机来找啊找找到了。

一开始问我推号是不是@ leftry，之后又问我怎么上推的，我说打开网页就上去了嘛。其中一个很不屑说你能上去推特呀我怎么上不去。我当时各种激动，凑到他面前问，那你怎么上推的你翻墙吗，你推特号多少你有没有 FO 我？他被我问得很不爽，表示不会告诉我他怎么上的推，还说他没有推特号只是上去看。

问完之后就开始做笔录，其中一个人写，另一个人就一会出去接个电话，一会又出去逛逛，结果他接的电话我什么都没有听清楚……写的那个人一边写，一边跟我确认，我就相对无聊一点，在屋里东看西看。又把我的个人情况问一遍，叫什么名字名字怎么写的户口在哪里住在哪里工作在哪里老公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班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来干什么要什么时候走为什么要住这家宾馆（我抱怨这家宾馆各种不舒服，房间小不隔音，厕所也小，他们再次觉得我过场[59]多，并咬定我是因为他们找上门来才觉得不舒服），后来又问我学校和专业，我说了之后他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校，我很窝火说，我们老师要是听到你这么说不要气死了。

中间还有个情节很好玩，靠窗的那个“国保”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抽烟，我一开始没注意，后来被问烦了突然注意到这个，就要他把烟掐了，他不肯，说抽完这根就不抽了。我于是坐立不安，站起来掀窗帘，他们说你不要把别人办公室搞坏了，我继续掀窗帘，于是他们把门打开一条缝透气，这时候我看到办公室里大柜子上写着“请勿吸烟”，便指给他们看，理直气壮的要求掐灭烟。他们说，你坐的地方看得到我们坐的地方看不到，我便气鼓鼓的说，

[58] 指中国监狱中一次犯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警察称犯人是玩一种“躲猫猫”的游戏而死的。被公众嘲讽为“躲猫猫”。

[59] 四川方言，太罗嗦的意思。

哦，原来脑袋后面有什么你们都不看的，还借人家的办公室呢，还在人家办公室里抽烟。他们便又给我扣帽子说我玩文字游戏，最后还是他把烟给掐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是他们跟我说《零八宪章》，说是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看好的也要看坏的也要看，我点头。然后又说你看刘晓波得奖了，他那个圈子里也态度不一的嘛。于是我马上追问什么叫“刘晓波那个圈子”他们又解释不清楚……后来又说什么刘晓波那个圈子里的人你都崇拜吧？我又反问这个圈子的定义，他们让我说我觉得谁是那个圈子里的人，我脱口而出：罗京！（晓波老师我是跟他们搅局我不是故意把你和罗京混到一起的，我为这么说向你道歉！）他们脸色很不好看的样子岔开了这个话题。

“国保”做记录的时候我不停地张望，一会看办公室白板上的进出货记录，一会玩窗台上的笔筒，然后又看着他笑，他被我笑烦了问我笑什么，我说我好久没写这么多字了，要是让我来写肯定手很痛。好像就是在说这个的时候，这两个人嘀咕说我蛮有趣的。不过就是我这个有趣的人，在检查笔录记录的时候各种字斟句酌，气得那个写字的人咬牙切齿的说，哼要是你是我老婆的话……我马上大叫，靠！！幸好不是哦！！！

检查笔录也各种不顺利，我看到第一页上面打印的那个“就＿＿＿＿＿＿＿＿案向你了解情况”那里是空白，就抓住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是这么问的必须改，你们明明说来找我了解情况根本就没有案子的事。他们各种不愿意改，说这就是个固定格式，后面有笔录写的是“向挪威馆献花一事”。我仍然坚持让他们把那句话给抄过来，他们又坚持不愿意抄，我就逼他们把那个空白的地方用斜线划掉，他们仍然不愿意，我说这种空白的地方都必须划掉的你们懂不懂规矩啊？他们就说我以前也做过笔录。我就奚落他们，靠！以为我没签过合同啊！合同不是法律文件啊！坚持许久之后他们终于按我的要求划掉了。

笔录一共密密麻麻四页纸，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而且是站着看，一边看一遍念，念到认不出来的字那里就卡住，自己猜，实在猜不出来才问他，这个做法也让他们很不爽，说你小声点，门开着缝呢，这样你的隐私都被别人听见了。我说，从小养成的习惯，不念出来就看不下去，他们只好把门关上了。

念完了笔录，各种不对的地方都让他们给改了，签名字的时候，要求每一张都得签名签日期。我先签@leftry，再签黄雅玲和日期，他们又气又笑，一个说只签姓名，一个则说哎呀算了随便她吧。

签完名，他们就要我开电脑看我拍的照片，还要看我发在推上的内容，我跳着脚说要上厕所（真的喝了好多水，不去不行了），上厕所的时候，发了那个报平安的推。

上完厕所，他们就说要么接办公室的网线，要么接我房间的网线，我自然就回了房间。开电脑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来的时候你磨蹭半天是不是该处理的东西都处理了，我说哪有的事，然后问他们要不要吃零食啥的，还问他们这个菱角要怎么吃，现在菱角多少钱一斤，他们继续相顾无言。然后就给他们看了我和挪威馆长先生，还有那位白衣先生的合影，并逼着他们说馆长先生很帅，问他们要不要删掉，他们说你不想删就不删嘛。

又要看我的推特，我开 IE 浏览器输“敏感词”[60]的网址很给力的打不开。检查网络，确实可以上网，我于是开始抱怨他们一来就害我上不了推了，非常悲悲切切的嘀咕着抱怨，一副马上要哭的样子。

[60] 指一种推特第三方客户端。

然后他们觉得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又交待我两点，我现在记得不确切了，好像一点是不要把个人的行为搞成公共的行为（我当时问来问去，没明白到底什么意思），还有一点大概是今天来找我的事不要说得太多（哎呀怎么样算太多，怎么样算不太多，这个好难判断哦……），完了又表示欢迎我来上海也欢迎我来世博会但是再也不想看到我了(我相信这是他们的真心话啥的……)。我理解的是，你这匹成都草泥马在成都当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是了，不要到我们上海来添麻烦。

最后，我还是硬逼着跟他们两个都握了手才放他们走，而且我还把他们其中一个的姓给叫错了，他很不爽。关于这两个人的名字，我很想说我是因为答应了他们所以不说，但是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姓，而且好像还有点记混了，我希望我能早日把他们连名带姓一起忘掉，这些信息不值得我去存储。

整个“喝茶”过程中，我越来越有种感觉就是是我一个人在围观他们两个，哈哈哈哈……

送走“国保”之后，我就欢快的回到了推上，而且发现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出名了。收到了好多关心我，@我的消息，翻了好多页才看完。那么多推友的名字我没法都记住，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注。说起来，我还真得感谢“国保”，不是他们的激活认证，我肯定收不到这么多关心的消息。而且更加让我高兴的是，以前的同学也在推上，看到照片之后认出我了，确定之后给我打来了电话夸我。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几乎就没有联系过，现在我又有了一种回到学校的感觉，童老师，杨老师，刘老师，我觉得我没有给你们丢脸。（鞠躬）

除了中文圈的推友之外，我也收到了日文推友的祝福，你们的真诚让我十分感动，谢谢你们！我还要特别谢谢推友@dongyingwenren，他把我“非法”献花前后的推文都细心的整理出来，还翻译成日文，你真的很体贴。（看这里→“在上海打酱油辛苦了！我把你‘非法献花’体验录收集（http://togetter.com/li/59135 ）然后译成日语了（http://t.co/LNTaJpV），对你的幽默和勇气，日本网民表示衷心敬意！”

我现在已经回到成都继续工作，跟以前一样忙碌，办公室的好多同事也知道了我去“非法”献花和接待警察的事情，他们中有一些人本来还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的始末，现在都被多多少少普及了啥的。他们对这次和平奖的颁奖看法不一，有一些人仍然觉得这事儿是挪威在跟中国捣蛋，是西方反华势力跟中国作对。不过，不论对和平奖看法如何，得知我经历的同事都表示上海警察的做法很夸张很莫名其妙（这个我不排除是本地人护短所致），而且有同事很仗义的说，要是他们再来骚扰你，你开门之前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让你的家人都知道你去什么地方了。

我现在仍然觉得去献花是一件很浪漫、很美好的事，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我也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什么事要让我产生“非法”献花之类的念头（我可是很容易就产生这类念头，反正献花又不会伤害谁，顶多被蜜蜂蛰一下）。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希望你们也能同样关心刘晓波，关心谭作人，关心赵连海，关心刘贤斌，关心黄琦，关心高智晟，关心胡佳……不仅关心他们这些不自由的人，也关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处境比我困难得多冰冷得多，他们都是非常高尚的人，值得我付出一束花，一杯“茶”的代价。

另外，我真的很希望能知道跟我合影的两位先生的名字，我想把你们的名字公布到推特上，也记在心里。

雨声，一九七０年代生于河南，某报社记者。

二０一０年十月八日，因参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庆祝活动，被警察传唤。本文所记述的殴打事件，可能与其参与诺贝尔和平奖庆祝活动有关。

莫名其妙被打记

雨 声

一、网络酒局

作为一名赌品甚好的人，我一直想早日了结那场网络赌局[61]。

原来打算周六把相关人员约齐吃顿饭，但周五喝多了，第二天起床太晚，就耽搁了。虽然周日起床仍然不早，但觉得再拖下去有损我的形象，就迷迷糊糊发了个推，请“债权人”和“债务人”与我联系，时间暂定晚七点，在鼓楼附近一家麻辣香锅。

之所以发推约人，也是懒人图方便，因为网络上跟我打赌的那几位网友的电话我都没记住。联系期间，推上有人谈到了风险问题，我突然意识到，目前正在召开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属于敏感期。不过又一想，我本非敏感人物，又是纯粹的请人吃饭，想必不会有什么风险，但谨慎起见，我仍然发了条推，希望有关部门不要“敏感过度误判情况”。

二０一０年十月十七日晚七时，饭局准时开始，陆陆续续来了九个人，几乎一半不上推特，分别为媒体朋友数人、律师朋友一人、网友若干，另有我一个同学。麻辣香锅上了两锅，白酒两瓶，啤酒若干。席间，天南海北穷聊，或谈国际国内形势，或谈名人逸事，或谈打牌趣闻。

正聊得过瘾，房东突然给我来电话，问我到底惹了什么麻烦，管片民警今天几次电话找他。我莫名其妙不知缘由，说正在吃饭，如果民警有事情，请他直接找我。挂了电话，想起网上“有风险”的提醒，我的心里有了阴影，趁朋友们继续高谈阔论，我开始左右观察。旁桌一位黑胖子独自靠墙而坐，眼光不时瞟向我们，过了一会，又来一人与他同桌，同样非常注意我们。

朋友们并不在意，我也没放在心上。心想，就算是有关部门监视，看到我们中没有敏感人物、更非反革命聚会，想必会放心的。

二、警讯重重

大约一个多小时，酒足饭饱，纷纷准备作鸟兽散。我那位同学在餐馆门前等跟他约好的人，其他人打算分头回家，另有两人阿陈、小楚说和我一起喝茶、打牌。

打牌地点起先约的是餐馆附近地安门外的避风塘，一群人走着去的路上，有朋友说刚才和黑胖子同桌的人在后面跟踪，马上有人笑他神经过敏。

正在争论，前面一辆出租车摇下玻璃，有人探出头来喊阿陈，是被叫来一起打牌的小胡。竟然如此凑巧，赶忙和阿陈、小楚钻进出租车。阿陈临时决定改变原定地点，到海淀南路的避风塘去打牌。我感觉他是为了离自己家近一些，不过对他的这一决定，我也没有意见。

[61] 赌刘晓波是否能获得二０一０年诺贝尔和平奖。

到了海淀南路避风塘，喝茶、“斗地主”[62]的时候，阿陈又提起话碴儿，他说，餐馆那个黑胖子的同桌确实在跟踪我们。于是我给饭后原地等人的同学打电话，想问问他是否看到什么情况，电话没人接，反复打，仍然没人接，我心里开始犯起嘀咕。

玩了一会儿，小楚先走了，剩下我和阿陈、小胡三人。

我仍然不时拨打同学的电话，听着无人接听的提示音，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大约十二点钟，我正准备再次拨打同学电话时，手机响了，无来电显示，接听时只听到自己的“喂喂”声，正奇怪呢，小胡说：“手机定位就是这样的，可以确认你的准确地址。”

我说：“不会吧，有关部门认为我这么重要？”

阿陈问：“还玩吗？”我犹疑不定。

小胡说：“算了，‘斗个小地主’万一被他们用赌博的名义收拾了，不值得。”还没讨论完，又一个无来电显示的电话打进来，依然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说：“不玩了。”抠出手机电池，三人收拾东西，小胡出门去厕所。

三、遭遇暴打

我站起身来，突听门外一阵嘈杂，刚走出去的小胡被推进门来，随后三四个便衣大汉涌进房间，用手指着我们高喊：“警察。不许动！”接着又有两三人冲了进来，其中一人亮了一下镶着警徽的皮夹，一边喊“警察！”一边推搡着我们大声喝斥：“身份证拿出来。”

虽然知道应该要求看看他们的警官证，但当时满屋大汉气势汹汹，我心已经虚了，马上非常配合地把身份证递了上去。听到阿陈说：“身份证没带。”

对方熟练地“啪啪”打开牌桌抽屉，一无所获。

有两个人围着我，其中一个拿着我的身份证，问：“你就是 XXX？”

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厉声命令：“双手抱头。趴下！”

我一听火了：“凭什么？你们到底是干嘛的？！”

那人一拳打到我脸上：“告诉你了，警察！”

我更不服了，高声叫：“警察怎么打人？你把警官证掏出来！”

他身后一人又挥拳打到我的头上：“你他妈不服啊？！”

这时，我的双手已经分别被对方抓住了，只能高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救命啊……”回答我的是更多的拳头，头、脸、胸、腹，纷纷中招。两个人各扳我一条胳膊使劲往上抬，其中一人一边抽我的皮带，一边用拳头打我的胸腹，另一人主要攻击我的头部，身后还有一人可能凑不到跟前，于是跳到旁边小桌子上，抬腿对着我的头和脸就是两脚，他的动作提醒了另一个人，那人也跳上桌子一起踢我的头。在被暴打并高喊救命的间隙，我心里奇怪了一下，避风塘的桌子看起来很单薄，其实质量不错嘛，能承受两个大汉的重量。

四、下手有分寸

头上脸上至少挨了七八脚，这时他们已经不用跳上桌子踢了，因为我被扭着胳膊弯下了腰，他们站在地上可以很方便地直接踢我的头和脸了。看着不同的鞋子在眼前飞舞，我发现一个共同点：都是运动鞋，没有一双皮鞋。

很快，我的双手被自己的皮带从后面绑紧，按坐在墙角，我也没力气喊了，大口喘着粗气。不时有人扇我一巴掌或踹我一脚：“让你他妈不服！”还有人一边拽着我的头往后面墙上撞，一边叫嚣：“你这样的傻逼弄死白弄！”

我看到，我的两个朋友已经被制服，分别抱头对着两个墙角。

---

[62] 一种扑克游戏。

打我最起劲的是一个带眼镜的家伙。他看我盯着他，伸手拧我的眼皮，拧完了左眼拧右眼："让你他妈瞪我！让你他妈瞪我！"

我仍然盯着他，发现自己还能说话："你们要不就打死我，否则我记住你了！"

他一脚踹到我脸上："记住我，别忘了！——记住我你想怎么样？"

我说："你们是警察，随便打人，执法犯法，违反了执法条例、警察法……"

"眼镜"不屑地说："警察法我比你懂，但我告诉你，不管用！"旁边一人又飞脚踢到我头上："现在就弄死你！""眼镜"又一抬脚，我本能地躲，谁知道他只是做做样子，收脚嘲笑我："你不是牛逼吗？你怎么躲呢！"

这时我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看似下手凶狠，其实很有分寸，否则五六个壮汉一起打我，我早被打烂了。

五、鼻子出血

我坐在墙角喘粗气。他们互相点烟，进进出出联络。房间里静默了三五分钟。

我忽然意识到什么，对"眼镜"笑道："不会吧，等车等这么长时间，你们组织也太不专业了。"

一脚结结实实踹到我胸口上，"眼镜"怒喝："你妈逼管得着吗？！"

随着门外有人说："来了来了。""眼镜"和另一人一边一个拽起我，将我拖出屋外。"眼镜"顺手拿了张报纸，一边拖着我走，一边揉成团儿。楼梯下到一半儿，"眼镜"命令我："把嘴张开！"

我问："干嘛？"

眼镜伸手把那团报纸往我嘴里塞。

我说："我不喊行吗？"

眼镜不为所动，勒着我的脖子，掐着我的下巴继续往我嘴里塞报纸，我咬紧牙关。看塞不进去，"眼镜"抬膝朝我腹部就是一下，同时挥手冲我面部就是几拳，其中一拳打在我鼻子上，我感觉"咔嚓"一下，一股暖流从鼻子里喷涌而出。

看实在塞不动，"眼镜"放弃了，把那团报纸捂在我口鼻处，从前面兜起我的套头衫蒙在我的头上，拖着我下了楼。

他们按着我的头把我塞进停在门口的车的后座，随后一边一人把我背缚的双手抬起来，命令我把头埋在自己的双腿间。

这时，套头衫已经从头上落下，报纸也掉了，我看到血一滴一滴流到车厢的地板上，流到自己的裤子上。

六、被提溜上楼

汽车开动了。

我的头几乎碰到了地板上，鼻血滴答，脑子却飞速旋转：他们会带我去哪里？是拖到某个地下室再打一顿，还是送到某个宾馆"双规"，或者像网上说的那样找个荒郊野地把我扔掉？如果扔掉我的话，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把我的手机和身份证比较讲规矩地放到附近？被扔掉的判断很快被我否定了，我又不是什么重要的敏感人物，他们没事揍我一顿扔掉，纯粹神经病嘛。

感觉汽车在颠簸的小路上开了很久，好像还过了一个铁道口，心里越来越悲观，干脆不想了，听天由命，却突然又想到，刚才他们兜起衣服蒙住我的头，不知是否可以列入传说中的"黑头套"。

终于，汽车停了下来。开车的应该是打我最狠的那个“眼镜”，他下车交涉一番，将车开进了一个院子。

由于蜷缩时间太久，我被拖下车后双腿发麻，几乎站立不住，两个人拖着我进到楼里。我瞟到大门前有“执法为民”的字样，知道这是一个公开的公安机关，我当时猜想这是北京某个郊县的派出所。

楼里面有穿制服的警察，但拖着我的还是原来的便衣，只听到有人喊着：“上三楼，上三楼。”一个人说：“让他自己走。”但我双腿弯曲无法站立，几乎脚不沾地的被提溜着上了二楼。

左边那人可能累了，把我往地上一顿：“自己走！”

我直接就往地上歪，嘴里嘟囔：“腿麻……”

他嘲笑我：“你不是牛逼吗？！怂了？”接着又把我提起来。

进入三楼一个大房间，中间摆着会议桌，他们把我靠墙放在了门口。有人把皮带松了松，我背绑着的双手拉开了一点距离。一张椅子推到我的面前：“坐下。”

七、十年专业

打我的那批人好像大部分都到了，他们也放松下来，互相喊着要烟抽。其中一人拿出一包黑色香烟，散过一遍后问我：“嗨，抽烟吗？”

虽然我是个大烟鬼，但没理他。他又问：“叫你呢，抽烟吗？”

我问：“什么烟啊？”

他说：“问这干嘛？”

我说：“你们的工资能抽起什么好烟？”

他激动起来，举起烟盒：“看清楚，‘三五’，十块钱一盒。”然后对另一人说：“他倒挺敏感，好像我们腐败似的。”

我说：“那倒不是。只是想知道你们做这样的脏活能赚多少钱。”

他顿了一下：“脏活……”然后不再理我。

鼻血稠稠地糊满了嘴和下巴，一条长鼻涕缓慢地垂落下来，我吐了口痰，都是鲜红的。

一个穿运动裤的壮汉拿张报纸要给我擦，我头一挣，躲开了。这个黑壮汉也是打我最狠的人之一，他说：“呦，还不服呢？”

我笑笑，说：“你们继续打嘛，肯定能打到我怕的。”其实这时候我心很虚，到了他们的窝里，会不会拿刑具收拾我？比如，传说中的用电棒电“小鸡鸡”——那时我怂不怂呢？

刚进来的一个打手听到我说的话，高声反驳：“谁打你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要胡说。”这话倒让我一愣。

他们这个进那个出的抽了会烟，“眼镜”走到我前面，靠着会议桌，冷冷地瞪着我。知道他想给我施加压力，我毫不示弱地反盯着他。

感觉过了很长时间，两眼酸疼，但我坚持不收回目光。又过了一会，他说：“你不行的，十年。”

我问：“什么？”

他说：“要练十年。”

我说：“哈，跟专业人士过招，败了也没什么。”

另一个刚进屋的家伙看我两眼瞪出了泪花，笑话说：“呦，哭了？你不是很牛逼吗！”

我笑笑：“不用讽刺我。在你们手里，被打出尿来也不丢人！”

八、我要投诉

一个人比较正式地站到我面前："XXX，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吗？"

我说："你们执法犯法，把我打成这样，我要投诉，我要求验伤，否则什么话都不回答！"

运动裤黑大汉说："你疯了？胡说什么呢，谁打你了？"

我四处看："这里有监控吗？你们连打我都不敢承认了？"

另一个家伙说："你今天喝了多少酒？还没醒呢！没人打你。"

再一个说："你妨碍执法！我们有两个同事被你打伤了，去医院验伤了。跟你打牌的那两个人很配合，什么事没有。"

我说："原来真有监控啊。"不再理他们。

他们继续挑逗我："XXX，你一河南人跑北京来干什么？"

另一个人说："好像是记者。"

再一人接过去："记者啊，怪不得这么牛逼呢。"

我不为所动，被逼急了只回答两句话："我要投诉。我要验伤。"

看没有效果，他们大部分都出去了，只剩运动裤黑大汉坐在旁边看着我。

我感觉很疲惫。

他问："要喝水吗？"我不理他。他又问了两次，我点了点头，他拿个杯子接了水放在会议桌上："有点烫，晾一下。"

过一会，他端起杯子："可以了。"

我把手从后面向上伸，嘟囔着说："把我解开，我自己来。"

他说："那不行，我喂你。"就着喝了一口，上下嘴唇都被粘在了纸杯上，拉开，是一个双面的血唇印，一条血丝融进水里。我摇摇头，示意不喝了。

这么呆了很长时间。我左顾右盼，从文件柜的资产标牌看出这里属于西城分局，开了那么长时间车，怎么才到西城区？然后就想再找找看，能否看出是在西城分局哪个派出所。运动裤黑大汉看我盯着墙上挂着的条例看，就说："你可以走近看。"我起身凑近看了看，没有落款。

九、黄头套

陆续有几个人进来，问是否抽烟喝水，又说只问几个问题就放我走。我的回答仍然是那两句："我要投诉。我要验伤。"

运动裤黑大汉说："你要投诉什么？跟我谈。"

我说："我要跟你上级谈。我不跟凶手谈。"

他暴怒起来，从会议桌上拿起一个黄色塑料袋套到我头上。

我从电影上看过这种刑讯方法，用塑料袋套在头上令人憋到窒息。不过这是个硬塑料袋，他也没有把下面系上，还留有呼吸的空隙。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了呼吸不畅，鼻子早就被血堵住了，只能用嘴一下一下地喘着粗气，满头大汗。

我努力盯着塑料袋，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迹，尽管字体是反着，而且是背面，我还是认出了"医学影像科"五个字。

渐渐地，意识有点飘忽，开始产生错觉，明明知道自己双手被绑在身后，却仿佛是在小腹前相握。我动动双手，互相挠挠，仍然感觉在前面。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碰碰我的头套："XXX，我们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问几个问题，否则就把你送到你该去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就点点头。"

迷迷糊糊中我仍在嘟囔："我要投诉。我要验伤。"

另一人大喝："你还验伤？我们两个同事，一个胳膊骨折，一个小拇指断裂，就凭这个，

就够刑拘你！”

再一人说：“和你打牌的两个人都承认了，没有警察打人，只有你抗拒执法——材料都在这里。”

十、凤凰新闻

看我没有反应，他们嚷嚷着：“给他换个地方。”

又有人架起我：“转弯”“这边转”“下楼梯”“转弯”“下楼梯”“抬脚”……

听到电视里播新闻的声音，很熟悉。

被架着坐下，黄头套被抽走，映入眼帘的是墙上“厂桥派出所”五个不锈钢大字。随后看到两名年老的保安，我明白，我被纳入正常的看管状态了。

其他人都出去了，两个老保安狐疑地看着我：“什么重要人物，要俩人看，还不许睡觉？”

我环顾屋内，发现这是一间更大的会议室，远处墙上挂着一个大液晶电视，原来正在播放凤凰卫视的新闻，因为远，看不清字幕。

我问：“现在几点了？”

一名保安看看手表：“三点半。”

一个矮个子便衣男人推门进来，看到我双手被绑在后面，说：“我给你解开，你可不许乱搞。”

心里嘀咕，“我什么时候乱搞了？”

他问：“这皮带是你的吧？”

我说：“是。”伸手去拿。

他没有给我，放到了桌子上：“先不给你系。”掏出一包烟：“抽烟吗？”我点点头，他给我点了一支，随后从兜里掏出一厚沓卫生纸，伸手到我面前。我以为他要擦我脸上的血迹，转头躲开。

他说：“看你怎么回事，满头大汗的，自己擦擦。”

我接过纸：“把你用塑料袋套头一个小时，你也会满头大汗。”

我问他：“你是这个派出所的？”

他含糊地说：“是”。

我说：“我要投诉。警察打人，虐待我……”

他说：“谁打你了？你情绪不要太激动。”

我说：“哦，你是他们一伙的。”

他又对我说，不要激动，应该理解警察，配合工作，等等。

我说：“你把他们弄来，我把他们打成这样，肯定理解配合。”

这时，又一个保安进屋，对两个老保安抱怨：“他妈这叫什么事儿！要我半个小时上来一趟，看着你们不让睡觉——那帮孙子倒一个个都睡了。”

一名老保安回答：“规矩多着呢，要眼睛不眨盯着，不能离远，他可以睡我们不能睡，上厕所得去一楼那间。”

我发现自己兜里还有已经揉得不成样子的两盒烟，就借了老保安的打火机，然后一边看凤凰卫视新闻，一边一支接一支续着烟抽，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

十一、你在什么单位

这个房间虽然大，但空调一直开着，倒也不冷。看看电视，和两名保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不停地抽烟、喝水。天亮前，把两个椅子拼起来躺着睡了会儿。

一名穿制服带眼镜的警察进来问我吃不吃早饭，我说吃，他就叫一名保安帮我打了份鸡蛋饼。

随后，那名矮个子便衣又来劝我接受问话。我说："只要投诉、验伤之后，问我什么我都认真回答。"

一上午几乎不再有警察进来，我倒跟两名保安聊熟了。一名保安是建筑公司的下岗职工，痛骂他们前领导任人唯亲，再骂现在派出所警察拿很多钱不干事，把保安不当人支使。

他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傻逼警察办错案了。他神秘地说，你别装了，肯定是政治上的事儿。我们谈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甚至知道美国压人民币升值："不仅美国，全世界都在跟中国作对。"

中午，又是那位穿制服带眼镜的警察进来问我吃什么，我说吃米饭。保安告诉我，他是这里的副所长，我的案子归市局管，跟派出所没关系。

我说我没烟了，正想找警察要，一名便衣黑胖子进来了，我一眼认出来，就是昨晚餐馆饭局时坐我们旁边监视那位。他对我说，别太激愤，平和一些配合他们的工作。我问他是不是领导，完成投诉验完伤什么都好说。他开始激动："你凭什么看我像领导？头大脖子粗，不是领导就是马夫，我就是马夫。"

午饭后，我闲着没事，就由保安押着去找他们，要烟抽、要投诉、要验伤。现在派出所好像只剩下矮个子和黑胖子两个便衣是市局管我案子的人。

下午五六点，我又找到他们呆的那个房间："我要打电话，向领导请假。"两人很兴奋："没问题，你是什么单位的？电话号码说一下，我们替你打。"

我看他们的神态，感到有点疑惑，就含糊地说："我在报社工作……"

"什么报社？"两人异口同声。

我倒诧异了："你们真的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随便打人抓人？！"

"你告诉我们不就行了嘛，我们帮你打电话。"

我愤然："我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调查吧。"

十二、独自验伤

负责我住处的管片民警来了，说向我了解了解情况，然后问我什么时候搬到现在的住处，是否办理了暂住证，等等。当他问到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时，我警觉起来："是那些家伙让你来问的吧？我不回答。"他讪讪地走了。

我继续喝水、抽烟、看电视，累了就躺椅子上眯一会儿。

下午六点左右，屋里涌进来一群人，有人指着我："你，起来吧，给你换地方。"

随后听到一个河南口音大声说："我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你，跟我走吧。"原来是河南省某地驻北京办事处的老林，跟老林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小伙子，凶狠地瞪着我。我知道，他们这是要把我送回原籍，瞪我这小子是在给我施加压力呢。

我拿起套我头的黄色塑料袋，说："我还有东西呢。"

老林说："你手机、身份证都在我这呢，还有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走。"

老林问："为什么？"

我说："他们把我打成这样，我要投诉他们，他们得给我个说法。"

老林作诧异状："他们打你了？"

我高声说："他们傻逼办错案抓错人了，让你们来擦屁股。我现在全身是伤，胸口疼得厉害，真有什么事，你负责吗？"

老林问会议室里的人："他说挨打了，你们谁打他了？"满屋子没人理他。他出来拉我：

“算了算了，你在这能讲什么理，先跟我走。”

我继续高声说：“傻逼警察办错案，把我打成这样，我要验伤，我要投诉！”

老林有点急：“你先跟我走。验伤、投诉，随你。”

“我都不知道他们名字。我要在这里盯着他们。”

纠缠了半天没有结果，最后还是跟老林坐着一辆河南牌照的警车离开了。老林把我的手机、身份证还给我：“你去哪儿验伤，我送你。”其实他也就说说，随便到了一个路边，他们就把我放下了。

我一边在附近找医院，一边打电话向昨天一起吃饭的几位了解情况：我的同学被威吓盘查了四个小时，两名牌友简单询问后就放回家了，其他人没有受到骚扰。

来到北大第一医院，我感觉自己满头是包、全身伤痕、鼻梁断裂、右胸骨折……看了外科又看五官科，X 光、CT，共拍了三张片子，可检查下来，竟然只是“软组织挫伤”，连个脑震荡都没有，令我十分感叹，警察打人真专业啊。

徐友渔，《零八宪章》签署人，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

长期研究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造反》、《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哲学》等著作。

有感于官方对《零八宪章》签署人的追查与压制，发表"我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负责"，二 00 九年三月，与莫少平、崔卫平一道，赴布拉格替刘晓波领取人权奖，二 0 一 0 年九月，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请求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二 0 一 0 年十月，与崔卫平等一道，发起知识界人士"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

抗　拒

徐友渔

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不喜欢与警察打交道。警察找上门来，一定意味着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不祥的事情，所以，中国警察的口头禅是："你没有事？没有事我们怎么会来找你呢？"确实，中国人早就养成了一种良民心态，认为警察的出现，提示了某种违法的事情业已发生。警察，不管有没有穿制服，都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可以玩弄小民于股掌之中。警察是日常生活中的恐怖因素，他们的到来要么表明大祸即将临头，要么让你的生活蒙上深沉的阴影，使你疑神疑鬼、自我折磨、心神不安。

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七 0 年——那时我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四川省安县，县公安局两个人来生产大队找到我，要与我谈话。一霎时，其他知青像枪响之后的麻雀散落在四周，紧张不安地窃窃私语，那两个人走后，同伴们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眼光闪烁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县城里的'农业学大寨'展览馆被人放火，公安局分析是知识青年干的，有人告诉他们，上个星期日兼赶场天[63]我去了县城，于是来调查，要我交代那一天的所有活动——去过县城的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我虽然交待得一清二楚，但不安和不祥的心情一直没有消除，谁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暗中会有多少双眼睛盯住我，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调查？我分明从几个同伴关切的眼神深处觉察到一丝喜悦，那时招工回城的风声已经出现，知青之间开始形成竞争关系，我"被公安人员找过"的传言飞快地散布开来，对有些人而言，我的这一层阴影不啻给他们的前景增添了几许光明。

大约从二 00 六年起，警察进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知道，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因为自己的思想、信念、文字、交往，警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一开始，我很愤怒，但到后来，就像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我生活中最讨厌、最丑恶的事实。虽然与警察打交道已经有五六年了，但面对这些人，甚至在他们离开后，我从来没有平静过。每次见面、交谈都是一次反抗，有时是用心应对，有时不客气的话冲口而出。和其他人比起来，我受到警察的对待可能是最不坏的，但内心受到的伤害绝不是最轻的。我从不放弃抗拒的努力和姿态，这是在捍卫我的尊严，捍卫正常的社会生活。

（一）

[63] 中国农村北方说赶集，四川说赶场。

二０一０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十五分，我走出社科院大楼的电梯，盘算着时间。捷克大使馆的文化活动六点开始，新任大使约我们早一点，即五点半到达使馆，先与他喝咖啡，再参加活动。还有十五分钟，正好够走到使馆。下午三点刚过，接到 JJ 的电话，说崔卫平已经被拦在派出所，不让去使馆赴会。其实上午就接到卫平的电话，说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对她发出警告，不许去使馆。我叫 JJ 尽快把消息告诉外界，并注意与我保持联系。接着，接到香港来的一个电话，问我此事，我证实了确有其事。再接着，接到卫平先生的电话，告诉我此事。又过了一阵，卫平本人从派出所给我打来电话。我给使馆秘书 M 女士打电话，告诉她崔教授肯定不能去使馆参加文化活动，请她转告大使。既然他们为了阻止卫平参加大使馆的活动在七八个小时前就对她采取行动，而我一直安然无恙，我想我去得成，完全没有被阻截的心理准备。

我一走出电梯，就被四个人围住，要我去院保卫部。我说我要先打个电话给家里，他们坚持到办公室去打，看来不想在大庭广众下引起喧嚷，我看他们坚持，而且估计确实打得成，同意了。院保卫部那里还有一个牌子，叫做“维稳办”[64]，我惊讶地第一次知道，社科院还有这样一个机构。

院里的人指着一个带头的介绍说，是“市局”的，问我要去哪里，我把情况说了，强调是参加文化活动，上半部分是画展，下半部分是音乐。其实活动内容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被他们监控的电子邮件说明了活动的详细内容。他们宣布：不让去。

我以前以为在这种场合会控制不住自己，会厉声斥责，但其实完全能控制住，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异常冷静。我想骂就骂，想谈就谈，不想谈就闭目养神，甚至决定不必在每一件事情上讲道理、占上风，对警察，讲道理根本没有用处，想说服他们完全是白费口舌。那个为首的警察姓杨，身体壮实，脸上有横肉，人很凶，明明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还不肯采取陪笑脸的策略，企图与我争个输赢。他看我在谈话中宣称“一切透明”，想一点一点地掏我的话，谈出如何组织关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签名一事，我当然不谈，他用我的话“无事不可对人说”来激我。我说，我固然没有任何可隐瞒的，但事实证明，你们会歪曲人们说的话，利用这些话做成陷害人的证词，我当然什么也不说。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捷克使馆的 M 女士电话打到我的手机，我用英语把情况详细说了，请她转告大使。协助警察行动的社科院“维稳办”的一个年轻人大概能听懂几句英语，以为可以捞到几根稻草，指责我与外国人有联系，不爱国，等等。我正气不打一处来，这家伙敢往枪口上撞，我就大发雷霆，训了他一通，我最后说：“你们毫无理由地阻止公民的正常活动，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夺公民的自由，他们干了这么赤裸裸的非法的事，还有脸给我谈什么‘爱国、守法’，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这小子一句话也没有回，在往后的时间老实多了。

过了六点，这帮人要吃饭，他们要我跟着一道出去，进饭馆。我坚决不去，他们买回来一些盒饭，再三邀我吃，我坚决拒绝了。我宣布，我的饭必须回家吃，扣我三天，我就三天之后吃。我确实是作了这样的准备，下了这样的决心。如果我同意跟他们一道出去进饭馆，他们一定会趁机胡吃海喝一顿，反正都算在我这个“项目”上，这次，这帮人只能在办公室里吃盒饭，啃炸鸡腿，兴致明显不高，我的拒绝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是实质性的，想到这点我心中略微泛起一丝快意。

这帮家伙一定要和我说话，我怕谈政治会忍不住骂人，主动谈旅游，结果谈得十分投入。那个市局的杨姓警察附和谈了一阵，看我掌控了局面，就不干了。后来我懒得谈，闭目养神，他们说什么，挑起什么话题我都不应。再后来，我想抓紧时间看点东西，把提包里装的一大堆学术刊物翻出来，逐本浏览。

八点三十八分，扣押结束，估计是使馆那边的活动完了，离开维稳办，坐警察的车回

[64] 即“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属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从中央到省、市、县、街道各级均有设立。主要针对政治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访民等。

家，我坚持要自己回去，他们不干。我提到要把今晚的故事写出来，院里的人显得有些害怕，不断劝："没有什么好写的，何必呢！"

那个警察则表示他才不怕呢，我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都不顾忌的。"

路上，那警察说希望我今后不要做……，说不下去，我接住说："不要做你们不高兴，不准做的事，而不是违法的事"，他想辩解，说凡是与刘晓波或诺贝尔和平奖有关的事情都是绝对不许做的。我不与他纠缠，没问凭什么不许，只是追问他为什么连使馆的文化活动都不准参加，这与刘晓波和诺奖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说原因"你自己心里明白"，我一听这话就冒火，说："这是你们警察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的口头禅，我就是不明白。警察凡是无理拘禁公民，根本讲不出道理时总是说别人'自己知道'，'心里明白'，这是天下最不要脸的道理。"。"不要脸"这几个字看来把这杨警察激怒了，他凶狠地吼叫起来。我本来可以与他争论，告诉他为什么这是"天下最不要脸的道理"，但想一想，算了。他可以在对我大叫大吼中宣泄怒气，那还不如让他把火窝在心中，慢慢品味、消化。

回家后，首先给卫平打个电话，告知刚进门。然后吃饭。

第二天，我发了一封信给崔卫平，以下是信的全文。

他们是在疯狂报复

卫平：

我从昨天下午五点十五分到八点三十八分被北京市公安局（自称）警察和社科院保卫局人员扣押在院维稳办，一直到现在，都在想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阻止我们去捷克大使馆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只好用我一直爱用的，昨天对警察说的"毫无必要的横暴"来解释。但是我现在找到一个原因，你看是否合理。

首先，警察对我们要去捷克使馆参加文化活动，以及活动的内容非常了解，他们监控我与使馆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另外，我在抗议他们的扣押时，解释这是纯粹的文化活动，上半段是画展，下半段是音乐会，还会邀请不少其他客人。而且正如你对警察说的，我们是捷克大使馆的客人，扣押我们会造成国际关系问题。

警察警告我，不得参加与刘晓波有关的活动，我当然严词拒绝，同时也抓住机会反问：那我们去捷克使馆参加文化活动，与刘晓波毫无关系，为什么要非法禁止，警察无言以对。

我认为，昨天对我们两人的扣押纯属对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丧失理智的疯狂报复。

首先是报复我们。在扣押期间我明显感觉到，对于我们那份"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他们是极端地怀恨在心。当我说自己是组织者（并且是唯一的组织者）时，警察竭尽全力想掏出组织过程的细节，这当然是徒劳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报复捷克，我想一有机会，他们还会报复挪威，而且更加疯狂。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一直在国际社会大声疾呼，抗议逮捕刘晓波，呼吁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还有其他知名人士与哈维尔一道签名。现在看来，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归罪于国际和国内的人士。他们当然也不去分别政府、国家与相关的民间组织和民间人士，所以捷克是他们重点报复和打击对象。

我们不但是捷克使馆的客人，而且是捷克新任驻华大使的客人，明知是与政治、敏感话题无关的文化活动，把客人扣押，当然是做脸色给主人看，不但非法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权利（这对他们是家常便饭），而且会引起另一个国家的不满和不快，这一点，一般情况下政府是不会轻率从事的，这么做了，就是经过考虑，就是有意为之。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很多没有教养的粗人的行为方式：用欺压客人的办法侮辱主人或发泄其不满。

我与中国一些官方人士、官方媒体的驻外记者接触过，他们与以前虚伪宣称的“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度完全不同了，除了不敢惹美国，对其他国家都瞧不起，以为随时可以使脸色，对欧洲的大国都是这种态度，何况在他们眼中的小国。对于这次刘晓波获诺奖，他们对有关的欧洲国家一定是非常怀恨与恼怒，心中想的大概是“竟敢与老子作对！”

我们的获释时间，正是他们估计大使馆活动结束的时间，他们要确保我们不参加，哪怕迟到，甚至赶个结尾也不行。他们要用这个赤裸裸地含有警告和侮慢的方式给捷克新任驻华大使一个下马威，他们要用这种蛮横的态度告诉欧洲的一些国家：“得罪我，有你们好受的！”在昨晚与警察交谈中我知道，他们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蛮横行为会给中国的声誉造成多糟糕的影响，中国的形象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外的、野蛮的国度，虽然好些领导人和官员西装领带弄得极其昂贵漂亮。

我对昨天的事件不仅愤慨，而且失望。我宁愿有一个为了维护一党私利而精于盘算的统治集团，而不想他们是毫无理智的，动辄乱来的法外恶人，他们的行为具有作恶不考虑成本的黑社会特征。仅仅为了让他们进化这一小步，我们不知要做多久的努力，吃多少苦头。

祝

安好！

友渔　二０一０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

这封信加了标题，当然是为了发布。除了给卫平，我还给了一些使馆和媒体，不言而喻，也等于是给了警察，包括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警察。

（二）

那个姓杨的警察显然不是个善茬，他明明在侵害公民的自由权利，却要说自己在执法，有道理。这种恬不知耻的态度有时会激发我的斗志，我寸步不让地与他争辩，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回合中占到上风。听朋友说，一般警察在执行任务时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私下向当事人表示，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吃一口饭而已，希望当事人理解配合，大家都过得去。还有的警察甚至表示佩服当事人的人格，请求对方理解自己的苦衷。不管这种态度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实际上让警察轻松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既然他们是一定会达到目的的，这种态度让双方都有台阶下，还是比较明智。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一定的范围和条件，前提是已经确定警察不会抓人和打人，不然，警察何苦陪小心？在二00八年之后我听说的许多事例中，警察是蛮横粗暴的，他们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对待女性也如此，完全没有策略一说。

不过，我与杨姓警察打交道的时间不长，后来换了其他人，也不知道原因是不是他与我打交道不顺利。

记得是在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八日下午，杨姓警察打电话到我家中，说要见面谈一谈，我说就在电话里谈好了，他坚持不干，我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只好勉强答应，正要商量时间，他说自己其实已经在我的楼下，于是他和另一个年轻的警察两分钟不到进了我的家门。

这次集中到一个话题，就是十月十四日由我、崔卫平等发起，一百多位各界人士首批连署发表的“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我们支持和赞扬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决定，呼吁中国当局以理性和现实的态度对待刘晓波获奖一事，兑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杨姓警察详详细细地盘问声明出台的经过，谁发起、谁起草、谁联系联署人、谁发布的，等等。我当然不会如实相告，只是按预先的约定，说发起组织者就是我一人，由

我负全部责任。

杨姓警察挖根刨底地讯问，叫那个年轻的警察拿出纸和笔做记录。对于警察要做笔录，我已有心理准备，在前两天，他们已经对崔卫平这样做过了。我们由此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他们似乎是在当成一件案子在办，目前正在走收集证词证言的程序。我还明白，现在对我正在做的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酝酿、起草、发布声明时没有，也做不到秘密行动，而警察的监控从来没有停止，我们的商量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三天，电话、电子邮件等联系一直在密集地进行，整个过程，每个人的作用警察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想他们也懒得弄清楚具体的真实情况，只要有人承担责任就够了。

杨警察盘问我时露出心满意足的神色，似乎他自己也感觉到正把一张细密的网向我撒过来，而那个年轻的警察笔下刷刷地记得很用心，我心中一阵冷笑："使劲记吧，没有用的！"

询问完毕，杨警察叫年轻警察把那几页纸递给我，要我好好读一遍，如记录有误可以改正，然后签名。我把早就准备好的话抛过去："我不看，也不签名。"

杨警察完全没有料到我来这一手，他很吃惊，也很生气，他问为什么，还攻击我自己说的话都不敢承认。

我悠然地回答他：我对自己做过、说过的，都负责任，都承认，因为我在做和说的时候想到了法律，一定在它之内而不要触犯，所以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也不担心记录有误。但是，我知道完全有这样的可能，你们把这份记录中我说的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按自己的意图解释，变成诬陷我或者其他人的法律上的证词。你们在对刘晓波的判决书中就是这么做的。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列举了十多项证词，包括刘晓波妻子刘霞和他的一些好朋友说的话，用来支持对于刘晓波的指控。我看到这些话马上就明白，这些都是一般性的事实陈述，而不是对于违法活动的指陈，本来就没有想到要隐瞒和否认的，但它们也一定不是在明知官方要收罗诬陷晓波的证词时出于配合作出的，而是官方以欺骗手段，利用人们光明磊落的"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心态在其他场合得到而移作他用。我知道几个朋友对此的抱怨，并亲自听到刘霞气愤地谈到事情的经过。对于少数知道事实真相或者有分析头脑的人来说，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书中那些移花接木的证词不说明任何问题，但对于多数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会或多或少产生"官方似乎还是有一些证据"或者"怎么刘晓波的亲友都揭发他？"的印象。

我坚信，我的言论和行动绝对是说得清楚的，但是，我决不当被警察利用、陷害的"老实人"。你们可以干掉我，但你们休想让我先挖一个坑，然后一脚把我踹进去！

杨警察看来对北京市一中院判决书的事很熟，他嘟嘟囔囔地说，那些人本来就是说了那些话的嘛，后来在判决书上作为证词公布出来，受到指责，引起议论，感到受不了，又说另外的话，又想否认。我了解晓波的那些朋友，我知道他们太坚信自己和晓波的光明磊落，他们不是懊悔说了老实话，而是震惊于司法当局的无耻。我只是做出一脸冷笑听他说，懒得反驳。

杨警察好说歹说、软话硬话，我则是一口回绝："不看，不签名！"他们只得悻悻离去。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碰到过这个警察。

后来和我打交道的警察一个姓郝，一个姓贾，自我介绍说是"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的。好像从这两个人起，他们的分工包干就比较固定，没有其他警察来找我。两个人中，一般是贾警察出面，只有在二０一０年十二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挪威奥斯陆颁奖的时候，他们把我从家里带到北京郊区昌平县一个住处，作为副处长的郝警官才上阵执行任务。

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第四条，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应主动出示警察证表明身份，但与我打交道的警察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批、多少人，从来没有人向我出示过他们的证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把国家的法律、规定

放在眼里。

（三）

与警察打交道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大概始于二00六年。在这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我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干预和压制，是通过社科院或哲学所的领导施压进行的。最紧张和严重的对峙发生在二00四年，那一年是“六·四”事件发生十五周年，五月份，刘晓波组织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允许重新讨论“六·四”事件，我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也许在官方的眼里，这是第一次像我这样的“体制内学者”和像刘晓波这样的“民运份子”共同行动，引起了高度重视，哲学所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紧接着，书记、所长、副所长三人一道赶到我家里，要求我撤销签名，我当然严词拒绝。最后是副院长会同社科院监察局局长等人约见，我事前估计是要宣布开除的决定，并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以严厉宣布“下不为例”，而我明确表示拒绝承诺“今后不再参与”为结束。

大约从二00六年二月下旬开始，每年所谓“两会”前警察上门打招呼，就成了惯例。这种打招呼行动对我个人而言表面上是很温和的，就是警察上门，东拉西扯，问问“这一向干些什么”，假装漫不经心地提到“就要开两会了，注意一点”，等等。这其实是对人的尊严，对公民权利的赤裸裸的侵犯。

经历过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那时有一个规定或惯例，每临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国家大事，警察（在农村则是党的书记、民兵队长或其他显示“专政力量”的人物）就会把他们所管辖地区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召集起来训话，告诫他们“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厉害的”，“别妄想在节庆的日子搞鬼!”这个传统大概终止于八十年代初，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现在，警察居然把早就过时并且废弃了的作法——特定日子对“坏蛋”和“危险分子”打招呼、发警告——又用到知识分子身上，这怎么不令人气愤？

这样做的荒谬与可笑还在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所谓“两会”，那么它们应该是这样的时候，比平时更加让人想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行使公民权的自由是得到宪法保障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公民身份的神圣感或尊严感，那么警察在这个时候的故意出现就是对这种感觉的亵渎。当人们仅仅因为表达了独立的政治见解就要被警察的阴影笼罩，就要被视为不良分子、潜在的威胁社会的人，那么警察贬损和侮辱的不仅是个人，更是对宪法的嘲弄，是在毒化社会空气。

当自称“丰台分局”的警察突然给我来电话，说因为两会即将召开而要到我家里来“谈一谈”时，我本能地拒绝。警察找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借口，说他们要了解自己辖区居民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我立即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应该对我们小区的每一户业主都要走访，而不是专门对我，你是这么干的吗？”他说是，他以为可以随便说。等他下一次又来找我时，我告诉他，我问了住同一栋楼的好几家住户，没有一家在相同时间段得到警察的关照，我严厉谴责他撒谎，狠狠地训斥他，弄得他极为狼狈。

丰台警察对我采取的策略是无赖式的死缠，他们从不说强硬的话，就是厚着脸皮要见、要谈，而且要在他们选定的时间。其中为首的一个姓杨，要我叫他“小杨”，但我从不使用这种昵称。他知道自己打交道的对象是教授，于是想装斯文、装好求学问，妄图制造出共同点以便有话可说。他要我把自己写的学术文章给他看，让他“学习学习”。有一次，说到过几天我会去北京大学作一个讲座，他表示他也想去听听，他“很感兴趣”，他以为我会对他产生谦虚好学的好印象，而且，他到听众中去凑个数会提升我的虚荣心。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我的讲座是给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做的，他离听懂还有相当距离。我还告诉他，别以为

在我面前装学生的样子是在抬举我，其实是在抬举他自己，因为，凭他的学历或学识，肯定没有资格做我的学生。

我这么做是想挫败他套近乎的努力。平时，我很讨厌讲究学历等级，更不会摆教授架子，但现在，对于他的说假话与伪装，我只好搬弄这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来把他推得离我远一些。在真正的读书人圈子里，我的这些话是很伤人自尊心的，我也在想，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但我最后发现，警察对于这些挖苦根本没有反应，他们原本就听不懂，用这种办法来拒绝他们根本无效。

我相信，和我打交道的警察是因为上级的指示才竭力做出谦恭姿态的，但这些人本来缺乏教养，而且在中国，警察这个职业赋予了他们超越法律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就会养成为所欲为的习性，他们习惯于老百姓怕他们、服从他们，要他们真正尊重人是很困难的。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警察来敲门了，是一向来我家的杨警察和另外一人。姓杨的做出惯常的满脸堆笑，说要进屋来和我聊一聊。我双手叉腰，把他们挡在门外，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预约，我告诉他们，今天是周末，一家人好不容易有个聚会的时间，警察周末找上门来，不但挤占了我们一家人难得的团聚，而且会破坏气氛。我还告诉他，我儿子回家看父母，都会事先打好几次电话，第一次是提前三四天，问我们最近是不是很忙，如果不是，约周末回家，然后，在临回家前还要打一两次电话，说定回家的具体时间，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忙，日程安排十分紧凑。我对警察说，连儿子回家都是如此，你们警察这么想来就来，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那怎么行！

他们坚持要聊一聊，我坚决挡在门口不让进。杨警察压低嗓子说："我们不要在门外大声嚷嚷好不好，让邻居听见，影响不好。"我明白这话的威胁和敲诈意味。一般而言，中国老百姓怕警察找到自己，万一不得不与警察打交道，会尽力避免让单位、朋友、邻居知道，以免有"遇上麻烦了"的嫌疑。所以，二0一0年底警察去找我妻子时，为了向她示好，强调他们很为她着想，没有告诉她的领导，也没有把谈话点定在她的单位。我明白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不愿意让邻居知道警察上门，你就不要在门口与我们争执，快让我们进屋去得了。"但我不吃这一套，相反，我扯着嗓子，对着楼道更大声地嚷，我恨不得让整栋楼的人都知道我正在和警察吵架，我才不怕呢，如果邻居来围观，我会吼得更厉害。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软肋，警察休想要挟我！

平心而论，这两个警察不是蛮横刁钻之徒，也没有要压制、为难我的意思。只不过他们在中国干警察久了，平时是说一不二，没有人敢惹，没有想到要遵守法纪，尊重别人，他们身上的毛病和坏习气，是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知不觉养成的，很有可能，他们并没有自觉到，"别让人知道警察来了"貌似体贴，其实具有威胁的含义，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的人。

我发觉，与当代中国普遍的社会风气相适应，中国警察身上的痞子气很重，与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的警察典型——威严的沙威先生大不一样，他们不是法律——哪怕是压迫者的法律——的化身，而更像无赖，毫不自信、自重，甚至不在自己的压制对象面前掩饰低下的欲望和行为，既贪便宜，又色厉内荏。我经常回想起一次经历。

二00六年六月一日，我乘中国民航CA933航班，由北京飞巴黎。

经过边防检查时，警察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搜查我的背包，在放行时，我发现包里的一本《亚洲周刊》没有了。我大声索要我的杂志，警察说是没收海外出版物，我问，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又是凭什么理由？他们根本回答不出来，只是重复就是要没收，我不依，这样一路争论，闹到了边防检查负责人的那个柜台。队长很凶，说依照的是公安部的命令，我说，这就怪了，我在这里呆了不到二十分钟，你们哪来得及去请示公安部？旁边一个年轻警察涎着脸说："怎么不可能？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嘛！"

我决心抗争到底，我说杂志属于我的私人财产，你们没收可以，我配合，但必须给我一

个收据。队长完全不讲道理地说，就是要没收，就是不给收据。我质问他，如果没收有法律依据，怎么不能给我收据？你们怕什么？我故意大声争执，引起中外过关人士的注意，我还宣称要上告，要诉诸全世界的舆论。这一招见效了，队长马上把杂志退还给我。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杂志，而是要和他们较劲，我说："刚才你不是说公安部要你们没收这本杂志吗？现在怎么不执行上级命令了呢？我很愿意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宁愿你们没收，但不开收据是不行的。"这帮家伙真是恼怒得不行，尤其是我那平静、揶揄的口气。他们凶狠地叫我快走，那个队长最后恶狠狠地说："你自己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对你！"我不想示弱，回应说："你们工作得太好了，我可以让你们的上级知道，也可以让全世界知道。"这是无数次中的一次，警察在完全无理的时候就说"你自己明白"。边检人员偷我的杂志，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想看，而不是检出了按他们的恶法说来的违禁品，因为，查禁海外书报是挡住由外到内，而我是带出边境。

（四）

二0一一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姓贾的警察又来我家，问我海外媒体约请我写文章的事。

前一天接到香港一家刊物编辑的邮件，约写关于艾未未的文章，重点放在对他本人的认识和交往，我答复说："艾未未的事，我很关切也有自己的立场。但我不认识他，关于他本人说不出什么，对于他的非法抓捕除了愤慨也写不出什么深入分析的东西。我想对这件事就不发表文章了。"同一天还接到英国 BBC 一位编辑的邮件，约写时评。

我分析，他们在继续执行我称之为的"零距离接触"策略：他们想要告诉我，"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你必须考虑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他们以"保持沟通"的名义企图造成这样一个局面：我的言行是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我需要随时得知警方对我言行的评价，其逻辑后果就是，我必须接受他们的同意或禁止。

上一次（三月二十五日），姓贾的警察来，是谈"茉莉花革命"集会问题，其间还说，最近一次我们去捷克使馆，他们放行了，我去日本，他们又放行了，可见他们是支持正常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希望我由此看出他们的善意，与他们积极配合、沟通。这真是霸道和无耻的逻辑：在他们无数次非法剥夺公民正当权利的行为之余，如果出现一两次没有剥夺的情况，就是宽大为怀，就需要感恩，就要对警察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我绝不接受这样的格局，我绝不想让他们以为，我的言行被他们监视而决定是否放行，可以成为常规。他们能够剥夺我的权利，但休想从我这里得到认可。

警察的所谓"沟通"，就是他们随时会来，我必须报告我做的事情，以及别人约请我做的事情。当然，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一直在他们的监控之下，他们什么都知道，但问题在于，他们这种监视是非法的，见不得人的，他们公然来和我讨论他们从非法监视中得知的情况，如果不表示抗拒，就等于承认他们这样做的合法性。他们把一些不加禁止而放行的事情提出来作为示好的筹码，如果我默认、接受他们的"宽大为怀"，就等于是认可他们干涉的合法性，他们马上就会以要求"配合"作为回报。

虽然我不会把警察当成很高尚和讲体面的人，但是我以为他们作为一般人应有的羞耻感还是有的。当我前一天与媒体商量写稿第二天警察就赶来说这件事，当西方驻京媒体打电话和我联系采访的事而刚放下电话警察就来干预，我还是非常吃惊，为他们的厚颜无耻吃惊。没有拐弯抹角，不是暗示而是明说，毫不掩饰他们的窃听。我想起以撒亚·伯林在回忆他见到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时得知的一件事：克格勃趁她不在时在她家装窃听器，猖狂和无耻到这种地步，完工后他们居然懒得清理现场，让墙屑散落一地。我知道，有些心理病态的人喜欢偷窥邻居的夫妻生活，但我很难设想有人无耻到这种地步，敢于主动找上门去说，我

看见你们昨晚怎么怎么了。

我愤慨地责问："我的言论自由权是得到宪法保护的，这是与警察的工作无关，警察无权干涉的。你们凭什么要来对我进行干涉？你今天到我家里来干什么？来与我讨论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给哪家刊物、媒体写，公民的言论表达是在警察管理的范围之内吗？"

针对他们对我"允许"、"放行"，因此宽宏大量的说法，我质问说，难道你们警察有几件事没有禁止、打压，就指望我感恩？比如，你们"准许"我今天吃了早饭，中饭也没有禁止，还"准许"我上街买菜，就要我把这当成是你们的恩德？难道这些不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有些本来属于我的东西你们没有抢走，这就是你们的大方，等于给了我什么东西？你们以为我是小孩子好糊弄，真的要感谢你们？对我连珠炮式的发问，他无言以对。

谈到海外媒体对我的约稿，贾警察冒出一句："对于海外某些组织与你的接触，我们是关心的"，我对这句话高度敏感和警惕，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口误还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就我的法律意识而言，"与某些海外组织有联系"是公民的合法、正当的权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在中国当局和警察那里，这句话有特定的含义，这是他们加罪于人的依据。我必须澄清和反击，我用手指着他厉声说："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和某些海外组织联系了？海外正式的、合法注册的报刊向我约稿，是公开、正当的行为，我与他们商量写不写，写什么，是我应有的公民权利。我知道在你们的说法中，'与某些海外组织有联系'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是要治罪的，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根据？"贾警察再三推诿，想搪塞过去。我哪能在这么严重的问题上把他轻易放过去，我穷追不舍，直到他明确无误地承认说错了为止。

贾警察说，他们关注我写什么文章，是因为我的文章"大部分是好的"，也有的文章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说，所有的文章都是我有权利写的，我不与你争论我的文章的好与不好，我的文章当然有可能是错的，但文章的对错好坏都在言论自由范围，与警察无关。你们根本没有权利来和我谈论我的文章，这不是警察工作之内的事。我还说，关于艾未未的文章我没有写，不是因为不敢，不是怕你们反对和惩罚，而是怕素材不够写不好，不是觉得不该写。你们的无理干涉，使得我倒很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和谐社会，还是警察国家？"，把你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我的遭遇和感受都写出来，让全世界来评理。

针对贾警察的所谓"沟通"，我明确告诉他，我不欢迎他和任何警察上门，他强行要来，我感到是"极大的冒犯"。

贾警察力图分辨，我懒得与他多说。说知道他是奉命行事，指责他没有多大用处，要他把我的意思原原本本向他的上级报告。

与警察的缠斗使人厌恶和厌倦，即使把他们质问得理屈词穷，把他们训斥得狗血喷头，有什么用？说到底不过是口舌之争，是嘴上的胜利。他们要来找你，你躲不脱，他们要进你的屋，你挡不住。虽然每个回合都占上风，但我明白那不过是杯水风波，不值得自慰。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尽管说是杯水风波，也必须力争，"一滴水可以反映整个世界"，与警察的斗法，折射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现状，是政治高压与捍卫公民权利之间斗争的一个缩影。胜利不分大小，我与警察争夺的，锱铢必较的，是人的尊严和权利。

很多年前，曾经在饭桌上听刘晓波、江棋生等朋友谈到他们与警察打交道的情况，他们心态和口气的平静让我吃惊，在他们的讲述中，警察上门，禁止他们出门，把他们带走，或者与他们一道喝茶，进饭馆，好像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没有区别，他们讲起来，好像在述说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后来逐渐明白，这种平静是练出来的，如果警察日日、月月、年复一年地找你、问你、抓你，你与警察的关系是如影随形，你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淡化自己心情的气愤与激烈，如果你每一天都处在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当中，如果你对警察的每一次非法举动都对着苍天大叫"天理何在"，那你的生命会处在脆弱易折的状态，你的生活、以及家人的生活是难于持久的。我很惊奇，我的这种转换来得如此之快，进展得如此

之迅速。我肯定修炼不到晓波、棋生的程度，但警察迫使我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警察行动的非法性，对他们侵犯人权，剥夺公民的自由，从来没有丧失新鲜、敏锐的感觉。警察对自己的行为是如此习以为常，甚至人们也跟着习以为常，似乎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不，我每一次看待和对待警察的言行，都是站在原点——宪法和法律的原点，这是我们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准则。也许，我不会次次、时时向警察抗议他们践踏法律、欺压公民，和他们讲道理，很多时候不谈他们违法这个基本事实与前提，而是若无其事地、就事论事地、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讨论面临的具体事务，比如他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但我内心从来没有忘记、没有淡化事情的真相和本质。

警察背后是整个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暴力，面对警察，任何妥协、退让，甚至屈服都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哪一种服从是耻辱，但是警察的横行不法却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所有被警察侵害的中国人，都是在为自己的权利，为国家的尊严，为民族的体面斗争。

华泽（网名“灵魂飘香”)，《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六 0 年代生于北京，前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

二 0 一 0 年开始参与公民维权运动，拍摄有反映“福建三网友案”的《草泥马大战河蟹》，反映结石宝宝之父的《赵连海案庭外纪实》等影片，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二 0 一 0 年十月八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后，因签署、征集、发布“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而遭到当局绑架，并秘密关押五十五天。

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飘香蒙难记

华　泽

一、绑架

在东北出差近半个月，白天拍摄，晚上上网，知道晓波获奖后，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于是和滕彪商量，回京后先在他位于望京的工作室住一段时间，等“有司”[65]疯够了再回家。

担心被定位，二 0 一 0 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午，登上飞机后随即关掉了手机，把电池和电话卡从手机上拆下，中止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

下午三点左右飞抵北京，在机场和滕彪等人告别，与他的助手欢欢乘机场大巴去望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我这该死的记性，一定是落在飞机上了。

一到滕彪工作室，放下行李，马上用固定电话联系机场失物招领处，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电脑信息已有登记。立即出门，去一条街之隔的民航干部管理学院乘机场大巴。

走到民航干部管理学院门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按住，仰面架起，一边向后拖，一边黑头套从天而降。脑海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原来黑头套这么厚，有一股脚臭味儿。

“救命!”听到自己在尖叫，之后是拼死挣扎，希望拖延时间，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被绑架的一幕，并能报警。挣扎的过程中，黑头套被我挣脱了，在被七八个大汉头朝下脚朝上塞进面包车时，记住了这个最后的镜头：我用双脚勾住白色面包车的门框，不肯就范。一个绑匪变形的脸，恶狠狠地俯视我：“再挣巴就弄死你!”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隐隐约约醒来，感觉车停了下来，以为到了目的地。一会儿车又继续开，再停下。几番之后开始飞速行驶。明白之前在等红绿灯，之后上了通往郊外的高速公路。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盆冷水扑面而来，恍惚中感觉置身一间黑屋子，惟一一盏灯直直地照在我的脸上，许多张脸在眼前晃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重重地扔在一个凳子上。头狠狠地撞着了墙。嘴里很腥，胸口很痛，想到了小说《红岩》[66]里的渣滓洞[67]。

数度昏厥，最后醒来时，躺在一张床上。仿佛潮水从头顶退去，身体虽极度虚弱，意识却逐渐清晰起来：这一切终于来了，好快！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朋友们知道了我失踪的消息吗？最晚明天，欢欢会去工作室，她应该知道我离开后没有再回去，她一定会告诉滕彪的。

环顾四周，我判断这是一个郊外的小旅馆，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北面是门和厕所，南

---

[65]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称呼，这里指警察。

[66] 一部进行革命教育，讲述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做斗争的小说。

[67] 小说《红岩》中描述国民党关押共产党员，对其实施酷刑的监狱。

面是窗户，东面的写字台和椅子摞在一起，被移到了窗户下面，腾出的地方靠墙放着一张凳子，是我之前撞着头的地方，西面就是我躺的这张床了。有五六个人走来走去，低声耳语。有人发现我醒了。

在审讯开始前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饿死事小，失（气）节事大，自己的事可以谈，绝不提任何朋友的名字；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既然来了，就做最坏的打算。

二、较量

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靠在床头，不知什么时候被弄伤的背部一阵刺痛。

审讯开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间，只留下“一号”（我把审讯者按先后顺序编了号）。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头发打了厚厚的摩丝，像招手停一样翘着，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领敞开，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银项链。很想告诉他：难看，像拴狗链。

他夸张地活动活动手腕，点上一支烟，套上一个透明烟嘴，用带着银戒指的兰花指捏着，踱过来，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边。我低下头不看他。过了一会儿，他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脑门把我的头顶起来，把耷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挑到耳后。然后深深地吸一口烟，悠悠地吐到我的脸上。显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闭上眼睛，不上他的当。又过了一会（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把胳膊轻轻搭在了我的腿上，身体向前倾，几乎是耳语：“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地目光。他一只眉头向上挑起，挤眉弄眼的凑到离我不足一尺的距离。

“请离我远点儿!”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力量。

“多远？”

“越远越好!”

“为什么？”

“我讨厌烟。”

他站起来，踱到桌子那边，掐灭了烟，又靠过来。

“你看，烟没了。这下可以说话了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把你们的头儿找来。”随后闭上眼睛，不再搭理他。

这个小痞子还挺有耐心，自说自话持续了差不多一小时，进来一个人与他耳语了几句，那人走出去。不一会儿，又进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人十分面熟，像是北京东城区“国保”大队的周队长。几个月前曾被他约谈过一次，那次他与我隔桌而坐，虽然言语中透着威胁，但始终面带笑容。现在这人板着脸，带着黑色墨镜，个头也比我印象中矮不少，显然是这次绑架事件的次要角色。所以我一时还不敢确定。

“起来，跟我们走!”有人发话。

我挪到床边，穿好鞋，脚刚沾地，顿时痛得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脚踝也受伤了。顾不上想，黑头套又罩了下来，我被两人连架带拖，踉跄着往外走，走过长长的过道，走出大门，像货物一样被塞进车里。

这次汽车没有行驶多久就停下来，我被带进一个大房间，走了十来步拐进另一个房间后，被按在一个方凳上坐下。随即，房内嘈杂的人声散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围着我开始踱步，静静地房间里只有他的脚步声，一圈又一圈，停下，一把扯下黑头套。也许适应了黑暗，这屋里的亮光刺得我眼睛睁不开。

“你叫什么名字？”

看清了，是一双登山鞋。我的目光顺着登山鞋慢慢往上移：户外登山裤、蓝色运动针织衫，披着休闲外套。一个皮肤白净，眼睛大得像瞪眼羚的年轻人——“二号”。看来他喜欢

户外运动。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了一遍。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绑架来？”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华泽。”

眼睛已经适应了环境，环视四周，屋子有二三十平米，我坐在正中间，前面三米左右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公文包，是录音设备！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经典的审讯场景。

“你今天下午刚下飞机？”

“对。”

“从哪回来？”

“丹东。”

“干什么去了？”

“拍片子。”

“去了几天？”

“三天。”

“拍什么？”

“律师办案。”

“都干什么了？”

“会见当事人和家属，去法院、检察院复印案卷。”

“这么点事儿要三天？”

“时间还挺紧张的。”

“是哪个律师？”

“我不想说。”

“为什么？”

“我不说别人的名字。”

他又踱了几个来回：“你看起来很虚弱？”

“痛、累，坐不住。”

搬过来一张椅子：“坐着吧。舒服点？”

“是。谢谢……”

“我们接着谈？”

“谈吧。”

“为什么拍这个律师？”

“喜欢。”

“为什么喜欢？”

“喜欢一定要理由吗？”

“不要吗？”

“我喜欢什么不要理由。”

听见他运了运气，停顿片刻又重新开始。

“拍完到哪里播？”

“哪里出钱买就在哪里播，中央电视台要买我也愿意。”

“要是没人买呢。”

“那就谨以此片献给我喜欢的人呗。”

“你就拍这一个律师，还是拍一个系列？”

“不确定，如果还有喜欢的就再拍呀。”

“你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

“说了你也不明白。”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律师的？”

“年代久远，不记得了。”

在律师和拍片的问题上纠缠许久，他一无所获。

门“呼”的一声被推开。一个高个儿男子在四五个人的簇拥下隆重出场。

“三号”——四十岁左右，小眼睛，西装革履，皮鞋亮得苍蝇站在上面都会滑倒。他把手里拿着的烟盒、手机往桌上一拍，坐下，二郎腿一跷，一边不停地抖动着，一边气势汹汹地说：

“你别难为我的弟兄们。你不是找领导吗？我来了。告诉你，我忙着呢，没空跟你废话，你来句痛快的，能聊不能聊？”

“我不是一直在和你的弟兄聊吗？”

“聊不下去了，卡壳了,你一会儿不记得了，一会儿不想说了。这叫聊啊？到这儿来你还想掌握主动权？没门儿！告诉你，来这儿的就不可能随便出去。我问你就答，这才叫聊知道吗？”

“请把证件给我看看？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说出来吓死你！”（和“国保”打交道又不是一两天了，没吓过啊,莫非是“国安”？）

“说出来听听。”

“现在我不能说，以后再说。”

我笑了。“三号”气得咬牙切齿，脸都扭曲了。

“我能让你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信不信？”

继续笑着，看戏似地盯着他。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

“我把狼狗牵进来和你玩玩你信不信。”

“行—啊——。”我笑得已然力不可支。

一旁的“二号”帮腔：”你怎么这么傲慢？有什么好笑的？你应该恐惧，正常人上这儿来都会恐惧。”

“我为什么要恐惧？你们把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用暴力绑架到这里来，连自己的身份、名字都不敢说，证明你们更恐惧。你们如此恐惧，我就不必恐惧了吧。”

“三号”显然是气疯了，他一拍桌子：“最后问你一句，还能聊不能聊？”

“没什么可聊的。”

“好，你想当江姐是不是？那我成全你！我向来是先礼后兵，现在礼完了，该兵了，你等着!”他说完几乎逃跑一般冲向门口，屋里所有人随他蜂拥而出。

在他临出门前甩给他一句话：“被你们绑架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门“呼”的关上，又打开，进来了“四号”。他冲我大喊一声：“站起来！坐舒服了你是不是？”

我摇摇晃晃刚站起来，身下的椅子就被他一脚踢倒了。

“你有正经营生没有？啊？”

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又没男人，又没正经营生。啊？”

（明白了）“你认为自己干的这叫正经营生？”

“你住嘴！我们领导问你话，是看得起你，你那叫回答？你那还不如不回答，你那么回答你不如干脆别说话。”

跟这个瘦小的委琐男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你干嘛不找个男人？干嘛不找个正经营生？你什么东西？!”
都什么逻辑啊？这人上过学没有？
他又重复了N遍这两句车轱辘话。看来他对我没有男人、没有正经营生这件事耿耿于怀。
我看着他一言不发。
“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是不？！”
他刚才不是让我干脆别说话吗？
他恶狠狠地围着我转了一圈，停在我身后。“礼”完了，要开始“兵”了吧？是什么样的“兵”？传说中的酷刑一件件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到某人常说过的话：“最看不起进去就怂，出来就硬的人。”我不会给某人机会让他这样评价我的。再说，我这身子骨，估计两下就完，痛苦也不会有多长时间，我准备好了。
他怎么还不动手，时间过去了多久？右脚痛得站不住，全身的力量都在左脚上。我已经开始有些神情恍惚了。别倒下，千万别倒下！别让他们以为我害怕了。
听见有人在和我说话，神智慢慢恢复过来，是“二号”，他把椅子端过来，让我坐下。开始唱白脸：
“你为什么发抖啊？”
“冷……”
他出去转了一圈，拿了一个白床单进来：“没有衣服，给你这个吧。”
我把床单裹身上。“二号”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语重心长的开始聊：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其实我们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守法的公民非法绑架到这里来，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态度？”
“你要是总追究前面你怎么来的这件事那就没完了，你又改变不了现实。”
“我是改变不了现实，但我可以不合作，我和小流氓也不可能合作。”
“小流氓？谁是小流氓？”
“调戏我的人，要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我可以忍受大流氓，但不可以忍受小流氓。”
“他们有什么区别？”
“大流氓竭力掩盖流氓的本质，他们知道那是丑的。小流氓赤裸裸地表演流氓的本质，他们以丑为美。”
“哦，有道理。但是你也太傲慢了吧？你知道吗，你的态度让人感觉是在挑衅。”
我纠正他：“不是挑衅，是不屑。让我消失？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越说越生气：“不就是死吗？我们纳税人花钱养着你们这些无恶不作的东西，天天看着、听着你们的恶行，我早就活腻了。”
他倒很有耐心：“你想过没有，可能不会让你死，就让你耗着，你受得了吗？”
“耗吧。油干了，灯就灭了!”
“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你做的事不是都光明正大的吗？说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你了，可以说我自己，不可以说别人。”
“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别人，你自己能不能出去都还不知道呢。”
“对我来说，内心的安宁和灵魂的自由，比身体的自由重要得多。你不会明白的。”
他愣了好一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想，你也再想想。今天太晚了。先休息吧。”
我提出要上洗手间。他叫来一个女看守陪我去。从洗手间出来，地上已经放好了一个床垫，上面有一套被褥。女看守说：“就在这上面凑合睡吧。”
怎么？这就完了？没有酷刑？也不打算耗干我了？不管它，先把自己虚弱、颤抖不止的身体放平、暖和了再说。

一男一女搬来两张椅子坐到床垫旁边。我平生第一次，在足有两百瓦的灯光下，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闭上了眼睛。

疲惫之极，却彻夜难眠，能感觉到心脏对胸口猛烈地撞击。全身开始疼痛，双肩、腹部、四肢，是绑架时使劲挣扎的结果吧，运动量太大了。

听天由命地躺着。看守们换班时走动的脚步声，低语声，椅子发出的吱吱响声，甚至喘气声都那么真切。

不知道几点了？天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渗透进来。这是一个靠南的房间。一个身材五短、健壮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打手，昨天绑架我的人之一！），他把手插在裤兜里走到我的旁边，眼露凶光，看着我，用脚踢了两下床垫："起来！请你来疗养的啊？！"

我爬起来，整理好被褥，默默地坐在床垫上。

"二号"进来，拉过一张椅子，靠近我坐下。

"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

我再重复一遍："我只谈自己，不谈别人。"

"这是你的原则？"

"是。"

……

"华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花的海洋。古汉语中花、华不分。"

他开始问一些我看起来很无聊，也许对他很重要的琐事：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状况……谈话就这样拉拉杂杂、漫无边际地进行着。

"从昨天到今天，你们对付我的足有二三十人了吧？纳税人的钱你们就这么造？"我开始提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不是吗？"

"不一定哦。"

"难道是安元鼎？"

"说不定哦。"

"干这份工作一定很痛苦吧？心里会有阴影吗？"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看你也是受过教育的，至少是大学毕业吧。你会告诉你的家人你们绑架了我吗？"

"不能说是绑架。"

"那是什么？"

"我们叫，弄进来。"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吧？"

"法律包括很多层面，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

哦，很新鲜，我不知道的也叫法律。好奇地看着他："告诉我吧，你究竟属于哪个部门？"

"告诉你你也不理解。就算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另外的场合见面，你也不会理解。"

"那就告诉我你的名字吧。虽然你是这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中的一员，但将来你受到审判时，我可以出庭为你作证，证明你在我被绑架期间，没有对我施以酷刑。"

他笑笑："你觉得这一天还有多久？"

"人算不如天算，也许十年，也许一夜之间。我相信，你我有生之年都会看到的。"

"那你在这之前打算做些什么？"

"用笔、用心、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变化。"

他点点头，转了话题："你该吃点东西了，你想吃什么？"

"我要先刷牙，不刷牙不能吃东西。"

他用了十几分钟来说服我，用水漱一漱也可以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我坚持必须用牙刷、牙膏。

他终于说："其实，找一个牙刷来也不是太难的事，不过你昨晚看起来情绪不稳定，我怕你伤着自己。"

原来这样。睡觉有人守在旁边，上洗手间也有人贴身"保卫"，原来是："怕我自杀？"

"是啊，你昨天说到死的时候眼都不眨，你把我惊着了。"

这回轮到我笑了："放心，我不会自杀。要死，这笔血债也得给你们留着。"

"你要在这里被弄死了也没人知道。"

"那可说不定。你们这二三十个人就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今天不说出去，你能保证十年二十年后也没人说出去吗？别那么自信。"

"你真的不怕死？"

"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庸常地活也是一辈子，精彩地活也是一辈子。有什么可怕的？"

"那你得吃东西，把身体养好，才能精彩地活呀。"

"要刷完牙才能吃东西。"

"你这人还真固执。你知道吗？你的许多朋友都比你有智慧。"

"知道。"

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用手指当牙刷，抹着牙膏刷了牙。然后吃了几根青菜、几块香菇、几口方便面。

"二号"出去了，马上进来两个看守，一左一右坐在两边。看来我可以继续休息了。

这一天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如此隆重地把我绑来，就这么呆着？看来，我们相互无法理解。我们不是同类，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比狼和狗的差别大很多吧。

四周真静啊，只有狗叫声。偶然，远处有飞机轰鸣而过。猜测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机场的东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秘密处所，专门关押我这样的异议人士？他们有多少这样的秘密处所？关押过多少异议人士？这里有过酷刑吗？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朋友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一年以前，无论如何，我不会想到自己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胡思乱想着，捱到天黑，又天亮。

打手又来了，用脚踢床垫，我翻过身，用后背对着他，他一把掀起被子，我仍然躺着，不理他。他火了，围着床垫走了两个来回，开始破口大骂："你个贱 B，你以为你是谁呀？装 TM 什么丫挺的？……"继续骂，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来："你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说？我弄死你！"

"二号"夺门而入，我朝他大喊："让这个打手离我远点，等你们要弄死我时再让他进来！"

"二号"拦住了冲过来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着我："你等着，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

我气得混身发抖："我等着你们把我给埋了。我知道你们做得出来，但是你记住了，总有一天，你们会受到审判！"

已经是被绑架的第三天了，怎样才能让外面的朋友知道我的下落？

看守我的人至少有五班，每班两人一男一女，大约两小时一换。每次"二号"一进来，看守立即出去，"二号"一出去，看守立即进来。从看守们简短的交谈中能听出来，他们是从不同部门抽调来的，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大声自言自语，让他们知道我

是谁，我是如何被绑架到这里来的，他们中间会有人把消息带出去吗？我不相信这几天接触过的所的人都是铁板一块、铁石心肠。我把头埋在双膝上默默地想着，门“砰”地开了，涌进来一帮人，其中一个紧挨着我坐在了床垫上。是“一号”，那个小流氓。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抬头！看我!”

我不动，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点上烟，吸一口，找准位置，“噗”把烟从我趴着的头和胳膊缝隙间吐进来。我朝远处挪了挪，继续埋着头。他也跟着挪到床垫中间：“呃，你怎么这么淡定啊？在台湾受过训吧？”周围嘻嘻哈哈一片笑声。

从这句话里，我再次确认他们不是“国保”，而是“国安”。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吧？我是间谍，是特务，危害了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敌人。否则怎么能让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下这样的狠手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呢？怎么让他们相信自己从事的职业是有尊严的呢？这会儿他们不是来审讯我的，他们显然是闲得无聊来找乐子。我始终埋着头，一言不发。闹了一阵，实在没什么可乐的，一帮人扬长而去。

之后的时间里，“二号”不时会走进来站一会，和我交谈几句，我知道他在研究我背包里的东西。

“你那个双肩背是装摄影机的，还是放照相机的？”

“都有。”

“东西呢？”

“放朋友家了。”

他想知道那些SD卡是干嘛用的。那卡是专业设备用的，如果他用普通相机看不到里面的数据。

“‘四·一六’[68]的纪录片是你制作的？”

“对。”

“不怎么样嘛，会讲故事的人都会做，没什么技巧。”

“谢谢夸奖！纪录片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

“你为什么关注这几个人？”

“我爱他们。”

“你还挺逗，你爱的人那么多，却不结婚。”

“我说的爱和你说的两码事。”

他在看“四·一六”的片子，那让无数人激动过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感动他。很想告诉他，那就是爱。

“你有几部手机？”

“好几部。”

“为什么把它们拆开来？”

“准备做清洁。”

“为什么不开机？”

“省电话费。”

他在检查我的手机。我有两部手机，那部专门用来上推的买了没几个月。被他碰过了，脏了……

“你过去的生活不错嘛，去过不少国家。”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周游世界。”

他在看我拍的照片？U盘里肯定没有。是看我的博客吗？

[68] 指二０一０年四月十六日，因言获罪的“福建三网友案”在福州马尾法院开庭，全国各地数百名网友在法院门口抗议，这一天即“四·一六”，被称为中国公民运动的里程碑。

“赚钱不少吧。”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你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去吗？”
“每天都想，就是回不去了。”
“我可以帮助你。”
“你帮助我？你怎么帮助我？你能让结石宝宝健康吗？你能让赵连海被释放吗？你能让汶川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砸死的孩子复活吗？……”
“难道这个国家就没有让你满意的地方？”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我绑架来？我违法了吗？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这么做吗？”
“当然会呀，美国中情局也会绑架的。”
“小伙子，你美国大片看多了吧？美国中情局只对外，不对内，它不可能绑架美国公民。”
“你从来不知道妥协吗？”
“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妥协，不同利益诉求可以妥协。和流氓怎么妥协？和强暴你的人怎么妥协？他说要强暴十次，你说两次算妥协？他说要强暴一小时，你说二十分钟算妥协？”
“二号”扭头出去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晨起来感觉异常虚弱，身上穿的牛仔背带工装裤整整肥了一圈。穿上鞋，摇摇晃晃站起来，松松垮垮地裤脚竟踩在了脚下。弯下腰去挽起一截，再站起来时，只觉眼前一黑。
听见一片嘈杂的人声，感觉离我很远。有人在掐我的仁中，指甲几乎嵌进了骨头。痛得睁开眼睛，看到打手那张幸灾乐祸的脸。软软地仰面躺着，无力反抗。周围站着五六个人，有“三号”，还有东城区“国保”大队周队长，对，现在我可以确定就是他，虽然他仍然带着墨镜，一言不发。
“走，穿好外衣，跟我们走。”
被人架起来，第三次带上黑头套，塞进一辆轿车的后座，一左一右被两个男人押着，离开了这个囚禁了四天的地方。
不知道要被带去哪里，用心辨别着方向。车子不停地拐来拐去，有人打进电话，听出接电话的是副驾驶位置坐着的周“国保”，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概这趟差事办得有点窝囊。
走了大约两小时左右，传来火车站广播喇叭声：“各位旅客请注意……”是遣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有。你们必须通知我的家人。”我一把拽下黑头套。两个男人大声喝斥着按住我，黑头套立即又被罩上。右边的那个人用手按住我的头，我的下巴死死地抵在胸前不能动掸，绑架那天被弄伤的背部痛得像要裂开来。
我一边喊：“放开我！”一边反抗。坐在前座的周“国保”厉声制止。
右边的男人狠狠攥住了我的手，使劲揉搓：“你挣！你挣啊！”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一人能听见。是那个打手，他在报复我！
周“国保”开门下了车。
打手一边将我的手腕往后扣，一边从牙缝里骂：“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厉害吗？我就捏死你！捏死你这个贱 B!”
我大声反击：”你这人渣，给我提鞋都不配！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我的手腕被他拧得和胳膊形成了三十度锐角。四肢开始痉挛，渐渐麻木，失去了知觉。
周“国保”回到车里,车子启动，行驶不远，停下。
“下去！”
“我的腿动不了。”

“你 TMD 装什么装？！”

打手用脚踢我，接着把我往外拖。在拖出车门前，黑头套被摘了下来。

是站台，就在火车车厢门口。秋日明媚的阳光穿过站台洒在了我的脸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我被公然绑架，就这样被两个男人在地上拖着……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哭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你们别这样对她，你们放开她。”

我抬头看：“你是谁？”

“我是陈明。”(作者化名)

“啊？陈明，是你吗？”

“是我。我来接你回新余!”

陈明，江西新余广电局办公室主任，我好朋友的丈夫。多年不见了，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相逢。

陈明抱着四肢麻木的我登上了火车。乘客还没进站，软卧车厢里只有我、陈明，和两个自称是街道办干部的便衣警察。

四十分钟后，火车驶离了北京西站，整整六十八小时，我终于脱离了黑帮的魔掌，开始了被软禁的日子。

三、软禁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省辖市。二十一年前，我曾是新余日报的一名记者。一九八九年辞职后，有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回新余办护照，那时我的户口还在报社的集体户上，开个证明就得千里迢迢跑回去。于是，我和好友，陈明的妻子建建商量，把户口落到他家，这类琐事以后就可以拜托建建帮我办了。就这样，陈明成了我的户主。

大约在我被绑架前一个月左右，“国保”找到陈明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告诉陈明，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维权活动。陈明回家和建建说：不会是华泽吧？她会参与这些事吗？建建肯定地回答：就是她，没错。我了解她。

十月二十八号晚上，陈明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和市“国保”一起来北京接我，途中一切费用由陈明所在的单位支付。不知道陈明有没有后悔当年同意我把户口转到他家？不知道领导有没有责怪他“交友不慎”？总之，陈明和他的单位被我株连了。

一登上开往江西的火车，我就要求检查背包。便衣把包递过来，我刚打开背包拉链，手机就掉了出来，女便衣一把抢过：“手机我先替你保管。”她不知道的是，我另外还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是专门上推的，我从未用它打过电话，干净得就像初生的婴儿。去东北出差，打电话的那部手机只有一块电池，以防万一，我在这部上推的手机里，存了两个当时正在拍摄的朋友的电话。依我的记性，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如果不存在手机里都是记不住的。这次细心救了我。

我把幸存的手机悄悄塞在裤兜里。车开后，乘上厕所的机会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浦志强，电话响了很久，他没有接。第二个打给滕彪，通话时声音很杂，断断续续，我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绑架我的人中有一个是东城区的“国保”；我现在正被送往江西新余；我的电脑还在机场，请务必设法帮我拿回来。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这时，浦志强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告诉我，自二十七号从伊春回北京后，他也被软禁着，但是可以与外界联系。我把和滕彪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他顿了顿，慎重地对我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它早晚都要来的，你要学会独自面对。我说：好，我知道了。

后来，五十天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到这句话，我把它当成一个先行者对后进的忠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打完这两个电话，手机还剩一格电。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要留着这格电，危险来临时用它呼救。虽然我不知道谁能救我，怎样救我。总之，我不能这样消失，我要让朋友们知道我的消息。

在火车上，来接我的两个便衣好奇地向我问起了刘晓波。这是自我失去自由后，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这三个字。

“你和刘晓波是什么关系？”

“ 刘晓波是干什么的？”

……

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因为我在《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上的签名。姓名：华泽；居住地：北京；职业：纪录片导演。就这么几个字，他们绑架了我，接下来他们还要囚禁我。同时得到证实的是，绑架我的就是“国安”。

这是一个野蛮国家、黑帮政府。文明社会的准则在这里不被遵守。与一百年前的清末相比，惟一的差别是，对异议人士由杀头、流放，变成了绑架、失踪。这一切必须改变！

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讲《零八宪章》，讲诺贝尔和平奖……说到这些我开始兴致盎然起来——既然有司要用绑架、囚禁的方式让我分享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那么，我不能枉担了虚名，我要一路播散火种。

火车快到终点站时，两名便衣和陈明都对我说：我们只负责接你，到新余后不会再见面了，希望你不要吃眼前亏，该服软就服个软。

我笑着谢谢他们的好意，我的字典里没有“服软”这两个字。

到火车站来接我的新余市“国保”陈建军，大约四十岁左右，一看就是军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刚上车他就开始给我上课：

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把家丑扬到国际上去，影响了国家形象；

什么你们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啊，拿法律做武器，法律又不是一切；

什么你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啊，但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了。

我一点都不擅长这样八股的话题，不过看他被洗脑成这样，只能耐心回应：

就是怕影响国家形象才呼吁释放刘晓波，怎么能把诺奖得主关在监狱里呢？获诺奖是我们的百年梦想之一嘛；

法律是执政党制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怎么是钻法律的空子呢？不拿法律做武器，难道让我们用坦克做武器吗？

说到国外反华势力，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利用我的？

他说：“我不了解你，回头我们再谈。”

我严肃的告诉他：“不了解就不要乱扣帽子。花点时间了解了再来和我谈。”

我最烦不敬业的人，为什么这次让我碰到的都是不敬业的人？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了解我，不知道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吗？我认为，哪怕是“国保”、“国安”这样无耻的职业也应该做得敬业。

到新余后，我被直接送到了消防宾馆。这个宾馆坐落在城市北部边缘，六层楼高，最初应该是按三星级标准装修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了，好在被褥还算柔软、白净，卫生间也挺宽敞。我住在二楼九二０七房间，据说这是整个宾馆惟一的三人间。两个女警与我同住，两个男警住在隔壁。每班四人，共两班，二十四小时一换，我的贴身“保镖”共八人。

一进房间，女“国保”欧阳就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会见朋友；活动范围不能出这座楼。”

“保镖”们自我介绍时，只说姓，不提名。说自己是刑警、经警、治安警，就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国保”，看来这个警种还真是见不得人。不过，我这双已经阅“国保”无数的

眼睛，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八个人中有三个市公安局的“国保”，其余的人都是从各分局抽调来的。我的安保级别高到他们从没经历过，分局的几个人，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只知道他们被抽调来执行任务，至于在哪里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一律保密。

市“国保”胡支队长来了——说是领导，没人介绍他的身份，时间长了，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领导很客气，他说这是公安部统一布置，你在这里呆多久取决于上面的命令，新余方面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停留，希望你能配合，他劝我把这当做一次度假疗养。

我向胡支队长提出要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母亲快七十岁了，没有我的消息她会着急。胡支队长说要向上面请示。

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人向我宣布限制自由的理由。总之，我这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软禁生活开始了。

进卫生间先给滕彪发信息：我住在新余消防宾馆九二 0 七房间。新余警方对我很客气，请放心。——手机只有一点点余电，不敢等回复，赶紧关掉。

然后洗澡。第五天了，这套衣服没离过身，床上睡着也是它，地上躺着也是它，一分钟都不能再忍受。

脱掉衣服，检阅被绑架四天“收获”的伤痛：仁中月牙型的伤口很深。至今轻轻触碰仍有针扎般的刺痛；被撞伤的背部在颈椎下方，晚上睡觉一直不能翻身；四肢和右手布满青紫色的瘀血，还有扭伤的右脚。仁中和右手的伤是遣返那天打手留下的。其它地方是怎么伤到的？绑架那天曾数次昏厥，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究竟对我做过什么。

洗完澡已经疲惫不堪，睡在靠窗的床上，透过铁栅栏的隔断看新余的天空。这里没有我任何亲人，它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连宾馆的方位都不知道。

我要习惯和两个“保镖”共处一室。她们睡觉千万别打呼、别磨牙、别说梦话。长期失眠，使我对睡眠的环境要求很苛刻，必须非常安静、非常干净。

计划十一月的欧洲旅行是去不了啦，以后说不定会被限制出境，周游世界的梦想或许就此结束了；滕彪帮我拿回笔记本电脑了吗？千万别落在黑帮手里；我第一次有了不好的银行信用：信用卡过了还款日，去欧洲旅行的机票刷了两万多，那会是一大笔利息吧？每天要吃的药没有带怎么办？身体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想来想去怎么都是身外之事？自由都没有了，这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能周游世界就不能吧，好些人连北京都没离开过呢；信用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以后也没打算从银行贷款；笔记本电脑滕彪一定会想办法帮我拿的，即使拿不回来也没办法；药不吃又有什么了不起？被绑架时连死的准备都做好了。惟一不放心的是母亲，她有心脏病。十月八号诺奖公布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在庆祝聚餐时被抓，第二天母亲离开北京回江西，在火车站告别时曾向她保证：我不会有事，放心吧！现在我只想对她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遵守诺言。

既来之，则安之。烦躁、愤怒都不起任何作用，那会影响我的敏锐性和判断力。我对自己说，很好，就当作是对内心定力的训练吧。

第二天一早，去火车站接我的“国保”陈建军推门进屋，一边接电话，一边指着我：“你和北京联系了？你还有通讯工具？”他扭头示意两个女“保镖”：“搜她身，包，床！”——我的手机被搜走了，那是我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希望。顺便搜走的还有背包里的一些小型专业设备：无线音频发射器、微型摄像机，他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全都拿走才放心。

包里只剩下一本摄像机的说明书。我自己拿起摄像机拍片子的时间不长，摄像机的一些功能还记不住，随身带着说明书，需要的时候可以查阅。在后来的许多天，这本说明书就成了我惟一的读物。

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度过的：

清晨七点半起床，洗漱后下楼吃早餐；上午看书、写日记，练瑜珈；十一点半午餐；下午看书，练普拉提斯（一种融合了瑜珈和健美操的有氧运动）、洗澡；晚餐后看电视、睡觉。

开始时很不适应，“保镖”们从早到晚开着电视，那些噪音让人心烦意乱。不过，很快我就学会了在电视声中看书、写日记、健身……

一天晚餐后我说要出去散步，陈建军打电话请示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散步，但不能离开宾馆的院子。于是，我的生活多了一个项目。

每天傍晚，我上身一件贴身红毛衣，下身是宽松的背带牛仔工装裤，外套黑色风衣（这些是我被绑架时的全部衣装），在四个“保镖”前呼后拥下，绕场二十圈（那阵势一定很可笑）。

这个宾馆入住的人很少，院子呈长方型，东西八十步，南北三十五步。整座楼只有两个窗户是被钢条封死的，其中一间就是我住的九二 0 七。第一天散步，就发现了院子东南角一棵不大的桂花树。这个长满黄白色小花、香气袭人的绿色植物，给我孤独而漫长的软禁生活带来了些许生气。

到新余第一天就提出要和母亲通电话，一周后还没有得到答复。十一月九日早餐时再次提出要求。陈建军说：“本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藏了一个手机，而且和外界联系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所以不能让你和母亲通电话。”

“造成什么恶劣后果？”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我一下就冒火了：“即使我是罪犯，你们还得通知我的家人呢。对一个守法的公民你们却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我有另一个手机，是北京警方交接时没有告诉你们，那不是我的错。向朋友通报消息是我的权利。你们要以此来惩罚我？好吧。不是怕我与外界联系吗？从现在开始，我宣布绝食！我倒下时你们得送我去医院吧？到医院我就大声呼救，告诉所有人你们绑架了我。”说完，我离开餐桌，扬长而去。听到后面几个人追上来的脚步声。

“小陈不懂事，你别和他生气!”

“不懂事没关系，千万别没人性。谁都有父母高堂。”

“你要和母亲通话我们也做不了主，得向上面请示。”

“给了你们九天时间，向联合国请示也应该有答复了。”

回到房间，我开始了第一次绝食，争取与母亲的通话权！

上午，胡支队长来了:“我这就请示领导，问题不大，但得有一个时间周期吧？你先吃饭。”

“请示吧，我等着。和母亲通话前我不会进食的。”

第二天一早，陈建军笑容可掬地进来了：“上面说你可以和母亲通电话，只是有两个条件，一，你不能说绑架、软禁。也不能说你现在在新余；二，手机要拿在我手里，要打开免提。可以不？”

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母亲我的遭遇，只想报个平安让她放心。

他们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拿着手机放在我耳边。听到母亲焦虑的声音：“你在哪啊？为什么手机一直关机？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平静地向母亲撒谎：“我在欧洲旅行，电话坏了。国际漫游太贵。不能经常给您打。放心吧，国外比国内安全多了。”

我以前每次出国旅行，登机前、到达后都会打电话告诉母亲；离京前会把在国外的行程、国外朋友的电话、预订宾馆的地址、购买各种意外险的单号和保险公司名称 E-mail 给弟弟。这次完全一反常态，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相信了。

此后每周我被允许和母亲通一次电话报平安。为了能和母亲保持通话，我不能冒险向她暗示我的处境。

无眠的夜晚是那么漫长，我用思念充满它们，思念的感觉既温暖又悲伤：

十年前的圣诞夜，在三里屯的一间酒吧里，我认识了北大在读博士许志永。那天，一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在那里狂欢，喧闹嘈杂的环境中，我和志永静静地交谈，他谈自己的宪

政理想，谈他定点做基层选举田野调查的乡村……这些话题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的理想也正是我的理想。十年后他为我争取言论自由的案件做代理，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

认识滕彪是在一次法律援助研讨会上，志永向他介绍我将要起诉的案件，他毫不犹豫的说：好。支持！第二次见面是在大兴法院声援赵连海，面对用摄像机偷拍我们的便衣，他大声说出那句：我叫滕彪，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令现场所有女性倾倒。

一年多来，我参与、拍摄了许多或由“公盟”发起，或由“公盟”援助，或由“公盟”关注的公民行动与法律个案：暴力拆迁、教育平等、“七·四”推友日[69]、赵连海案、福建三网友案、夏峻峰案、冷国权案……共同的理念和行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心里，志永和滕彪不仅是我的战友，他们如同我的手足。

去年初，我因发表《寻找中国之路》被“国保”骚扰，我打电话向庆妈诉说内心的绝望与无助。庆妈是谭作人的妻子，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庆妈说：你需要一名律师，去找浦志强吧。于是给志强打电话，半小时后在他凌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志强面前，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像是个学法律的人，就是个絮絮叨叨的求助者。他打断我：

“这不算什么，你没事。”

“那么，如果我有事，你能答应做我的律师吗？”

“我答应。”

从此，一遇到麻烦我就会向他诉说，仍然是絮絮叨叨，直到把他说烦为止，他脸上的表情和神态，明明白白地写着，我就是那个老叫狼来了的孩子。直到十月二十四日我在伊春与他分手，去丹东与滕彪会合。短短几天里，他每次打电话、发短信，结尾总有两个字：保重！我突然感到：他在向我预警。而此刻，让我悲哀的是，在这片土地上，预警，是我的律师惟一能为我做的事情。

第一次知道崔卫平的名字是因为海子。那时我准备为诗人海子做一部传记片。在查找资料时，我看到崔老师研究海子的系列文章。第一眼，她的文字就打动了我，从那以后，几乎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文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送别屠夫去福州的晚宴上。那是“四·一六”的前奏，屠夫去福州为三网友案打前站，前途凶险。崔老师高调加入关注团以示声援。她说：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屠夫。几天后她写下了长诗《这些义人们哪》，其中有一段竟是为我而作。

还有王荔蕻大姐、屠夫、天天、王译、张辉、阿尔、强本……

每次想到你们都会有一股暖暖的细流划过面颊，那是内心涌出的感动，它无声地融入黑夜，迎来天明。

十一月十四日晚餐后，回到房间不久，我正靠在床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我没有在意，以为是隔壁的“保镖”。女“国保”欧阳去开门，听到外面有人说，找华泽，欧阳“咣”的一声关上了门，我心里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华泽，华泽，你答应一声，让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女“国保”愣愣地看着我。

外面的声音更大了：“华泽，我们爱你！”眼泪奔涌而出，不顾一切冲向房门。因为欧阳站在旁边，门只能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外一女两男，三张陌生的面孔。

“我是华泽，你们是？”

“我们是网友，来看你的。”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新余的，我是奉新的陈茂森，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我们在推特上有过交流，记得这个大头照很帅的小伙子，不过本人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清秀一些。我伸出手和他们一一相握，那种温暖无以言表，女网友递过来一束鲜花，他们说了

---

[69] 二 0 一 0 年七月四日，为迎接“福州三网友”之一的游精佑出狱，网友们在推特上发起了推友日活动。

一些保重之类的话，欧阳从后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屋内死一般的沉寂，随后欧阳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两个人是新余钢铁厂的，所谓的维权人士，他们很坏，专门挑动别人和政府作对……"。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好了，欧阳认出了那两个网友，网友也一定认出了她，他们今晚就会在推上公布我的消息，我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而不为人所知了。

欧阳换好衣服，急急忙忙出去了，留下另一个"保镖"和我。她找领导汇报去了，出了大事，我被暴露了，他们一定开始忙乱了。

第二天一早，胡支队长来了，通知我收拾东西转移住处。

新搬去的宾馆离消防宾馆并不远，叫新蓝天商务大酒店。这个酒店没有院子，楼外就是大街，我要散步必须得走出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有时也会允许我到大门外面去散步了。

这个酒店没有自己的餐厅，要到隔壁的酒楼用餐，每顿饭要不得超标，要不就吃得不好。房间里也没有空调，很冷。在这里住了十天，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可"保镖"们受不了了。看看没什么危险，网友不过是来看望一下，也没打算劫持我。于是第十一天，在"保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搬回了消防宾馆。

搬回消防宾馆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冬日清晨的峨眉山上，大雪缓缓飘落，远近山峦白茫茫一片。晨钟从山脚下的寺院响起，一波一波往上传，一直响到山顶，此起彼伏。这是一九九四年春节的真实场景。那年，我第一次到四川，认识了谭作人夫妇。十六年后，一模一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的梦中，而这时，我的生活因谭叔被判刑已彻底改变。

大约十一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可能要软禁我到二0一一年春节后，甚至有人说会无限期软禁。既然我被绑架、软禁是因为晓波获奖，那么十二月十日诺奖颁布后必须获释，这是我的心理底线。否则，我将绝食，以死抗争。我必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平时，我每天都记日记，我的日记记得非常潦草，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段落，就是一些只言片语，提示我自己不要忘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以及当时的内心感受。因为我知道欧阳常常偷看我的日记，只要离开房间，我就会在日记上做记号，日记摆放的角度，一根发丝，等等。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消息必须非常秘密，不能被她发现。

这个纸条是夜晚躲在厕所里写的，大意是：我被软禁了，不能和家人联系，请帮我将这个短信发给 186……和 139……（这两个号码是滕彪和浦志强的手机，在火车上我已经把它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两个电话号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以下是短信内容：1、我的手机已被没收，这是请陌生人帮忙发的信息，请不要公布出去。2、如果颁奖日之后还不释放我，我会绝食，请设法救我。3、如果可能（我担心他们也被限制了自由），我委托你们做我的律师。我有一份写给浦志强的委托书放在家中（附具体放置的地方、有我家钥匙的某人联系方式）。4、我在新余"国保"手中，现软禁在新余消防宾馆九二0七房间。我把这张纸条和五十元钱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

十二月一日晚上外出散步时，我将纸条和钱一起塞给了一位事先物色好的陌生人（恕我不能说出更多细节）。我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否能替我把短信发出去，但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两天后，我又外出散步时，再次遇见了这个陌生人，他竟然等在那里，并且向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

离诺奖颁奖日越近，我的内心越焦虑。失去自由的日子，每一天都如一年那么漫长。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漫无边际的黑暗隧道，知道前面有光，却总也看不到。

许多个夜晚都被心悸折磨，它总是在刚入睡时向我袭来，难以形容的心慌，四肢发软，想大声喊叫，必须竭力控制自己才不会发狂，那种感觉是多么无助，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能崩溃！不能崩溃！

即使到诺奖颁奖日第二天就释放我，我也已经与世隔绝整整四十五天了。对于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的我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被绑架后，我的态度不是那样强硬，他们问什么我说什么，他们也许会放了我，或者只是限制我的行动，不会让我与世隔绝。是的，这完全有可能。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从他们采取暴力绑架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阻断了与我谈判的可能。我不是不能妥协，我是不能向暴力屈服。

没有人可以要挟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亲情也不能。不要以为柔弱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渺小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差别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信念的坚定。

终于熬到了诺奖颁奖日那一天。按照诺奖公布日的时间推测，颁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左右。按我的情况推测，所有可能去挪威的人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国内没有人可能到现场。我希望，领奖台上，和领奖台下被邀请的嘉宾席上，是一排排空椅子，镜头缓缓推向这些空椅子。它再好不过的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说明了这个奖颁给晓波的伟大意义。想到那个场景，我哭了（在我获释后不久，终于看到了颁奖的录像。那个场景——真是空椅子!）。

十二月十一日早上，我宣布绝食!

下午，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来了。他说昨天已经亲自去江西省公安厅请示汇报了，这一两天就会有答复，希望我有一点耐心。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1、告诉我继续软禁的理由；2、告诉我结束软禁的时间。”

听天由命的躺在床上，听任意识慢慢消失，身体是飘浮的，没有重量，仿佛另一个我，不，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它升到半空俯视着：

你能坚持多久？

我笑着说：挑战极限。

你要毁掉自己吗？

不。这恰恰是使自己完满。他们想用粗鄙、丑恶、苍白毁掉我，我则以精致、纯净、丰满来对抗。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肉体，但我的内心，他们永远无法毁掉。

十二月十五日，胡支队长来回复我的要求：1、颁奖日后还有一个音乐会。而且，外地有许多维权人士到北京去了，北京警方忙不过来，所以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去；2、二十日之前一定放你走，前提是你必须进食。

当天，绝食结束。

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胡支队长再次光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二十号你就自由了。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北京。”

“怎么回去？”

“火车、飞机都可以。”

“你让陈明帮你买票吧。”

“我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探亲访友的。你们怎么把我接来，还怎么把我送回去。我身上没有钱了，如果你们不送我回去，我就等在这里，让北京的朋友来接我。”

“好吧，我向上面请示一下。”

第二天我得到答复：二十号帮你买好卧铺票，送你上车。

四、自由！自由？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胡支队长通知我收拾东西，离开宾馆。他说新余买不到去北京的卧铺票，已经请分宜公安局安排，我们今天先去分宜，明天下午从分宜送你上车。

内心开始不安，他说的理由不合逻辑。新余是直辖市，分宜是新余下辖县。市局连火车

票都买不到，还要县局安排吗？

分宜离新余只有三十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两辆车穿过县城的闹市区，向郊外驶去。越走越荒芜，最后开到一个山脚下的度假村，分宜县公安局的人在这里等着。我们一行是这个度假村惟一住宿的人。可能是山里的原因，这里非常冷，比城里气温至少低三度。整个晚上我都裹在被子里胡思乱想：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去劳教？会不会逮捕我？今年五月份就有一个在江西因"煽颠罪"被捕，后取保候审的朋友告诉我，江西警方向他调查过我。

"保镖"在一旁玩电脑。我请她帮我查一下从分宜到北京的火车，明天下午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她百度了一下，吃惊的说："这趟车在分宜不停。"

我开始发脾气："问你们领导，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这"保镖"是一个年轻、单纯的姑娘。她说："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明天下午任务结束啊，明天一定会放你走的，你不要乱想，领导会安排好的。"

一会儿，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分宜县局的人开车出去接。等了许久，另一个"保镖"进来说，领导没接到，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局长说要为你送行。我感觉情况越来越诡异。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没和"保镖"打招呼，我自己开门径直走出去，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心里非常乱，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要释放我，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几个"保镖"赶紧跟出来安慰我："不会有事的。领导一定会安排好的，如果今天不放你走，我们和你一起绝食。"

快到中午时终于出发了，目标是分宜县一家高档餐厅，一桌人等着我们。张局长，胡支队长，另外四人是省公安厅来的，其中一个年长者（领导模样）说："我们接你去南昌，坐飞机回北京。"

"手机什么时候还给我？我要打电话让朋友来机场接我。"

"别着急，会还给你的。"

完全没有心情用餐。从新余到南昌明明更近，为什么要拐到分宜再去南昌？

省厅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女性，姓熊（依然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客气得让我不忍说她是"国保"……

"华老师，您看江西的变化很大吧？您帮我们宣传宣传呀。"

"我不做宣传，我只负责批评。"

"华老师不是做历史人文纪录片吗？我们江西历史很深厚啊。"

" 那倒是。我曾经对江西的古代书院做过一点研究，不过当时我所在的部门，认为这个选题收视率不会高，所以最后没有批下来。"

"那好啊，您提出方案，我们帮您安排，资金，接待，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哈哈哈哈……好啊。"

看这个架式不像是要送我劳教什么的，倒像是要招安，这太有意思了。

午餐后，我和省厅四人及新余女"保镖"一人，乘福特商务车，新余"国保"陈建军开一辆轿车跟随，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南昌。

快到南昌时，省厅那位年长者说："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们陪华老师去看看滕王阁。"

在滕王阁一层茶室里，进行了一次精心安排的"友好"谈话：

"华老师，这次在江西呆了快两个月，我们新余的同志对您照顾还周到吗？"

"很好，麻烦你们了。"

"您也是学法律的，我也是，有关法律的问题咱们就不谈了，有些事情留待历史来评价，您看好不好。"

我无言，笑笑。

“我今天不是以什么身份和您谈话，只是年长您几岁，您能不能听我一句忠告？”

“请讲。”

“以后刘晓波的事就不要参与了。”

“刘晓波哪些事？”

“比如签名活动。”

“签名不会总有的。”

“好，那就好。”

“还有关于江西警方的事就不要出去说了。”

“江西警方很不错呀，文明执法。”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江西有什么事，您只管说，我们一定尽量帮忙。您和我们小熊互相留个电话，以后常联系（她是我的专职客服了？）。欢迎您常回来，但不要以这种方式回来。”

“会常回来的，我还有家人在这里呢。不过，会不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可能不取决于我。”

“您提到的江西古代书院的项目很不错呀，您写个东西给我们，我们马上可以着手办，没有问题的。”

“好，需要的时候一定找您。”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晚上七点，我被送到机场贵宾室，小熊要我的身份证去办登机牌，我再一次要求把手机还给我，小熊说：“手机我帮您托运吧。”

正色对她说：“手机是贵重物品，不能托运，你必须还给我。到北京太晚了，我身上衣服单薄，我必须打电话让朋友来接我。”

“衣服我给您准备了。我知道您身上钱不够，也帮您准备了打车回家的钱。另外，我们厅里还准备了一些礼品，我会把手机包装好一起托运的。”

“你们是担心我打电话，北京会有欢迎团来机场接我是吗？天气太冷，到达北京的时间也很晚了，我不会让很多人来接我的，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还是托运了吧。”

“不能答应你的事我不会答应，只要答应了我就会做到，请把手机还给我。”

年长者发话了：“还给华老师吧。华老师您既然明说了，我也告诉您，我们确实担心再弄出什么事情来，我们也是为您好，希望您平安回家。”

飞机八点起飞，七点四十分，我被从贵宾室直接送上了飞机，在登机口，向省厅一行挥挥手，掉头走进机舱，立即打开手机，向滕彪报平安。

这一刻，我才确定，真的自由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知道了江西警方在临近释放我的最后两天费尽周折，把我转来转去的真正原因：滕彪、许志永、屠夫等人已于十八日成立了飘香关注团，包括四位律师在内的各地关注团成员已决定前往新余营救我。

获得自由后的第十一天，当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的朋友不要再被绑架、被失踪、被囚禁，不要再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打死挖个坑埋了！”

滕 彪

话说冬至刚过，北京城冷风刺骨。我琢磨，什么是比冬天还冷的东西呢？很快答案找上门来了。

二０一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我在西直门和华泽、许志永、张永攀聊天。华泽和我十月二十七日从丹东办冷国权案回到北京就被秘密绑架，一直失踪，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被释放。绑架者当然是“国保”警察了。我让她把被绑架、失踪的过程详细写出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见证文字。

之后与张永攀说，去看看范亚峰的妈妈，再去江天勇那里。前一天与范亚峰博士联系过，他被严密软禁、完全与外界隔绝，和他见面已经不可能。但听说亚峰妈妈晚上自己住，我准备去看望一下老人家。

由于以前常去，我和永攀轻车熟路地进了单元门，正往楼梯走，发现后面有人跟了上来。一年轻保安问：“找谁？”

我说:“看朋友。”他赶紧喊人。

我们敲门进了屋，见到亚峰妈妈，那保安也跟了进来，一个便衣也马上闯了进来。这便衣（估计是“国保”）非常蛮横，要看我们的身份证。

我大声质问：“你们什么人？怎么未经允许就私闯民宅？”

便衣说：“我是警察，我们要查身份证。”

“你是警察？拿出警官证。”

“我说是就是。你们干什么的？”

“你管得着吗？不拿警官证怎么证明你是警察？”

此时已感觉形势不妙，我低头迅速发推，永攀给朋友打电话，此时大约八点半。

便衣”国保”也打电话叫人。后来知道，此时我方援兵已经进入一级战备。

来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出示了警官证，我让永攀把警号、名字（时立刚）报告给后方推友。

然后要查我们的身份证。我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你们现在不符合查身份证的法定条件。”

他说：“我们是依据人民警察法对你进行盘查。”

我说：“盘查针对的是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来看朋友，你没权力盘查。”

争执了一小会儿，这便衣“国保”继续打电话叫人，电话里的人说：“拿手铐采取强制措施。”情况更加不妙，我又发一条推。后来知道，我方援兵已经上路。

我和亚峰妈妈交谈，那“国保”跟老人家说：“你先回避。”

我火了：“你身份不明，随便闯入别人家，还让主人回避，违法不说，基本人情都没了！”

“想明白点，少跟我讲法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共产党的地盘儿！”态度极其傲慢。

我不理他，继续跟亚峰妈妈交谈。期间又与此“国保”争吵一两次。此“国保”企图对我动手，我心说，素质，注意你的素质！我警告他：“你连证件都没出示，没权力跟我说话，别碰我。”

他莫名其妙来了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国！你们来了就别想走！"

大约十五分钟后，大批警察来了。我正在卫生间，听到永攀被警察强行扭下楼去，场面非常混乱。那便衣猛砸卫生间门，门上的薄木板被砸漏了。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说："不许上！"继续砸门。我想尿也尿不出来了。他从被砸破的门洞伸手打开门闩，几个警察强行将我扭到门外，"国保"抢走了我的眼镜，我高度近视，啥也看不着喽！后来和警察不到一米远距离，连警号都看不清。

我高声反抗，一群警察连推带扭，连扯带拽，将我弄下楼，推进警车里。永攀的眼镜、手机也都被抢走了。在推搡中手被警察抓出了几道伤痕。一警察来抢我手机，我奋力反抗，他抢夺未遂。

到了双榆树派出所。我说："你们没有权力把我们带到派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你们也不是不清楚。"

"你说说看？"

"以下四种情况，警察可以把公民带到公安局盘问：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赃物的。如果你们要查身份证，也要符合四种情况之一：一、有违法犯罪嫌疑；二、现场管制；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个法律你必须要说是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哪一条款。"这些东西我熟。

"你就属于身份不明的。"

"可是法律规定的是'有作案嫌疑并且身份不明的'。我不属于有作案嫌疑的人。"

由于越来越多的草泥马[70]活学活用这两个法律条文与警察叫板较真儿，我从警察口中得知，他们对这两部法律的立法者恨之入骨。

我和永攀被带到派出所一层不同的房间。一帮警察又来抢我手机，又一场肢体冲突。我兜里的东西全被掏了出来。我抗议！七八个警察大声辱骂我，有两三个骂得最凶狠。京骂、国骂、黑话一起都上了："X 你妈！""你妈 B！"种种最难听的脏话从四处喷射而来。

我心想：这双榆树派出所是狼窝不成！但我身经百战，境界高深，多年修炼下来，早已练就物我两忘无敌大法,我可以做到怒目斥责但同时内心平静。陈犯云飞多次跟我说，跟他们别真生气,气伤肝，犯不上。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众犯学习。又想起在流沙河家的讨论："与流氓要不要讲道理？"我的结论是："和流氓也要讲道理，流氓不是天生的，流氓也未必永远是流氓。道理不光讲给流氓听，也将给众人听。和流氓不讲道理，也就和流氓区别不开了。"

一警察喝令我坐下，我一脚把椅子踢开，众警察一拥而上，扭胳膊、摁脑袋、掐脖子，推、抓、拽，非常粗暴地将我摁倒。如果能调出当时摄像记录，肯定非常滑稽，难度系数极高的人体造形。（一天后，我的臀部、右腿仍隐隐作痛，应该是此一回合留下的战果。）

我被弄到另一房间，我在走廊里喊叫："我是教法律的，你们违不违法我很清楚。"这样说，主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懂法律的大学老师，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使我少遭皮肉之苦。这话也说给隔壁的永攀和盘问永攀的警察听。

几个警察把我挤到墙角，一人上来狠狠地拽我的领带(因为上午讲课,所以我系了领带)，猛拽半天，终于拽断了，扔在地上。毛衣被撕出一个口子。警察们再次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还扬言："这是什么地方？就打你了，你能怎么着？"

一警察把我摁在椅子上，他们见不得空椅子。

---

[70] 指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中国维权运动中的公民。

感觉左手疼痛，一看，流血了。目测左手掌心有 3cmx4cm 血迹，正中有约 1cm 长表皮擦伤——小意思。

一警察（后来听别人叫他徐平）问话，我不答，只说："你们无权讯问，打人骂人已经违法。"我经过一系列喊叫和被运动，口干舌燥，不想说话，就闭目养神。

听他在一旁嘟囔："你叫什么？有名字吗？来干什么的？"

过了一段时间又进来一警察，说到我们是因为去范亚峰家被抓来的。这徐平一听，像打了鸡血一般，腾地跳将起来，嘟囔变成了咆哮，问话变成了咒骂和控诉："原来是这样！这下子变成敌我矛盾了！操你妈的，原来是看范亚峰！马勒戈壁的！这下子不用讲法律了！你他妈的也出不去了！你们这帮汉奸走狗！反革命！吃共产党的，拿共产党的，还不念共产党的好！天天骂共产党，你们是什么东西！"，"范亚峰也是博士，现在怎么着！"，"范亚峰家就是不能去，这是规定！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警察素质就低了，警察就是拿执照的流氓，怎么着？"，"这是敌我矛盾，你懂吗？对敌人什么样对你什么样！"

我很好奇："对敌人什么样？"

"就像对法轮功那样！"

"对法轮功什么样？"

"你慢慢体会吧！"

毛骨悚然。

什么都问不出来，他们气急败坏。徐平警察一边问话一边挑逗性地不断地踢我的腿。我说："你放文明点！"

他还是那句话："我就这样，你怎么着？！别的事情我们还真怕投诉。现在这个是敌我矛盾，我们就打你骂你了，你去告吧，告到公安部也没用！"我想，这小破警察不到三十岁，怎么"敌我矛盾"成了他的 G 点？

又进来一个又高又胖的便衣，白鞋，灰绿色肥大裤子，格子上衣，一脸横肉。见我不言不语，猛然狠踢我一脚，骂骂咧咧地出门了，临走跟徐平说："需要'动手'就叫我过来！"我辩护的刑事案件不少，知道警察滥施酷刑并不都是为了破案取证，有时候就是因为"手痒痒了"，折磨别人肉体能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快感，并达到警察身份的高潮。

听到隔壁永攀那房间里的争吵，为他担心得紧。这孩子比我还"轴"，完全不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高胖便衣又来了，上电脑鼓弄些东西。徐警察还在不断跟我磨叽："你拥护政府吗？"，"你拥护共产党吗？"，"拥护，咱们还能谈，不拥护，就是敌我矛盾。""——噢，你不回答，那我就明白了。"

高胖便衣有些不耐烦，对徐警察大声说："跟他这种人废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正好我们这儿有地方埋！"又对我说："你以为你失踪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吗？你说，北京没了你一个人能有什么影响吗？"后来又小声和徐平说："把他弄 XX 饭店去得了！"我没听清是什么饭店，根据上下文，他说的那个饭店指的就是"正好我们有地方埋"！

我十分清楚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感觉自己像个小蚂蚁，随时可以被任何一个警察随便踩死，不留一点儿痕迹。"跟他废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应该推荐这句话成为年度警察金句。我倒是没太害怕，一来已经在网络发出了消息；二来他们此时也从我书包里翻出了身份证，知道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

我感触很深。

"北大毕业，法学博士，大学教师，知名人权律师"这些身份无疑对我起到了保护作用，甚至"北京户口"也是。警察开始时问我："你是哪地方人？"

我说:“我在北京工作。”

“我问的是你的户口？”

我答：“北京户口。”

他明显感到很诧异:“你他妈的是北京户口？”好像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他失去了某种优越感，好像没有北京户口也要成为挨打的一个理由。

这些特殊身份使我没有被打得更惨，使我没有被挖坑埋了。我也的确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信息透露给这帮警察，以免遭毒手。在其他维权活动中，这些身份也无疑使我少受伤害。如果没有“法大教师、北大博士、著名人权律师、推特名人、耶鲁访问学者、三博士、十大法治人物”这些东西，我还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敢吗？我非常怀疑。

我突然为我的这些头衔和身份感到深深的耻辱,为我主动被动地从这些头衔和身份中得到的区别对待而感到耻辱。更为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极力隐藏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感到耻辱。我真的毫无保留地认为，我被打死和一个农民工或乞丐被打死是一样的吗？我很怀疑。我感到，对我个人安全的关注，一定会吸引了很多媒体和访民的注意力，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关注更悲惨、更无助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我甚至感到，没有把我埋成，一定使警察们怒火中烧，一定使他们找机会埋一个不听话的倒霉鬼。我甚至认为，我少受的疼痛，一定会在其它的时间、其他的地方加在那些更无助的弱者、无辜的同胞身上，我感到耻辱。

面对一群视生命如草芥、视民众如寇仇的如狼似虎的警察，那些被抓到派出所、劳教所、看守所、收容所、遣送站、黑监狱的普通人，心中该承受多大的恐惧、屈辱和绝望？孙志刚、佘祥林、聂树斌、李荞明、赵作海、胥敬祥、滕兴善、冷国权们，将承受多少肉体的剧痛和精神的折磨？全国各地的那些声称“打死挖坑埋了！”的警察们到底弄死、弄残了多少人？这些警察们每工作一秒钟，同胞的尊严就失去一部分。想到这里，我的心在流泪。

……

接近午夜十二点，北京市公安局来了几个“国保”要把我接走。眼镜、手机等物品都还给我了。我说，我不能走，我要和同时被抓进来的朋友一起走。在走廊里交涉时，张永攀从房间里出来喊了我一声，又被拽回去了。我说：“我担心他被打，他不放出来我绝不走。”又过一会儿，“国保”同意我进那房间，我和张永攀说:“态度好点儿，他们很快会放你走。”永攀还轴呢：“我没有态度不好啊，态度不好的是他们！”

很快他们把我和永攀带上车。我估计有网友来声援，就摇开窗户往外看。有人喊我，一看是莫总统，还有魏强等网友，我不能下车，在车里和他们一一握手。到现场的还有许志永、董前勇、温海波、张凯、黎雄兵、包龙军、张贾龙、艾米@Rainbowfisch、@sushi2037、张小钰、单亚娟，等等。无数网友在网络上声援、围观、转发。也许这是我们很快被放出来的重要原因吧。

后来了解到，永攀被多次辱骂，脑袋被摁到地上,脸被扇,手指被猛掰，右手大拇指和手腕有明显伤痕。

送我回家的路上，北京“国保”说：“都像你这样较真儿，警察没法工作了！得少抓多少小偷！”

我回答：“执法者对法律不较真，马马虎虎，那公民还有好么？抓小偷的是警察，想把人“打死挖坑埋了！”，这还是警察吗？大家这样较真儿的话，也许能少抓几个小偷儿，但派出所、看守所被打死的公民却会少很多！哪一种情况，社会损失更大呢？”

何培蓉，（网名「珍珠」），《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七 0 年代生于南京，曾任德赛网站策划及编辑。

二 00 八年赴四川震区做志愿者，二 00 九年在推特上发起用于人道救援的小额定额定向捐款活动，用于帮助中国狱中良心人士的家属。二 0 一 0 年一月十日，独自前往山东探望被囚禁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这次不成功的探访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对陈光诚境遇的再度关注。二 0 一二年四月下旬，帮助长期被囚禁家中的陈光诚，逃离当地警察的监禁，去到北京，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

一路向北——探访陈光诚遇险记

何培蓉

二 0 一一年一月十日，我独自从南京驾车去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看望被软禁在家的陈光诚先生，遭遇暴徒暴力阻拦，现在把经过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首先要感谢各位推友的大力围观和救援。记得到场的警察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安全的，跟我们走，一会儿跟你的朋友们报一声平安，让他们知道你是安全的。”

在被带到双堠镇派出所办公室后，警察说的前几句话也是：“你现在是安全的，我们配合一下，你给你的朋友发个消息，告诉他们你安全了。”在我发了一条推并接了一个电话后，他们把手机拿走，放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一直响个不停，我知道，那是你们，我的朋友们，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守护我的安全。

在那一夜给山东各级警方的电话中，有一些特别美丽的声音：金燕@zengjinyan、飘香@hz8964、雨桐@suyutong、大王@ripleyyu、艾米@Rainbowfisch、小草@xiaocao07、海雪@wojieyi、月流瓦@Valerie_Guo、无题@wuti1212、石婧@shijing110、艳萍@duyanpili、倪妮@runningnini、老鼠@liudimouse、温暖透明@leftry，[71]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声音柔弱、温和而坚定，谢谢你们不懈的坚持，勇敢地拿起电话参与，因为有你们这些闪耀的女性，那晚显得分外特别。

我首先回答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孤身涉险？

自从陈光城先生出狱后，被当地政府软禁隔离在家中，有病不能医治，其孩子亦失学在家，令人非常担忧。外界欲援手组织围观，但对其看守人员等情况毫无头绪，没有人知道村子、派出所等是如何协作的，大家都是一团浆糊，苦于没有一手资料制定“观光”计划。我也想知道看守陈光诚的究竟是什么人，是地痞流氓，还是村民？他们从哪里领取工资，有没有协议，多长时间？

我曾想征集警察出身或有侦查经验的网友一同前往。但反复衡量，觉得孤身前往可能是最安全的策略。首先，之前的探访者都遭到暴力殴打，甚至有生命危险。自己无法保障同行网友的人身安全；万一被警察抓捕，自己更无力捞人。即使我愿意涉险，却不能要求别人牺牲。

对我来说，生命是最宝贵的，无论是自己的，还是陈光诚的，都非常宝贵。没人愿意轻易涉险，也没人愿意遭遇殴打，但是有些代价不得不付。正如网友@yinys 说的“是时候用身体冲撞出缺口了”，我认为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候，甚至可以说，若不如此，事情很难突破，至少我看不到其它更好的方法。

综合各方面消息，前往探访陈光诚先生的人员，都曾遭遇暴力阻拦。我认为，这样的人

[71] 均为网友在推特上的 ID。

身威胁和攻击绝不是当地民风凶悍、民众头脑简单的反映。相反，每一个恐吓都是精心算计的，理性而有分寸的决策，决不是失控的行为，这就是我采取行动的依据。

甘地说："如果我们能发展意志力，我们就会发现我們不再需要武裝力量了。"对我来说，如果不能和那群有恃无恐，受有关部门指使肆意施暴的人斗狠，那就只剩示弱了：如果那些人举起棍子，那便把头凑过去接；那些人打我的左脸，还需要把右脸伸过去。无论如何，我想我会展示自己，不计一切代价见到陈光诚先生的决心。我将以自己的行为告诉这些流氓暴民，打人这种恐吓的手段没有用。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不对人性失去信心，我将以人性的善呼唤善。

在探访前，也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通过网友"谷歌"[72]了部分当地警察"国保"的电话号码。长期以来，这些人躲在体制后面作恶，面貌模糊，我希望直接把其姓名、电话，甚至宅电公布于众，一旦不测，把罪恶落实到具体人员，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相信中国公民社会力量逐渐崛起，围观正在改变中国。也许我们还需要一点运气。

一、一路向北

一月十号早上，我独自驾车前往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一路颠簸，在晚上六点多进入临沂，没有导航，也不认识路，朝着北方开，找 G205 公路。当我开到路的尽头，不得不停下来问路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推友推荐的住宿地点。估计推上消息已经散播开，一旦住宿，登记身份证件，很可能半夜就被山东"国保"叔叔从被窝拎出来，送回家了。晚上"推特"夜猫子多，人气已经聚集，第二天也很难唤起持续关注，于是决定当晚进村。

早上一杯咖啡，中午一杯热水、一个鸡蛋。十二小时车程，又困又乏、饥渴交加。寻思晚上进村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次喝上水，吃上东西，决定先休整一下。最后找到了一家小店，边吃边和老板打听当地的情况。得知已开出临沂三十公里，离孟良崮还有七十公里。东师古村大概离孟良崮二十公里，也就是说还有五十公里左右抵达目的地。

这时候手机已经无法上网，于是决定去小吃店旁的网吧发消息。原以为从南京到临沂大约五小时车程，结果足足开了十二小时，预先约定时间通过电话报平安，再将我的消息发到"墙"[73]外"推特"的网友已经全部错过。只有寄希望"新浪微薄"把消息带到"墙"外了。

在网吧，老板要收我两块钱一小时，我说不对，不是一块五毛钱一小时吗？那个男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不是会员，会员一块。我说，我上半小时，给你一块如何？他说行。但是，他坚持收了我两块作为押金。在"新浪微博"发了几条博文回到前台，我找老板要回一块钱，老板看看时间，很爽快地给了我一块，这个细节也让我意识到当地的某种文化习惯。

我吃饭的这一排房子，只有这间网吧开着空调。再往北，途中停车问路所见都是煤炉取暖，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民风淳朴豪爽，并不是奸猾凶恶之地，这让我对自己的行程又有了点信心。

上路后，看了看时间大约七点半，惊喜地发现手机又可以上"推特"了，赶紧发推："一路向北，不停息。"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我的意思。更高兴的是，一小时后，接到了江天勇律师的电话，他问我在什么位置，我说自己快到了。我从离临沂三十公里的地方，一直以时速四十码开，应该在八点四十分左右到达东师古村附近。吃面时村民告诉我，到了没有房子的地方就进入山区，也就是快到孟良崮了，这和江律师介绍的村子特征不谋而合。

紧接着又接到飘香的电话，她嘱咐我小心，并约定隔一段时间打一个电话，以确保安全，

---

[72] 指用 google 进行搜索。

[73] 中国政府为封锁网络信息，斥巨资建立的"长城防火墙"。

这让我十分安心。

我把车上摄像、录音设备都打开了，摄像开到声控，两分钟内没有声音，停止摄像；声音超过六十分贝，继续自动启动摄像。又用车上的电台测试了几次。

九点不到的时候开始进入山区，我估计离目的地不远了，于是停车靠边，把随身携带的暖宝宝都贴上，把围脖绕上，并把衣服拉链全部拉好，做好站在寒风中的准备。又最后测试了一次机器，一切正常。

出发前几天，我公开了自己的“谷歌纵横”[74]，并要求网友“加好友”。但是，从周末开始，手机里的谷歌地图开始无法加载。现在，地图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一路向北开就成啦！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预想中的东师古村没有出现。感觉应该非常接近东师古村了，所以一直不敢随意问路。时间越来越晚，我也越来越焦虑，考虑了一下，决定冒险下车打听。一位路边卡车司机说，前面上坡就是孟良崮。这意味着已经过了东师古村。我干脆破釜沉舟直接问东师古村在哪里，司机相当友好，告诉我刚才经过的那个村子就是。

我松了一口气，把车掉头开。一段一段搜索，感觉已经开了老远，也不见东师古村口的河流小桥，情急之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见村就进，惊扰得鸡飞狗跳。最后接飘香电话，确认东师古村应该在我的右手边，据滕彪介绍，在那个什么双什么村的对面。我说，我知道地点了。

把车掉头，第三次经过东师古村，没敢直接进村，开过去，在前一个路口停车，发消息：“我进村了。”决定迂回从这个路口进去，看看能不能到东师古村。

开车沿着水泥路一直下去，貌似看到一条河，在桥的两头各有一块界碑，我也懒得下车查看。没人阻挡，一脚油门一直向前，车到一个村口的岔路停下，问了半天，一直没打听到进了村是向左边走还是向右边走，只知道过了村边的小河，看到第一栋房子就是陈光城的家。可是路两边有两户人家，加上另一家的墙，丁字路口两个门，三户人家啊！就在我发呆的时候，一个站在一辆面包车前打着手电巡视的穿军大衣的男子过来了。

我伸头问：“这是西师古村吗？”

他说：“不是。回头，前面一个路口右拐是西师古村”。

我又问：“这是哪里？”

他犹豫了一下，说：“东师古村。”

二、正面交锋

我心里乐开了花，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对，开车掉头开出去几米，停在路边，拨通了飘香的电话，我说我误打误撞已经找到村子了。正说着，看到后视镜里闪着手电光，站岗的村民过来了。

我问村民，是不是每一个村子都有站岗的，我到了西师古村是不是就能跟站岗的打听路？村民听了有些尴尬，说没有，各村不一样。接着让我电话联系要找的人出来接我。我一边让他上车，说要跟他打听点事情，一边伸手掏我包里的皮夹，里面放了大概一千五百块钱。那个村民死活不上车，站在车窗玻璃前低头让我赶紧说什么事情，我想想直接问道：“陈光诚住这里吗？”村民一听陈光诚三个字，立刻触电似地几乎跳了起来，往回就跑，掏出对讲机，叽里呱啦的喊了起来。我“吧嗒”把车门锁上，把收音机打开，看了一下摄像机闪烁的灯光已变成静止，重新打开，该来的跑不掉……

一会儿，大概四五个村民围过来，问我干什么的。我把车窗摇了一条小缝，对他们说，我要见村长，我说，你们做不了主，我也不为难你们，也理解你们的任务，请村长出来说话，

[74] Google 公司推出的一种手机定位服务。

我要见村长，有事。村民来回跑着，拍打我的车，让我走，我就坐车里看着，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这时，前面灯光一闪，来了一辆警车，我立刻打开车门，从车里出来拦住警车。村民也拦住警车问什么人，车里人说要进村，我一听，也要求跟他们一起进村。车上身穿警服的人摇摇头说，不行。接着车子就往村里开。村民忙着拿对讲机汇报。我确定了警车的车号，赶紧给飘香打电话："一辆"鲁 Q3393"的警车进村，如果今晚遭遇不测，就找这辆警车上的警察算账。"我大声说，故意让村民听见。

然后我钻进车里再也不出来了，把车窗摇下一条缝，坚持要求见村长，并告诉村民，等警察来了我就走，我想知道警察什么时候出警。这时候，村里出来一个戴圆眼镜，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恶狠狠地让我不要走，问我是干什么的，要看我的身份证。江天勇律师正好在和我通话，在电话里听到了，江律师嘱咐我，他们没权检查身份证。但是，挂了电话之后，我决定还是给他们看我的身份证。我掉转车头朝向村里，跟村民说，我不会走的，然后隔着车窗出示了身份证。他们打着手电仔细看。那个男子说，别看，看不见。要我把身份证递出车窗，我不同意，他又说他是村长，想坐进我的车，我让他出示身份证，他不同意。这时飘香的电话又打进来了，我让她赶紧给双堠镇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报警。

那个男子边踢我的车门，边唆使村民说，这是小偷，让四个人扒我的车窗。我说，我有工作，是老师，看谁说话可信，我一路直播过来，你们这种表演都会播出去，全国的人都会听到。那个男的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接着跟村民说我是敌特[75]之类的，让村民抬我的车，左右摇晃，想掀翻，我一脚油门，村民被吓住了，我也火了，对着车外说："我一直很克制，没有硬闯，你们把手放我车窗玻璃上我也没有压你们的手，我要见村长，你们今天要是动手打了我，就是个人恩怨，你们上有老、下有小，我绝不放过。听说你们都是劳改释放人员，什么都敢干，今天晚上不如把我大卸八块，吓唬我没用。我不是美国记者、律师，会给你们吓跑了，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被吓大的，流氓谁没见过啊。"

村民开始搬石块堵在我车子周围，我在车里接陈云飞的电话，那个眼镜男拎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木棍过来，对着我的车头就是一棍子，说："我让你装神！"接着是砸车前窗玻璃、主驾车侧玻璃。然后把手伸进车内，拔起车锁，打开车门，开始把我往外拉。我一直对着电话跟陈云飞描述现场情况，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被拉出去了"，手机就被抢走了。

我被掼在地上，倒下一次，我就数一，然后站起来，拍拍灰。再倒下，就数二，然后站起来，大概被踹了三四次，那群人骂骂咧咧地住手了。

然后一群人往村里走。我上了车，发动，一踩油门，汽车底盘划过石块冲进了村子。一群人赶紧搬石头封路，我被再次拎出车子。村民想把我扔到公路上去，我说成啊，我就堵你们的 205 国道。村民想想，就派了两个人把我弄到离村二十米远的路上。我们三个人就这么一直在寒风中站着。

一有路过的村民，我就拉住人家："您知道陈光诚吗？他是个盲人，您见过他吗？"这些人都低头赶紧离开。

其间，我见到一个村长模样的人走出来，我拉住他问话，看管我的村民赶紧拉住我说："他不是村长。"

我说："不是村长，你狗一样屁颠颠跑过来，他手轻轻一摆，你赶紧退回去？"村民笑。

我又问："你们镇长说陈光诚生活幸福，孩子在上学，是真的吗？"

村民把头扭过去，嗤之以鼻："谁说的？！你找他去！"

北方的夜晚寒气逼人，不知道站了多久，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我说，我想休息。那两个村民不同意，差点冲突起来。这时村里换了一个人出来，我继续要求休息，这位同意了。我爬进车后座，躺了下来，村民把车内灯打开，以便监视我。我实在太困了，迷迷糊糊睡了过

[75] 指敌方特务。

去。

三、警民一家

我被警察摇醒，他们对我说："安全了，跟我们走。"我上警车以后要看时间，他们说到派出所看，但最终也没让我看。

到派出所以后，做笔录。警察反复详细讯问了我的工作、学习经历，如何开车过来的，有没有同伙，车是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买的，甚至突然中断正谈着的话题，反复问工作简历，我忽然明白过来："原来你们当我是敌特，审查我呐。"旁边的警察笑出了声。

审问我的警官脸红着，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是问清楚是什么人，对你负责。"

我说："南京警方都有资料，你们可以身份核查啊。我是不是一个人出发的，也可以看监控录像啊。别问这么弱智的问题好不好呢。"最后，让我把所有过桥、过路费收据都拿出来，警察一张张核对时间的先后顺序，终于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

警察又讯问我："这么晚去村子合适不。"

我说："没办法啊，就这个钟点到的，南京这个钟点没人睡觉的，夜生活刚开始啦。"

警察说，北方农村这个时候大家都睡觉了，夜闯村子被村民围攻是情有可原的。

我说："我是拜访朋友啊，朋友没意见，管其他人什么事情啊。"

警察坚持这个时间不合适，我望着他不说话了，等他解释完，我说："你不要这么 SB 好不好呢，我都没有挑明了说，照你的意思，那是不是下次我白天来就让我进村子了？"

接着，又详细讯问我车上的摄录设备，我一一说给他们听。一个警官说："看来你有备而来啊。"

我说："废话，我要是被杀了，你们怎么破案啊，本来这些设备就是为你们警察准备的嘛，方便你们了解案情，迅速抓捕嫌疑人，快速破案的。"

警察又详细讯问了在村头的情况，比如被砸的时候车头朝什么方向。我一一作了回答，警察也照实记录，还问我是不是开车撞了村民。我说他们掀我的车，那我是要撞的，我说我一再亮明身份，要求见村长。最后，我让他们看录音、录像去，看了就知道我和村民谁说谎了。警察听完后，给我解释了一番，这些村民是自己组织的联防队，乡村警力薄弱，无法及时出警，治安大多依靠村民自治等等。

基本上，无论是村民还是派出所的人，都不愿提及陈光诚的名字。

我们也含蓄地涉及到陈光诚。警察用"那个人"代指陈光诚，警察的问话都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第二天在车上，我又谈到陈光诚在北京为残疾人权利提起诉讼的事，警察也嗤之以鼻，问："你怎么知道是他做的？"

在派出所里，我提到小说《红岩》，问他们知道里面那个小萝卜头吗？我们从小就受红色教育，万恶的国民党旧社会，连孩子都不放过。我说，你们要是觉得陈光诚是反革命，就地枪决好了！他孩子是无辜的啊，凭什么把孩子也软禁在家失学啊，株连九族啊？！再说，现在共产党也知道，反革命不能就地枪决呢。我说，就你们能当警察，家里肯定有点关系有点地位的，都经历过文革吧，知道狗崽子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也都平反了。想想那时的境遇，做人要将心比心。

最后，我说："中国人有句俗话，做事不可做绝，如果你们持续突破人伦底线，如生病不允许治疗，让孩子失学等，这就引起公愤了，会有更多的人以不同方式来看望陈先生的。"

整个讯问过程中，除了被允许接了一个电话，发了一条经过许可的推文，手机一直被警察控制着，就放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一直响个不停，有时警察掐了，有时不管。最后警察拿走了手机。我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搜查我的手机，于是我要求他们开搜查令，并上楼寻找手机，被四个警察在楼梯口拦住，拉回屋里。

警察开始的时候说，作完笔录，他们进行调解，修好车马上送我回去。检查我的手机后，又改口说，明天去临沂，车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再回去。我说不把检查我手机的事情说个明白，或者开个搜查令出来，这个事情没完。我干脆趴下睡觉不理他们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一个领导模样的，就是头一天晚上要求我接电话报平安的警察，打印了我的笔录，出去了。上班后，一名女警送了两个馅饼让我吃。我问："我什么时候能走？如果不能走，我要请律师。"

不一会，晚上给我做笔录的警察出现了，变色龙一般，态度又好转了，很客气地说："马上送你走，车在临沂，因为当地没有合适的车窗玻璃，马上送你去取车，拿了车就走。"

四个警察开了一辆车送我去修理厂，在修理厂门口等了好久，我就在车里呼呼大睡。拿到车后，两个警察开我的车在前，我坐警察的车在后，一行人上了路。期间，前面车里的警察找地方给我的车加了油以后绕了半天，我坐的这辆车里的警察急了，开到前面把他们拦住训了几句，看样子急于把我送走。

直到上了高速，警察才把手机还给我，并催促我接电话，让我的朋友放心，请他们不要来山东。听说已上路前来看望我的"观光团"已返回，才连说，好好。并一再问我接着要去哪里？我说，回家喂猫呀。他们才放心。

开到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地方，大家下车，警察让我和车子合影，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我发现车子已经换了玻璃。我问："玻璃上的遮阳膜呢，还有车门被砸得凹凸不平的都没修啊，还有偶的衣服鞋子破损呢？设备好贵的，没搞坏吧？"

警察说："哎呀，你不缺那个钱，算了啦，设备是否坏了，我们不知道。"

和警察握手道别，被静电电了一下，送我的便衣直说和我有缘。我说："是呀，一回生，二回熟，这个问题没解决，肯定还会来的。"

从山东平安回家，心里对陈光诚先生的处境更加担忧。他所处的地区经济落后，相对封闭，红色老区，意识形态浓郁，只要说是敌特，那就几乎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可以采取任何专政措施。无论是警察还是村民，没有人道主义概念和底线。

此次探访之旅的心得是，每一个电话、每一张明信片都有用！朋友们，请你们不要沉默，给陈光诚先生寄一张明信片，告诉那些村民，陈光诚是个好人，不是敌特；告诉那些村民，我们都在关注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做丧尽天良的事，那样的人，罪恶几辈子都洗不完。山东民风淳朴，村民还是很看重名声的，那些用金钱利益诱使村民使用暴力犯罪的人，非常可耻，毫无底线。

李昕艾，本名李新爱，《零八宪章》签署人，生于一九八０年代。二００六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新闻系。曾活跃于中间思想文化论坛、常识网、百灵社区等网络论坛，在博客网、凤凰网等网络媒体担任过论坛编辑、评论编辑等工作。二００七年，以“侵犯通信自由权”将垄断集团中国移动通信告上法庭，法院拖沓一年后此案最终不了了之。现为自由撰稿人。

亲历“二.一九”

李昕艾

（一）

二０一一年二月十九日上午，三名不速之客突然登门造访，他们是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区分局的陈世杰、王东、陈志（音）。

自从二００九年四月我们搬到昌平区居住以来，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是昌平公安分局的两位中年“国保”赵树全和陈万军。此二人每次来谈话，态度尚可，期间古川与他们无冲突发生。

陈世杰、王东、陈志（音）相对年轻一些，七十年代生人，看上去不到四十岁。陈世杰还是昌平分局“国保”的一个小领导，古川很不喜欢他拐弯抹角旁敲侧击的谈话方式，古川希望他不要浪费时间，直接说出来我家的目的。其实我们也猜到他们是为“茉莉花革命”[76]而来，非洲突尼斯民众推翻暴政的革命使他们坐不住了。

古川实在懒得在他们身上耗费时间，所以说话的语气很不客气，我想这一定令陈世杰怀恨在心。他们最后威胁:“不要在推特上推各大城市组织进行‘茉莉花散步’的推文，也不要发与茉莉花有关的言论，否则后果你们承担不起。”

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原以为与平常无异，谁知他们早就酝酿好，要借“茉莉花”之机，展开全国大抓捕行动。

中午十二点多，陈世杰来电谎称：“我的钥匙丢在你家了，找找看。”

我毫无防备地接了电话并信以为真，四处看了看告知他：“没发现你的钥匙，你肯定是丢在别的地方了。”

他继续询问：“古川呢？”

我答：“在呢。”

古川本来计划午饭后出门买打印机的墨盒，由于担心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比较辛苦，就先帮着哄小儿子恩恩入睡。

下午将近四点钟，恩恩睡着了。古川正准备穿外套出门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透过猫眼看见陈世杰、陈志（音）站在门口，我转头对古川说：“他们又来了，不是告诉他钥匙没丢在这嘛，还来干什么？”

古川毫无戒心地走过去打开了房门，突然闯进来二十几人，原来他们早就埋伏在猫眼看不到的地方了。

陈世杰一进门直奔正开着机的笔记本电脑，我见来者不善赶忙过去把电脑抱住，他开始跟我抢夺起来，这时，两个穿制服的男女一左一右上来反扭住我的双臂，我大叫：“放手！

[76] 二０一一年二月，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有人在网络上匿名发帖，号召人们从二月二十日开始，每个周日去各大城市的中心区“散步”。中共政府借此开始了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大规模逮捕、绑架和秘密关押。

你们弄疼我了。”——事后，我了解到此二人为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的民警，警号 050455 之女名叫王亚辉，警号 056376 之男未查到姓名。——我就这样被这对强盗般的男女粗暴地抓着双臂按在凳子上，而还未来得及穿外套和鞋子的古川已被四五个人抓胳膊揪腿地绑架走了。

此刻，大儿子洛洛已被吓得哭了起来，我要求他们放开我，让我去哄孩子，他们不肯并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来哄。”我愤怒地大骂这些助纣为虐的狗腿子是畜牲。

一个便衣男拿着摄像机对着我拍摄，两个便衣男开始翻书架上的书籍，一个便衣女和另一个便衣男哄孩子，还有几个人在房间里死人般地把守着。十几个“国保”抓走了古川，留下这十几个专门对付我。

骂了一阵，我稍稍控制住激动暴怒的情绪，发现哺乳衫的扣子在反抗中已被扯开，我要求去卧室换件衣服，他们这才松开手，女警王亚辉贴身跟着我。换衣服时，我发现胳膊被扭捏得青一块红一块。我心中的仇恨在燃烧，总有一天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

陈世杰叫嚣：“上午让你们不要发推特了，你们不听还照样发，这就是不听话的后果。”

我要求他出示相关法律手续，他把搜查证在我眼前晃了晃。其实他们早已搜查结束却赖着不走，目的就是拖延时间不让我与外界联系。

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已是我们被抄走的第三台笔记本电脑了）、一台台式电脑主机（朋友寄放在我家的）、两部诺基亚手机、《中国改革的末路》和《改革之死》等古川参与写作的多套书籍被抄走。我拒绝在查抄清单上签字，并要求立即归还我的手机。

晚饭的时间耽误了，三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没有喝水也没有吃奶，一岁零九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也没有吃饭。我要求出去买点吃的，陈世杰不同意。随后，他打电话叫来一份披萨饼、一份意大利面和菌汤。直到晚上十点多，陈世杰带人离开后，我和儿子才开始用餐。“国保”虽撤离了，三个协警却仍然把守在门外。

半夜，我把两个孩子哄睡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电脑没有手机，门口有人二十四小时把守，我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呢？

当晚我开始腹泄，吃了药后回到床上，我无意中碰到了恩恩的小手，发现有点烫。小孩子是很敏感的，他的心情会不会受到我情绪的影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熬到天蒙蒙亮，我起身开始用红色记号笔在 A4 纸上写求助信息，想请求路过的好心人帮忙打个电话，告诉朋友我们的处境，然后我将纸条从窗口扔到了楼下，可是来来往往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些求助的纸条。

（二）

二月二十日天亮后，两个孩子睡醒了。洛洛不肯吃早饭，哭闹着要出去玩，无奈中，我只好带着两个孩子硬往外闯。三个协警拦着我说：“您不要为难我们！”正争持着，昌平公安分局的董姓女“国保”来了。

我对她说：“孩子要出去玩，我也需要找教会的姐妹来帮忙，一个人实在照顾不了两个孩子。”她不允许我出门，但同意由她打电话给教会的人，并叮嘱我不许说话，不许透露我家现在的情况，我佯装答应。

由于手机被没收，所有人的电话号码我都无从记起，还好在一张名片上找到了朋友孙皓的电话，便让女“国保”打给他。

电话一接通，我便告知对方：“古川昨天被昌平分局‘国保’带走了，我现在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被严密看守，无法与外界联系，请帮忙把消息公布出去。”

女“国保”急忙挂掉电话，并严厉斥责我：“不让你乱说你还说！”我没理她。

回到屋里，恩恩撒尿，尿的最后一滴是红色的，我立即紧张起来。早晨他拉稀了，现在

又尿血，我的孩子怎么了？

我哭着冲女“国保”吼：“赶紧让我带孩子去医院，他尿血了！”女“国保”在尿布上看了看，然后打电话请示领导。随后昌平分局的王东带着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开车带我们到了北苑附近的航空工业中心医院。挂了儿科急诊，化验后诊断为泌尿系统感染，医生要求立即住院观察治疗。

住院押金需要四千元，我要求“国保”去办理住院手续。他们请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中年李姓“国保”来到医院，昌平分局的“国保”称他领导。十九日古川被绑架后，他曾到过我们家，我当时询问他的身份，他只说：“我姓李，以后我们打交道的时间还长着呢。”

李姓“国保”和医生商量后，医生同意先交两千元押金。之后，东小口的胖警察徐铮（十九日抄家时对我摄像的便衣）让我打个借条，并谎称：“这是我刚取出来的，是我个人名义借给你的，以后要还的。”于是，我按他的要求写下“今借刘涛人民币贰仟元整”（当时我并不知道徐铮的真实身份），借条中的刘涛实际上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名“国保”。

恩恩需要住院，我更无法分身照顾洛洛，我再次要求向教会求助。这次曹姓女“国保”同意我使用她的手机联系教会人员。

我拨通了孙皓的电话，刚说出“我是李昕艾”，电话就断了，再次拨打，一直是占线的声音。我这才知道十九日给他打电话后，古川出事的消息并没有被传递出去，不知是他遇到什么压力，还是他的电话出了故障。

我只好再拨通爱加倍教会约瑟牧师的电话。由于女“国保”在一旁监视，为避免电话被她抢走，我只能隐晦地把我家遭遇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并拜托牧师一定要把消息转告给朋友王京龙。

二十日傍晚，教会的侯阿姨带领另外三个弟兄姊妹来到医院帮助我。

我看着幼小而可怜的恩恩，心痛极了。在病房里跑来跑去玩耍的洛洛似乎已经忘却了昨日受到的惊吓。这么小就要承受这样的灾难，我对两个幼子充满愧疚。

医生准备给恩恩输抗生素，我和侯阿姨都觉得不妥。还未做其他详细检查，有无必要输液还不能确定。医生解释：“医院已经下班，各项检查只能明天白天做了。如果不输液，就没必要住院，还不如呆在家里环境舒适呢。”

我思量再三，决定出院。医生开了阿莫西林颗粒，我买回家喂给恩恩吃。六十岁的侯阿姨留宿在我家帮忙照顾洛洛。原以为古川会像去年被传唤那样很快回家，可是我却一直等不到他的消息。

侯阿姨每天来我家帮忙，二十多天后她累得犯了气管炎，只好留在家里休息。这段孤独焦虑的日子，感激侯阿姨的守护，愿她平安！也感谢曾来看望我并帮我照看孩子的大学时期的师弟师妹夫妇。

二十一日上午，在教会冀弟兄的帮忙下，我又带恩恩去医院做检查。恩恩不发烧了，尿液的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但自此恩恩却一直腹泻不断，持续了两个多月，每天拉很多次，经常搞得到处都是粪便，令我焦头烂额。

去医院化验大便，医生却说问题不大。可是吃了各种中西药都不见好，医生怀疑食物过敏，建议带孩子去做过敏源检测并停掉母乳，改换深度或完全水解牛奶蛋白奶粉喂养。

我问医生：“最初腹泻的那天，我曾吃过披萨饼，当天我腹泻了，接着孩子也跟着腹泻，是不是与披萨饼上的奶酪有关系？”

医生答：“有关系。”

害恩恩生病，被迫五个多月大就断奶的罪魁祸首正是“国保”，是他们伤害了我儿子的健康。每当想到此事我都会无比愤怒。

恩恩吃的奶粉是三百多元一桶，九百克装的雀巢适度水解牛奶蛋白奶粉，改吃奶粉后他停止了腹泻，但是一吃辅食仍会腹泻，所以此后一直不敢给恩恩添加辅食，只能非常小心翼

翼地喂养他。

恩恩一个星期至少吃掉一大桶奶粉，拜“国保”所赐加重了我们每月的经济负担。恩恩食用奶粉的半个多月里没再腹泻，我以为他的消化功能复原了，便打算换掉雀巢，改食一百元一盒，四百克装的雅培奶粉。这一换却换出了问题，恩恩又开始腹泻了，无奈只好再换回雀巢，却仍于事无补。

现在恩恩十个月大了，可他腹泻的问题时好时坏，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苦恼的我们已无计可施。随着月龄的增大，单一食用奶粉已不能满足他发育的需要，常常会饿得哇哇大哭，只得让他进食各种食物，然后不停地处理他无规律的粪便。这对孩子和大人都是一种折磨，我祈祷恩恩早日摆脱腹泻的伤害。

（三）

自从二月二十日我与教会取得联系后，古川被绑架的消息才传了出去。在医院的时候，李金芳大姐打电话到曹姓女“国保”的手机上询问我们的情况，女“国保”谎称：“我是古川和李昕艾的教友，他们正在排队给孩子看病，他们的电话没电了，没什么事。”李金芳大姐被蒙在鼓里，还是王京龙识破了女“国保”的谎言，因为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不会称呼教友。王京龙遂打电话到侯阿姨的手机上向我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

此后，在外地出差的王京龙还特意委托冀弟兄给我找了一部手机使用，冀弟兄把教会的公用号码也借给了我。王京龙回京后多次登门探望并送给孩子两千六百元奶粉钱，我谢绝不掉只好收下。

李金芳大姐隔三差五打电话来安慰我，并转达了张祖桦老师对我们一家的关心。古川被秘密关押的日子，若没有他们的关照，我将更加艰难痛苦。

我家楼下每天都有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和小区物业的保安驻守。我出门买菜、采购日用品，他们都会贴身紧跟，生怕我跑了似的。

恩恩由于腹泻时常哭闹，每天要不停地抱着才能安静下来。我实在顾不上照看洛洛，只好把他交给教会代养。

每天一早，洛洛被送到教会，晚上再被送回家。不到两岁的孩子像个小流浪汉一样，虽然教会的弟兄姊妹空闲时都会轮流看护他，但我知道时间长了他会想爸爸、妈妈。有几次我送他去教会，他留恋不舍的眼神令我心碎，他怕妈妈会像爸爸那样消失不见，他渴望妈妈陪他玩耍。每次我只能狠下心来偷偷溜走。

有一天，洛洛的手臂在教会被饮水机的热水烫伤了，起了一个大泡，红红的一块，在诉说一个幼小孩子所不能，也本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之痛，我的心在流血。为什么如此不堪如此邪恶的政权能持续迫害民众六十多年？难道这真是一片神弃之地？难道真应了那句话“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不，我不想让我的孩子重复一代代被戕害的命运，我想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并过上人的生活：没有恐惧，没有欺诈，没有谎言，没有血腥，一个干净、自由、充满爱的世界。

一天晚上，洛洛从教会回来后闷闷不乐，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喊“不！”并拼命摇头。我知道他心里的伤：没有爸妈陪伴的日子他不喜欢，困在室内不能外出晒太阳的日子他不喜欢。我抓狂发飙，拿起电话质问“国保”王东：古川何时回家？可他始终只有一句话：不清楚不知道。

负责日常跟我联络的王东是刑警出身，每次来找我谈话还算客气，但陪同他的曹姓女“国保”令我十分厌恶。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王、曹两人七八次上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三月十八日，市局的李姓“国保”又来找我谈话，企图诱使我表态就范：“古川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能否回来就看你的态度了。”但我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

据朋友讲，市局“国保”朱旭曾对古川和我在网上每日一推，点名向他们追讨二 0 一 0 年四月九日被查抄的电脑、护照等物品表示不满。朱旭说：“古川年纪不大，却顽固得像个老民运。”

良师益友张祖桦与王俊秀开始张罗为古川聘请律师的事。王俊秀先见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律师，夏律师因正在代理别的案子，无法接受我们的委托。于是王俊秀又见了朱久虎律师，朱久虎答应帮助古川，并与我签下了委托书。可是中共这套绑架失踪的黑帮手段无法使古川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度。

我度日如年，期盼着古川早日回家。我没有告诉父母真相，电话里总是报平安。我不想让父母担心，种了二十亩棉花忙于生计的父母也无闲暇帮我带孩子，何苦害他们一起忧心愁烦呢？

这段日子爱加倍教会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帮助。还有一位令我感动的是古川多年前的同事麦田，他打来电话对我们表示支持，他说：“别的忙帮不上，只能给您些经济上的帮助。请告诉我银行卡号，我打钱过来。”我心领了他的好意，但谢绝了他的帮助。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他的关心令我倍感温暖。

期间，身在德国的苏雨桐、美国的郭保胜都曾表示要给予我们经济上的帮助，我都谢绝了。郭保胜不解地问：“是害怕接收有危险吗？”我笑答：“不是。我在经济上还过得去。”我感谢这些朋友的支持，但想到也许有经济上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

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我接受了国际特赦组织和维权网的人道援助款。这两笔援助都是朋友们事先帮助申请，然后转给我的，在此一并致谢！

（四）

古川被秘密关押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光。我每天趁恩恩睡觉之际做饭，有时饭刚做好他就醒了，抱他哄他等他再次入睡之后，我才能吃上已经放凉了的饭菜。常常洗衣服尿布至深夜。有一天我发现内裤上的血迹，开始以为是产后月经恢复了，后来才知道是累出来的。期间，精神的压力、身体的重负使我痛哭过两次。

古川和我一直低调做事，以免树大招风，可是当局仍不放过每一个致力于推动社会转型的公民。

四月四日下午，我打 110 寻找被“失踪”的丈夫古川，抱着恩恩跟随 110 来到东小口派出所，洛洛则被留在了教会。派出所的警察称古川没有失踪，现在有确切位置。我问确切位置在哪里？他们却做出神秘的样子，表示不能说，并扬言：“这事不归派出所管，你找错地方了。”并不再理睬我。我决定不问出个结果便不回家，随后开始绝食抗议。

晚上十点左右，王东陪同市公安局李姓“国保”来到派出所劝我回家，我坚持不离开，他们无功而返。当晚有一些陌生网友给我发来短信表示支持并希望我保重，令我十分感动。

第二天，热心的王姐来派出所陪我，并帮助我照看孩子。

四月五日下午，市局刘涛和张姓“国保”前来与我谈话劝我回家，我提出要求：“要么马上放古川回家，要么解决我一个人无法看护两个孩子的问题。”

刘涛答：“古川现在回不来。”并继续古川在里面“表现不错”的谎言。

我坚称：“我不相信。即便古川‘表现不错’，也是在你们的酷刑折磨下被逼屈服的。”

刘涛辩解：“他绝对没有遭受过任何酷刑。”

我说：“反正你所说的我不会相信。除非让我亲眼见到他向他证实。”

我又追问古川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么长时间不放人到底想怎样？他们却从不提罪名，也不明确说因何抓人，只有王东提过一次古川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

刘涛最后答应：一、三天之内找个保姆帮我带孩子；二、适当的时候会安排我和古川通

话甚至见面。前提是我不能向外界透露今天谈话的内容，不能在网上提他们的名字。

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我也曾多次致电市局“国保”孙获，他每次都搪塞：“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不清楚。”后来干脆不再接我的电话。

我们租住在天通苑的房子本来二 0 一一年四月二日到期，房东在“国保”的协调下同意延期一个月。我猜测古川或许能在五月二日前平安归来。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局李姓“国保”再次来到我家，说：“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古川快回来了，你要耐心等待。”

之后，他们让我和古川通了电话。王东用他的手机拨通陈世杰的手机，我听见久违了的熟悉的声音:“你和孩子还好吧？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个人问题已交待清楚，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后，电话匆匆挂断。后来古川告诉我，这些话都是刘涛拟好让他照说的，否则他们就会掐断电话。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敲门声响起，我突然觉得应该是古川回来了。打开门，穿着毛衣戴着眼镜，黑瘦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的古川就站在我的面前，整整六十三天，恍如隔世。

古川被绑架走的时候还是萧瑟寒冷的冬天，回来时却已是花红柳绿的季节。我和孩子身上早已换上了单衣，而古川身上仍是那件离家时穿着的黑色毛衣，他仿佛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

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经历了带黑头套、不让睡觉、不给饭吃、不准走动、肆意辱骂、拳打脚踢、耳光如风、扒光裤子、被逼下跪等种种酷刑……负责审讯他的“国保”陈世杰见古川不肯屈服就范，就拿两个孩子来威胁要挟。古川很难过，内心充满了对孩子的愧疚之情。

古川回到家后总是腿痛，过了好些天才渐渐恢复。

两个多月不见爸爸，洛洛已经对爸爸感到陌生，他原来是多么喜欢跟爸爸在一起啊！我知道古川身体的疼痛会很快愈合，可他心里的遗憾与懊恼却要持续到孩子们重新与他熟稔亲热后才能渐渐消退。

古川获释的前一晚被逼在保证书和悔过书上签下我们夫妇的名字：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被秘密关押期间的情况，不准写“反动”文章，不准上推发言，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不准外出会见“圈内”朋友，不准去教会。还特别强调不能联系李金芳和朱久虎。每天要向他们做思想汇报。“国保”让古川承诺回家后做我的工作，如果我再有“不和谐言论”就惟古川是问，并威胁：“我们随时可以再抓你回来，关进监狱。”

我们发现“国保”陈世杰归还的两部手机里惟独不见了他的电话号码，那一定是陈世杰归还手机前删除了。他们如此强大，但又多么心虚啊！

（五）

五月份天通苑的房子再次到期后，我们本想把行李暂放教会，然后回老家休息几个月，待返京后再另行租房。但是“国保”不同意，说古川现在不能随便离京。我们只能留在北京继续租房。我们想搬去燕郊，因为那里房租相对便宜，“国保”又阻拦，逼着我们在天通苑北边找房。

找房子那几天，我们发现有人开着一辆面包车在楼下蹲守。一日，我走到面包车前问坐在驾驶位置的那个人“要不要帮我们搬家？”他看身份已暴露忙慌张地打电话：“喂，是陈世杰吗？我是东小口派出所的，他们让我们帮着搬家……那我们撤了？”挂断电话，他开车载着五六个同伙离开了。后来，我问陈世杰为何派人监视我们，他却矢口否认。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在房价只升不降的北边租了一套每月两千元的房子。

“国保”时常询问我们家里还有多少钱，并让古川接受生活补助，我们拒绝了。现在我还真有些后悔，恩恩的奶粉钱和高昂的房租都应由他们支付，就该增加他们的维稳成本，更

何况那本来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他们的罪恶是永远别想用钱洗清的。

搬入新居后，我们决定偷偷回老家，不幸半路被追了回来。陈世杰对古川叫嚣："你不要命了吗？你要是不马上返回，那就看守所见。"

我们实在不愿让两个孩子成长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国度，毒奶粉、毒疫苗、毒火腿肠……在这个毒化的中国，想保留一份健康、平安是多么奢侈。

古川回来的日子，我感谢那些没有忘记我们并前来探望的朋友：赵常青、蒲文昕、姜丽夫妇，和小宇、王家敏、杨民道、吴傲祺，这四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不仅大老远过来请我们吃饭，还硬是留下七千元，任凭我们怎样拒绝都坚持要我们收下。他们生活并不富裕，却对我们如此慷慨。

感谢路透社的黄瑞黎多次来电关注我们的境况，感谢前来采访我的香港《壹周刊》记者简淑明，采访结束后还留给孩子一千元。还有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人带给我们的感动与温暖。围观的确是一种力量，独裁政权不就是害怕用爱凝结在一起，守望相助的人们吗？我相信中共无论使用何种恐怖手段终有寿终正寝的一天。

借用网友的一首诗《删时代》来蔑视一下中共的独裁政权：

当你删除我的文字，
但删不去我的言语。

当你删去我的图片，
但删不掉我的呐喊。

当你删掉我的视频，
但删不尽我的怒吼。

当你删去我的真相，
但删不掉我的正义。

当你删掉我的声音，
但删不走我的良知。

当你删走我的视线，
但删不尽我的真理。

当你删掉我的名字，
但删不走我的人格。

当你删走我的权利，
但删不尽我的热血。

当你删尽我的生命，
我换来不灭的自由。

有一种信仰，它胜过世间一切力量，那就是主耶稣；有一种坚持，它胜过世间一切恐惧

与威吓，那就是追求公义与真理。不义的必坚立不住，作恶的必被剪除。

何杨，《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七０年代生于北京，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二０一０年开始参与公民维权运动，拍摄有人权纪录片《吊照门》、《应急避难场所》、《赫索格的日子》、《血色年华》、《反宫城》、《饶乐府》等。

二０一一年三月，被警方抄家并秘密羁押六日。

“双规”六日

何杨

整个事件应该从二０一一年二月十六日北京西直门的“饭醉”[77]活动说起。

二月初，陈光诚受迫害的视频流传出来，激起了所有“草泥马”和维权人士的愤怒。二月十五日我得到通知，第二天中午在一家餐厅聚会，之后，前往附近的山东省驻北京办事处抗议，声援陈光诚。孰料，聚会信息被“国保”截获，聚会场地也被取消。当晚，许志永、王荔蕻、阿尔、李和平等数人被上岗。我与滕彪商量决定，聚会照常举行，地点改在到西直门“鱼头火锅”餐厅。

几天前，我刚被解除了长达三个月的软禁，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像其朋友那样被再次上岗。十六日上午，“国保”打来电话，我未予理睬，照常赴约。共有十几位朋友与会，唐吉田律师刚从老家归来，从火车站直奔餐厅，数月不见，他消瘦了很多。照例大家逐一发言，讨论赴山东“挨打团”[78]组建的技术细节。“国保”的鼻子十分敏锐，朋友们尚未聚齐，数十名市局便衣闻风而至，数次想将滕彪带离，未果。

因为我正在筹备拍摄陈光诚的纪录片，所以让张永攀对聚会进行了全程录像。我完全没有想到，它最终成为警方对朋友们进行迫害的证据。

由于我和天天要去看望倪玉兰律师，故提前离开。傍晚，从父母那里接孩子回家，片警和两位协警在楼下把我拦住，说市局“国保”必须马上见我。

见面后，“国保”直奔主题，让我交出磁带。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我要求他出示搜查证，他说，出示搜查证没有问题，但拿来搜查证就不是只要一盘磁带的问题，而是要抄家了。不

[77] 指异议人士以聚餐的方式集会，此类活动时常受到警察的干扰或阻止，故取“犯罪”的谐音“饭醉”。

[78] 维权人士时常在维权过程中被警察，或其雇用的人殴打，故自嘲为“挨打团”。

得已，我最终交出了磁带。

回到家才知道，聚会后，滕彪、江天勇、唐吉田三位律师已相继被警方带走。当晚，滕彪、江天勇被释放，唐吉田被失踪。

二月十九日，网上有人发布去各大城市中心区域“茉莉花散步”的消息，当天，江天勇、滕彪再次被抓并失踪……二月二十日，响应“茉莉花”号召，上街散步的数十名网友被抓……唐吉田于一个星期后被遣送回延吉老家，并失去联系，他曾被酷刑的消息在朋友们中间流传。

自此，中国进入了“红色恐怖”时期。

对我本人而言，从二月十九日到三月十八日，是波澜不惊的一个月，除了在网上声援被失踪的朋友之外，我没有采取其它行动。期间，收到捷克人权电影节的邀请，被“国保”阻拦未能出境，随后被带到东北“旅游”十天，三月十六日回到北京。

三月十八日下午六点，妻子准时下班回家，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又被上岗了？”

我说：“没通知啊。”

她说：“楼下有很多车，还有十几个留小平头的男子，楼道里也有人。”

我立刻意识到要被抄家了——很多朋友都已受到了相同待遇，轮到我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反映是出去看看，被妻子拦住，问我：“你这几天干什么了？”

我说：“什么也没干啊。”（心里知道，这事儿和“这几天”没有关系。）

第二反映是准备拆电脑硬盘——我有两台电脑，一台是编辑影片的专用电脑，所有影片素材和资料都在这台电脑的硬盘上，早打算备份转移，但一直犯懒没有行动。

此时，传来敲门声。

“谁？”

一个女声：“物业的。”

心想，对于我们这些长年与“国保”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个手法太业余了。

马上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他要开始抄家了，准备电话录音（此后手机始终处于接通状态，直到“国保”把手机电池抠掉）。

第二个叫门的是一个恶狠狠的男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警察。

问：“哪儿的警察？”

答：“北京市公安局的。”

岳母和妻子都说不能开门。我知道门是非开不可的，砸烂一扇门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长时间与警察打交道，我已经没有什么恐惧感，但家人的感受肯定和我不一样。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此前我一直把自己的处境淡化处理。即使在被软禁期间，也刻意营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不过是某部纪录片引起的小麻烦，过一阵子就没事了，等等。现在想来，任何隐瞒和拖延都不会长久，事物终将显现出它的本来面目。

门一开，十几个便衣冲了进来，一律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此时，我只恨手不够用，一只搂住妻子，另一只揽住岳母，把儿子挡在身后，站在厨房门口的外侄女，被便衣一撞，头磕在了门框上，她大骂警察……场面一片混乱。

妻子表现得异常冷静，她要求领头那位便衣出示警官证，警官证一晃，我匆匆瞄了一眼，什么也没记住，但她却记下了上面的警号。此后她与警察的周旋，岳母心脏病发作后她冷静的处事手法，都让我感到敬佩和骄傲。借此，向女同胞们表达一下敬意——身边太多的女英雄：倪玉兰、王荔蕻、野靖环、苏雨桐、华泽、王译、刘沙沙、何培蓉、天天……她们勇敢、无畏、顽强、执着、智慧、果断。也许世事变换，我妻子也会成为一匹优秀的“草泥马”。

岳母身体本来就不好，受此惊吓，心脏病发作。转头看到儿子眼泪汪汪地站在墙角，我把他拉过来摸了摸头，什么话也没说出口。

传唤证、搜查证一件不少，只是上面的罪名一栏是空白的。问原因，答：等我们审查之后就知道了。

两个年轻“特警”[79]自从进门，就寸步不离地对我进行贴身控制，双手交叉，双脚分开，随时出手的那种姿势，一看就知道受过专门训练。

抄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严格，一共只花了十几分钟。抄走了两台电脑、一部手机、几张银行卡和医保卡（可能要查查我有什么病，免得不小心把我打死了），还有几张A片。心里有些担心——他们不会以“淫秽罪”逮捕我吧？

“你们什么时候能放人？”临出门时，妻子问“头儿”。

“二十四小时会给你信儿，我有你的电话。”

我向妻子喊了一声：“给李和平打电话!”（其实这话说得多余，此时，律师们都已自身难保，滕彪、江天勇、唐吉田、李天天、刘士辉、唐荆陵、金光鸿，到后来的倪玉兰、李方平、黎雄兵、刘晓原……在这波镇压中，维权律师是重点“专政”对象）

有了上次进去的经历[80]，这次知道要多穿点衣服，有备无患。

---

[79] 主要用来对付恐怖分子和暴力犯罪的特殊警察。

[80] 二0一0年十月八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后，作者曾与许多朋友一起被警察抓捕并关押二十四小时。

楼下停着一辆无牌照的别克商务车，我和两个始终跟着我的“特警”坐后排，他们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分别擒住我的双手。所有动作都是标准化、程序化的，不知演练过多少次，很有职业感。

车出小区，向北。

坐在前排的“头儿”下命令，“把他的眼镜摘下来！”“你是知道规矩的，别惹麻烦！”

此时我的两手被掰成了“爪子”，丝毫不能动弹，都这模样了我还能惹什么麻烦。

“给他放松！”两个“特警”听到命令才把我的“爪子”还原成手，但仍然紧攥着我的手腕。

“把头套给他带上！”

左边的“特警”随即将一个黑头套麻利地罩在我的头上。感觉头套是双层的，内衬银色石棉布，十分厚实，只有些许光线从下面透进来。

“调整呼吸！”“特警”整理了一下黑头套，扩大了里面的空间——嗯，还不想把我憋死。

黑头套的故事听过太多了：滕彪、李和平、刘德军、刘沙沙、飘香……有人曾在推上对《飘香蒙难记》[81]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其中以胡荻（此时他也被失踪）为甚，我在推上还和他们打过几仗[82]。但本人在此之前没有享受过这一待遇，经过黑头套之后，“草泥马”的荣誉又添上了一笔。

虽然此时天气不算热，但黑头套内空气不通畅，很快，流下来的汗就迷住了眼睛。

汽车在城里开了一小时左右，然后是高速路，接着是乡间公路，大约两个小时后，车停了下来，听到和门岗检查证件的对话。此时，天已全黑，蒙头蒙脑地被带下了车。“特警”一左一右架着我，提示：“前方上台阶、找楼梯，左转。” 感觉楼梯较窄，三个人并排走很困难，心想，肯定是黑监狱。

左转没走几步便进了一个房间。

“双臂伸开！”然后是搜身，解皮带。我穿着一双无带的便鞋，如果有带的话，恐怕也得解下来。

被按坐在一把椅子上。

听到一个“特警”命令：“双腿分开，双手扶膝！”

照做之后，“头儿”发话：“把头套给他摘下来。”

---

[81] 指独立纪录片导演华泽（网名灵魂飘香）记述她被警察用黑头套绑架经历的文章。

[82] 指在推特上发生的争论

似乎是一间宾馆的标准间，但是没有宾馆里常见的用具和摆设。正面一张桌子，周围几把椅子，墙角立着一个床垫，脏兮兮发黄的壁纸，地毯上到处是烟头烧焦的痕迹，右侧是一个壁柜，里面堆满了毛巾——这些东西是以后才看见的。当时视线只能集中在前方，担心一扭头，就会挨一个大切脖（去年十月八日庆祝刘晓波获奖那天，就挨过一下）。

房间里除了我，还有四个人：一个指挥抓捕我的"头儿"，一个戴眼镜的"国保"，两个仍然以标准姿式站在我旁边的，虎视眈眈盯着我，好像随时准备扑上来扁我一顿"特警"。

没人理我，只有两个"特警"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好像随时准备扑上来扁我一顿。心里虽然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仍不免提心吊胆。

关于酷刑，已听得很多，高智晟律师是最典型的例子。那种酷刑一般针对拒不妥协、"顽抗"到底的勇士，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也没有那么强的意志，他们应该无需下此狠手。

"告诉你，这不是你家，在这里要讲规矩！听见了吗？"

"听见了！"我小声回答。

出于职业本能，我时常会跳出自己所处的位置，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此时，我仿佛就是一个置身事外，正在拍摄纪录片的导演，我甚至已经选好了机位，就在墙角的床垫前。而这个坐在椅子上被审讯的人与我无关。在这种意识中，一切仿佛突然间安静下来，没有紧张、没有恐惧。感觉那回答像空谷的回声，而不是出自我自己。

"大声点！""头儿"大吼一声。

我知道例行的恐吓开始了，这是所有初来者都要经历的过程，用一系列的恐吓、威胁，包括体罚，来消灭你反抗的锐气和意志。

"听见了。"我提高嗓门。

"刚才在你家是给你留面子，到了这儿我可就没那么客气了。你也别想什么传唤二十四小时的事儿，那只是说给你家里人听的，既然我们花了那么大警力把你弄来，你就别想再回去了，三个月、两个月是它，三年、两年也是它，让你永远消失也不是难事，我就不信外面的人为了你能闹翻天。滕彪怎么样？喊去吧（指网友们在推特和微博上的呼吁），管个屁用。告诉你，在这儿别跟我讲人权，这儿没有人权。碾死你就跟碾死个臭虫……"

"还喝茶！还旅游！想得美！"

"告诉你，到了这里，想当人容易，想变鬼也容易……"

"我见到你们这种人就烦，一天到晚牛逼烘烘的，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在这里，你就是一堆臭狗屎……"

"头儿"说了很多，除了恐吓就是污辱，这是预审开篇的必然程序（后来从跟我较熟

的区“国保”那里得知，这个程序他们的行话叫“拍虎”)。而此时，我的意识仍然站在床垫前观察，就好像他在训斥一个陌生人，这样心里的挫折感便减轻了很多。

“你这几年没少折腾啊，上窜下跳的，挺有名的嘛，你干了什么事不用我们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好好想想!”这句话他不说还好，一说就露了馅——首先，二月十六日那天饭醉活动之后，我没有任何具体行动，与“茉莉花”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只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条深圳散步地点的推，当时负责我的“国保”斥责了我。如果因为这个转推就抄家、抓人显然不合常理。即使要抓也应该当时抓，而不会等我被旅游回来再抓)；其二，我参与维权活动，是从二０一０年四月二十二日拍摄《吊照门》开始的，到被抓当日尚不满一年，何来几年之说，看来抓捕队的“头儿”对我缺乏了解。

他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软包中华烟，对于我这个烟民来说，真是一种折磨，床垫前的那个替身不太起作用了。

“何杨，你吃饭了吗？”

看来第一阶段审讯结束了，算算离家的时间，此时应该是十点来钟。

“没有，我正在做饭，就被你们抓来了。”

“头儿”从门外拿进一瓶矿泉水，放在我的椅子旁：“这是你的，但这里有规矩，任何动作之前都必须喊报告。听见了吗？”他指了指始终站在我身边的“特警”。

我点了点头。

“问你听见了吗？!”厉声喊道。

“听见了。”

“头儿”和带眼镜的“国保”出去了，估计他们也饿了，找地方填肚子去了。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折腾，我确实渴了。

“报告。”

“什么事？”一个“特警问。

“能喝水吗？“

“不行!”吼了一声。

“特警”岁数都不大，二十岁出头。“特警”——是我见到他们的第一印象，但之后想想，应该是“国保”抓捕队的队员。他们身材高大结实，十分精干。如果走在大街上，看上去就是一群阳光男孩儿。但如果知道他们的日常工作，想必阳光感就会瞬间消失，代之以阴森的恐怖。不知在他们孔武有力的手下，多少异议人士、维权律师成为牺牲品。内心对他们充满怜悯，这种摧残人性的职业，把正常人变成了魔鬼，爱和光明在他们心里能有多少？

突然，右边的“特警”大吼一声：“你咬什么牙！” 想问题的时候，我有磨牙的习惯。

“我咽唾沫呢。”

“咽唾沫还没完没了啦！”

哈，口腔内的活动也被剥夺了。

“头儿”带回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虽然你在这里没有人权，但我们保障你的生存权，吃吧。”

说实话，我真吃不下，但为了保存体力，我必须吃。关键是有机会喝水了，但不敢喝太多，这瓶矿泉水喝完，不知还有没有下一瓶。

两个“特警”终于撤岗了。他们保持一个姿势站了一个多小时，确实不易，恐怕不比一动不动坐着的我舒服到哪儿去。

预审正式开始了，审讯我的共有三个人：一个是“头儿”，一个是记录员，一个是带眼镜的“国保”。在普通人的印象里，“国保”都是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样子，其实，他们大多数和普通人一样。我接触的北京市公安局第一总队（“国保”总队）的人有十几个，脸带凶相的还真不多。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比如预审，或者需要实施暴力的时候），谈话也都较有分寸。不过，接触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面目是可以随时转换的，翻脸比翻书快。因此，万万不可被他们的假相所迷惑。

“先给你定条规矩。”“眼镜”发话了。

“以后无论什么人进来，你都得站起来，说领导好，不让你坐不许坐。听见没有？”

这可真叫摧残尊严。想到那些堂堂正正的律师、学者、教授，那些将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面临此情此景，内心将会受到怎样的煎熬。又想到唐吉田律师，他那宁折不弯的性格，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表情，能够听到他的回答——鄙视地撇撇嘴：哼，领导？你们算哪门子领导？别以为你们是奴才，把我也当成奴才！

不，我不会像老唐那样，这不是我的性格。本人有时易怒，但也分场合。况且，此时此刻，我心里确实没有丝毫愤怒，更多的是要见证：见证朋友们的磨难，纪录站在最前沿的战友们，在这伟大变革时期的真实故事。因此，我不太在意形式上的委曲求全，细节上的抗争只会让我躺着出去，然后再也没有机会发出声音。

“听见了。”我回答。

“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不知道。”

“你装什么蒜呐！你干的那点事儿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

“你的 Gmail、Skype 密码是多少？”

一年来，我确实经历了很多事儿，生活也从地上渐渐走到了地下，况且我对抄家早有思想准备，Gmail 和 Skype 都设定为信息不保存，Gmail 里的邮件也经常清理。被抓来的路上，我反复回忆邮箱里是否有遗漏的敏感内容，确定没有大碍后，我把密码告诉了他们。

“如果你敢骗我，哼哼……” “头儿”拿着记有密码的纸条出去了。

审讯主要由“眼镜”进行，从家庭背景到如何进入维权圈，拍了哪些片子，参与了哪些活动，其中问得最多的，是二月十六日“饭醉”现场的情况，具体对话已记不太清楚。

那天的录像他们显然已经看过了，录像带里的内容比我记得还要清楚，但仍然纠缠不休。

“你们在西直门吃饭是哪天？”

我抬着头想，死活也想不起来具体日期。

“眼镜”突然在我腿上踢了一下：“拿鼻孔看人，这就是你的家教？”

实在想不起来——二月十六日，这是他们在笔录上写下的日期。

接着是关于“茉莉花”事件，日期我也记不得了。又挨了一顿骂，说我装蒜什么的。又问我是谁组织、谁发起的——我哪儿知道，我还想问呢。说实话，对“茉莉花”事件我没有好感，觉得是海外那帮人闲得蛋痛搞出来的。本来蒸蒸日上，稳步发展的公民维权运动和“草泥马”力量，因这件不靠谱的事而损失惨重。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对“茉莉花”事件如何评说，是将来的事。

苏雨桐是我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起并肩打过仗。当他们问我，苏雨桐是否参与了“茉莉花”事件时，我断然地冲口而出：“没有!”。

“先把你自己的屁股擦干净了，再给别人洗泥!”“头儿”说。

“眼镜”:“我告诉你，苏雨桐知道!”

我不再争辩，心想，苏雨桐在国外，凭她那股子蛮劲，还真说不定参与了。

他们把我抓来的理由，就是我转发了一条“茉莉花”事件的推文，但这不过是找罪名的借口，因为关于这条推文，他们一共也没问几句话。

“你觉得委屈吗？”“眼镜”问。

“不觉得。”这个回答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这是早晚的事儿。只是觉着奇怪，为什么把我抓到这个地方，而不是看守所或者拘留所。”

“对呀，看守所、拘留所都有日子（期限），这里没有。”

如果讲法律，“双规”就是违法行为——非法拘禁。通常它针对副处级以上党内干部，不知道对我们采取的这种强制措施叫作什么。我把这称为“双规”，只是借这个人们熟悉的名词用一用。出来之后，区“国保”说我用词不当，说我不够“双规”的级别。我虽然不够“双规”的级别，但我已经够了“草泥马”的级别。

其中有一系列的问话是围绕胡荻展开的，这使我感觉非常诧异。我和胡荻的交往，仅限于在推特上的一次争吵。前面已经提到过，因为《飘香蒙难记》，胡荻、老武等人对飘香进行了一次围攻，意指她造假，编故事。作为战友，我深知飘香为人，故挺身而出为飘香助阵。我发过一条推文评价胡荻：“躲在被窝里猥琐地伸出兰花指。”意思是他没有经历过任何凶险，只会躺在安乐窝里指点江山。也许因为这句话，激发了他去王府井参加“茉莉花”散步的冲动。当然，这只是猜测。

之后的审讯无关“犯罪”事实，而是一连串的羞辱和讽刺。

“这么个大男人，还靠老婆和父母养着，你要脸不要脸……”

“你说说你为家庭做过什么贡献……”

“你就是虱子，寄生虫、社会渣滓……”

这确实是我的软肋，问心有愧。但这也轮不着你们管啊，“双规”如果用来做家庭责任批判，那也太劳民伤财了；如果用来做道德批判，那所有当政者和诸位“国保”都要进来过过堂。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人的……”

“谁和人民为敌，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对敌人我们绝不会心慈手软……”

晕倒，无语……

这一串宣言式的独白之后，可能因为累了，也可能他们确实从我的电脑、Gmail、Skype里都没有查到可作为证据的东西，审讯者的态度不像先前那么强硬了。

“你拍的这些片子为什么都是单方面讲述？”

“我无法采访到另一方。”

“拍不到你就播啊？你能保证这些人说的是真话吗？”

“当然可以保证，因为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

（第一次和市局“国保”对话时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中央电视台天天单方面报道，他们比我的条件好多了，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问？）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最关键的是真实对不对？”

这句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感到十分荒谬。我党与真实为敌，都九十年了，党徒还敢以此为口号！

“你觉得你拍的这些片子真实吗？”

回答这样的问题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在一个不公平的对话环境里，面对一个已经预设立场的人讨论这种问题，嗤……

“你接受过外媒采访没有？”

“接受过，因为倪玉兰的事、因为刘晓波的事、因为江天勇的事……”

“江天勇什么事啊？”

“被‘国保’堵门锁。”

说完之后，有些后悔，话从嘴里溜出来还挺快。果然“国保”急了：“你怎么知道是我们干的，你见着了？你给我听好了，以后没见到的事别他妈瞎说！”

经过磨人的两三个小时，预审终于结束了。签字的时候，由于长时间手扶膝盖，保持一个固定姿势，手臂已经不会打弯，竟然在签字栏上画了一个圈。哈哈，就当一回文盲吧。

审讯者走了以后，进来了两个看守，没有“特警”那种职业范儿，他们随便找把椅子歪歪斜斜一坐。自进了这个房间，我一直保持双手扶膝、腰板挺直的姿势，所有关节都像锈住一样。看他们二人不像“国保”，便试探着问：“我可以靠一会儿吗？”

岁数大些的看守犹豫了片刻：“那就靠一会儿吧，不过等会儿还得那样。”

如获大赦，终于可以靠在椅背上稍作休息。此后，他们没有再让我坐回到原来的姿式。

虽然十分疲乏，但坐着根本无法入睡。和滕彪一起见过太多酷刑案例，剥夺睡眠是最常见的酷刑之一，让人极度痛苦而又不留痕迹。在拍摄《朱明勇律师访谈——重庆黑打》时，朱明勇说他的委托人樊其杭，连续六个月没有睡过床，也没有一次完整睡眠，最后导致神经错乱。想来自己应该不会被折磨到那个程度，最短三天，最长一周，这是当时的自我预测。

其实两个干坐在那里的看守，也不比我好受到哪儿去，看他们对我的态度，与“国保”显然不是一路。后来从言谈中得知，他们是从远郊区县派出所抽调来的警察，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

比预想的情况要好，水可以随便喝，喝完了一杯，他们就出门去续。趁他们开门的时候，我扭头看，门外是一个走廊，右前方有一个房间，里面传出训斥的声音，想必有一个朋友被关在那里。

第一班看守，我称他们“二沉默”，因为他们经常几小时不说一句话。在后来我可以睡

觉的几天里，很希望他们值夜班，因为我睡觉轻，一点动静都可能被惊醒。但不希望他们值日班，因为对我来说，听别人说话是一种消遣，否则几个小时只能自已胡思乱想，十分难捱。

水喝多了就要上厕所，这使我得以观察整个房间的全貌。厕所窗户是磨沙玻璃的，开着一条小缝，外面有铁栏杆。夜色已深，窗缝里吹进来清新凉爽的风，真想多站一会儿，享受一下这自由的空气。低头看到坐便器，不由得心里一颤——上面全是黑色的污渍。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胆汁？其实我没有见过胆汁，不知道什么样，但那污渍肯定是身体里面的东西。老唐！唐吉田瘦弱的身影浮现在眼前，这一想法再也挥之不去。我这么想不是毫无道理，第一，在我进来之前，被失踪者只有唐吉田被释放；第二，传言唐吉田被酷刑，依据他的性格，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当时没有想到那是血，在我的意识里，血是红色的，忘记了血液氧化之后会变成黑色，当然，这些也只是猜测。

我本想刷刷牙，但发现只有几把用过的旧牙刷，只好作罢。壁柜里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用过的毛巾，其中一条上面还有血迹。

三点钟，看守换班。此后，我的时间概念全是通过他们的换班时间来推算的。看守一共八人，分四班，每班四小时。

第二班看守，我称他们“二烟枪”，因为两个人都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他们是话最多的一对儿。开始，我想也许可以从他们的言谈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后来，对无比寂寞的我来说，不管有用没用，只要能听见有人说话，时间就不那么难捱了。

“据说这里离水库很近，明天咱们早上去看看。”

水库？十三陵水库？我听李和平说过，他曾经被关在小汤山附近，那里离十三陵不远。

从谈话中得知，他们都是从部队转业之后当上警察的，在部队里至少也是连级干部，转业后却干上这么个差事。

“这他妈是什么活儿啊！”他们经常这样发牢骚。

早上七点，“二烟枪”轮流去吃饭，之后给我带回来早餐：鸡蛋、包子、油条。熬了一夜，早已饥肠辘辘，迅速吃得干干净净。

“看不出你这么瘦，还挺能吃啊。”“二烟枪”说。

有人倒水、有人送饭，吃完了撒手不管，嗯，这是在里面唯一的好处。

第三班，我称他们 “二昌平”，因为他们两人是从昌平抽调来的。其中一个很和善，偶尔还会和我聊上两句。

我问他是否有规定不许和我说话，他说没有，但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没什么话说。我就自我介绍了一下。

“啊，你是反共产党啊!”

“我没反共产党，我只是拍弱势群体的纪录片，共产党不喜欢。”

估计也是苦出身，从他语言动作之中所流露的亲近感很容易察觉到。

每当我上厕所，他都会让我在厕所里多待会儿，这是我唯一可以站立的机会，人坐久了，感觉全身都皱在了一起，需要站起来舒展一下。

透过窗户的那条小缝，可以看到一个停车场，停在那里的车大多数无牌照（我被软禁期间，用来监视我的车辆大多数也都无牌照）。停车场的右侧有一个小楼，可能是餐厅，曾经看到我的看守拿着饭盒从里面出来。左侧看不到的那边可能是一个篮球场，有时传来打篮球的声音。远处隐隐约约停放着一艘警用摩托艇，说明这里离水库非常近。我没有戴眼镜，所以无法看清更远的景物，但感觉那里就是水面。综合分析，这里应该是一个属于公安部门的宾馆或培训中心，临时成了秘密监狱。

我被关押的房间朝北，透过窗帘缝隙，可以看到阳光越过屋顶照在对面的树上，树叶摇曳出朵朵金花，璀璨夺目。清澈亮丽的空气，将万物包裹得晶莹剔透。使我想起勐宋山密林中的潺潺溪水、想起西陵峡的五彩悬壁，想起儿子在草地上打滚沾上的满身露水。那只是一条窄窄的缝隙，但它却意味着自由。在后来的几天里，这条缝隙成为我唯一的慰籍。

最后一班看守，我称他们“二延庆”，因为他们是来自山区延庆的警察。其中五十多岁的那位偶尔会让我站起来做做体操，活动一下筋骨，这是在里面受到的最高待遇。

十九日这天没有人来问话。到晚上，我已经三十六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又困又乏，歪歪斜斜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各种坐姿，头沉得抬不起来。我向看守抱怨，这样坐着很难受，“二延庆”中年岁较大的那位告诉我，他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别的看守说，他们看管的人只能坐方凳，不像我还可以坐有靠背的椅子。

“别发牢骚了，你已经是最好的了。”

不寒而栗，心里真为朋友们捏把汗。

十九日晚，“二昌平”正准备交班，“眼镜”“国保”推门进来了。

“今天可以放平了。”

“二昌平”想帮我把立在墙边的床垫放下来。“眼镜”立刻制止：“让他自己搬。”

床垫是光秃秃的，上面什么都没有。我把自己的衣服叠了叠，枕在头下。想到有人曾总结过人生几大快乐，其实，在极端缺乏的情况下，意外得到的就是最大的快乐。

刚躺下一会儿，“二延庆”就来换班了，“二昌平”告诉他们，是领导让我躺下的。

“二延庆”感叹：“他也够累的，肯定一躺下就着。”

我面朝墙壁躺着，没有吱声，此时困倦突然消失了，头脑格外清醒——进来以后唯一恐惧的就是酷刑，想到酷刑就毛骨悚然，至于会关多长时间，或者会不会坐牢，考虑得并不多，长期当宅男已经习惯了，不过换个地方待着而已。既然进来的第二天就允许我睡觉，说明不打算对我实施酷刑了。再想到妻子，相信此时，她比我还要难熬，我知道她会从最极端的角度设想我的处境，随着时间的拖延，不知她会怎么样……整夜就这样胡思乱想地过去了。

早上七点钟，看守送来了早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许多年来，我很少有时间读书、思考，大多数时间除了拍片子，就是剪片子。此次强迫性“休养”，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反思过去若干年的得与失。

记得一个体制内的好友曾对我说：“何杨啊，你就是错过了进入体制的机会。”我反复咀嚼这句话——其实这是一个要真实还是要舒适。在当下，它们形成了一个悖论，真实等同于苦难，舒适等同于虚伪。其引申的含义归结于一点，就是要不要良知，或者说要不要灵魂。当把问题理清之后，答案就很容易得到了。也因此，我给自己这些年的选择一个高分。而此时的种种难捱，也因顿生的荣誉感而减速弱了许多。

这里的伙食还算丰盛，这让我想起和朋友们的一次次“饭醉”。滕彪、江天勇肯定就在这幢楼里，我们近在咫尺，却又天各一方。

二十日下午，终于等来了第二轮审讯。

与我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盼望审讯——为了能说话。我不过才被关了一天，可以想象那些被单独禁闭的朋友，几个星期、几个月都见不到一个人的感受。

这次审讯换了三个人：两个“国保”，其中一个很胖，像个生意人，还有一个记录员。这个记录员我感觉面熟，好像是某次街头打仗时，他拿着摄像机对着我们录像。

“抽烟吗？”胖“国保”问。

我已经两天没抽烟了，烟瘾犯得厉害，伸手拿了一根：“我打算借这个机会把烟戒了呢。”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人，假幽默。”

胖“国保”的策略显然是唱白脸，和唱红脸的相比，白脸肯定让人舒服一些。

“这是负责你的人。”胖“国保”指了指另一个警察。

“我们都是专案组的。”——不用问也知道，是“茉莉花”事件专案组。

“咱们就是随便聊聊。”

两人年纪和我相仿，又都是北京人，自然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从小学开始聊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这种闲聊的目的，一是为了缓和气氛，使我放松警惕，近而发现更有价值的信息；二是为了了解我的成长经历，以判断我参与维权运动的动机。“国保”对动机十分

敏感，好象他们特别痛恨直奔名利而去的人。

胖“国保”的谈话基本不涉及政治，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与其他“国保”相比，他的知识面要广一些。他坦言高智晟和胡佳都归他负责，并且与两人的交流也非常好，还说他们是性情中人，无论是勇气还是人品都令他很敬佩。这席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高智晟律师的悲惨遭遇我早有耳闻，如果是他负责高智晟，那些酷刑是否与他有关？

我问了一些胡佳的情况，他说胡佳的身体并无大碍，再过一段时间就出狱了。他认为胡佳的行为有些冒进，无所顾忌地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接受国外机构资助，最终害了他。这番话大概是说给我听的。

接着他便开始询问我和境外媒体的关系。此前，因为倪玉兰律师的案件，及其它街头抗争行动，我接受过一些境外媒体的采访。

“你知道，如果判你的话，会以什么罪名吗？”

“我恐怕够不上‘煽颠罪’吧，如果非要找罪名的话，大概是‘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寻衅滋事’。”

“嗯，你还挺清楚。”

“就因为你发了一条推，我们就可以办你。其实也不用那么复杂，劳教三年就够你受的。”

他这么说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早就知道劳教这种丑陋的制度，它不经审判便可以将你羁押，公安局就可以直接做出劳教决定。

“我看人是比较准的，你也不是真要搞革命，但是话说回来，你这么继续走下去很危险。如果下次咱们再见面，尴尬的不是我，而是你。”

胖“国保”的任务完成了，留下另一个警察做笔录。这个警察人挺和气，他不是“国保”，是专案组需要人手，从其它部门调过来协助工作的。除了按程序做笔录外，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闲聊，他讲他的工作，讲他的家庭，讲他的生活：

“嗨，人不就是一辈子吗，干嘛给自己找不自在？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

“你看，我升副科了，工资又长了几百，我知足。可能我这人比较低级啊，也没什么文化，但这就是老百姓的日子。”

“我一天到晚和坏人打交道，天天面对的就是社会渣滓，看到的就是最阴暗的那一面。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除了当警察不会干别的。”

“你上网吗？”我问

“上啊，上网‘斗地主’。”

“不看新闻？”

“每天累得贼死，倒头就睡，还看新闻？所以你刚才说的什么翻墙啊，什么陈光诚啊，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不是咱们老百姓能管的。你想帮人，那么多人你帮得过来吗？还是那句话，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

“你呀，就是家庭太好了，父母太惯你了，没受过罪，不像我们苦出身，小时候有上顿没下顿的。你要是过过我们以前的苦日子，就知道什么叫知足了。”

“我对家庭挺知足的，但对社会不知足。”

“嗤……”他撇了撇嘴。

说实话，我很喜欢和他聊天，他人很实在，不像“国保”那样虚话连篇。可以感觉到他隐约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与警察打交道时间长了，发现他们中间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人，甚至“国保”中间也有，所以那种遇警必反的言论我是不赞同的。曾经在推特上发表过这一观点，认为恶警和普通警察必须分开，不能一概而论，结果挨了一顿砖头[83]。这种愤青（无论左和右）思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去人性论，与当前体制思维异曲同工。

“咱俩如果换个地方认识，很可能就成哥们儿了，都是实在人。”

我点头表示同意。

“放不放你，不是我说了算，上面还有好多头儿呢。但我会说我该说的。”

“明天我再过来和你聊天啊。”

谈话结束了，心情好了一些。

房间里满是烟味，“二延庆”不抽烟，受不了这味道，打开窗户透风。水库边的空气十分清新，夕阳西下，春风和煦……真的感觉很奇怪，进来之后有些滥情，多年没有的浪漫情怀，在此时此地不断地被一点点细小事物所引发。困境，会激发人强烈的求生欲，而浪漫或许是自我解救的最好方法。

半夜，迷迷糊糊被隔壁的声音惊醒。

“我 X 你妈，X 你妈……”一阵怒吼和谩骂声，有人呻吟，低沉的申辩声。

又是一阵谩骂和怒吼……从这种暴虐的声音中不难判断隔壁的情形。

听那申辩的声音，第一感觉是李海。因为在我之前，李海已经被抓，在失踪人员名单中，他的年纪最大。下午的好心情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

“这是干吗呢？”“二烟枪”说。

[83] 指被网友围攻。

我偷眼看，“二烟枪”满脸惊恐。可能在这两位退伍军人的警察生涯中，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景。

“没你的事，睡你的。”

我面向墙壁躺着，伸直了耳朵听，叫骂声、呻吟声，和东西倒地的声音混杂在一起，门被猛烈地撞击，走廊里也传来嘈杂的声音，随着走廊远处一扇门被重重地关上，所有的声音嘎然而止。

二十一日，那个负责我的警察没有如约前来。不过，“二昌平”让宾馆服务员进来打扫了房间，把坐便器擦干净，还拿来一些新的牙刷和香皂。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已经躺下了，一个“国保”推门进来，此人又高又壮，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孙迪（北京市“国保”总队总队长）。

“真把这儿当你家了，想睡就睡？起来，起来!”

来者不善，就他单独一人，没有记录员，看来不是审讯。

“今天我来跟你聊聊。你的事我听了不少，人没见过。”

点了根烟，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听说你是北京人，所以过来看看你。”

心想，圈里的北京人还真不多，难怪他对我好奇。

“你父亲是外交部的？”

“是。”

“怎么混到这个圈里来的？”

“拍纪录片。”

“你为什么拍啊？”

“觉得不公平，看不过眼。”

“你觉得美国就公平吗？”

“美国有机制约束，我们国家没有。”

“这些年中国进步没进步啊？发展是不是需要时间啊？是不是需要社会稳定啊？别以为美国怎么着，告诉你，美国也有我们这种人，你想颠覆美国试试，一样。”

这种言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辩论环境。

“抽烟吗？”

软中华，我拿了一根。

“你知道吗？因为你是北京人，你占大便宜了。”

第一次听说，这和北京人、外地人有什么关系?

“我最讨厌外地那帮小孩儿，本来到北京来找工作，就像傍大哥似的，认识了某个民主圈的大佬，觉得可以出名了，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

“你知道你们这个圈里有多脏吗？”

我摇摇头：“您告诉我点吧。”

他诡异的一笑：“有必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之后的话题大多是重复先前审讯时的内容，具体细节已经记不请了。不过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中国，颜色革命一百年、二百年也成功不了，即使真要成功了，在成功之前，我也要把你们这些人全干掉!”

赤裸裸的恐吓!据说黎雄兵律师也曾经听到过同样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出自同一个“国保”。

“你写个保证书怎么样？”

“保证什么？”

“保证以后不和滕彪他们接触。”

“那也太不近人情了吧，我们私交很好，总不能不让朋友见面吧。”

“那你们见面的话，能不能告诉我谈话的内容？”

“啊？！您是想让我当线人？”

他点点头。

“那不可能，那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他倒并没有坚持：“你有你的原则，我不强求，但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和他们共事。”

这点我虽有犹豫，但还是答应了。在这种局面下，妥协并不耻辱。

二十二日晚，负责我的那位警察和一个酒气冲天的老“国保”一起来了，看来晚餐没少喝。

警察说他昨天忙，所以没有如约前来。我可以理解，他来不来恐怕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这次以老“国保”问话为主，态度很生硬。

“你觉得圈里的人都怎么样啊？”

“和社会上任何群体一样，什么人都有，但其中不乏英雄。”

“哦？你觉得谁是英雄啊？”

“滕彪，王荔蕻……”

“为什么？”

“他们正直、勇敢，敢说敢当、敢做敢为。”

“你怎么评价自己啊？”

“正直、善良、冲动……”

“滕彪可不冲动，我太了解他了。”

看来他是负责滕彪的。

“那你怎么评论胡荻呀？”

怎么又来了，为什么总把胡荻和我扯一块儿？

“我不了解他，不过觉得他可能心理有问题。”

“怎么心理有问题了？”

“偏执。”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从他发的推上。”

接着对“茉莉花”事件，对体制，对政治现实又进行了一番理论说教。过一会儿，负责我的警察把他叫了出去。一会儿，警察单独回来，对我说：“他不了解你，我和他说了，你就是从小有自由主义倾向，不受管。”“你应该没什么大事，我再和‘头儿’说说，别着急。”

心里很感激他，心想，可能真要回家了。

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多钟，再次见到抓捕队的“头儿”，和那两个“特警”。

“收拾你的东西!”

除了皮带和眼镜，我没有其它东西。像来的时候一样，戴上黑头套，被“搀扶”着下楼、上车。车开出一个小时之后，“头儿”命令把黑头套摘下来。窗外已经是西四环。

“头儿”说：“今天算是审查结束了。但是告诉你几个原则，一，里面的事不许透露。再有，作为新闻工作者，你应该核实新闻的真实性，别胡说八道。”之后不再理我。

借着车窗的反光，我照了照自己的形象，胡子已经很长了，想像妻子看到我的反映，这个样子肯定会吓着她。

车进了丰台公安分局后门，这个门只让出不让进，但“头儿”要着第一总队的威风，完全没把看门的保安放在眼里。

终于见到了“老朋友”——负责我的分局“国保”。交接之后，他们设宴为我“洗尘”。饭桌上，分局“国保”祥细询问了里面的情况，然后说，抓我的事他们完全不知情，总队不告诉他们。他们也很着急，为我获释做了不少工作。对此，我就不做评价了，时间会证明一切。

直到此时，“双规”才算真正结束。

我的家人在恐惧、愤怒、哀伤中度过了难捱的六天。他们毫无准备地被我带到了战地前沿，这种愧疚只能来日补偿。

我可能是失踪者中最幸运的人之一，其原因总结几点，第一，我是北京人，北京“国保”地域感很强，其深层原因不得而知；第二，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国家干部，这也是他们考量的因素之一；第三，我没有具体的“犯罪”事实，也没有他们认定的“罪大恶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我的态度比较温和，没有激烈的对抗。

目前，被失踪和被抓捕人员的名单并不完整，粗略估计应有数百人。当局如此图穷匕见，无疑是在自掘坟墓。二0一一年，中国维权人士集体被失踪、被抓捕事件必会在历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我相信，总有一天，所有失踪者的境遇都会公之于天下。

陈家坪，本名陈勇，一九七０年代出生于重庆，现居北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纪录片导演。二０一０年开始拍摄讲述外籍在京务工子女争取公平教育权的纪录片。

我被带进丰盛派出所

陈家坪

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一早，我匆匆起床，洗漱完毕，背上摄像包出门，乘坐四号地铁。因为一些非北京籍学生家长在网上约定，今天是去教育部请愿的日子。

他们当中许多人来北京时还是少不更事的小伙子、小姑娘，二十多年过去了，结婚，生子，漂泊者总算有了生活的根。现在，他们的孩子面临高考，户籍在哪儿就得回哪儿去。对于这些学生家长来说，不是个人生命的创造决定生活的根基，而是国家的户籍制度限定了人身的自由。并且，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包括他们的孩子。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及时变革，他们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都走不出户籍制度对人生的限制。当然政府会说，你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但是，能以高考改变命运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而现在的问题是，作为非北京籍家长的孩子，他们尽管在北京接受了同样的教育，却不能同样在北京参加高考。如果按户籍制度规定，孩子回原籍参加高考，两地教材不统一，加上方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孩子还得重新适应原籍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孩子本来在北京健康成长，为什么非要去接受这种人为的挫折呢？因此，一些学生家长自觉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上广泛征集签名，每月一次去教育部递交签名册，呼吁政府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今天是他们请愿活动开展一周年纪念日，签名人数已超过三万，《财新》、《燕赵都市报》等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多名记者将前来跟踪报道他们的请愿活动。

上午七点三十分，我如约来到北京西城区灵镜胡同地铁站 D 口，走出来是一片开阔地。陆陆续续有学生家长开始到来。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的行人，家长们自觉散开，三五成群靠边站着，我则架起摄像机开始拍摄。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些学生家长到了，他们开始换上统一制作的体恤衫，胸前写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后背写着："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要高考网及网址 www.inpeking.net"。这时，有两名警察走过来，问了问今天的活动情况，听家长们说一会就要从这儿离开，警察跟他们聊了聊就走了。九点钟，去教育部的时间快到了，因为有的学生家长去了他们前几次集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学生家长决定，留下几个人等正赶过来的其他家长，其余的人先去教育部，我留下来继续拍摄。不一会儿，出现了两名警察和两名协管[84]，两名协管非常嚣张，张口就骂一位学生家长是"娘儿们"，还做出一副就要动手打人的架势。警察则直接奔我而来，气势汹汹地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起初没有理会，只是收起摄像机不再继续拍摄。但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更为严厉地命令我出示身份证。

我表示："我不是在犯罪，你们只能去命令那些正在犯罪的人。"

警察说："警察法赋予我权力，我可以随时随地要求任何一位公民出示身份证。"

我心想回头得好好了解一下，警察法如果真是这么规定的，就得改改。警察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人，他们应该对人有一个基本判断，怎么能随时随地任意要求公民怎样做呢？

我再次强调："我现在不是在犯罪。"

"你有犯罪的嫌疑，你必须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警察说。

我知道他们冲着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带去派出所。恰巧今天我没有带身份证，于是我说："我的身份证放在家里了，你们非要检查的话，我明天给你们送来！"

---

[84] 协助警察工作的保安人员，没有独立执法权。

警察一听，立刻气焰高涨："你没有带身份证，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强行抓起来。"（如果是在二 00 三年收容遣送制度没有废除之前，我就会被拉去筛沙子[85]了）说着，警察就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臂，我本能地后退，五六名学生家长立即上来贴身保护我，并七嘴八舌地与警察争执，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想我得回避一下，不然学生家长的请愿活动会被我这件事给拖住，这时，正好有一位学生家长低声对我："你先走。"

我环顾一下四周，警察正在驱散停下脚步围观的行人，于是，我顺着墙壁一侧，向大街走去。警察发现了立刻大声喝道："你今天跑不了，我们必须得把你抓到派出所去。"然后回头威胁学生家长："没你们的事，你们再不让开，我马上喊大批警察来把你们一起抓走。"

立即，彼此又是一番抓扯，我被挤得紧紧贴在了墙壁上，五六个学生家长绕着我围成半圆型誓死捍卫我的安全。为了给我力量，一位学生家长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别怕！如果去派出所，我们陪你去！"

我听了非常感动，也更加冷静。我立即把摄像卡取出来，以跟学生家长握手的方式转移了出去。只要能保护好拍摄素材，我去派出所也无所谓了。

这时，一个警察头目赶来，态度显得非常具有亲和力："这是一件小事，咱们没必要把它闹大。"我也不再坚持，于是，在两名学生家长的陪同下，我被带上了警车。后来，又有四名学生家长找到了关押我的丰盛派出所。

到了丰盛派出所大厅，我才发觉手里提着的摄像机不合适宜，于是，准备把摄像机收进包里。警察不让两名学生家长跟着我，并催促我赶紧到里面的房间去。一位学生家长让我把摄像包留给她，警察不同意。

依警察抓我时的意思，只要查清楚我的身份就没事了，但真正核实完身份以后，他们并不打算放我走，似乎通过核实身份，又查到了一些可疑的事情，只听核查的警察说："不能让他走！"

就像真怕我逃跑了一样，另外两名警察慌忙表示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房间，感觉还需要别的人一起来完成这件事。看他们这个样子，搞得我也跟着东张西望起来，想跟他们一起尽快解决眼前这个问题，好让彼此都早一些获得安宁。可是警察马上说："这儿是派出所，不是你可以随便张望的地方。"我想，他们大概希望我像真正犯了罪的人一样低下头来，等候传唤吧。

终于，我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没有床单和被盖的单人床，窗户下面还靠着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看上去像一辆婴儿车，事实上，它是审讯犯人的工具，犯人一旦坐进去，能动的就只有用来签字和按大印的手。这是审讯室还是囚禁室？我抗议："你们怎么能把我带到一个连座位也没有的地方呢？"

"你可以坐到床上去。"

"你们要把我关在里面吗？"

"只是暂时呆在这儿，一会儿有市局领导来，对你进一步核查。"

"那你们不要把门关上。"说着，我自己站到了靠门口的地方，只要他们关门，我就要伸手制止。

这时，我发现房间里开着空调："这个房间太凉，让人受不了，能不能换一个房间？最好是一个看上去不像关犯人的地方。"

他们把我换到另外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但房间格局都一样。当一个相同的东西在你面前重复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我沉默下来，任由一个保安看守着我。

---

[85] 二 00 三年之前，北京警察常常依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人限制人身自由，并送到郊区清河从事的一种劳动。二 00 三年，许志永、滕彪、俞江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刚才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没有听从，现在马上用它给朋友打电话作些交待：“我现在被警察抓进派出所了，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放在家里的某某地方，请帮我找到并收好；如果到月底我还没有被放出来，请帮我交一下房租。”然后，我又给另一个会玩微博的朋友打电话，希望她把我现在的情况发布到网上去。电话打完，我就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做好了失去自由的准备。

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审讯室的大小跟刚才的房间一样，它们是同一条走廊里的不同房间。审讯室里有四把椅子，一把放在办公桌后面，属于审讯我的警察，对面一把椅子属于我。警察左边两把椅子上，坐着两个小男孩儿似的保安，他们的表情像是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发生，索性就不多想，反正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带身份证？”警察开始讯问我。

“我有身份证，只是没有带在身上而已。”

“没有带在身上就是违法!”

哦，是这样吗？我指着旁边那两位小保安：“我想现在他们的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他们也违法了吗？我想现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是吧？”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在楼上办公室里，你要看吗？”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妥，警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挽回面子，他就像赌气似的说：“你相信我的身份证就在我身上吗？如果我马上拿出来，你就承认自己是违法了吗？”

我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一时反应不过来，这种时候我的表情一定会显得有一点儿愚蠢。

“你知道法吗？”警察又开始问我。

“法？”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法，你正好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我私下认为，那两位小保安也跟我一样想知道。

警察说：“不知道法你也敢乱拍？”

“我没有乱拍，我是拍学生家长，他们愿意让我拍。”

“你有记者证吗？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也敢随便拍？”

“有记者证的大多关注领导的言行和主流社会发生的事件，学生家长们是不被关注的人群，我不拍，很少有人去拍；作为公民，我做什么事不必由政府来决定，我有拍摄的自由。”

“谁知道你拍摄下来会干什么用呢？”

“是呀，我也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哩。”

“你知道你拍摄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在北京正常参加高考的权利。”

“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怎么来解决，不需要他们去争取。”

“怎么会不需要呢？”我说：“当然，政府部门有他们了解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但学生家长们自己把情况反映出来，不是更为直接、客观，更有利于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

“啊，都这么一大堆人跑到大街上去闹，社会不乱套了吗？”

“这的确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说：“但学生家长们一直非常理性，他们呼吁，作调研，想解决办法，并没有闹事!”

“哦，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这样，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是不是就可以打你一顿，侮辱你一番呢？”

“这没有可比性吧!”

“一样的嘛，我就是对你不满嘛，所以我可以打你侮辱你。”

“我是觉得你说的不行，但你说的具体是什么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都是不满嘛!”警察固执己见。

“你一个劲地这样来说服我，是不是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满就可以随便去打人侮辱人呢？”我说完，警察沉默了。

过一会，警察又问了我一些很没有逻辑的话，似乎想证明我在精神上有毛病。

“你就别绕弯子了！”我不耐烦了：“咱们还是来谈点儿正事吧。”

“在这儿，不是你来安排我，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于是，姓名，我回答了；年龄，我回答了；民族，我回答了；性别——这个问题太像香港三流电影的台词——我也笑着回答了。

这时，抓我进来的警察头目推门进来，他问审讯我的警察：“审讯得怎么样了？他什么都明白。”说着抬头看看我：“就这点事，你别绕来绕去，老老实实的，早点说完就完。”

再过一会儿，两名所谓的“市局领导”来了，一个进来后笑呵呵地要看我拍摄的东西，一个端着摄像机对着我们开始拍摄。

“快快快，让我看看你拍的录像。”感觉是某个好朋友在催促着要看我刚拍摄回来的旅游照片。

“我把摄像卡给扔了。”我不得不对他撒谎。

他好像很大度，也不再追问，呆了一会就走了。他也许想：扔了就扔了呗，反正也没有拍着什么东西。

我继续被两个小保安看守着，审讯我的警察可能吃午饭去了。

刚才被警察收走的我的手机，现在正摆在审讯桌上，我起身拿起来翻看信息，有一条信息是：艾未未被放出来，许志永被抓进去。这时，一位小保安命令我马上把手机放回原处。他气势汹汹，发音里充满着含混不清的方言，以至于词不达意，听上去不是他自己想要显示出的那种威严，而是气馁。我能理解他的情绪，因为我也是说话方言味很重的人，我安抚他：“你不必这么严厉，我看看就放回原处，不会让你为难。”于是，他坐回原位，我放下手机也坐回原位。

再审讯我时，我直接问：“事情很严重吗？”警察没有回答我，他好像突然变得有些深沉，一会儿仰靠在椅背上，一会凝神思索，不时还用眼睛盯着我看，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我说：“你这个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画家。”

“你像一个诗人。”他不加思索地回了一句。我大吃一惊，是我的神态让他有这种印象，还是他对我已有所了解？我们顿时像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相互体会着一些让人心领神会的思绪。他问我的人生经历，问到我父亲时，警察说：“你父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昨天是父亲节知道吗？给你父亲打电话了吗？”

见我沉默，他说我：“不孝啊。”

我感到有些惭愧。其间，警察先后接到两次家人来电，他向家人说自己正在办理案子。

接下来，警察开始翻看我的摄像包，命令我：“把鞋子脱掉。”

这令我大为不悦，我抗议：“我不是罪犯，你却把我当罪犯一样对待，你无权翻我的私人物品。”

警察不动声色：“我刚才已向你宣布过了，你涉嫌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罪。”

这是什么罪呀，我八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我什么时候有过公共空间了，何来扰乱？我对警察说：“我拍摄愿意让我拍摄的人，扰乱谁了？有人向你们投诉过我吗？反而是你们警察来抓我，引起行人围观，扰乱了街道上的正常秩序。”

“你素质也太差了，要批评我也要抓到点子嘛！”警察轻视地说：“现在你知道作为一个法盲是多么吃亏了吧？”

“我的确是对你的‘法’了解不多，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犯罪。”我说：“政府在我们接受教育的年龄，只告诉我们警察在文明执法，没有说明警察可以随便翻看一个公民的私人物品，我有隐私权。”

警察说：“我打你了吗？我告诉你，在警察面前公民没有任何隐私。”

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了解一下警察法，如果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在我的抗议下，警察把我的摄像机装回包里，他让我把从身上衣兜里掏出来的钱和杂物也收好，手机还给了我。

警察递给我看审讯记录，三页，他说：“每页都按上你的手印吧。”

我用中指去按蓝色印泥，警察制止，比划着教我用食指。其中一个小保安低声对我说：“以后别到这儿来了。”

呵呵，这由得了我吗？你听审讯的警察怎么说：“你等会儿走的时候，我们派人跟你一起去扔卡的地方，把卡找回来。”

哦，警察并不相信我把摄像卡扔掉了，他刚才在我的摄像包里找呢。佩服！这么一位工作尽心的公务员，如果我真是一名罪犯，他的工作就太完美了！

审讯结束，但还不许我走，让我去另外一间审讯室里呆着，等市局领导对我作出最后的发落。我离开审讯室，刚走到门口，就遇见一位学生家长，她叮嘱我：“你别怕，好好配合警察的工作。”然后，她走进了审讯室。后来我知道，她和另外四名学生家长一直守在丰盛派出所大厅，坚持要派出所释放我，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既然是这样，警察就把他们也全部关押起来，一个一个进行审讯。我听见一位学生家长因为饥饿、紧张，全身无力，手开始抽筋，疼痛得大叫起来。

这时，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发来短信：“我在功权大哥和千帆教授微博上获得你的电话，我们永远支持你，保重！”我顿时感受到，这是我此刻所能听到的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内，一个声音就是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外，众声之中，也许连一个声音你也不能真正感受到。

从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被抓，到下午两点四十四分被放，我在丰盛派出所被关押了六个多小时。从派出所出来，我背着摄像包从一条小街向西单大悦城走去，那儿有一批陆陆续续从二龙路派出所放出来的学生家长。原来，今天所有的学生家长都被派出所抓进去了。上午先去教育部的十七名学生家长和两名媒体记者，还没有走到教育部门口，就遇到数量远多于学生家长的警察，他们扯起警戒线，然后把学生家长一个一个强行抓上警车带走。

也就是说，今天政府是用暴力阻止了学生家长们去教育部请愿的行为。我明白，我在丰盛派出所经历的关押与审讯，只不过是他们早就编排好的一幕荒诞剧，剧本台词虽然陈旧，却成功地篡改了学生家长、媒体记者以及我——我们这些公民的集体意志。

似乎，政府是胜利者，公民是失败者。我有幸扮演了一个成全政府胜利的角色。

政府胜利的潜台词是：看你们下次谁还敢再来！

公民失败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呢？

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放出来的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直到最后得知两名记者也被释放，学生家长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看守着他们。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外一种力量阻止我不忍心去拍摄这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已拍摄下来这全部的一切。要传播它们，我知道，只有靠我们的心灵。

冯正虎，《零八宪章》签署人，一九五 0 年代生于上海，一九八六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一九九一年赴日本留学，一九九八年返回中国创办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多年来，冯正虎推动宪政民主，为弱势群体维权，故屡屡遭受迫害。二 00 九年二月，冯正虎被当局绑架并秘密关押四十一天，获释后，去日本短暂休养。此后，他八次回国均被拒入境，为了捍卫公民回国回家的权利，他滞留东京成田机场九十二天，经过不懈抗争，终于在二 0 一 0 年二月十二日顺利回国。但回国后，他长期被限制人身自由，多次被警察传唤、抄家、失踪。

瞎折腾

冯正虎

近三个月来，每周一下午，我带着一百八十九位上海市民联署建议书，与其他几位市民一起，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信访办，反映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的问题，要求人大常委会对我们的上访做出回复。我们已与人大信访办建立了一个正常稳定的沟通渠道，每次均有信访办的专门负责人接待，他听取我们的意见，并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我们也完成了代表部分民意的职责。

一、去人大信访办也被传唤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是周一，我按惯例去人大信访办履行市民建议书的代表职责。下午两点许，当我走到小区大门口，却遭到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的阻挠，他说："冯老师，你今天不可以出门。"

我问："为什么？又出什么事情了？"

他说："不知道，是'国保'老沈说的。"

我告诉他："我每周一下午都要去人大信访办沟通。你们可以陪我一起去，或者用你们的车送我去。我只去人大信访办一个地方，去了就与你们一起回来，这样你们可以放心吧？你可以向上级先请示一下。"

陶警察打了一通手机后告诉我："不行，今天你不可以出门。但我保证明天你可以出门。"

我笑着对他说："你保证？你以为你是谁？明天上面一个电话就改变你的保证。你打电话给'国保'警察，让他们自己来跟我说吧。"

陶警察又打了一通手机后告诉我："'国保'老沈说，马上来。"

我说："好的，我在这里等他。我很想知道，这么草木皆兵、神经过敏，是'国保'又在瞎折腾，还是你陶卫国自己在瞎折腾。"

过了一段时间，还不见"国保"警察的人影。我对陶警察说："'国保'不会来了，如果真是重要的事，他们会立即赶过来。我不陪着你瞎折腾，我要去人大办正经事。人大信访办不是天天开门，只有每周一、三、五下午上班，而周三的时间我已经给你们了。"

我刚走出小区大门，陶警察就一把抓住了我，我也顺势抓住他，并谴责他的违法行为。我居住的小区位于五角场万达商业广场的繁华地段，小区门口人来人往很热闹。过路群众一见我们在争吵拉扯，都纷纷上来围观，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听到一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既不穿警服又没有执法凭证，还要强行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群众的反映是显而易见的，他

们最痛恨这种无法无天的警察。

我清楚这种围观事态的发展趋势，马上帮陶警察解围，我对他说："你没有资格在这里拦住我，你快去把你的警察证拿来，去办好不让我走的法律手续。你放心，我就在这里等你。"他马上松手，跑回小区拿警察证、开传唤证……我站在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等他，我今天准备陪着他瞎折腾，给他上一堂法制课，非法限制我去人大信访办的违法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陶警察一再说，是"国保"让他这样做的，那我就等"国保"警察自己来承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后果。这些警察滥用职权已经成习惯了，传唤证如同随身带的纸手帕，撕一张很随便，警车也是一呼就到。

过了一段时间，一辆警车行驶而来，我知道，是专程来接我的。陶警察向我出示了一张传唤证，说"国保"警察老沈在五角场派出所等着见我。我要求他先将传唤证交给我，然后再上车去派出所。他手慌脚乱地将给我的一页传唤证撕坏了。我对他说：不要急，慢慢来。

传唤证上写着：到达五角场派出所的时间是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四时四十分，而传唤的理由是： "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他们如此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也只好无语。他们玩法律、玩上级领导，我又何必生气呢？拿过传唤证，我高高兴兴上了警车，派出所是国家机关，有很多国家警察公务员，我很乐意去那个地方开展法制教育。

二、询问陶警察

陶警察和一名雇佣的保安与我一起到达五角场派出所，刚进入讯问室，陶警察就要离开。我马上叫住他："今天是你把我传唤到派出所的，你是本案的承办人员。你走了，谁来管我？"

讯问室是公安机关审讯犯人的重要之地，公安部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讯问室的警察承办人员及审讯对象都要登记，无关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可是，我每次来这里就像旅游途中累了，借个地方歇脚一样，没有人给我办理任何登记手续，也没有任何记录，严格地说，讯问室的看守人员没有权力管我，但却应该对我的安全负责。所以，我要求陶警察承担起承办人员的责任。

我询问陶警察："你说'国保'警察会来，他们人呢？"

他说："老沈说他一会就到。"

我告诉他："你已经把我传唤到这里，如果他们要传唤我，他们应该有人出现在传唤现场。如果他们今天不来，你就必须承担责任。你看，我多么配合，你一拿出传唤证，我就跟你来派出所了。"

他说："但是你开始不配合，我叫你不出门，你还要出门。如果你早配合，就不用来派出所了。"

我大声质问他："你脑子里有没有法制观念？你以为你是警察，在公安局工作，你说一句话，别人就要听你的。我告诉你，你警察的权力是靠法律支撑的，如果你违背法律，你什么也不是，没有人会把你的话当回事。你要我不出门，我就不出门吗？我凭什么听你的，你没有执法凭证，连一件警察制服都没穿，我没有义务听你的，不仅不应当配合，而且还要指出你的违法行为。你后来拿出传唤证，我就来了，那不是我听你的，那是我尊重法律。我可以先服从你，然后与你一起到派出所讨一个说法，追问你的责任。现在你可以开始做讯问笔录了。我要看看你都问些什么，我涉嫌哪些违法行为让你开出传唤证？如果你说不出一个名堂，你要向我赔礼道歉。"

陶警察不肯做笔录，说要等"国保"警察来。讯问室的门开着，来来往往的警察都穿着警服，一副遵纪守法的正经模样，不穿警服、不讲法律的陶警察显得与周围的气氛很不协调，他坐在讯问室里像一个被讯问的对象。熟悉我们的警察路过讯问室，听到我在不断地质问陶

警察，并大声对他进行法制教育，笑一笑就走开了，不熟悉的几位年轻警察还站在边上听一会。

我继续对陶警察说：“你也年龄与我差不多，没有几年就要退休了，不要做违法的事，让晚节不保。你现在已经与政治搭上边了，就要把眼睛睁睁大，不要跟着瞎折腾，害人也害己。今天我已经非常非常忍让你，主动请你陪我去人大；答应与你一起回家，不去其他地方；我也给你充分地时间，让你请‘国保’来处理，但你没有好好利用妥善处理问题的机会，以为自己的权力很大，可以滥用传唤证。你愿意出头违法作恶，我就不放过你。你们在我家门口瞎搞惯了，你以为派出所与我家门口一样吗？你这个警察是越混越糊涂了。派出所是国家机关，是一个讲法律的地方，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被带进派出所的讯问室，传唤证也不可以滥用。国家是有法律的，以后都会追究责任。”

陶警察说：“我们不是有几天不让你出门，你就不出门了吗？今天不让你出门，你要是不出门，也就没有事了。”

我说：“你就是傻，连这点也看不出。周三、周六、周日我不出门，是给你们面子，我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各取所需，彼此不发生冲突。你真以为你们权力很大吗？你们违法的事样样都可以做吗？有这种想法，你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若挑起事端，我就不会让你轻松。现在谁怕谁，我已是到底的人，而你是一个连奖金都不愿少拿的人。”

我继续催他依照法律程序走下去，我既然已被传唤到派出所，应该要做一个讯问笔录。他坚持要等“国保”警察来。可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国保”警察的人影。我明白，这又是一场瞎折腾，只不过还不清楚，这次滥用传唤证的违法责任者是谁？是“国保”，还是陶警察？

我问陶警察：“你说‘国保’会来的，怎么这么久还不来？到底是你自作主张，还是‘国保’的主张？你说‘国保’老沈给你打过电话，我相信。但老沈怎么说的？他是要求你与冯老师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最好不要出门，如果要去人大信访办，请配合让看守的人一起去，还是让你滥用传唤证，以变相拘留的方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国保’老沈今天没有出现，只看到你一个人在自唱自演，滥用职权。”

陶警察气愤地说：“谁要骗我，我以后就不做了，我也会向上面反映的。”

我说：“谁骗你？你这把年龄了，又不是小孩，没有人可以瞎指挥你，你做的事你自己就要负责。现在大家都很明白做违法的事以后要被清算，都在躲避作恶，上下骗，上下玩，看谁玩得过谁。你笨，就只配被人玩，为违法的事顶罪。今天‘国保’不来，你就去找一个值班的警察来一起做讯问笔录吧。”

陶警察说：“再等一等‘国保’，他们说要来的。”

我说：“他们肯定不会来。如果是他们的事，老沈下午就会自己蹲在我家门口拦我了。现在是你把我带到派出所来的，我要找你们所长讨一个说法，你去找所长来，如果你不去找，我自己去找了。”

我说着就起身要走出讯问室，陶警察让我坐下，他自己去找。

过了一段时间，不见陶警察回来，我就自己上楼去找所长投诉，走到三楼口上碰到陶警察，他说：“所长不在。”我说：“所长不在没有关系，把值班的警察叫来，我的投诉可以请他们纪录下来向所长反映。”

三、“冯正虎，你在哪里？”

我回到讯问室刚坐下，就听到走廊上有人呼喊：“冯正虎，你在哪里？”这是我妻子的声音，她居然闯到派出所里面来寻找丈夫了。我马上走出讯问室，见到她我很感动。我妻子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下班回家后听门卫说我又被带走了，就直奔五角场派出所，进来就喊

要找冯正虎，也没有警察为难她。

陶警察看到我妻子很惊讶：“你怎么也进来了？”

我妻子告诉他：“我是来找老公的。他犯了什么法，你为什么又要把他抓走？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把冯正虎带回家，要他陪我一起去买生日蛋糕。”

本来我今天打算下午去人大信访办，然后回家等妻子下班后一起去订生日蛋糕。我七月一日生日，妻子七月二日生日，我哥哥六月二十八日生日，我们几家亲戚准备在一起聚餐，庆祝庆祝。

此时， 派出所翟副所长正好进来，我迎上去对他说：“我正找你，我要投诉陶卫国。”

“你去找他（陶警察）谈吧。” 翟副所长慌忙推开我，匆匆上楼去了。我知道，这个派出所的领导怕粘上这些麻烦事，但是今天是翟副所长当班，我只好麻烦他，让他管管五角场派出所瞎折腾的陶警察。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被带来派出所，陶警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当班的翟副所长避而不见怕趟浑水，“国保”警察自始至终不见人影，大家都在瞎折腾。不依法律，不依规章，没有是非标准，一切乱哄哄。惟有我傻乎乎地认真对待法律，要找派出所领导投诉，讨一个说法，既维护自己的权利，也维护国家机关的尊严。

大约下午五点过后，陶警察告诉我：“‘国保’老沈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作主了，你们可以回家了。”

要“国保”警察作主承担责任时，他们的电话就常常打不通了，或许这正是他们处理问题的高明之处。但是，陶警察说他自作主张让我回家，我实在不相信他的“勇敢”。我对他说：“今天的讯问笔录还没有做，我还要找你们所长说清楚今天的事，既然来了，就没有必要急着回家。”

但是，我妻子觉得今天的事说不清：“算了吧，跟我回家买蛋糕去。”

这原本就是一场瞎折腾，所以我也不再坚持了，在陶警察递上的传唤证上写下离开的时间五点三十分，签上我的姓名。我对他说：“去喊一辆警车，送我们回家。”

警车驶到我住的小区门口，我们谢谢警察。下车后，到五角场万达商业广场内的克莉斯汀店里预购了一个十寸生日蛋糕。

在以 GDP 为政绩的时代，中国有些官员在某个地方建造一个土方工程，然后拆了再造，这样瞎折腾可以拉动 GDP，创造政绩，升官发财。在以维稳为政绩的时代，中国有些警察也通过瞎折腾来表现自己的政绩，升官发财，折腾别人，折腾自己，折腾整个国家。

游精佑，《零八宪章》签署人，桥梁高级工程师，“福建三网友案”三被告之一。

一九六0年代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市，一九九0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此后一直在铁路系统从事土建技术管理工作，二 00 八年担任向莆铁路福建段第二指挥部副指挥长。二 00 九年七月，因拍摄林秀英讲述女儿严晓玲非正常死亡视频，被福州司法机关以“诽谤罪”入狱一年。

“七·四”吃喝记

游精佑

一、引子

动这场吃喝的心念由来已久。

在二0一0年七月四号的前几天，我就知道四号肯定有人会到福州接我出狱，就想：他们不会让很多人在看守所门口迎接我的场面发生，那么怎么办呢？估计会在四号大清早把我送回家。那么，我就可以跟家里人从容商量请大家吃喝这件事了。那时候，“饭醉”[86]这个在高墙外早已流行的词，对我还是新词。

在看守所跟家里人通信，往返周期最长一个月，最短也要两周。所以，我这想法当时没来得及写出来告知家里人，但我知道家里人会赞成我这个计划的。我们家经济不是很富裕，但办这些事的能力还是有的。

七月四号一早，我就等待狱警开门，但直到十点左右才听到门响。我拿起行李跟同号的人道别，但是狱警隔着铁栅门对我说：“行李不要拿，领导让我告诉你，电脑出了故障，手续办不了，现在不能离所，但你放心，今天肯定可以让你回家。”

我心想，今天看守所门口肯定有大场面。

同号不少是看守所的老客，有一位隔壁号的老乡，在看守所已经呆了两年多了，为了送我，昨天特地跟管辖民警申请，让我到那边共进午餐。此刻，他知道动静后隔着高墙对我说：“看来有状况啊。”

我说：“是啊，有状况。”

虽然这是个星期天，但隔着墙高声讲话很累，影响也不好，于是我就在自己号内回应大家的安慰。

其实只有一句话：福州当局的愚蠢出乎我的意料。

十二点开饭了。同号的说：“没想到还要留你吃午饭，这是最后的午餐。”

午餐后，洗澡冲凉。号长陪我在天井抽烟，烟才抽半支，又听到开门声，我们赶紧把烟藏起来。开门的是陈科长，我正想返身到号房拿行李，他说：“东西先不要拿，所长想找你聊聊。”

我跟他到民警办公室，所长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正喝着矿泉水，也递给我一瓶，说：“你是抽烟的哦。”但他自己不抽烟，陈科长也不抽烟。于是他拉开办公室的抽屉找了找，也没有烟，满脸歉意地说：“本来我答应你在正常的时间，九点左右出去的，我也想送一下你。”

我说：“是啊，你说你今天要在市里开会，而且今天又是周日。”

他说：“我刚从市里赶回来，没有能在九点左右让你回家，要向你道歉。所里的网络电

[86] 指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维权人士以聚餐的方式集会，此类活动时常受到警察的干扰或阻止，取“犯罪”的谐音“饭醉”。

缆，因为施工被挖断了，没办法办离所手续。但是你放心，今天你肯定可以回家，电缆如果修不好，我们还可以手工办理。”

我笑了笑说：“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也在大的国企呆过，很多事情也不是你能左右的。今天能否出去，不是我现在关心的问题。家里人肯定一清早就在门口等了，天气这么热，我希望你能把情况告诉我家里人，让他们先回家休息，等我可以离所了，你再通知他们。”他说已经告诉家里人了。

聊了没多久，所长送我回号房，他说：“现在里面很热吧。”

我说：“是啊，两台吊扇，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风是热的。”

所长说：“我进去看看。”

所长跨过天井，走到号房门口的时候，很多人都还在午睡，听到动静，都欠起身子，所长用手试探了一下号房内的温度，然后离开。

我跟号长继续在天井静静地抽起烟来。

号长说：“我第一次看到所长到号房里面来，看来你确实是特殊的人啊。”

我淡淡一笑。

晚饭时间到了，还没有要出去的动静，于是全号的人都开玩笑说，还是游兄有情谊，不仅陪我们吃午饭，还要继续陪我们吃晚饭。

晚饭后，我开始按报警呼叫器，值班的问什么事，我说找黄所长，他说有什么事？我说，我要问他电脑什么时候修好，他说他联系一下，但没有回复。

过半小时，我又按报警呼叫器，对方知道我的用意，说，所长正忙着修电脑呢，你先等等，我说好，半小时后我再呼你。

过半小时，我再按呼叫器，对方没有回答。很快，高窗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值班的站在窗口往下问，谁是游精佑？我说我是，他说，你不要一直按报警了，所长正忙着修电脑呢。

之后，直到晚上九点，我每半小时按一次呼叫器，对方都只是回答，知道了，就挂断。号内的人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玩笑话也说尽了，大家都静静地铺床准备睡觉。我也躺下了，跟隔壁的号长说，超过十一点我就不出去了，明天再走吧。他虽然是老江湖，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是说，也不要这样，开门的话还是出去，家里那么多人在等着。

我自己这时候也没什么心事，就躺着等待入睡。

突然又有开门声，有人喊我名字，我装睡没动，号长推了我一下，喊：“游精佑，回家。”

我说：“几点了？”

他轻声说：“差不多十一点，走吧，兄弟。”

我起身，在床铺下的菜龛里面取出自己的行李，跟众多眼露羡慕“凶光”的人们挥手道别。

在号房门口，等我的还有管教科郁科长，他一路陪我往外走，问：“你家兄弟姐妹很多吧。”

我说：“是，很多。”

“你同学很多吧。”

我说：“是，很多。”

路上看到一位年青人通过送菜口跟里面的熟人道别，说：“本来以为今天出不去了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会这么迟放人。”我心里有些愧疚，小伙子，是我拖累了你啊。

在柜台办手续的时候，发现连我在内，有三位要回家。

所长也在，他叫民警拉出一张椅子，叫我坐下来等前面的人办手续，还叫会抽烟的人给我一支烟。他给我看自己手机上的一条短信，说这是你同学的电话？我一看，是陈老师的手机号，但内容是同学发的，大概是，我是游精佑的同学，门口迎接的网友已经被我们“劝离”，是否可以让我的同学早点出来？

满地是前两位正在办手续的小伙子的行李，正被翻开检查。要动我的行李的时候，我说："你翻开，我还要装，多麻烦，要检查的话，我自己拿出来给你们看吧。"

民警为难地看着所长，所长摇摇手说："算了。"

那两位小伙子对所长说："这么迟了，我们出去连公车都没有了，怎么回家啊。"

所长说："哦，那我安排一下，派车送你们到市区有车的地方。"

我是不要送的，我知道门口会有车在等我。

办好手续，我问所长："我还有钱在这里，不一起领走吗？"

他说："财务那边还有手续，要以后再来取。"

我说："我还要再到'二看'来一次？"

他说："那你先回家，钱的事情，我帮你处理。"于是跟所长握手告别。

夜晚很安静，几盏大灯在高处亮着。办手续的地方到门口要穿过一个停车场，在绿篱甬道中，我提着八块钱一个的蛇皮袋走着。我注意到办手续时大厅里面坐着的三位便衣尾随而来，在身后几步远的地方高声说："游精佑，你出去后不要参加非法聚会。"

我停了一下，他们也停住了。

姓郁的科长随我走到门口的接待大厅，我看到在那里等待迎接我的人们：妻子陈老师和手捧鲜花的女儿豫璟，满脸泪水的大姐一下子抱住我，我和两位大学同学王和罗紧紧地拥抱，然后接过豫璟递过来的鲜花。豫璟说："小凡姐姐前一刻还在这里，刚刚被他们带走。"

我们相互簇拥着走出第二看守所的大门，门口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其中两个人手持大摄像机在拍摄，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们是便衣。

小韩师傅开着指挥部的霸道车等在路边，还有两部车是亲戚的。

我们一家坐在霸道车的后排，豫璟带着遗憾叙述着小凡姐姐被带走时的情景，还说王大姐也被带走了。

我跟胡姓同学（我被捕后，他接任我的工作）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说同学们都在宾馆等着我。

我平静想着要安排的事情，这么迟，不可能请大家吃饭了。于是接通了刘晓原律师的电话，告诉他我出来了。

途中接到林洪楠律师的电话，说网友们都在宾馆等你。我说谢谢，不知能否过得去，没有多余的话。

滕彪打来电话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我还是说谢谢，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见上面。"福建三网友案"发生前，滕彪不一定知道我，但我知道他。此案在二审阶段，福州的律师悉数被当局清理出场，我曾想请他当我的辩护律师，但那时候我把滕彪和浦志强两位律师弄混了，他们两位的形象被我叠加到一位叫滕彪的人身上。

我问女儿和妻子："妈妈现在知道了吗？"

她们说："还不知道，你先不要告诉她，我们跟她说今天航班晚点了。"

到家后，妈妈平静地看着我，有点疑惑，我笑着向她老人家问好，轻松地开了几句玩笑。二姐煮了碗太平面，我在茶几上，在家里亲人的围观中吃完，说，姐，你现在煮的面没以前好吃啊。然后，跟妈妈说，还有同学来福州了，我现在要去看看他们。

到同学入住的宾馆，洗澡，换衣服。然后坐下来和同学聊天。

同学说："老游，你做得够多了，这个政权这个社会，就是这鸡巴德性。"

我有点诧异地说："我做了什么吗？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有些细节，回忆很有趣，但也会引起其他的情绪，比如说，愤怒。

所以二0一0年七月四号到五号，还有二00九年七月五号到二0一0年七月四号之间的许多事情，我不愿意去过多回顾。我觉得目前我的心境不足以消解因此而导致的愤怒。有很多朋友建议我把那一年的经历写出来，但我现在做不到，包括申诉——我提交一次后，就

再也不想去触及。林洪楠律师对此肯定有意见，我原先单位的一位领导兄弟每次跟我通电话，也都要提到申诉的事情，他说："还是继续申诉吧，为了自己，为了历史。"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拒绝回忆这场经历的细节，是担心愤怒使自己的行为失控；另外，在现有执政党的司法体系内申诉，只会让我感到自己无聊，弱智。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处理办法，比如说菜刀和铁锤，虽然我有宗教信仰，对杀生也没兴趣，但处理它们，我心理上毫无障碍，也不会有什么罪恶感，类似于清理垃圾。垃圾很恶心，但清理的时候，你必须动手。当你跟他们说，你们错了的时候，他们依然在行凶，甚至对你的指错行为继续进行司法报复，比如像对待王大姐那样，那么以牙还牙将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本能反应。

还是继续说吃喝的事情吧。

我要通过这次吃喝，还一个人情。回想二0一0年七月四号，我无法绕开王大姐，她是我的心结。

简单的知恩图报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虽然知恩图报的联想可能引起的庸俗感不会使我害臊。事实上，我认为王大姐跟我已经有了血缘关系，这是我们无中生有[87]的做人原则。一切伤害，都要付出代价，不在当前，必在未来。

王大姐事件[88]，事实上是"福建三网友案"的延续，在福州当局的配合下，有关方面把三网友案，变成了四网友案，以后将会有五网友案……

这次我出狱一周年，在今年恶劣的形势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一场吃喝会感兴趣，感兴趣又想来的有多少，想来又能来的又有多少？任何事情都需要成本，我不希望我们生活在空洞的道义上，我想提出报销前来吃喝人员的路费和住宿费用，但又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

所以在二0一一年六月四号之后，我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要请客吃喝的计划，当时就有不少兄弟们响应。我知道响应是响应，行动是行动。但对我而言，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说，既然说了，就要做到，这是原则问题。于是我开始预测可能的规模，以及所需的费用。其实十桌也只是一个很模糊的经验判断，可能多了，也可能少了。费用我也测算了一下，算来算去也没办法确定，于是就想，一万不行就两万吧，突破一点也就三四万。吃喝嘛，钱是身外之物。

去年七月四号出来的时候，几位大学同学作为代表到福州迎接，这回再叫他们来成本太高，还不如叫他们直接给我汇钱来得痛快，再说也没必要通过这次吃喝来证明他们对我的态度。而且，二0一0年九月份，大学同学已经专门在成都为我组织了一次同学会。

于是我不跟他们商量这件事，只跟那位后来接任我原单位工作的胡同学说，请他作为代表到时候列席。

中学同学去年为我的事也筹集了不少钱。那我就请中学同学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吧。

于是我跟同学说："七月四号，我要请大家吃饭。他们说好啊，不要你请，AA 制，大家一起出。"

我不跟他们纠缠这些，继续说我的想法："我还要请去年一年关注这个案子的网友来一起吃喝。"

他们犹豫了。

我继续说："吃喝的意思主要是，一、我要感谢一下大家；二、我要让大家表示一下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来吃喝，就是一个态度；三、我想通过这次吃喝表示一下，不管福州司法当局怎样对我，大家还是愿意跟我交往的。"人会有基本的判断，并用行为来展示自己的判

---

[87] 指游精佑与另外三位网友组成的网络"家族"，取名"无中生有"。

[88] 指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她因发起"福建三网友因言获罪网络关注团"，并在法院开庭审判三网友时，组织全国各地关注团成员前往福州声援而遭到当局迫害。二0一一年四月被以"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

断，当然这需要勇气。这是一个荒谬的社会，这荒谬无比真实地缠绕着我们。

我的同学们平时只顾赚钱，有几位是非常尽职的老师，他们上网基本限于 QQ 聊天，看新浪、看新华网、看 CCTV。要是没有三网友案，他们不会知道刘晓原律师，不会知道博客，不会知道福州政法委原来是搞司法陷害的机构。

我的同学们有畏惧和犬儒心态，但是，我的同学还有是非的坚持。

感谢王鑫[89]，感谢以福州马尾区公检法为代表的福州司法有关人员，是他们，让我这些政治单纯的同学知道了，原来有一种肮脏和戏弄叫做办案子。如果有朝一日，能自由选举，我敢保证，我的同学没有人会投现在执政党一票。

六月二十四号吃喝邀请书发出后，我的邮箱收到了有关咨询吃喝资格和报名吃喝的邮件。没几天，就有人跟我说，他远在三明市的家里人突然打电话劝他不要来吃饭，随即单位或学校也都对他们进行了约谈。我知道邮箱出问题了。登录一看，被设置了自动转发，于是我对邮箱进行了处理。再过一天，我发现我无法登录自己的邮箱了。

其实，六月十七号开始，有关人员就电话联系我，我猜大概就是为吃喝一事，当时我没空，而且，吃喝邀请书也还没拟好。到二十四号，吃喝邀请书发出去之后，六月三十号，我自己联系有关人员—我的邻居，约好到他家去喝茶。

他说："听说你要请客。"

我说："是啊。"

他说："要花不少钱吧？"

我说："计划花一两万。"

"能不能不请啊。"

"那怎么可能，请客吃饭，这个有什么？要不要我把邀请书给你看看？"

"那控制一下范围吧。"

我说："好。"

到七月一号，我的邻居又来电话，语气比较急切，说"国保"要找我谈谈。

我说："没有必要吧，无非就是四号吃喝的事情。"

"国保"认为我是他们的工作对象，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他们的配合对象。

邻居劝我还是谈谈比较好。我说："确实没有必要，也没什么意思。而且，"国保"有我的电话，如果要找我，也不要一直麻烦你中转，让你为难啊。"

那天回家后，想想，为这个事情，把派出所所长跟邻居夹在中间，心里过意不去，就给所长打了个电话，把自己的看法再重复一遍。所长倒没客气，说："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无所谓夹不夹在中间，麻烦不麻烦的问题。"

吃完饭，我给邻居打电话，说要到他家喝茶。我很喜欢他家的台湾高山茶，本来想请他帮忙买一点，有次他送了我一盒之后，我不敢再说买茶的事情了，怕误会。

到他家，刚坐下，他就开始泡茶。我表达了一些歉意，解释说"'国保'是比较神经过敏的部门，我不跟他们谈，是不想自己变得无聊。"

他打哈哈，不置可否。然后说："'国保'正从长乐赶过来，就一起聊聊吧，其实也没什么，谈总比不谈好。"

我再次感受到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但碍于面子，我不好太决绝，就等着。

我的邻居是警察。

于是他先进屋吃饭，我自己煮水泡茶。

"国保"进来后，我坐在主位，接着煮水泡茶。

他说："老游，怎么装着不认识啦，我们上回不是谈了两三个小时吗？"

我依然在煮水泡茶。

[89] 福州市政法委书记，制造"福建三网友案"的主要人物。

这天晚上，高楼的阳台上居然没有风，我能感觉到他一路奔波的气味。我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于是不断地续水，泡茶，我们一起喝茶。

他说：“我们不想搞得太难看，到时候像其他地方一样停水、停电的，或者让你失踪。能不能不请？”

我说：“请客吃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些事你们当然能干得出来，王鑫那王八蛋都能把三网友做成案子，关了我一年。失踪再长时间，我还是要出来的，这样的做法，对我药力不够吧。取消是不可能，邀请书都发出去了。”

他说：“关键是你公开邀请，还发在海外网站上，就不会一个个邀请吗？那样就不会弄出这么大动静了。”

我说：“对啊，推特是海外网站。去年来声援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怎么发邮件邀请？再说，如果私下邀请，七月四号福州一下来了百把号网友，又是游精佑请他们吃饭，你们不是会更紧张吗？我请他们是来吃喝的，不是来上街的，到时候像去年那样，连饭都吃不成，那算什么事啊。我那个邀请书其实是给你们看的，意图、方式都讲得很清楚，我觉得你们看了那个邀请书，应该放心才是。”

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人吃喝会不会出什么事？”

我说：“你认为会上街吗？要不我写个书面保证，如果上街，你们再把我抓起来？”

他说：“你控制一下范围，就请家里人和同学吃喝纪念不也一样？”

我说：“那可不一样。我要感谢一下大家。现在你们全国到处堵截，很多人肯定也来不了了，我也只能缩小范围。但是只要来了，我还是要有饭给他们吃吧。”

他还算通融。

我也答应第二天写个补充说明，劝劝被“劝阻”无法前来的朋友淡定一些。不就是一次吃喝吗？以后到福州来我再弥补，犯不着做什么大文章。

余下的时间，我再次介绍了高铁方面的有关知识，介绍了刘志军为建设高铁的融资技巧，那也是一盘很大的棋啊。

七月四号中午我到乡下，与几位姐妹和老母亲一起吃饭。大姐说：“去年这时候，我们有多难受啊。”

妹妹跟妈妈开玩笑说：“全家都难受，只有你很开心，在等你儿子从‘国外’回来。”

妈妈说：“还不是你们，为了让我开心合起来骗我，以后你们骗不了我了。”

我跟他们说：“我今晚在福州请大家吃饭，要还人情。”

姐妹们都说，这个做法很好。他们问，王大姐的事怎么样了？

我说：“批捕了，现在走司法程序。“

大家开始叹气。

没多久，我妹妹接到她夫家的电话，说古槐派出所要找她。

我说：“肯定是为了晚上吃饭的事情。”

昨天，长乐市教育局也叫我妻子陈老师去聊天。聊天的时候他们一再提醒说，不要搞得影响太大。

陈老师是个性温和的人，只问了一句：“那为什么要搞影响这么大的案子？”

他们还说：“有关部门正想法恢复你老公原单位的工作。”

陈老师说：“案子不翻过来，南昌铁路局是大国企，想恢复工作就能恢复工作？”

谈话结束，她把《赫索格的日子》光碟和我的声明印刷本给学区书记，书记不敢接；把吃喝邀请书的打印本给他，也不敢接。

我跟陈老师说，我什么时候要去会会你这个书记。陈老师说，算了。

但我想，下回他们再找陈老师，我是要去登门拜访的。

我叫妹妹带张纪录片光盘和我的声明给古槐派出所的所长。

开车回福州时，顺路接了几位同学。

我不知道吃喝是否能够进行，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的几位同学也做好准备了。

我跟同学说："即使其他人都被吓阻，不能来或不敢来，只有我们同学，吃喝也照样进行。"

他们说："那当然。就是吃喝嘛，他们想得复杂，我们要做得单纯。"

我想起庄子说的赤子，赤子是婴儿的状态，她不知功利，只有朴素的坚持，没有因功利想像导致的畏惧。她会坚持做自己能做、该做的事情。

虽然七月一号晚上的谈话貌似有个默契的约定：我这方面进一步解释了吃喝邀请书，第二天又发表了邀请书的补遗；他们那方面不会阻扰这次吃喝活动。但同学提醒我，对这个机构的疯狂本性怎么戒备都不过分。所以我不能事先公布吃喝地点（如果有下一次的谈话，"国保"或许又会跟我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吃喝的地点吗？我们早知道了！一个把这些无聊的隐私探知活动成果，作为自己的能力进行炫耀的机构，是多么无聊的机构，而且还是纳税人养着的机构）。原先通过邮件报名想来的朋友都留有联系电话，但这些人基本都被"劝阻"了。我公布吃喝地点的平台只能在微博和推特。考虑到四号是周一，外地来的朋友到福州后，再到吃喝现场需要时间，所以我在四号上午通过微博告知大家，吃喝的大概方位是鼓山苑。那里到我们预定的酒店很近，步行即可。

下午四点多，我跟先到的同学到达和谐酒店，我们查看了预订的包厢，酒店方面看来没什么异常。有朋友提醒说，门口似乎有警车。我请一位同学去探听一下虚实，同学回来说，还好，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我开始对外公布吃喝地点。福建有关部门越迟知道吃喝地点，我这个吃喝不成功的几率就越低；但是，计划来吃喝的人前来的难度也越大。在福建有关部门调动诸多资源，扣帽子，动私情，举棒子，伸胡萝卜地减少前来吃喝人员后，如果再有朋友因为没能及时得到吃喝地点的信息而不能前来的话，这次吃喝将更加冷清。这应该正是福建有关部门要达到的目的。

在等待的间隙，我给几位朋友打电话，说今晚要在和谐酒店请客，请他们拔冗前来。

有的朋友是生意人，我不希望他们因为这次吃喝被无端骚扰，所以电话里面连纪念出狱周年的意思都没说，只说我要在这里请大家吃喝，他们答应说好。

无中生有家族成员中，无中生花妹妹五号是她父亲三周年忌日，不能前来；无中生假和无中生饼都在微博上发出了消息，他们人没来，心里却牵挂着这次吃喝。我发现自己手机突然不能登陆微博和推特了。最后一刻，只能请在外地的他们代为公告吃喝地点，免得有想前来吃喝的朋友找不到地方，那对我们无中生有家族来说是很失礼的。

到五点半，人们陆续到了。陈信滔兄中午在微博上说被其驻地民警干扰，这时候他来电话说要过来，但民警会跟过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他们干他们的工作，我们吃喝我们的，不矛盾啊。跟过来没关系，他们如果要进来吃喝也没关系。

林洪楠律师我是临时打电话告诉他的，他说把所里的事情安排好就赶过来。

其实在三号晚上，郭宝锋也来电话说，他在漳平的老父亲突然打电话，叫他不要到福州吃喝。他既感觉荒谬，又感觉愧疚，一再道歉。我说没什么，寻找你最柔软的部位下手，是他们历来使用的手段。远处的父亲来电劝你，说明他们知道跟你直接交锋已经没有效果，就动用了这一招。他们知道这一招有效，以后会继续使用的。道歉没有必要，我如果要怪罪，也能分得清怪罪的对象。因此把朋友丢弃，那就是我在犯傻了。

我的大学胡同学，傍晚时打电话说，南昌质检站的人来工地检查，指挥长叫他随质检站的车回南昌休息几天，所以也不能来了。（当时我觉得这情况有点蹊跷，但也没多想，同学在异地工作，回家的机会不是很多，我在他这个位子上干过，了解。后来结合其他事情一想，这个是调虎离山计嘛。他说他也觉得奇怪，怎么突然发善心主动叫他回家休假了。）

有位多年的兄弟发短信说，晚上有事，来不了。我能猜得出来是什么事，只回复说，知道了。

现在我开始担心，别说预留的第五桌，连预订的四桌可能都坐不满。

过六点，人已经来了一桌多，加上正在途中的同学，可能只有两桌人。马上就要开席上菜了，要开几桌呢？我心里暂时拿不定主意。

跟同学说要不先上两桌吧。刚说完，又收到一条短信：据说有关部门晚上要采取行动，建议吃喝改期进行。

一场正常的吃喝，被那些无聊的人无端干扰得只能像搞地下活动似的进行，本来就够郁闷的，现在要我改期，我还不如直接跑到福州有关部门门前竖中指。

改期是不可能的，除非改为从今以后游精佑都不准请客吃喝。再说，已经有朋友来了，很多人我还是初次见面，我的同学也肯定要来，吃喝改期，开什么玩笑。

在酒店大堂迎接朋友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一些晃荡的身影，他们是有关部门的人，这个在预料之中。

六点半，我们一家来到包厢，一看，基本可以做满三桌。我决定四桌全部开张。

还有朋友通过不同途径告诉我，正在前来的路上。我担心四桌坐不下，就联系酒店领班，问她如果要开预留的第五桌，包厢在哪里？她说，就在隔壁。我说，好，随时要开，看情况吧。

她说没问题。

我不知道酒店是否被告知，今晚吃喝被他们强行附加的性质。但从酒店服务安排情况看，没感觉出异常。

开席前一刻，一位陌生的朋友，身体突然发病，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子，等稳定下来，扶他到楼层客厅沙发上躺下休息。我再进包厢里看，来人已经超过四桌。我考虑加桌和加座的利弊后，决定加座。

大家有条不紊地开始吃喝。同学提醒我是否要讲几句，我说算了。我喜欢自然的状态，大家五湖四海，又已经无拘无束地开始了，我再讲话就是画蛇添足了。

我最担心的事情——吃喝不成——没有发生，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对，敬酒。

于是我开始一桌一桌地敬酒。

我原先以为四桌人，自己一人一杯啤酒可以轻松应对，事实上，喝到第三桌的时候，我发现自从开车以来，酒量退化，于是开始对喝饮料的朋友特殊对待了。

大家言谈甚欢，气氛，是该有的气氛：大家虽初次见面，却像故交老友，只有网络社会才有这样的交际积淀啊。

有朋友建议大家留下联系方式，我说算了。网络是个很好的社会，大家只要有心，都能互相找得到，现在留我也记不住。大家有话题可以多聊，有酒量可以多喝，开开心心地吃喝。

有朋友提醒说某某怎么没到？我一想，是啊，怎么忘记通知她了？上回于教授到福州讲座的时候，我们见面谈到这次吃喝，她说到时候要通知她，一定会来的。我赶紧打电话道歉，说，我只顾集中精力考虑吃喝能否成功的问题，确实疏忽了。

这时候我想起来，前面电话约好的几位做生意的朋友也没到场。想想，宴席过半，都吃到这份上了，再催他们来喝几杯意义也不大。（后来我专门登门说明，他们说，本来是打算来，后来事情一忙就忘了。但是如果知道这次吃喝的含义，无论如何是要来的，对不起啊，游哥。）类似的事例不少。

吃喝进行中，接到几个外地朋友的电话，都是祝贺吃喝愉快，对不能前来表示遗憾。其实，我不太遗憾，四桌刚好加几个座，说明冥冥之中我的预感和计划还是很切合实际的。这种成就感，只有我自己能体会。

那些到场和不能到场的朋友，加上福州有关部门，大家合力促成了这样效果的吃喝。这

是很有意思的。

陈老师建议我们全家敬大家一下。于是我稍微休息一下，又各桌走了一遍。这一轮每桌喝的酒有多有少，好在大家都体谅我的酒量，没有勉强。

我把印刷的无中生有《致网友们的声明书》和自己的申诉小册子送给老林律师，跟他说，以后我要申诉的话，就把这小册子装信封里，贴上八毛钱的邮票寄出去，这样成本低一些。虽然格式好像不太正规，但对目前画胡烂[90]的福建司法，我觉得如此处理，还是很般配的。

送走吃喝的朋友，跟几个同学找个地方喝茶聊天，他们都对今晚的吃喝评价很高。嗯，这是一次成功的吃喝。

十点左右到家，接到“国保”的电话，他问：“今晚还顺利吧。”

我说：“是，蛮顺利的。”

“你现在在哪里？”

我说：“我回到家里了。”

“你不是说还在喝茶？”（估计是从微博上监看到的。）

我心里想，我喝茶或者回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回答：“我现在到家了。”

“都有哪些外地网友来？”

我说：“不清楚，我也不全认识，总共有四十来位吧。”

“你不认识怎么请客啊，下回我带一百号人过去，你也都请？”

我说：“来的都是客，来赴席的我当然都会安排。”

“你连来的人也对我保密啊。”

我觉得这个对话又开始变得无聊，就把电话掐了。

后来在推特上说，我把你电话拉黑了哦。我知道他会看到这些信息的。

本来我请客吃喝，与你们无关，你们自己要多事，胡搅蛮缠地要寻找自己的工程量。找了也就找了，还到处围堵，差点让吃喝冷场。现在大家平平顺顺地把吃喝进行完毕，你的差事完成了，我的吃喝也暂告段落，何必再寻这些无聊的话题让我恶心呢？难道认为你们让我吃喝成功，是给了我天大的恩惠，我从此要把你们当朋友？这个逻辑有点牵强吧。

你是具体的工作人员，你的领导发疯，采用对付三网友案那样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伎俩，把这场吃喝定性为非法聚会，用来吓阻准备前来吃喝的网友，但咱们是面对面的人，非要搞得大家很弱智，你说是不是很没意思？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还有，你们领导说什么看这次听不听话之类的，我不是他的下属，他怎么放屁是他的自由。听话这样的词，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是什么意思？你不听话，对你会有影响；我不听话，就再把我抓起来？

我很想知道你们领导是谁，然后呢？然后……

补遗：罗哥是一个只关心我的生活，对我的思想不感兴趣的兄弟。七月七号，罗哥从外地回到福州，我们两家吃饭。饭后我们在万达楼下抽烟，风很大。我跟他说四号是我出来的周年。他说，我一忙就忘了，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大家一起聚聚啊。我说，我安排了一场吃喝，但是差点被那些神经病部门弄得搞不成。罗哥静静听完我的讲述，按灭烟头，轻轻地说：他妈的。

---

[90] 乱七八糟之意。

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作家，一九七０年代生于东北。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伊甸樱桃》，散文小说集《遗忘在光阴之外》。

为了光，为了时间——东师古行记

慕容雪村

（一）

二０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晚，我在青岛海洋大学做了场演讲，在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问我：你谈到了陈光诚，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去看望他？我解释了一大通，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自己也觉惭愧。我曾经在微博上为陈光诚说过话，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我的言论都显得有点轻浮——他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却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有人说，陈光诚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由，一个更好的自由。但我当时并没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我不想自己的书被查禁；不想当敏感词；我计划去几个国家演讲，不想横生枝节；还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有人或许会说：看望一个人有这么夸张吗？我要说，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确实就有这么夸张。我不想为自己的懦弱辩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贵，虽然只是可怜的、夹缝中的自由。我以前讲过一个死囚和骨头的故事：死囚跪在地上，只要丢给他一根骨头，他就会跪在地上等死。而我就是那个舔骨头的囚徒，为了一点小名声、小利益、小安全，吓得浑身发抖，每根骨头都是软的，一直哆嗦到死。两小时后，我在青岛大剧院见到了王小山，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陈光诚。他说："我们对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赞同，可是依然下不了决心，小山似乎也没有下决心。为此我心里有点别扭，相信他也同样别扭。

第二天中午，在青岛海边的"小渔村"酒家，与小山、恩超、中强和诺拉姑娘一起吃饭，大家一拍即合，决定饭后就出发，去临沂，去东师古，去看望那个饱受折磨的好汉。我是个怂货，需要有人壮胆，至此终于下了决心，心头一阵轻松。诺拉外表柔弱，所有人都反对她去，但她异常坚定："你们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如果你们不带我，那我就自己去。"

中强拿刘沙沙的例子劝她，说女性不应该参与这么危险的事，因为东师古离我们有好几千年，远在丛林时代，有许多诡异的特产：布袋蒙头、拳头打脑袋、脚踢裤裆，还有抢劫和猥亵。

诺拉不为所动："我不怕！反正我要去，要么跟你们一起去，要么我自己去。"

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笑着打圆场："去吧去吧，不就是猥亵吗？多大个事呀，又不是抢鸡蛋"

诺拉眼睛明亮地回答："就是，又不是抢鸡蛋！"

作业本[91]帮我们联系车辆、安排行程。为防不测，我和王小山把钱包和银行卡都交给了我们的朋友杨瑞春，身上只带了身份证和现金。作业本已经去过一次，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丛林旅游攻略，以及去往野蛮时代必须注意的事项，我听了连连点头，在心里给自己壮胆：大不了挨顿揍，不怕。

一个小时之后，车来了，我们五个人振奋登程。通往野蛮时代的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没

[91] 网名。

人再害怕，我们甚至谈笑起来，中强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被打的准备、受伤的准备和被拘留的准备。"大笑。

进入临沂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城中灯火闪耀，一面面广告牌依次进入视野，上面写着"大美临沂"、"文明临沂"、"宜居临沂"，某个路口的电子屏幕上有两行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我想起陈光诚的遭遇，感觉这城市很有点黑色幽默，当时想把它拍下来，刚拿出手机，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

在市中心的荣华酒店开了三间房，诺拉自己住一间；我和小山住一间，房号一三一0；恩超和中强住一间，房号一三一七。四个男人中，恩超和中强都是实名上网，怕被追踪，用了我和小山的身份证登记（我们俩用的都是笔名，小山本名范春三，我叫郝群），登记时有个中年男人一直盯着我看，不知道是什么人，心里有点紧张。开完房到酒店十七层吃了顿晚餐，几道菜都是当地土产：拌牛蒡，拌三七，一大碗土鸡汤，还有恩超最爱的土豆丝。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是因为忧虑，平日酒量甚豪的小山和恩超都没怎么喝酒。

饭后在一三一0房讨论第二天的行程，按恩超的意思，进入东师古之前，我们应该做点有表现力的事：每人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光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村口到你家。然后拍成照片发到网上。我和小山都不赞成，因为我们只是去探望朋友，这事很平常，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根据网上的消息，@胡晨晨、@TIM[92]的所谓"二十一人团"也会在第二天到达，中强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会合？"

小山摇头，说："这二十一个人中，说不定就有几个钓鱼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况且，我们不过是去探望朋友，不需要声势浩大。"

夜色渐深，心情也随之沉重，我们共同决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决不动手；如果有人要打我们，那就任由他打；如果打得太厉害，那就跑，跑不掉就听天由命。有人说我们此行意在作秀，但在当时，我们确实做好了准备，准备流一些血，受一些苦，我们只是想验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去看望一个未被判刑的"自由人"会有多么艰难。但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得出结论，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离陈光诚的家依然无比遥远。正如恩超想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村口到他家。

那是二0一一年的十月十五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四个胖子和一个女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夜色渐深，女人已经睡熟，某间房里的两个胖子响亮地打起呼噜，轮番把对方吵醒。在另一间房里，一个胖子在打呼噜、说梦话，每过半小时磨一次牙，另一个胖子夜不能寐，坐在马桶盖上抽了几支烟，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在不远之处的某个村庄，一群身强力壮的人正在彻夜巡逻，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所房子。那房里有一个盲人，曾为了众人的福祉奔走呼喊，为此受尽了折磨。他坐在黑暗的底部，却挣扎着为他人寻找光明。在这波澜不惊的夜，但愿他有个好梦，梦见花朵妩媚，满世缤纷，梦见一个光明照彻的家。

（二）

从临沂出发，沿二0五国道向北，经青驼、双堠，大约七十分钟，就能到达东师古。这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但近段时间名扬四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定会誉满全球。在网上，人们把它写成"冻死骨"、"尸骨村"，意在嘲讽，但"师古"两字的本意并不坏，以古为师，回归传统，重拾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品格，这无论如何不能算坏事。当然，这里的"传统"是民国之前的传统，不是以阶级斗争和厚黑学为纲的现代传统。

十月十六日早上六点，酒店打来叫醒电话。天已经亮了，我们匆匆洗漱，上了事先联系好的出租车。司机是个笑眯眯的小胖子，样子憨厚，做事踏实，对很多事都抱着善良而一厢情愿的看法。他总是担心自己收费太高，带着腼腆的表情请我们吃桔子，说"能认识就是缘分"，我们在临沂见到了许多粗暴的人，但我相信，这小胖子比他们更有资格代表临沂，就

[92] 新浪微博上的两个 ID 号。

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世上还是好人多。

我们五个人大概都不习惯早起，个个睡眼惺忪。车到青驼，在路边小摊上吃了顿早饭，五碗豆浆、五个鸡蛋，还有十二根油条，用餐环境不怎么高雅：小桌子、小板凳，豆浆锅上满是灰尘。王小山不敢吃，说是怕闹肚子，我和恩超都笑话他“冒充高干、想吃特供”。他反唇相讥：“你们就吃吧，多吃点，一会儿全给你打出来。”这话有点倒胃口，但油条和豆浆都不错，吃得心满意足，吃完饭我去结账，二十三元，比北航食堂都便宜。

青驼镇离东师古大约十公里，我们的车开了十几分钟，到了一座高架桥样的建筑，司机说这是毛泽东时代建的引水渠，已经用了几十年。我们翘首张望，谁都没敢把头探出窗外。这里离东师古很近，已经到了丛林边缘，必须时刻小心。我们让车开过东师古村口又掉头回来，看见几条大汉站在那里，对面有个小院，院子里也有十几到几十个人，有几个正在吃早餐，看样子全是防守陈光诚的“战士”。

往青驼方向又开了大约一公里，我们下了车，诺拉没有同行，留在车上做我们的后援。那时已经八点多了，阳光晴好，我们各抽了一支烟，正打算动身，对面远远地走来一个小伙子，个子不高，很瘦，怀里抱着一件军大衣。

恩超说：“看，这个下班了，这肯定是值夜班的。”

果然，当我们走到近前，那小伙立刻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接着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估计是在通报敌情。我们假装没看见，顶着阳光，大步走向东师古——传说中的神奇之地。

东师古的村口有一条土路，旁边是两间平房，房里房外都有人，我们慢慢走近，一个穿灰绿色夹克的矮男人迎面拦住：“你们干什么？”

我笑着问他：“请问这里是东师古村吗？”

他不答，还是那句话：“你们干什么？”

我说：“我们来看一个叫陈光诚的人，请问他是不是住在这里？”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片刻，走上来推心置腹地告诉我：“最近吧，俺村里丢了很多东西，什么鸡呀、牛呀，都有人偷，所以你们不能进去。”

我笑起来：“我们不是偷东西的，放心吧，我们就是来看看陈光诚，看完马上走。”

他严肃起来，这时屋里又出来几个人，其中有个穿黑色绒外套的中年人，样子朴实，说起话却很蛮横：“现在是秋收，村里的男人都不在，怕丢东西，不能让你们进去！”

中强再次声明：“我们不偷东西，你放心！”小山更是讲起了法律。

“绒外套”冷笑：“你说不偷就不偷？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我是一个作家，叫慕容雪村；这位是王小山，专栏作家；这位是张恩超，网站总经理；这位是卢中强……”

“绒外套”急了：“俺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说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

场面僵住了，我动了动脑筋，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大约有两千多，说：“你不就是怕我们偷东西吗，这样，我把这些钱押在你这里。”

恩超说：“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如果还不放心，出来后你可以搜我们的身。”

“绒外套”连连摇头：“把钱收起来！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的钱干什么？”

恩超说：“要不我们把身份证押在这里，这你总该放心了吧？”

他们不说话了，谁都不说话，我试着往村里走，刚走两步，被先前的绿夹克一把揪住：“别走了，站住！站住！”

接下来大约有两三分钟，说什么他们都不回应。中强掏出一包泰山，转着圈给他们敬烟，那群人表情僵硬，谁都不接。

我调侃道：“你们不收钱，连烟也不要，拒腐蚀永不沾啊。”小山、恩超和中强都笑。

“绒外套”不乐意了，撇着嘴回敬道：“发言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对吧？”（中强听成“发

烟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也许他是对的。）

在中国，遇到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领导，小山说：“如果你们决定不了，把你们村长叫出来，我们跟他谈谈好不好？”几个人同时回应，说的全是方言，听得语焉不详，好像是在嘲笑他，意思是你还讲法律呢，现在不叫村长了都不知道？（似乎是叫村委会主任）。

这时我注意到村口平房里有一个眼镜男正在打电话，其人白白净净的，看装扮不像村民，估计是这群人的领导，我对他招手：“哎，你出来，我们谈谈！”

那人很警觉，抬头看我一眼，瞬间消失在窗户后面，片刻之后又露出头来，小心翼翼地观察外面的形势，按说他应该不会紧张，可我总觉得他忒贼兮兮的，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僵持了十几分钟，我们进不了村，可是也不想离开，只能在那里耗着。期间不时有村民走过，或徒步，或骑车，没人在意我们，个个神色安详，一副不足为奇的样子，显然早就见惯了这一切。有些人还会停下来，跟“绒外套”们聊上几句，笑得嫣然，说得甜蜜，彼此之间极有默契。这些人一定认识陈光诚，说不定还是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但在此时此地，没人关心他的境况，这满村的人都视他如路人，如仇敌，这满村的人都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地对付一个盲人。

据说东师古为了监视陈光诚，设置了重重关卡，村口只是第一道，或许也是最容易的，但我们费尽心机，却始终无法闯过这一关。我说过，我只想知道去看望一个人会有多难，现在可以回答了：难如登天。

我盘腿坐下，摆出一副耍赖的架势，对“绒外套”发狠：“你不让我进村，我就在这里坐着，要是今天见不到陈光诚，我就不走了！”心里想，这么耗下去也不错，反正还有几批人要陆续赶来，等到人越聚越多，看他们怎么拦得住？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快，一辆大巴开了过来，他们招手拦下，车门打开，一群人立刻忙活起来，又拉又拽地把我们往车上赶，两个人招呼中强，两个人招呼恩超，王小山待遇特殊，也许是被人藐视了，只有一个人对付他。开始没人理我，等把他们三个扭送上车，几个人都围了过来，两个抓我左臂，两个抓我右臂，生拉硬扯地把我拽到车门旁。

当时声音嘈杂，每个人都在说话，我连声嚷嚷：“别拉我，我不走！”

几个人还是拼命地推搡，我伸手扳住车门，说什么也不肯松开，那群人一齐发力，拽得车门连连摇晃，大巴售票员急了：“你放手，别把俺车门弄坏了！”

我还是不肯放手，“绒外套”急了，在我胳膊上“砰！砰！”擂了两拳，有人制止：“别打，别打！”

这时小山劝我：“算了，上来吧。”

我松开手，讪讪地上了大巴，车门关闭前，我对“绒外套”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他不理我，对司机厉声吆喝：“关车门！走！”

买了四张车票，因为太激动，我根本没注意花了多少钱，也没人问我们去哪。司机和售票员显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神色极为镇定。

我挥着手跟他们解释：“我们只不过是来看个朋友！”

小山也站了起来：“这村里有个盲人，叫陈光诚，有人知道他吗？”

有位乘客回答：“听说过，好像坐过牢。”

我身边有个中年女人小声嘟囔：“坐过牢？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无言以对，慢慢感觉手上有点疼，这才发现右手无名指破了一处，流了不多的一点血，大概是扳车门时弄破的，这是微不足道的伤口，不值一提。

大巴又开到了毛时代的引水渠，我让司机停车，他笑着劝我：“在这儿下没用，你看看后面，两辆车一直跟着呢，就算你下去了，他们也会马上把你再扭送上来。”

那两辆车，一辆是无牌照的黑色桑塔纳，另一辆不知道是什么车，一直紧紧地跟着大巴。不知道这些车属于东师古、双堠镇、沂南县还是临沂市，但可以断定：它们一定属于中国。

在青驼镇下了大巴，身后只剩下无牌照的桑塔纳，离我们大约三四十米，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车窗不透明，感觉里面好像是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好像是在给我们拍照。不知道是为了建立敌情档案，还是当成他自己的工作业绩。我很想走过去跟他谈谈，但被恩超劝住了。

在路边拦了两辆大巴，但都不肯载我们。第一辆停下了，问我们去哪，我说去东师古，售票员手一挥："不去!"然后"砰"地关上车门，径直驶向东师古。第二辆车停都没停，只是稍微减慢了车速，待到看清了我们的模样，便一溜烟绝尘而去。

中强说："这沿线的大巴肯定都收到通知了，我们别指望了。"

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那我们就走回东师古!"

从青驼镇到东师古大约十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正如小山所说，山东的路修得不错，算得上康庄大道，我们大步登程。这是二0一一年的深秋，天蓝云淡，空气中有一股干草的味道，路边的叶子落满灰尘。

（三）

我在网上见过一张陈光诚的照片，他穿一件旧西装，站在自家门前，昂头望向远方，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翻出这张照片，开始不明白他何以会笑得如此爽朗，但渐渐地，我懂了，这就是勇者与普通人的差别，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一定也害怕痛苦，一定也会恐惧，但他依然抱有希望，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相信不正常的年代终将过去。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多都读过食指的《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这首诗写于一九六八年，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那一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作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死于狱中，那一年，许多善良的好人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命运，但真正的勇者依然抱有希望，相信未来会好，世界终将回归正常。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我不是什么勇者，我只愿意追随在他们左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

往东师古方向走了大约一两百米，一辆面包车远远开来，在我们面前倏地停下，一个小伙子率先跳了下来，这人身材很高，留着时髦的发型，穿一件黑色圆领T恤，胸口露着半圆形的刺青。在他身后还有六个人，其中有一些身穿黑衣，另外一些不是，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七个人全是一身漆黑，仿佛在黑夜里生活得太久，身不由己地染上了黑夜的颜色。他们一言不发，团团把我们围在中央，为首的小伙子认定了我就是匪徒首领，径直奔到面前，一手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力把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当时恰好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车速很快，中强或是恩超大叫了一声："你们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别动手!"那群人不理不睬，推推搡搡地把我们赶到路对面。

我十分愤怒，相信他们三个也一样，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你们凭什么？你们讲不讲道理？"

对方有人回答："这是我们的地盘，不跟你讲道理!"

恩超大怒："这是青驼，不是东师古，还是你们的地盘？"

对方答：“就是，就是！”

我问：“你们这里谁是领导？我们谈谈好不好？”

他们不说话。小山说：“那我们不去东师古了，我们走路回临沂，这你们管不着了吧？”说完作势要走，被一个家伙一把揪住：“站住，不许走！”

我急了，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你搞清楚，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未经审判，没人可以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

我现在承认，这话说得不合时宜，显得十分幼稚，因为在这个国家，法律并不是挡箭牌，至少不是我们的挡箭牌。果然，领头的小伙子一句话就把我打败了：“什么法律？不跟你讲法律！”

这下每个人都怒了，我们本来是背靠背站在一起，现在各自寻路突围，我印象最深的是恩超，有个家伙一直在撕扯他，恩超两眼圆睁，长发披散，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一次次挣开那人的手，在附近的店铺前连声怒吼：“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不多时又一辆大巴停了下来，黑衣人奋力拉我们上车，我们奋力挣扎。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走，走得越远越好！一个中年男人一直跟着我，抓我的肩，扭我的手，他的力气很大，可还不足以制服我，我一边挣扎抗拒，一边艰难前行，耳边有各种喧嚣，汽车声、喝斥声，还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这不是土匪吗？！”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各有遭遇，恩超新买的皮夹克被撕破了，中强的肚子上挨了两拳，小山的腿上挨了一记很专业的扁踹，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回北京之后才发现两臂有多处淤青，这些并不严重，几乎不能算打，以对方之实力，要打得我们重伤呕血并不难，打死打残也是情理中事，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并没有真的动手，只使用了象征性的暴力，与其说是殴打，不如说是恐吓。

我走了大约一百五十米，那个中年男人一直想制服我，一直未能如愿，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有一会儿他大概是没力气了，只抓住了我的外套，我拖着他走了几步，他大叫：“别走了，衣服都撕坏了！”

我不听，奋力挣扎，突然身上一松，外套被他扯了下来，我继续前行，他不肯放弃，抱着我的外套亦步亦趋，这时小山他们都已经被弄上了车，那个刺青小伙飞奔过来，右臂搂住我的脖子，猛然将我摔倒，厉声喝道：“叫你别动，听到没有？”

我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愤怒地嚷嚷：“好，你打人！你打人！”

刺青小伙回答：“谁打你了？谁打你了？”

我说：“你把我摔倒了，这还不算打？”

他当面扯谎：“谁摔你了？你自己跌倒的！”

我气得语无伦次：“原来你也会害怕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他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后面的事情非常模糊，不知道是汽车开到了我的面前，还是他们把我押送回去的。我只记得路边某家商店走出来一个小姑娘，缩在墙边呆呆地看着我们，两眼大睁，样子十分害怕。

又一次被扭送上车，当时车门口的阶梯上站着一个穿浅色衬衫的男人，个子很高，估计是他们的首领。小山和中强一起推他，小山说：“你下去！没人帮你买票！”

那男人稳稳站定，回头怒斥：“你们，忒不是东西了！”

小山说：“我记住你了，记住你这张脸了！”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没讲一句粗话，“不是东西”就是最严厉的指责。也许有领导专门交代过，也许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纪律，我不能因此说他们是文明人，因为文明人不会这么野蛮。事后我和小山讨论过，我说他们不一定就是坏人，也许只是信了一些不该相信的话。如果组织上认定陈光诚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恨上他，顺便也会恨上那些支持他的人，这很正常。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刚上高中那一年，我

听了太多广播，所以由衷的相信某个人就是猪狗不如的王八蛋，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清白高尚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小山说："他们也不能算什么好人，做这种事也许只为了钱，每月一千六百元，什么都不用干，只是打打人，活动一下筋骨，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

最后我们都同意：这是一群患有"善迟钝症"的病人，他们不在乎什么善恶，只关心眼前盈尺之地，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他们会变成罪恶的帮凶。如果手中有枪，他们会尽量瞄准，不管枪口下是暴徒、平民还是自己的亲人，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动摇，绝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公分。

厦门大学前校长、《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种人，帮凶。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帮凶就是所谓的"群众基础"，他们人数极多，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也没人需要忏悔，在多年之后，大多数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受了愚弄，也属于受害者。这话不能算错，但还应看到，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援手，罪恶才得以实现。

在当下中国，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四）

我们坐大巴回到临沂，一辆黑色别克车始终尾随，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我们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们加速，它就跟着加速；我们掉头，它就跟着掉头；我们停下来喝汽水、吃拉面，它就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等着。我不知道这辆车属于何人，但可以断定，它花的一定是纳税人的钱。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公款饭局，吃的时候没什么负罪感，但这一次，我要向纳税人道歉，仅代表自己：对不起，因为我们做了一件微小而平凡的事——看望朋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连累了你们，让你们每个人都有所损失。

我们原计划从济南回北京，可是去济南的路必经东师古，对我们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取道徐州。那辆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高速路口，或许它还会继续在那里停留，就像理查·马克思歌中所唱的：无论你在何方，无论你做何事，我都将在此坚守等候。直到徐州方面通报我们安全抵达的消息，它才会欢快地驶回东师古，并以此结算奖金和工资。感谢它的耐心，但我希望奖金的数额不要太大，纳税人已经够无辜了。

我们于下午三点到达徐州，已经出了山东省界，每个人都感觉一阵轻松。笑眯眯的胖司机要价八百元，我给了一千五百，因为他帮了我们大忙，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他帮了不该帮助的人，不知道这笑眯眯的兄弟回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愿他一切平安。

买了四张回北京的火车票，晚上八点二十二分开出的 G164 次动车，我想起七月二十三日的灾难[93]，心里有点庆幸，也有点悲哀：我们没能见证那次的奇迹，却见证了另一个奇迹，这是奇迹之国。

五个人中，小山经历最为丰富，也格外谨慎，有人打电话问他身在何处，他只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山东，绝口不提徐州二字。我没什么经验，有人问，我就直说，我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去看一个朋友，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证明小山不愧是老江湖，也证明了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做某些正常的事需要付出代价。因为这里是中国，而我也不是外宾。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错得有道理，因为做正常的事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虽然我不是外

[93]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两列同向往南行驶的列车，途经浙江省温州市瓯江特大桥时，后车追尾，造成四节车厢从桥上坠下。这是中国高速铁路发生的第一起重大伤亡事故。根据官方公布的名单，此次事故共造成四十人死亡，至少一百九十二人受伤。

宾，但我也有过正常生活的权利，这是人类生活最低的要求，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竟然会成为一种梦想。

四天之后，我们五个人在北京再次聚首。小山在上网，恩超换了一件新的皮夹克，中强在打牌，诺拉在旁边笑嫣嫣地看着，我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伤害了恩超，在此向他道歉。

我们吃了一顿饭，喝了两壶咖啡，说了一些不需要记住的话，我们像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我并没忘记，陈光诚此刻还在东师古，还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相信，诺拉也不会忘，中强也不会忘，恩超也不会忘，小山也不会忘，还有更多的人都不会忘：当我们在干净明亮的屋子里端起酒杯，陈光诚正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

如果你生活在东师古，陈光诚离你很近。即使你不在东师古，陈光诚也离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他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关心陈光诚，但应该明白：当他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的自由也将岌岌可危。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段话：在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之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请从我开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也请从我开始。如果我流血别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损失别人就可以不损失，我愿意损失殆尽。

这段话的作者不是陈光诚，但几乎就是他说的。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能将这段话读给他听。然后坐下来喝杯酒，庆祝我们终于实现了一个梦想：正常的生活。

十月十五日深夜，我在临沂荣华酒店读班•哲伦的《暗夜无尽》，书中描写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一些可怜的人活在其中，有人死去，剩下的都在等死。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依然有人珍视时间，他叫迦罕，是个年轻人，他坐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每天三次为囚犯们准确报时。他活在黑暗之中，却在时间中看到了光明。他身陷囚牢，却在时间中获得了自由。

第二天回到北京，有位前辈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你是一个作家，做这种事有意义吗？我回复他：有，为了光，为了时间。